斯大林与冷战

张盛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大林与冷战

（1945—1953年）

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

张盛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与冷战/张盛发编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

ISBN 7-5004-2779-4

Ⅰ．斯…　Ⅱ．张…　Ⅲ．冷战-研究-苏联
Ⅳ．D8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84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三河广增装订厂装订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32.00 元

目　录

谨以此书献给

我在大洋彼岸的亲爱的姐姐张桂凤

推荐意见书

“冷战”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各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意兴仍不衰退，盖因“冷战”对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斯大林与冷战》是国内第一部从苏联角度论述冷战特别是苏联与冷战起源关系的专著。它对于了解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误，研究和吸取苏联在冷战中的经验教训，防止新的冷战，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在确认美国在冷战起源中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论述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第二，书中所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近年来首次公布的，并且尚未见诸于国内的同类著述。这对于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特此推荐。

李静杰　研究员

1999 年 6月 30 日

推荐意见书

张盛发同志所著《斯大林与冷战》是“冷战”后我国国际政治学术界撰写的有关“冷战”起源的少数论述之一，特别是着重从苏联的政策与实践的角度分析“冷战”的起源，本著作具有开创性。

作者在肯定美国由于“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它的称霸世界的对外战略”，对“冷战”的起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前提下，根据新披露的原苏联档案资料全面阐述了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本专著作者对“冷战”起源的分析，对全面总结战后东西方之间爆发的“冷战”经验教训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苏联与“冷战”、特别是与“冷战”起源的关系，这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2. 与同类著作相比，首先比较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的概念。

3. 书中引用的材料绝大多数来源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其中大部分尚未见诸国内同类著述。

特此推荐。

邢书钢　研究员

1999 年 6 月 24 日

单位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1. 此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在于：该专著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现象的冷战，对于防止国际社会陷入新的冷战局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而研究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了解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误，吸取苏联在冷战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发展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此成果的新见解是：该专著在大量新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指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斗争过程，不仅美国而且苏联都是冷战起源的源头。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的概念，这是学术上有意义的探索。

3. 此成果的著作权没有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
中亚所学术委员会
1999 年 7 月 27 日

导 言

冷战一词为人们耳熟能详与其说是在冷战年代毋宁说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历史现象的“冷战”，原本只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只有了解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由合作转变为对抗的历史，才能确切地知道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倒是冷战结束后，冷战一词更为普及，成为一个凡是阅读报刊的人几乎都熟悉的流行词语。这是因为诸如“冷战思维”、“冷战后时期”和“冷战后国际格局”等词语频频见诸报端的缘故。这里，“冷战”是作为修饰词出现的，并不涉及冷战本身是什么。因此，如果要问冷战是什么？似乎真会难倒一大批人。这样说虽然近乎刻薄，但却并不失之严肃。因为，就“冷战”一词来说，无论是其字面定义还是其特定内容都是一个几近玄虚的复杂问题。就为“冷战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史学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并且迄今似乎还不能算结束。

冷战是什么？依笔者的愚见，大致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第一，广义地解释，冷战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非武装、非流血形式的对抗、对立和斗争。这种冷战现象实际上在国家产生并且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便存在了。只要两国之间发生对抗和对立而又不爆发战争就可以称之为冷战。据西方史学家考证，冷战一词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如果追根溯源，14 世纪卡斯提尔的政治评论家多恩·胡安·曼纽尔可能是最早使用冷战一词的人。他在有关战争的评论中

说，“战争具有一种或者死亡或者和平的直截了当的结果，而冷战既不能给发动战争的人带来和平也不能为他们带来荣誉……”[1]19 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在评论当时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时也使用了冷战一词。他于 1893 年写道：“这种迫使别国紧追德国的不断扩充军备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用过这种措词，但是人们可以说它就是冷战。没有枪声，但却有流血。”[2]二战结束后，最先使用冷战术语的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他在 1945 年 10 月分析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时指出，“它是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一 种如同古代奴隶制帝国那样的恐怖的稳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强国是不会立即被征服的，它会经常与其邻国处于一种‘冷战’的状态”。。[3]第二，狭义的冷战则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涵义，它是指二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东欧剧变前，美国和苏联及其他们的盟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相互对峙和对抗的一种状态或现象。用冷战一词来形容战后美苏对抗关系和对峙状态的第一人则是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他在 1947年出版了一本论述战后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专著，书名就叫《冷战》。[4]自此以后，冷战一词便广为流传，用以特指美苏或东西方之间那种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一切对抗行为和对峙状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也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对象。

美苏之间的冷战使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之中，阻滞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影响。现在，虽然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冷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终结，但是，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冷战的影响和冷战的遗迹仍然存在。换言之，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并不太平，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当，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就会被

阻止，其结果不仅会使冲突各方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会使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进程再次受阻。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研究冷战的意兴不仅未衰反而更盛。这当然不是猎奇，而主要是反映了人们希冀通过研究冷战的历史来有效地防止国际社会陷入新的冷战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当冷战结束后，才能更全面地描绘冷战的历史画面。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冷战的研究早在 40 年代末，即冷战刚出现不久就开始了。在长达四五十年的研究中，西方研究冷战的学者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流派：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或新修正派）。

正统派产生于 40 年代末。其代表人物中许多是亲历冷战的政治家和官员。如，凯南、贝尔纳斯、史密斯等人，甚至包括杜鲁门总统本人，其中当数凯南的影响为最大。因为他的观点不仅成为官方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了学者们的研究走向。[5]正统派学者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廉·麦克尼尔[6]、赫伯特·菲斯[7]和诺曼·格里布纳。[8]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正统派的观点颇为流行。正统派把冷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他们认为，冷战的出现和欧洲的分裂是因为斯大林想要把尽可能多的欧洲地区置于追随苏联的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的控制”下。美国只是对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作出了合理的反应。但是早在 40 年代末就有人向正统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1949 年，英国物理学家布莱克特在其所著的《恐惧、战争和原子弹》一书中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是为了吓唬俄国人。这可以被看做是早期的修正派观点。

到了 60 年代，修正派的观点汇成声势颇大的主流。他们中有：威廉·威廉斯[9]、唐娜·弗莱明[10]、加布里埃尔·科尔科[11]、劳埃德·加德纳[12]、巴顿·伯恩斯坦[13]、戴维·霍罗威

茨[14]、加尔·阿尔佩罗维茨[15]、托马斯·佩特森[16]等。修正派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在美国而不是苏联。美国的政策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迫使苏联采取行动以捍卫社会主义集团的利益。

70年代，随着美国档案中机密材料的解禁和美苏在欧洲缓和的出现，又兴起了后修正学派。其主要代表有：约翰·加迪斯[17]、乔治·赫林[18]、马丁·舍温[19]、盖尔·伦德斯塔德[20]、丹尼尔·叶尔金[21]、沃伊捷赫·马斯特尼[22]等。后修正派综合了前两派的观点，注重研究美苏两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他们认为冷战是一系列不幸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错误和误解引起的。后修正派中还有些人抛弃了在美苏两国中寻找冷战起源的两极论观点，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美苏以外的国家，如探讨英国和北欧国家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他们是后修正派中的值得注意的重要分支，也被称为“非极化派”。其代表人物有：弗雷泽·哈伯特[23]、罗伯特·哈撒韦[24]、艾伦·布洛克[25]等。

除了上述三种学派外，有人认为，在修正派和后修正派之间存在着一个现实派。他们以正统派观点为基础，揭示了西方流行观点与冲突的现实之间的一系列差异。[26]还有人认为，在后修正派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后修正派。他们对后修正派关于误解产生冷战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正统派关于斯大林挑起了冷战的观点是正确的。[27]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在美国和西方兴起了研究冷战的新的热潮。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设立了《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项目》。[28]该中心几乎每年都举办有关冷战问题的研讨会，并出版专题刊物，公布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冷战时期的各种档案材料，发表有关冷战研究的论文。[29]除了美国的以外，该中心还

汇集了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美国哈佛大学也于 1997 年设立了冷战专题研究项目。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研究冷战的视野已不仅仅限于美苏和欧洲，还拓展到了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和国家，出现了所谓‘欧洲的冷战’、‘亚洲的冷战’或‘某地区冷战’等新概念和新术语，也就是说，研究问题的范围和方法更加广泛和多样。[30]

在新一轮冷战研究的热潮中，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的新后修正学派。新后修正学派与后修正学派的界限并非很明确，前者中的有些人实际上就是由后者转化而来的，如，加迪斯和马斯特尼。新后修正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冷战是以苏联挑起而以美国胜利而告终的；从西方的角度看，冷战的结果是利大于弊；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是正确的。

马斯特尼认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帝国来维护安全。他对安全的那种过分的追求是东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并且导致了冷战。所以，冷战的到来是注定的。[31]马斯特尼并不认为冷战是一种错误的并且仅仅产生消极后果的斗争。他说，“如果斯大林创建的帝国真的完全如人们猜想的那么邪恶甚至更甚，那么，那些对这个帝国发动冷战的人就不必为他们这么做而道歉。准确地说，相关的问题只是他们是否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在他看来，冷战持续了 40 多年才结束是利弊相存且利大于弊的事情。弊是冷战的延长让人们付出了“多余的代价”，东欧在 35 年后才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利是“对西方来说”，“冷战的岁月是取得空前成就和收获的时期”。“如果说苏联威胁早在斯大林时期而不是在 1991 年消除的话，那么，为冷战付出的多余的代价和从冷战中获得的好处都会随着苏联的威胁一起消失。”[32]马斯特尼还概括了苏联历任领导人在冷战时期的信念，并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他写道：斯大林在进行冷战时，主要是寄希望于苏联制度

的政治（着重线系作者所加——引注）凝聚力和敌人内部的纷乱。赫鲁晓夫是相信苏联制度的经济优越性，即它能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及其病弱的继任者主要是注重于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旨在在先进武器方面获得对美国的军事均势甚至优势。最后，戈尔巴乔夫在认识到起抑制作用的代价昂贵的军事力量不可能转化为政治力量后，他使苏联制度最终崩溃。“没有斯大林主义重负的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33]

加迪斯认为，苏联那种共产主义独裁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因此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必要的。美国捍卫的是世界文明和人类生存。所以他认为，苏联，具体地说是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产生承担责任。[34]

马斯特尼和加迪斯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相当多的冷战史学者在冷战结束后对冷战的重新评价，在美国冷战史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35]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已经一统美国的天下。譬如，莱弗勒就坚持认为，冷战并不是苏联进行扩张和美国作出反应那么简单。苏联奉行的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使它感到最不安的，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自己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意识形态只是在制定世界革命的概念时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6]

前苏联对冷战的研究，几十年来的观点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即，冷战是由美国发动的。1974 年出版的由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史》（第五卷）援引苏共二十大决议说：“……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刻开始实行‘实力地位’政策……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冷战’和准备新的流血战争。”[37]1987 年苏联出版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更是把美国对外政策与冷战划上等号，说“美国及其盟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冷战’”。[38]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的影响，苏联学术

界有关冷战的观点也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美苏关系是按照相互行为的逻辑发展的，而不是美国挑战苏联应战那样简单。[39]到了 1989 年，终于有苏联学者坦率承认，“苏联领导人在五六十年代使我们国家进入了‘冷战’。”[40]这就是说苏联并不是被动地被美国拖入了冷战。1991 年，在苏联《近现代史》编辑部邀请苏联外交部前驻外大使和官员参加的关于“苏联外交与战后世界安排问题”的圆桌讨论会上，苏联前驻联合国官员罗辛强调，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他为此还回忆了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所采取的使冷战升级的行为。[41]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剧烈变迁，俄罗斯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的以前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有关冷战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源源不断地公布和发表。[42]在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立了一个由来自各研究机关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冷战史的专门机构。俄罗斯学者在档案材料的拥有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他们根据新的档案材料已经撰写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冷战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43]尽管如此，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丘巴里扬所指出的，就已经出版的冷战方面的专著和文章的数量而言，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丘巴里扬还分析了俄罗斯学者在冷战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他认为，俄罗斯的学者们注重研究具体问题，回避理论问题，似乎置身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热烈进行的有关冷战的起因、特征、性质和演变问题的讨论之外。为此他建议俄罗斯学者应当参与这些讨论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有关冷战史的新观点。[44]

但是，不管怎样，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学者有关冷战问题的观点，已与苏联时期迥然不同了。许多学者开始从美苏两

国的相互关系中而不仅仅是从美国方面寻找冷战爆发及其发展的原因。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纳林斯基先生在“苏联对外政策和冷战的起源”一文中认为，“随着轴心国的失败和共同目标的消失，大同盟的崩溃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战后国际舞台上大国所发挥的作用的深远变化而导致的力量重新组合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分歧，在盟国分裂和产生东西方对抗时代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都不愿意理解或接受战后的现实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45]

在中国史学界，有关冷战问题基本上也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是美国发动的。二战后美国采取“向苏进攻策略”，经过“一番周折较量”后，“选择希腊事件为导火线，抛出杜鲁门主义，公开发动了冷战”。而苏联则是“出于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需要，坚决反对美国称霸而奉陪到底，由此形成冷战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是战后美苏双方采取强硬政策和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爆发了冷战。[46]

近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部分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例如，沈志恩在“冷战起源论”中认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47]张盛发在“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一文中指出：“斯大林 1946 年 2 月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 1946 年 9 月《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应当被视做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信号和举措。因此，冷战并不

是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者仅仅是美国的政策引起的。实际上，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你一拳来他一脚去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战略目标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48] 白建才在“论冷战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9]

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在众多的专著、教材、论文和工具书中，有关冷战的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前一种，也就是把冷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冷战结束后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杜鲁门继任，‘冷战’拉开序幕’。[50]最新出版的《美苏冷战争霸史》的作者认为，杜鲁门主义“宣布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式的斗争”，“从此美国政策进入了打着反苏反共旗帜进行全球性的扩张干涉，进行‘冷战’的阶段”。“冷战的掀起，首先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的产物；是西方列强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首，对苏联实力兴起而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的反应；是为维护受到严重冲击，显得朝不保夕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对世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潮流的一种反动。”[51]

所以相对说来，在我国有关冷战问题的研究中，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每每提及冷战，几乎必提凯南的 8000 字长电文、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把它们视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无可辩驳的铁证，而对苏联方面的同样举动则鲜有论述。这恐怕是失之偏

颇的。

本书旨在以苏联为基点来论述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由于本书研究的是苏联与冷战的关系，所以本书对美国的冷战行为一般不作直接的详细论述。但是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本书绝对无意减轻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早已被无法抹去的历史所记载和确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驱使它奉行一种全球性的对外战略，以确保和促进它在国外的商品市场和经济利益，以它的价值观来塑造世界，按照它的意志规范别国的行为。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和进攻性。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外战略，构成了美国方面进行冷战的基础和根源。

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试图把整个世界纳入到它所希望的发展轨道中，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中，美国以土耳其和伊朗的保护者自居，以维护它们的独立和主权为名，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虽然美国迫使苏联最终放弃了对海峡和伊朗的要求，但是美国在危机中对苏联的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和乘机扩充美国在该地区势力的企图引起了苏联的警惕、不满和敌视。战后初期在东欧问题上，美国用各种手段侵蚀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而凯南电文、丘吉尔铁幕演说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向苏联发出的冷战信号。最后，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和通过经济手段组建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并破坏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方面对苏联进行冷战的开始。[52]冷战爆发后，在柏林危机、单独组织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都与苏联进行了全面的针锋相对的对抗和较量。

研究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有了相对足够的论述，而对苏联的冷战行为，国外学者虽有大量的论述，但从中国研究者的角度看，仍然觉得有偏狭和失当之处，因而不能苟同。其二，中国学者对苏联的冷战政策和行为，以往因为限于材料等方面的原因，鲜有论述。但是，作为美苏双方共同参与的冷战，如果要描绘其完整画面的话，那么，这幅画面中不能只有美国而没有苏联，否则，这幅画面就是残缺破损的。本书试图在最新披露和公布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论述苏联在冷战中的举措，与我们已知的美国的冷战行为相拼合，从而勾勒出美苏冷战形成的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历史画面。总之，在同样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于冷战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自己的论述。

斯大林晚年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45—1947 年（也就是战后初期）；第二阶段是 1948—1953 年。第一阶段是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冷战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或者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形势下进行全面对抗和争斗的时期。

战后初期，为了保障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基本框架，苏联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对外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持消极态度。但是，另一方面，苏联把本国的安全利益置于绝对的地位，因而采取了一些违背大国合作的有限进攻行为，如在海峡问题和伊朗危机中的所为。与此同时，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上，苏联与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的不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抗。在危机和对抗中，苏联与美国一样也采取了一些酝酿和导致冷战的行动。

如果说，1945 年和 1946 年是美苏双方在合作和对抗中相互打探和估计对方意图并调整各自的战后政策的话，那么，1947 年则是美苏关系彻底破裂从而公开进行冷战的一年。1947 年 2 月的五国和约是美苏双方最后一次勉强的合作，此后，美苏关系便急转直下。作为冷战的标志，在美国方面有尽人皆知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苏联方面则有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表明，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前，斯大林已经在与铁托和拉科西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商议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宜了。这当然不是说冷战是苏联首先挑起的，而是说明，双方在 1947 年的新的对抗行动是前两年对抗的自然结果，正是前两年的对抗使双方不约而同地奔向冷战。

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或者苏联走向冷战的历程，可以简要地作如下的概括：

1. 雅尔塔体制作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战后安排的妥协和折衷的产物，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等方面的广泛要求和愿望，使苏联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环俄罗斯安全带和东欧势力范围并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对此苏联不仅感到满足而且有理由要设法予以维持。

2. 由于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的要求；由于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由于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奉行了大国合作的政策。由此，战后初期苏联对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持冷漠的态度。

3 战争后期至战后初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是酝酿美苏冷战的催化剂。危机加快了英美联合的步伐，加深了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加快了各自对对方政策的调整。就其内容和结果看，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

完成了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全面对抗的转折和过渡。稍后的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讲话、凯南电文、丘吉尔铁幕演说和诺维科夫报告都与这两场危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4.1946 年 9 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报告作为战后苏联首次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进行全面分析的官方文件，堪称凯南电文的对应物。如同凯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样，诺维科夫报告同样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的作用。

5. 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是逐渐改变的。从时间上看，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和在东欧等问题上的斗争和较量后，苏联已经在 1946 年春天开始考虑重建新的共产国际，试图以阵营（集团）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的对抗。1947 年，当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苏联最终改变了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开始以集团的形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全面的冷战。

6. 导致苏联改变大国合作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中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无法弥合和调和；旨在遏制苏联和组建西方国家集团、侵蚀苏联势力范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西欧国家内部形势的发展（如法共和意共被赶出政府），削弱了苏联在西欧的影响，使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的策略破产；东欧的联合政府策略削弱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大国合作政策某种程度上在东欧成了培育独立倾向的温床。

7. 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奉行阵营（集团）对抗政策的开端。组建情报局的试图产生于 1946 年春天（早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实施于 1947 年 9 月（在马歇尔计划出台

后）。九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反映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看法，表明了苏联准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斗争和全面对抗的决心和打算。而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则构成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阵营（集团）的力量基础。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是既要规范和统一各党的行动和步伐，又要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它与同时期出现的莫洛托夫计划一起，既是苏联对外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必然反应。

8.莫洛托夫计划是对马歇尔计划的直接抵制和对抗。它为苏联东欧阵营（集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冷战爆发后，苏联与美国进入了全面对抗和争斗的阶段。从 1948—1953 年，苏联方面的冷战行为择其大端是：

1．1948—1949 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柏林和德国的争夺导致柏林危机的爆发。苏联试图以封锁柏林交通的方法逼迫美国就范，阻止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从而不仅要加强苏联在德国苏占区的地位，还要保持它在全德的影响。由于对形势的判断错误，导致苏联在柏林危机中遭到失败。

2．1950—1953 年，苏联依靠中苏同盟的力量，与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间接的局部性的热战。这是苏联与美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冷战，它标志着美苏冷战进入了一个整体非武装对抗但局部有军事冲突的新阶段。

3．1950—1951 年，苏联坚决反对美国筹划和签订对日和约，在苏联提出的修正案被否决后，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由此，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没能最终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4．1950—1951 年，苏联曾打算扩大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

设立情报局总书记职务，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从而增强与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这一规划最终流产。

对冷战的研究从冷战爆发后就开始了。几十年来各种文献和著述层出不穷。冷战结束后，对冷战的研究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出现了新的热潮。有关冷战的新材料和新著述还在大量涌现。真可以说，有关冷战的材料浩如烟海，有关冷战的著述汗牛充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那些堆集如山的材料和借鉴前人已有的论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认为，美苏冷战史中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和“模糊处”。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布无疑有助于填补空白和澄清模糊，为人们提供客观公正地认识和描绘完整的冷战画面的机会。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冷战，一方面，必须详细地占有有关冷战的各种材料并进行认真仔细的甄别和辨伪工作。如果轻视甚至无视新的档案材料，显然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冷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奇特现象的，因而也就无法从冷战中吸取什么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以猎奇的态度钻入档案材料中去搜寻轶事趣闻以求什么轰动效应。任何轻慢的态度在冷战这一严肃的论题面前都是有害无益的。此外，即使同样的材料，因为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从中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有可能大相径庭或截然相反。这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足为怪。但是，如果因为刻意论证某种先定的观点和立场而对材料采取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那就会陷于主观和片面，也是不可取的。总之，对待所有的档案材料（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它们进行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的取舍工作。至于前人的有关冷战的著述，那是几十年来冷战研究的可贵成果，撇开其观点不说，都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全盘照搬的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和一概否定的虚无主义、目空一切

同样是不对的。

今天，当冷战的尘埃落定后，再回首昔日曾经险象环生和剑拔弩张的美苏冷战，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为依据，重新研究和分析美苏冷战问题，应当能够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结论。本书将力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最新公布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认真细致地去分析和研究作为国际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史上已经成为历史的冷战现象，以此权作中国的研究者在有关冷战问题上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尝试。

简而言之，研究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现象的冷战，对于防止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新冷战的可能性，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1] 弗雷德·哈利戴：《第二次冷战的形成》，第 2 版，伦敦，1986 年，第 5 页。

[2] 约瑟夫·西拉库萨：《冷战的真正作者请站出来》，《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刊》，13：3，1982 年 9 月，第 9—11 页。

[3] 乔·奥韦尔：《你和原子弹》，论坛，1945 年 10 月 19 日，重印于索尼亚；奥韦尔和兰·安格斯编：《乔治·奥韦尔文论和书信选》，第 4 卷，伦敦，1968 年，第 9—10 页。

[4] 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纽约，1947 年。（以上第 1—4 注解均转引自戴维·雷诺兹主编：《冷战在欧洲的起源：国际范围的透视》，纽黑文和伦敦，1994 年，第 1—2 页。）

[5] 凯南，美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45—1947 年任美国驻苏联使馆参赞，1947 年 2 月起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他致国务院的 8000 字“长电文”（1946 年 2 月 22 日）和署名“X 先生”的《苏联行为根源》的匿名文章（刊于美国《外交》季刊，1947 年，第 25 期，夏季

号）详细分析了战后苏联的政策和意图。他认为苏联正在竭尽全力进行对外扩张，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遏制苏联。凯南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在美国官方和学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6] 威廉·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伦敦，1953年。

[7]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他们所追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年。

[8] 诺曼·格里布纳：《冷战外交》(1945—1960年)，纽约，1962年。

[9] 威廉·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修订版，纽约，1962年；第三版，1972年。

[10] 唐娜·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年)》，二卷本，花园城，1961年。

[11]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1943—1945年的世界和美国的政策》，纽约，1968年；《权力的限度：1945—1954年的世界和美国的政策》，纽约，1972年。

[12] 劳埃德·加德纳：《新政外交的经济因素》，麦迪逊，1954年；《制造幻觉的人：1941—1949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物和理想》，芝加哥，1970年。

[13] 巴顿·伯恩斯坦：《杜鲁门政府的政治和政策》，芝加哥，1970年；《原子弹：关键性的争论》，波斯顿和托伦多，1976年。

[14] 戴维·霍罗威茨：《自由世界的巨人，美国冷战政策评论》，纽约，1965年。

[15]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苏对抗》，纽约，1965年。

[16] 托马斯·佩特森：《苏美对抗：战后重建与冷战起源》，巴尔的摩和伦敦，1973年。

[17] 约翰·加迪斯：《美国与冷战起源(1941—1947年)》，纽约，1972年；第二版，1976年。

[18] 乔治·赫林：《1941—1946年对俄国的援助：战略、外交和冷战的起源》纽约，1973年。

[19] 马丁·舍温：《被摧毁的世界 原子弹与大同盟》，纽约，1975年。

[20] 盖尔·伦德斯塔德：《1943—1947 年美国对东欧的无用政策》，特罗姆斯，纽约，1975 年；第二版，1978 年。

[21] 丹尼尔·叶尔金：《支离破碎的和平：冷战的起源与国家安全状况》，波斯顿，1977 年。

[22]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俄国走向冷战之路》，纽约，1979 年。

[23] 弗雷泽·哈伯特：《铁幕：丘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纽约，1986 年。

[24] 罗伯特·哈撒韦：《模糊的伙伴关系：1944—1947 年的英国和美国》，纽约，1981 年。

[25] 艾伦·布洛克：《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945—1951 年），伦敦和纽约，1983 年。

[26] 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马歇尔·舒尔曼：《斯大林对外政策的重新评价》，剑桥，1963 年；汉斯·摩根索和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沃尔瑟姆，1970 年；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 年）》，五卷本，纽约，1973 年；亚当·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1967 年苏联对外政策史》，伦敦，1968 年；第二版，1974 年；罗杰·摩根：《不稳定的和平：欧洲冷战研究》，伦敦，1974 年；威尔福雷德·洛思：《世界的分裂：1941—1955 年》，拉特利奇，1988 年，第 8—9 页和第 13 页注 10。

[27] 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达林和盖尔·拉皮德斯：《危机中的苏联制度：西方和苏联观点选编》，博尔登，1991 年；卡罗琳·肯尼迪-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 年苏联的欧洲战略》，曼彻斯特和纽约，1995 年，第 2 页和第 7 页注 5。

[28] 英文的名称是：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29] 如 1993 年在莫斯科、1994 年在德国的埃森和捷克的布拉格、1995 年在香港和布达佩斯、1997 年在华沙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迄今已出版刊登冷战时期各种档案材料的《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1 期和《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s）25 期。

[30] 利用新材料撰写的著作如：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的竞争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 年；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

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纽约，1994年；奥德·韦斯塔德等编：《苏联与东欧（1945—1989年）》，伦敦，1994年；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1917—1991年苏联对外政策回顾》，弗兰克和卡斯，1994年；戴维·雷诺兹：《冷战在欧洲的起源》，纽黑文和伦敦，1994年；卡罗琳·肯尼迪-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年苏联的欧洲战略》，曼彻斯特和纽约，1995年；沃伊捷赫·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纽约，1996年；约翰·加迪斯：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反思，纽约，1997年。

[31] 马斯特尼前引书：《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第21、23、106页。

[32] 同上书，第194、195页。

[33] 同上书，第192、190页。

[34] 具体可参见加迪斯：《冷战史的悲剧》（载美国《外交史》杂志，1993年，第17期）和《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反思》，纽约，1997年。

[35] 1997年，马斯特尼所著的《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36] 莱弗勒：《在敌人的档案里：冷战又被开启》，载美国《外交》杂志，第75卷，1996年，7—8月号，第4期，第122页。

[3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7卷，莫斯科，1971年，第97页，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中文版，三联书店，1983年，第291页。

[38] 《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2卷，莫斯科，1987年，第111页。

[39] 苏联《文学报》1988年5月18日，第14版；《当代世界的美苏关系》，莫斯科，1987年，第5页。

[40] 斯米尔诺夫主编：《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莫斯科，1989年，第345页。

[41] 有关圆桌会议的情况，可参见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86—90页。

［42］这些文献和材料经常刊登在诸如《近现代史》、《历史问题》、《祖国历史》、《历史档案》、《史料》、《国际生活》、《远东问题》等杂志上。

［43］主要著作有：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冷战”：新观点和新材料》，莫斯科，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1995年；吉比安斯基主编：《“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莫斯科，1995年；科尔尼延科：《冷战——参与者的见证》，莫斯科，1995年；马利科夫：《曼哈顿方案：侦探与外交》，莫斯科，1995年；托尔库诺夫等：《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莫斯科，1995年；祖博克和普列沙克夫：《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冷战里面：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剑桥，1996年；富尔先科等：《一场糟糕的赌博：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1958—1964年）》，纽约，1997年；盖杜克：《苏联与越南战争》，芝加哥，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斯大林与冷战》（论文集），莫斯科，1998年。有关冷战的文章则不胜枚举。

［44］丘巴里扬：《〈斯大林与冷战〉的序言》，载《斯大林与冷战》（论文集）第4—5页；丘巴里扬：《“冷战”新史》，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6期，第11—12页。

［45］纳林斯基：《苏联对外政策与冷战的起源》，载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1917—1991年苏联对外政策回顾》，弗兰克和卡斯，1994年，第105页。

［46］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

［47］《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48］《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49］《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50］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35页。

［51］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64页。

［52］作为美国方面走向冷战的行为和政策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

如，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其目的不仅是要降低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而且还试图利用它暂时垄断核武器的优势在它的对外战略中增加对苏联的威慑手段，从而加重了苏联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并迫使苏联同它一起走上了核军备竞赛的道路。1946年9月，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利福德在《美国与苏联关系》的长篇报告中提出，“只要苏联坚持推行现行政策，美国就应维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并把苏联影响限制于其目前的地区。”（《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第2卷，第268—304页；转引自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3页。）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进一步深化了他在上一年中提出的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1950年4月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蓝图。

序论

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对外政策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1]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使苏联经济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骄人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此外，工业化运动还伴之以一场清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反“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则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

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 到 30 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把苏联摒弃于欧洲和世界舞台之外，使俄罗斯这个曾经在历史上一言九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民族成了欧洲大陆的“弃儿”。而且，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它把苏俄视为“红色瘟疫”，始则重兵

相加，企图通过武装干涉的手段消灭苏俄；继而又在苏俄周围组建反苏“防疫线”，试图阻止“红色瘟疫”向西蔓延和传播，并对苏俄进行干涉、遏制和颠覆活动。所以，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始终具有一种迫切的危机感和严重的“孤岛”意识，总以为与西方的战争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苏联则把外部世界视为需要用革命暴力加以破坏和改造的邪恶世界。因而，它就以各种手段宣传、鼓动和支持“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理论是 20 世纪初期和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推动和实施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十月革命以后，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它驱使苏联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形式的革命运动，动摇和打破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或世界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外部的世界是战还是和，对它来说无关紧要。战争孕育和引起革命，革命产生苏联模式的政权，似乎更加符合“世界革命”的逻辑。相反，歌舞升平的太平世界倒是不利于宣传和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的战略成为俄共（布）和苏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绞杀的危险。为了苏俄的生存，期望苏俄周边的国家和西欧国家爆发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成为苏俄生存和安全的基础。所以列宁认为，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使其他国家的革命扩大起来，怎样给国际帝国主义以回击’,。[3]列宁甚至把“世界革命’，提高到关系到苏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

甚至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4] 因此，列宁急切地呼吁，“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以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到世界革命。”[5] 但是列宁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其早期无论从言论上还是从行动上看，都谈不上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革命后颁布的《和平法令》其着眼点是退出战争，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其时苏俄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大多数俄共（布）领导人都对世界革命战略充满信心，希望以俄国革命为先导，促进和推动西方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且深信世界革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因此不要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就是一般的共存也不会长久。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6] “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7]

只是在“世界革命”战略一再受挫特别是 1918—1919 年德国和匈牙利等国革命失败后，俄共（布）领导人才开始考虑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的问题。1919 年春夏，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相继崩溃。9 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认为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并提出实行租让制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的愿望。[8] 12 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表示，“俄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

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9]1920 年 6 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的一项报告中宣布，“我们的口号已经是而且今后仍然是：同各国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10]可以说，大致在 1919 年下半年到 1920 年上半年列宁和契切林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口号。

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不能说已经提出或形成了和平共处的政策。作为一种口号的和平共处，其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内容。因为，第一，列宁所讲的和平共处的对象是各国人民。第二，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他的 6 月份的讲话并不能反映和代表俄共（布）及其大多数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同年 7月的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要求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路线。共产国际二大对此表示赞同。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内战在全世界已提上日程”。[11]

在同年 9 月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对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和苏波战争的目的作了重要的论述。他说，俄共（布）领导人认为，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已被最终击退，对帝国主义的防御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可以利用军事形势开始进行进攻性战争。这是苏维埃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转折点。苏俄决定要“帮助波兰苏维埃化”，“用刺刀试探波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检验资本主义欧洲的稳固性。尽管对波兰苏维埃化的努力遭到失败，列宁还是提出“要变防御政策为进攻政策”，直到最后胜利。[12]这表明苏俄所奉行的世界革命战略一仍其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和平共处的口号在此时仅具有宣示性的意义，而不是一项实际政策。只是到 1921 年列宁修改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放弃“直接进攻”的路线后，和平共处的口号才开始逐渐具有一些实际内容。正是这一年，苏俄相继与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济关系。第二年，

也就是 1922 年，苏俄又参加了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但是，和平共处作为一项政策，它的实际意义仍是有限的，也就是限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而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苏俄。就当时的情况看，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乃是苏俄国内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国际上出现了某种“均势”的缘故。因为，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外部的和平环境，“均势”意味着“世界革命”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胜利。所以，和平共处才显得必要和可行。到了 1924 年和 1925 年，苏联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平共处的内涵又扩大了。但是，对于苏俄来说，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它决不意味着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

必须指出的是，当世界形势并未按照列宁的估计和设想发展时，特别是当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关系出现某种“均势”和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修正了他原来的观点。列宁在 1921 年 6—7 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13]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14]但是列宁的修正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列宁逝世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和确立了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地位后，完全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的特征是把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战争画上等号。斯大林对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

机”。“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15]“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16] “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惟一手段。”“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17]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

然而，不管怎样，从1924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经济和政治较为稳定的局面，要想在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已经出现了“某种暂时的均势”，由此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的阶段。[18]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没有西方革命这一外来援助，苏联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19]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区别，认为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20]1927年7月，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又认为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21]

这样，维护苏联的安全便成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然，“世界革命”战略并未放弃，但它

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世界革命”必须符合并且促进苏联的安全利益。以后的实践证明，保障苏联的“一国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增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安全，则有利于推行“世界革命”。在具体实施时，既有轻重缓急之分，又可双管齐下，一切以苏联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如果“世界革命”战略妨碍苏联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须暂时隐退。总之，斯大林时期，“世界革命”战略已经重新定位，成为苏联安全的附属物，并且主要由共产国际去推动和实施“世界革命”。

受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并且鉴于 20 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出现，共产国际此时也部分地修改了它的“世界革命”的观点。“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短期目标，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进程，称之为“‘世界革命’进程”。1928 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承认，这一进程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相互联系的复杂的进程。但它强调，“只是归根结底‘世界革命’进程将导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22]

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指导和影响，共产国际常常夸大事物发展的革命趋势，而忽视和否定其他的趋势和可能性。只要资本主义矛盾一尖锐，就认为革命即将来临。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共产国际内普遍对新的革命风暴寄予厚望。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的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11 次全会上（1931 年 3—4 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 1918—1919 年的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23] 1933 年

11—12 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13 次全会要求各党“坚决地向广大群众提出以革命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任务”，为捍卫苏联而斗争，集中所有力量为无产阶级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做好革命准备。[24]这里只注意到了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忽视了法西斯日益增长的危险，因而反对法西斯的任务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只是到 1935 年共产国际才认识到法西斯对整个人类构成的威胁，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采取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的战略。但是，共产国际只是阶段性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而且对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并没有正确的理解。在它看来，反法西斯政权最终也应让位于无产阶级政权，因而它就无法坚定地去贯彻反法西斯的战略。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又重新回到了“世界革命”战略的轨道。 9月 7 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斯大林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贫困国和富有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我们乐意看到他们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如果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位被希特勒所动摇，那也不错。希特勒正在破坏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并且也不希望这么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意义了。”“战争引起了根本转变。以前提出的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奴役者的处境。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就产生了消灭奴役制的问题。”[25]这里斯大林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区别，忽视了反法西斯侵略国家的人民利益，再次提出了利用战争进行革命的不合时宜的任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放弃了反法西斯战略，试图

在战争的条件下寻找革命的机会。9 月 27 日，共产国际在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这不是一场民主对法西斯的战争，这是一场无论从法国还是从德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关于法西斯的问题今天已退居第二位，反对造成这场战争原因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6]9 月 29 日，共产国际在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资本主义的支柱不是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法西斯德国，而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的反动的反苏的英国。现在提上议程的不是与法西斯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现在不适用了。”[2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杂志 1939 年第 8—9 期上刊登的经斯大林修改过的文章中提出要“把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的问题提上日程”。[28]

1940 年 1 月，在纪念列宁逝世 16 周年大会结束后，斯大林对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把世界革命当做一项统一的行动，那是瞎说。世界革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国家里发生的。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事业。”[29]这表明斯大林已经不再把世界革命看做是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和同时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而是将世界革命视为可以在不同国家先后发生的分散性革命。同时它还暴露了斯大林要把红军当做世界革命工具的意图。

法国沦亡前（1940 年 6 月）在一份由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共同拟定的法共宣言草案的材料里留有这么一张小纸，上面有季米特洛夫的手迹：“但是要使法国成为人民的法国问题在哪里呢？”“1871 年”。[30]显然，这是要效法 1871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建立的巴黎公社。

然而，1941 年 6 月爆发的苏德战争使斯大林的坐山观虎斗然后伺机实施“世界革命”的打算宣告破产。现在的问题不

是革命而是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战争爆发的当天（6 月 22 日），斯大林就嘱咐季米特洛夫，“不要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31]季米特洛夫当天就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他指出，“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呼吁在某些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能呼吁进行‘世界革命’。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国家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占领者奴役制度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32]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国际的存在和活动妨碍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施和不利于苏联同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关系，斯大林决定要共产国际让路了。1943 年 5 月 21 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总结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33]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宣布解散。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失败。斯大林认为所犯的错误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其实更为深刻的原因乃是不存在实施“世界革命”战略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论和“世界革命”的战略。解散共产国际仅仅是斯大林在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暂时的退却手段和方法，这是苏联的最高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人员和机构也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主席季米特洛夫随部分机关并入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由该部继续与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34]

概括起来讲，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区别在于：列宁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宁的理

论和指示为基础的，其特点是把“世界革命”看做是一场虽有先后但却是迅速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序幕。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直接进攻”的策略。斯大林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斯大林的理论和指示为指导的，其特点是使“世界革命”的战略服从苏联的安全利益，放弃了速胜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谋求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做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寻找和利用矛盾、观察和等待进攻机会的迂回策略。

斯大林对外政策中的“一国安全”战略，就是要维护和确保苏联安全。它要求拒战争于苏联国门之外，建立一种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一国安全”，而不是普遍的安全。这是在“世界革命”短期内无法获得胜利特别是转而致力于在苏联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和要求。它在 30 年代的斯大林对外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惨痛的灾难和悲剧。战争的原因其实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体系中就已经潜伏着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设计者们（主要战胜国）按照旧时代的实力和强权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公正的和平结构。这一结构的重心和支撑点在欧洲，主导的核心力量是英国和法国。它压制了德国，排斥了苏联，剥夺了广大中小国家的应有的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另一个处于上升势头的大国美国的有力支持。因此，这样一种和平结构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立的、矛盾的和不稳定的因素和成分。其结果是，在凡尔赛体系中没有地位的中小国家在后来的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只能或者仰赖于大国，或者任人宰割，或者做些无力的抗争。正是由于把广大中小国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才使凡尔赛体系失去了稳固的基础，以至于在遏制法西斯扩张和侵略

中显得极为脆弱和不堪一击。美国由于其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当时在欧洲的有限利益，对欧洲大陆列强角逐的游戏并无多大的兴趣。这样，虽然美国曾费力地设计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但最后还是与凡尔赛和约和国联告别。美国人游离于凡尔赛体系之外，使欧洲的战后和平结构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致使英法在与德国的抗争中甚感势单力薄。

而凡尔赛体系致命的弱点是它对德国的压制和苏俄的排斥。它使受到严厉处罚的德国和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的苏俄成了欧洲大陆的“弃儿”，从而也使它们成了凡尔赛体系的对立和破坏力量。正是出于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的憎恨，这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毫不相同的国家以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35]，这足以对凡尔赛体系构成致命的潜在危险。德国法西斯也正是以纠正凡尔赛和约的不公为旗号，在广大民众中招摇撞骗，最后夺取了政权，并进而对外进行扩张和侵略，用刺刀去捅破它所要抹去的凡尔赛体系。

被摒弃于欧洲和平结构之外的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同样充满了危机感。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紧张关系，使它确信一场现实的反苏战争迫在眉睫。因而，这促使它一方面以非常的手段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加快“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强应付不测事件的能力。而且在这过程中常常伴之以自我毁灭的各种“大清洗”。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外等待实现“世界革命”的机会。

一个要消除凡尔赛体系的不公，一个要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到 30 年代初中期，这两个欧洲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已经聚集了充足的能量和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向凡尔赛体系挑战了。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恢复，苏联的工业化也已经完成。事

实上，到这个时候欧洲大陆已经形成了英法集团、德国和苏联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欧洲大陆上力量的重新组合，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旧的和平结构已经动摇，剩下的问题就是，以和平的方法还是以武力的手段来缔造一种令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和平结构，从而平衡各方的利益。显然，英法是倾向于前者。因为，虽然在三方力量的对比中，英法的综合实力要强得多。但是，它们在既得利益的包袱下，害怕战争打到自己的头上，因而，对德绥靖和祸水东引就成了英法的一厢情愿的选择。而对法西斯德国来说，英法那种局部性的让步已经无法满足它的贪婪的欲望和无止境的野心。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夺回被凡尔赛和约剥夺的东西，而且要建立一个包括附庸国体系的“大德意志”。简而言之，德国法西斯就是要彻底打破旧的国际格局，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奴役其他民族。因此，依靠武力来夺得“阳光下的地盘”就是它的惟一选择了。

就苏联而言，在 30 年代那种波谲云诡的复杂局势下，如何保障苏联的安全并在新的格局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却是一件颇费神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英国和法国，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都是与之对立的力量。而且就军事实力来讲，苏联相对要弱一些。但是就现实而言，法西斯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侵略和进攻的锋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0 年代初期苏联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试图通过与英法联盟的方法来抵御当时威胁最大的法西斯德国，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由于苏联与西方长期的对立和敌视以及不同的对外利益，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和诚意，并且谁都不愿与咄咄逼人的德国迎面相撞。英法试图“祸水东引”，苏联则想要“祸水西推”。其结果在纵横捭阖的外交游戏中，英法的绥靖政策在 1938 年制造了一个试图填饱德国欲望的慕尼黑协定，而苏联所谓的“集体安全”则顺势转变为“一国自

保”, 于 1939 年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法西斯国家退避三舍的时候，只能是法西斯大行其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不可避免。虽然苏联构筑了“东方战线”，并竭力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但仍没能逃脱希特勒德国对它的突然袭击。从“集体安全”到“一国自保”，最后还是未能使苏联免于战火之外，从而使二战前夕斯大林对外政策中苏联“一国安全”的战略目标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注 释

[1] 关于斯大林体制及其形成可参阅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

[2]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1 卷，第 149—150 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28 卷，第 134 页。

[4]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467 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4 卷，第 6 页。

[6] 同上。

[7]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126 页。

[8]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188 页。

[9] 同上书，第 394 页。

[10]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2 卷，莫斯科，1958 年，第 639 页。

[11] 《共产国际二大》（1920 年 7—8 月），莫斯科，1934 年，第 556 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5 期，第 46 页。

[12]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0 年 9 月 22

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发言速记，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2 年，第 1 期，第 16—17 页。

[13]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64 页。

[14] 《列宁回忆录》,第 4 卷，莫斯科，1969 年，第 26 页。

[15]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13—215 页。

[16] 同上书，第 215—217 页。

[17] 同上书，第 217—233 页。

[1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17—218 页。

[19] 同上书，第 289 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59—74 页。

[21]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291 页。

[22] 《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 6 册，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9 年，第 36 页，转引自《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5 期，第 50 页。

[23] 《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11 次全会速记报告》，第 1 册，莫斯科，1932 年，第 42—43 页，转引自同上，第 51—52 页。

[24]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13 次全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34 年，第 594、595 页，转引自同上，第 53 页。

[25] 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5，转引自菲尔索夫：《1939—1941 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 年，第 6 期，第 18—19 页。

[26]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184，案卷 4，页码 48，转引自同上，第 22 页。

[27]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184，案卷 4，页码 53，转引自斯米尔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22 页。

[28] 季米特洛夫：《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载《共产国际》杂志，1939 年，第 8—9 期，第 31 页，转引自同上，第 23 页。

[29] 季米特洛夫日记——1940 年 1 月 21 日，转引自别济缅斯基：

《根据新文件看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6 期，第 143 页。

[3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10a，案卷 82，页码 37об.，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24 页注 10。

[31] 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7，转引自《1939—1941 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 年，第 6 期，第 34 页。

[3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18，案卷 1335，页码 3，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3 期，第 34 页。

[33] 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11，转引自《1939—1941 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 年，第 6 期，第 34—35 页。

[34] 1943 年 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在联共（布）中央系统内建立国际情报部。(2) 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同志为国际情报部主任，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为副主任。”（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62，案卷 37，页码 112，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形式上解散后的共产国际（1943—1944 年）》，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7 年，第 8 期，第 32 页。）6 月 14 日，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和谢尔巴科夫一起商议国际情报部应执行怎样的职能和如何避免敌人攻击共产国际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等问题。商议的结果是，由季米特洛夫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曼努伊尔斯基负责有关战俘问题的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使季米特洛夫领导该部的事实不被敌人所利用，决定任命谢尔巴科夫为主任，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主任。这一决定没有宣布，该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是通过内部方式进行的。”（转引自同上。）

[35] 从 1920—1933 年苏联和德国的军事部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1）在苏联建立兵工厂和试验基地，共同试制武器装备。许多德国的大公司和企业在政府的资助下，挂着合资

企业和租让企业的招牌，在苏联设立了军事工业机构，试制《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飞机、坦克、重炮、弹药甚至化学武器。（2）在苏联创办军校和训练中心，供德国培养军事专家和指挥员。如在苏联喀山建立坦克学校，在利波茨克建立航空学校。（3）苏联红军的指挥员轮流到德国的军事院校学习。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等都曾到德国学习，研究军事理论和德军的组织管理和指挥训练等。（4）相互观摩军事演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两国的军事合作基本结束。参见阿赫塔姆贾：《1920—1933 年苏联与德国的军事合作（根据新的档案文件）》，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 年，第 5 期，第 3—24 页；戈尔洛夫：《20年代苏联同德国的军事合作》，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91 年，第 9 期，第 4—11 页；布舒耶娃和季亚科夫编：《德国国防军与苏联（苏联档案中未公布的文件）》，载苏联《十月》杂志，1991 年，第 12 期，第 183—201 页；叶利谢耶娃编：《1932 年苏联军事代表团在德国观摩演习》，载苏联《苏联档案》杂志，1991 年，第 1 期，第 70—77 页；又见《一个引人注目的披露——关于苏德 1922—1933 年间军事合作内幕》，载中国《军事史林》杂志，1991 年，第 2 期，第 14—16 页。

第一章

战后初期的世界与苏联

第一节　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建立

一　苏德战争前夕苏联扩展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

维护苏联安全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为此苏联在战时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计划和措施了。

早在苏联参战前，1939 年 8 月 23 日，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可以说是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最早步骤和行为。秘密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1）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2）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将大致沿着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来划分。（3）关于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1]当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后，主要地正是根据上述条约及其议定书，苏联接着便采取了在其西北边界夺取领土和建立

势力范围的措施。

1939 年 9 月 17 日，苏联红军以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理由，进入波兰，占领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2]

9 月 28 日，苏德双方又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及其两项秘密补充议定书，对先前的协议进行了如下的修正：卢布林省和华沙省的一部分划归德国的利益范围，而立陶宛的领土则为苏联的利益范围。[3]

9 月底和 10 月上旬，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签订了互助条约，取得了在这些国家内建立军事基地和驻军的权利。[4]

11 月 28 日，在苏芬关于修改边界线和租借芬兰汉科半岛的谈判破裂后，苏联宣布废除 1932 年签订的两国互不侵犯条约。11 月 30 日，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战争。1940 年 3 月 12 日，芬兰被迫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和约。根据和约，卡累利阿地峡连同维堡等领土划归苏联，汉科半岛租借苏联 30 年。[5]

1940 年 6 月下旬，莫洛托夫召见罗马尼亚公使，称：比萨拉比亚绝大多数居民以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语言和民族成分与苏维埃乌克兰联系在一起。他要求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交给苏联。罗马尼亚在拖延未成后被迫同意。[6]

这样，大约到 1940 年夏秋，苏联在其西北部获得的领土有：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同时使芬兰基本上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自 1922 年苏联成立以来苏联在其西北部拓展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首次成功的尝试。

1940 年 9 月下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军事和政治合作的三国同盟条约。虽然条约规定该

条约并不影响三国与苏联的现存关系，但是苏联显然对国际形势新变动是否会影响苏联的利益而感到担忧。所以，当 10 月中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德国时，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就两国会谈中将要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11 月 9 日，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即将对德国的访问下达了一系列详细的指示。

关于“访问的目的”，指示要求：(1) “探明（下划线是莫洛托夫所加——下同）德国和三国公约的所有参加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实行‘新欧洲’和‘大东亚空间’计划中的真实意图”，如，“‘新欧洲’和‘大东亚空间’的边界”；“现在和将来苏联在这些计划中的地位。”(2) “拟定苏联在欧洲以及在近中东的利益范围的初步设想，探询与德国（还有与意大利）就此达成协定的可能性。”然后，指示确定了莫洛托夫此行的具体任务是要“在谈判中要力争使下列地区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

1. 芬兰——以 39 年的苏德协定为基础，德国在履行协定时应当排除所有障碍和含糊之处（撤出德军、在芬兰和德国停止所有损害苏联利益的政治示威）。

2. 多瑙河，多瑙河的近海地区……

还要就下列问题提出我们的不满，即，德国没有就罗马尼亚边界和德军进入罗马尼亚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

3. 保加利亚，这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根据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协议，就像德国和意大利对罗马尼亚一样，保加利亚应当在苏联向保加利亚作出保证的相同基础上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由苏联向其派驻军队。

4. 关于土耳其及其命运的问题没有我们的参与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在土耳其有重大的利益。

5. 作为与苏联交界的国家，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未来命运

的问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希望能就此问题同我们进行协商。

6. 有关伊朗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在那里有重大的利益……）（原括弧是莫洛托夫加的）。

7. 对于希腊和南斯拉夫，我们希望知道轴心国想要采取什么措施。

8. 在有关瑞士的问题上，苏联的立场仍然是：该国保持中立有利于苏联和德国。德国是否仍然持这一立场？

9. 作为波罗的海国家，苏联对于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船只由波罗的海自由通过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丹麦——引注）、厄勒海峡（丹麦和瑞典——引注）、卡特加特海峡（北欧——引注）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北欧—— 引注）问题持关注态度。如能按照多瑙河会议的例子，由感兴趣的国家的代表就此问题召开会议，那就好了。

10 我们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挪威——引注）的煤炭租让企业的工作应得到保障。”

指示还要求莫洛托夫向德国人建议：“以四国公开宣言的形式采取和平行动……其条件是：在英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立即撤离直布罗陀和埃及以及承诺立即向德国返还其以前的殖民地[7]的情况下，保存大英帝国及其英国现在所拥有的领地(不包括委任统治地)。”[8]

显然，在斯大林看来，原来的苏德条约及其协定所带来的好处对于苏联的安全是远远不够的。从斯大林的指示看，苏联想要染指的地区和试图获得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不仅是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还有北欧和近东以及远东（虽然语焉不详）。为此，苏联不仅准备以英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与德国的合作，而且还试图牺牲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利益（承认满洲国和印度尼西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同日本进行交易奠定基础。

1940 年 11 月 12—13 日，莫洛托夫在德国短短两天的访问期间，分别与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各进行了两次会谈。此外还会见了德国元帅戈林、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和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莫洛托夫在会谈中，按照斯大林事先的和追加的指示，以务虚求实的方法，试图不仅让德国确认苏联在其西北部的领土所得，而且要德国同意苏联在东南欧和近东建立势力范围。

莫洛托夫首先肯定了苏德条约及其议定书给两国带来的好处。但他认为，“至于说到德国，那么由于这些协定（1939 年）它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后方，这对于西面的军事局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包括战胜法国……”“德国正是由于这项条约的作用才得以迅速和辉煌地使自己的军队完成了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作战。”[9] 然后他以明指暗喻的方法，就一些重大的全局问题和局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苏联的意见和要求。

全局问题就是德国方面提出的苏德关系的未来发展和苏联与三国公约参加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进行合作并确定各自势力范围的问题。里宾特洛甫提出，四国的天然扩张方向应当在南面：“日本的领土政策不应当指向北方，而是应当指向南方。”“德国自己的领土要求在西非和东非，即德国原来的殖民地，也就是向南。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在北非和东北非。在他看来，苏联的天然意向也应当指向南方。也正是在南方，苏联有可能获得出海口。”“苏联可以通过向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方向扩张而从重新分配英帝国领土中获取利益。在亚洲那些德国并无利害关系的地区可能实现苏联的要求。”[10] 莫洛托夫表示，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但他希望能进一步搞清楚与三国公约有关的问题，诸如：如何理解欧洲和东亚空间新秩序；各自的势力范围的界限在哪里；公约参加国关于划分各个国家利益范围

的意见；苏联如何参加三国公约（莫洛托夫认为苏联只能是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参加）。[11]在第二次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再次向莫洛托夫建议，德、意、日和苏四国达成合作协议，要点是：四国承诺“尊重相互之间的利益范围”，“协定各方将不支持针对它们之中一方的集团。”里宾特洛甫还建议在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中确定四国的领土要求的重心：“德国的领土要求，除了签订和约时在欧洲应该进行一些修正外，其重心将在中非。意大利的领土要求，除了在欧洲进行一些修正外，其重心将移到东北非和北非。”“日本领土要求的重心应通过外交途径在同它举行谈判时确定……日本的领土要求可以指向满洲国以南和日本诸岛以南。”“苏联的领土要求的重心在南方，也就是朝印度洋方向。”[12]德国方面提出的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方法显然是不能令苏联满意的。向南面扩展势力范围当然也是苏联所需要的，但并不是苏联势力范围的重心所在。而且这样一个牵涉到意大利和日本的势力范围划分的棘手问题，还必须去同意日两国进行交涉和谈判。从当时的形势看，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才是苏联所急切地需要建立的。

在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莫洛托夫对德国方面侧重全局问题回避具体问题并且只谈明天不谈今天的方式表示了不满。他说，“德国关于划分利益范围问题的设想是否正确，今天难于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些属于明天的问题不应当与今天的问题割裂开来。如果把它们正确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找到所需的解决办法。”[13]这表明莫洛托夫并非不愿划分总的势力范围，而是希望把解决“今天的问题”作为先决条件。所谓的“今天的问题”就是莫洛托夫先前谈到的有关苏联对东欧、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等要求的具体问题。概括起来是：关于芬兰：“在芬兰不应当有德国的军队，在德国和芬兰也不应当有损害苏联利益的政治示威。”[14]关于巴尔干和黑

海海峡：在罗马尼亚问题上，德国和意大利“未同苏联协商”就向罗马尼亚保证其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保证是损害苏联利益的”。[15]在海峡问题上，苏联关注的，“就是保证自己不遭受通过海峡而来的侵犯。这个问题苏联可以同土耳其一起来解决。（苏联）向保加利亚提供（安全）保证可以有助于更可靠地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政府的愿望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应付诸实现，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16]有关苏联关注的国家和地区，被莫洛托夫点到名的还有：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和波兰。瑞典的中立和波罗的海出海口问题也受到了苏联的关注。[17]此外，莫洛托夫在谈到远东问题时说，苏日关系发展虽然缓慢，“但正在好转”；中日关系则应当找到一种对于中国来说是体面的“妥协办法”。[18]简而言之，莫洛托夫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表明：在苏联的西北部，要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在苏联的南部，要谋求势力范围。在苏联的远东，则探求同日本妥协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德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是德军“浴血奋战”的结果，岂容苏联轻易染指？里宾特洛甫流露出来的实际意思就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不战而获和坐享其成，岂能再得寸进尺？[19]更何况，进攻苏联的目标已经确定[20]，又怎能让苏联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从而坐大？所以，除了引诱苏联向欧洲以外扩张外，对于莫洛托夫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或硬顶或婉拒或哄骗均不予接受。关于芬兰，希特勒说，“我们让俄国人去决定他们同芬兰的关系问题，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政治利益。但在战争期间，我们在芬兰有着经济上的利益关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放弃这些利益。”[21]关于巴尔干和黑海海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表述的观点归纳起来是：（1）罗马尼亚，是罗马尼亚自己要求德国和意大利提供安全保证的，而德意两国之所以

提供保证并派驻军队，是因为必须保证罗的石油产地和考虑到英军登陆的可能性。（2）保加利亚，应当了解保加利亚是否愿意从苏联得到安全保证以及意大利对此持何种态度。（3）海峡，应由德、意、苏三国共同行动以使蒙特勒公约被一项新条约所取代。规定苏联海军有权通过海峡，其他国家的军舰无权通过海峡，但是黑海国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除外。[22]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和波兰以及瑞典的中立和波罗的海出海口等问题，里宾特洛甫先是提出下列借口：德国正在同英国打仗，所以它不能解决一大批问题，并且给他提出的问题超过了他能够答复的问题的数量。然后他有选择地回答说，“德国希望瑞典中立。解决诸如波罗的海出海口这样的细节问题目前是不可想象的，那里现在还在作战，所以不能谈解决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问题。波兰问题也同样为时过早。至于巴尔干，那么对于德国来说，这是在经济上具有极大利益关系的地区，对此德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向苏联声明过。”[23]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德国无意让东欧、巴尔干、海峡和北欧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被苏联所染指。因此，就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言，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是失败的，因为他几乎是空手而归的。在最后一天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结束后，莫洛托夫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坦陈，“两次会谈都没有产生所希望的结果”。他在最后总结时承认，除了弄清了希特勒的想法外，“没有什么可夸耀的”。[24]

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还是有所收获的。那就是进一步摸清了德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三国公约的其他国家）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的真实意图和打算，从而使苏联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事实证明，莫洛托夫在柏林所受的挫折不仅没有使苏联泄气和退却，反而促使它更加坚定和执著地去追求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目标。

11月25日，这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长索博列夫分头采取了三项平行的行动。

其一是，莫洛托夫邀请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会谈。在谈话中，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声明，苏联准备接受里宾特洛甫在柏林会谈中提出的德、意、日、苏四国关于实行政治合作和经济互助的公约，条件是：

“1. 规定德军将立即撤出按照1939年条约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芬兰……

2. 规定在最近几个月内，苏联在海峡地区的安全将通过苏联与在地理上属于苏联黑海边界安全区内的保加利亚签订互助公约以及按长期租借的条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建立苏联陆海军基地的方法来予以保证。

3. 规定承认总方向面对波斯湾的巴统和巴库以南地区为苏联领土意向的中心点。

4. 规定日本放弃萨哈林岛北部的煤炭和石油租让权。”[25]

其二是，斯大林召见季米特洛夫谈话。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对谈话作了如下的记录：

“斯大林：我们今天向保加利亚人提出了签订互助公约的建议。显然，保加利亚大使斯塔梅诺夫以前没有正确地理解莫洛托夫的意思，我们提议的不是保证，而是互助条约。我们告诉保加利亚政府，对两国安全的威胁来自黑海和海峡，这就要求共同努力以保障这一安全。从历史上看，威胁总是来自那里：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919年的弗兰格尔干涉等。

我们支持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我们打算以贷款的形式向保加利亚人提供粮食和棉花等援助，还有船队和其他方式的援助。如果签订条约，我们就将对互助的规模和范围达成具体的协议。在签订互助条约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反对保加利亚

参加三国公约，而且我们自己也将加入这一公约。

如果保加利亚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将落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魔掌，那时他们就要灭亡。

对于土耳其，我们要求获得基地，以使海峡不致被利用来反对我们。显然，德国人想要让意大利人主宰海峡，但是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优先利益……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保加利亚。如果这一条约签订的话，土耳其就不敢同保加利亚打仗，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形势就会呈现出另一种状况。

——认为英国已经被打败是不正确的。英国在地中海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直接面对着海峡。在夺取了希腊的岛屿后，英国加强了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

——我们同德国人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客气的，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摩擦。

——对保加利亚政府的建议今天已经转告。菲罗夫首相已经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很快他就要受到鲍利斯皇帝的接见。需要使保加利亚人广泛地了解这一建议。”[26]

其三是，索博列夫会见保加利亚皇帝鲍利斯三世。他向保皇面呈了苏联关于缔结两国互助条约的建议的文本。

把 11 月 25 日苏联向德国和保加利亚提出的要求和建议与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谈中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相对照，可以看出，苏联现在对势力范围的设想和要求已经作了若干修正和调整。对芬兰的要求更为坚决；对保加利亚提出缔结互助条约来代替原来的安全保证；对土耳其明确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对苏联南部的波斯湾地区提出新的扩张方向；对日本提出获得萨哈林岛北部的经济要求；对南斯拉夫、希腊、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北欧等一些暂时没有迫切意义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按下不提。值得指出的是，苏联所提出的新要求从

内容上看正好是与其西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边界有关。所以，一言以蔽之，苏联的新要求和新建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在东南欧（靠近苏联的西部边界）、海峡和近东（接近苏联的西南部边界）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远东（毗连苏联的东部边界）寻找建立势力范围的突破口。

但是，对于即将对苏联发起进攻的德国来说，满足苏联的要求是不可想像的。在希特勒看来，苏联的新建议证明苏联提出了“自己的新目标和抵制德国要求”的意图。于是他下令里宾特洛甫不要答复莫洛托夫 11 月 25 日的建议。[27]另一头，保加利亚方面的答复倒是很快（11 月 30 日）就来了。但结果却是令苏联大为失望的。保“礼貌”地婉拒了苏联要求缔结两国互助条约的建议。[28]

这样，除了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议定书使苏联在其西北部获得了一些领土扩展外，苏联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欲望和计划便为德国所压制。毕竟，苏联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去打破德国在欧洲所占据的支配局面。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的百万大军对苏联的进攻无疑对它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场战争才给苏联提供了实施建立势力范围计划的最好机会。希特勒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压制和战争给苏联造成的灾难使斯大林深信，只有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在苏联的周边建立广泛的势力范围，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势力范围才能有效地保障苏联的安全。

所以，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苏德战争已经使苏德条约及其议定书化为废纸，但是苏联却坚决不愿放弃它从苏德条约和议定书里得到的收益。它不仅要西方盟国承认它从希特勒那里的所得（1941 年 6 月 22 日以前的苏联边界），而且还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二　苏德战争初期为确立有利于苏联的战后安排的努力

1941 年 6 月的苏德战争和 12 月的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在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下，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它们与其他愿意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组成了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联合国家，同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尽管它们具有打败法西斯的相同目标，但是对于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和战争结束后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等等问题，都各有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于是几乎在它们结成盟国的开始，它们之间围绕着有关战后安排和调整的问题，就已经产生了矛盾和争论。只是由于各自都能以战胜法西斯的大局为重，它们才仍然能够一边龃龉不断一边联合作战并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关于战后世界的重组和安排问题，大国的政治家们在战争时期的戎马倥偬中早就已经有所思考和筹划。1941 年 8 月 14 日，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八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同意未经有关民族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在纳粹暴政被摧毁后，重建和平，以使人类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各国必须放弃使用武力。[29]9 月 24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但同时表示，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必须与各国的状况、需要和历史特点相适应”。[30]这些措词实际上表明苏联对《大西洋宪章》是有所保

留的，尽管声明也宣布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尊重各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不受侵犯的权利，尊重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社会制度和选择政体的权利。[31]

就苏联而言，虽然苏德战争爆发后，战胜法西斯德国是苏联压倒性的头等任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仍然念念不忘并且孜孜不倦地追求它的建立势力范围的目标。因此几乎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开始忙于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构筑有利于自己的战后格局。

1941 年 12 月中旬，就在全世界瞩目于扣人心弦的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在繁忙的战事和国事之中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紧张的关于战后安排和调整的谈判。斯大林向艾登提交了关于军事互助条约和关于解决战后问题条约的两个草案，并主张在后一个条约中附加一个规定改变战后欧洲国家边界总设想的秘密议定书。正是在这项秘密议定书中，斯大林明确地向艾登阐述了苏联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初步设想和建议。主要内容是：关于战后欧洲国家领土和边界：恢复德军占领前的欧洲国家及其疆界；恢复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前的苏联西部边界，包括 1940 年苏芬和约规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关于战后维持和平的方法：苏联与罗马尼亚和芬兰订立军事联盟并驻军两国；英国与比利时和荷兰建立军事联盟并有权驻军两国；英国可以在德国和法国的某些地区拥有军事基地；建立拥有一定数量军队的欧洲委员会作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国际组织。关于德国等战败国的处置：德国等国必须支付赔偿，德国必须被全面解除武装并被分解成若干独立国家。[32]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方案和建议，艾登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关恢复 1941 年边界的建议，艾登称，因为他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并且还需与美国方面进行磋商，因而无法

同意。苏联方面为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原定的条约和协议就此流产。最后双方仅发表了一个内容简单的苏英会谈公报。

从苏联的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设想中可以看出：在战后的欧洲，苏联将在东欧占有优势，英国则将在西欧处于支配地位；欧洲的和平将由拥有一定数量军队的欧洲委员会来维持；欧洲大陆将形成由苏联和英国两强主导的力量格局。

在斯大林与艾登会谈结束后，194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筹建欧洲国家战后安排计划委员会的报告。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应当着手准备战后和平的理由。他说，“虽然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而且还不知道它何时结束，但是战争的结局已经明了。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盟国将被击溃。因此，该是开始准备和会的时候了。而这次和会的任务要比在 1914—1918 年的战争中德国战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复杂得多。情况的复杂性将在于：四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将要消失，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苏联、英国和美国。战争结束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最为强大的国家将在这次和会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我们在和会上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英联盟，而且还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有这些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战败国的），并且无论如何要把苏联限制在 1939 年以前的旧的边界之内。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之间、小国和大国之间以及最小国家之间的矛盾将在和会上激烈地爆发出来。但是，仍然必须预见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将会面对着资本主义列强的统一阵线。有鉴于此，现在就必须着手研究一些问题，以免到了会上我们只能对英国提交的建议作些修正和补充。”[33]

洛佐夫斯基认为应当仔细准备和研究下列三类问题：“(1) 必须估算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给我们造成的财政经

济损失…… （2）现在就必须考虑有关我国边界的所有问题。我们不能继续忍受这样的局面，即，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切断我们同太平洋和同我们的港口的联系，并且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宗谷海峡——引注）、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无论如何都不能保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来的状况。必须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3）必须对有关消除德国及其盟国的危害性问题做好准备。这包括边界问题和工业、财政、航运等问题以及战败国首先是德国的国家体制的问题。”[34]

洛佐夫斯基强调，“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宣布了关于未来欧洲和世界安排的计划（似指《大西洋宪章》——引注）。捷克人和波兰人正在制定建立联邦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肯定不能产生什么结果。英国人组建了一个由莱特一罗斯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它不仅研究战后原料分配问题，而且研究欧洲未来安排问题。”“现在我们也应当着手准备（哪怕是以初步的形式准备）未来的和平问题。为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1）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它估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确定苏联如何向战败国索要经济赔偿；（2）政治委员会，它将研究苏联边界的问题、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问题和这些国家的安排问题等等。”“当然，如果日本同我们交战，那么，两个委员会必须要研究苏联和日本的战后关系问题，特别是研究我们的远东边界问题和苏联港口与太平洋所有港口之间的航行自由的问题。”[35]

斯大林向艾登提出的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方案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苏联方面对战后和平与安排的最早的设想和考虑，非常耐人寻味。第一，它表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最早具体考虑战后和平与安排问题的时间是在1941年12月。后来苏联在战时盟国首脑会议和首脑会谈中所提出

的有关战后安排的要求和建议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二，争取有利于苏联的边界和维护苏联的安全，是苏联考虑战后安排的中心，其方法就是与其他大国（主要是英国[36]）一起划分势力范围。第三，苏联认为，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将是苏联、美国和英国。第四，苏联已经预料到，在战后安排的问题上，它将会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阵线。

洛佐夫斯基的报告自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一个月以后的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关于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安排方案委员会》的问题时，决定成立由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任主席的包括维辛斯基、洛佐夫斯基和瓦尔加等人的外交材料筹备委员会。确定委员会的任务是：

1. 搜集和整理所有值得注意的有关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安排的现行协定和外国政府、政党、侨民团体以及外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等提出的相关计划和方案。在搜选材料时，应特别注意那些包含直接涉及苏联问题的方案和计划等。

2. 根据上述材料，研究和整理拟议中的国家间划分边界的问题和与此有关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涉及欧洲大陆特别是涉及与苏联毗连国家的这些问题。还要研究和整理组建国家间联邦、集团和联盟的各种设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势力范围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欧或世界性国际组织（类似国联）的各种方案。

与此相联系，还要研究和整理关于建立国际武装力量的各种方案、削减和限制军备的各种设想以及在这方面实行国际监督的方式。

3. 研究和整理拟议中的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

排的设想，工农业原料产地的再分配计划，建立关税联盟、消除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和建立货币集团的方案，以及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国际性“计划”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4.研究和整理那些论述并以文献说明将在这次战争结束时予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历史的、外交的、民族志学的和其他的材料。特别要仔细研究1918—1922年的凡尔赛和会、圣日耳曼和会和其他和会以及国联和两次大战间的国际谈判和会议的材料。[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2年1月会议表明，从那时起，苏联对战后安排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非常全面和细致的阶段。

恰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关于战后和平安排和英国对苏政策的秘密备忘录被苏联所获取。[38]这份以及后来被截获的其他一些极其重要的文件，使苏联领导人相当透彻地掌握和了解了英国政府的包括对苏政策在内的整个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英国领导人的决策和行事方式，从而使得苏联领导人可以在这些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苏联关于战后和平安排的相应政策和计划。

艾登的备忘录是在他一个月前（1941年12月）访问了苏联并初步了解了斯大林的战后安排的意图以及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展开反攻后写的。如果说艾登在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提出的要求持坚决抵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艾登因为相信红军在军事上能够取得胜利从而确信苏联将在战后成为欧洲的主要大国而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在备忘录中论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是：“战后俄英合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和“对于斯大林关于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要求的最好对策”。

对于第一个问题“战后俄英合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艾登承认，由命运决定的英国和苏联的新盟友关系不过是一种

“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他认为，战后欧洲的力量关系将会发生如下的变化，即：德国最终将遭到失败，法国在某段时期内沦为一个软弱的大国，在欧洲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抗俄国。但是在艾登看来，战后来自德国的危险仍是可能的，因此他认为，“有可能出现继续与俄国合作的必要性，第一，是因为否则的话俄国就可能受历史趋势和经济必然性的驱使而被引诱去与德国合作；第二，为了在欧洲恢复符合我们利益的能够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力量对比关系（法国因失败而被消灭）；第三，为了包围德国。”艾登设想，可以通过法国的复兴来恢复对于英国有利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他认为在战后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苏联在战后会奉行什么样的方针呢？艾登认为主要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战争的进程、苏联打完战争后的状况和战争结束时的情况。“如果德国的战败主要是由于苏军的行动并且是在英美的军事实力充分施展之前的话，那么俄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将是无法打破的。俄国的威望就将大大提高，以至于它轻易地就能在一些欧洲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政府，所以苏联自然会受此诱惑而朝这方面努力。尤其是，俄国人那时就可以从德国的工厂夺取他们为恢复俄国的工业所需要的设备，而不顾英国和美国的需要。结果，苏联就能够完全自立而不再需要在其他情况下它必须向我们和美国请求的那种援助，它将会变得不愿再采取英国和美国可以希望它奉行的政策。”如果出现这种前景的话，那么在艾登看来，“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要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的理由，因为现在苏联的政策尚不明朗，可以尽可能地对它制定将来的政策施加影响。”艾登设想的另一种情况是：战争结束时俄国将衰竭。那时，“斯大林将不得不（即便是暂时地）奉行苏联处于那种不太专断地位时最能接受的政策”。如果事情的发展出现如此有利于英国的转折，那么现阶段就不应当作出让步和牺牲，因

为斯大林要依靠盟国的援助，就“必须使自己的政策与英国和美国的政策趋同”。但是艾登认为，作这样的考虑是冒险的，他认为，“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在计划中从下列的前提出发，即，如果我们希望俄国人在战后进行合作，那么就应当执行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并且现在就应当执行这种政策，而不是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如果把艾登的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剔除其中的修辞色彩，他的不得不迎合一个即将出现的强大苏联的论调就是十分清晰的。而要迎合苏联，在艾登眼里，最大的妨碍因素就是美国的态度。艾登写道，“自最近签订了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俄国进攻芬兰以来，那里对俄国的不信任和仇视就广为流传。”艾登虽然承认，“实际上是很难把英俄合作与英美合作协调起来的”，但是他却清楚地看到，在战争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接受了“更为现实的趋势”。不仅如此，他竟然已经预见到：随着美国认识到“俄国人能够帮助美国阻止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就将会发生变化。[39]不仅英国将迎合苏联，而且美国自己也将被迫或者在英国怂恿下迎合苏联，当斯大林读到艾登的备忘录时，相信他在谈判桌上讨论战后安排问题时的态度将更为强硬并且知道如何去对付他的盟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于斯大林关于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要求的最好对策”，艾登的说法肯定令斯大林高兴无比。他说：“斯大林要求似乎是适度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他可能会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譬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势力范围，同时强迫波兰接受俄波边界，得到波斯湾的出海口和通过给予挪威和芬兰的领土得到大西洋的出海口。”所以他主张满足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让俄国恢复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从而有可能使它与德国争夺对波罗的海的统治，

比它从1918年以来就有可能这样做更好，当时它只有喀琅施塔得一个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纯粹的战略角度来看，这恰恰是符合我们利益的。”艾登承认对此构成妨碍的是大西洋宪章：“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和对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领土的要求（即使是最小的）未必符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大西洋宪章指出，盟国将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追求违背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变更；他们希望恢复被强行剥夺的主权和自主权。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也将违背宪章中所提出的条件，即，盟国将尊重所有民族自己选择符合他们愿望的统治形式的权利。确实，斯大林可能会表示反对，因为：

1. 他要求归还的仅仅是战争之前就已经是俄国的并且现在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

2. 波罗的海国家是按照大西洋宪章所阐述的原则自己投票赞成归并苏联的；

3. 芬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给予苏联是根据与芬兰和罗马尼亚合法签署的条约。”

这里，艾登不仅承认了苏联兼并波罗的海国家，而且把芬兰和罗马尼亚也给出卖了。艾登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同意我在备忘录的第一部分里所提出的战后与苏联进行密切合作的必要性，那么，我认为，满足斯大林要求的理由就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没有大西洋宪章所产生的严重困难和如果美国不害怕这样做会牺牲独立民族的自由的话。”对于斯大林要求确定苏联1941年边界的意图，艾登认为，“我们同意或者拒绝都不能影响俄国的战后边界，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都不能迫使苏联让出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所占领的领土。但有可能是，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一下陛下政府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作出无条件的让步以保证战后同苏联的合作……如果斯大林的目的确实是这样

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不会同意更少的东西或者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要求。”怎样使美国改变立场和消除大西洋宪章的障碍呢？艾登认为可以向美国施加这样的压力，即：“我们对斯大林要求的答复在一定的情况下将会影响俄国决定对日本宣战与否”。如果压力未果，那么艾登认为解决苏联 1941 年边界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两种方案都应当“以满足俄国安全的要求为基础，这是苏联自 1917 年以来一直所追求的”，即：在波罗的海国家向苏联提供基地和让苏联政府监督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有意思的是，艾登敢于设想却怯于提出这些建议。他主张由美国向苏联提出建议，因为“斯大林宁愿从美国那里接受他拒绝从英国那里接受的东西”。第一个建议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美国和英国已经或者打算在外国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基地。第二个建议可以通过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让美国人以如下措词向斯大林提出：“为了使您的安全要求同我们按照大西洋宪章所承担的共同义务相协调，如果您要求把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政策和防御问题转交给苏联，由此苏联就有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任何必要的管理和监督，我们就将在缔结和约时支持您。”艾登在备忘录里还指出了英国可以向苏联提出的要求，如：英国在欧洲的基地，苏联确认不进行领土扩张和同意建立欧洲弱小的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40]

后来的事实证明，艾登以把波罗的海国家让给苏联的方式有限地满足斯大林关于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的要求以使苏联易于合作，为斯大林找到了一种以兼并波罗的海国家为突破口进而把东欧国家全盘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方法。因为既然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可以践踏，那么对其他苏联认为有理由向其提出要求的东欧国家为何不能依样效法呢？有限承认的方式只能激起苏联更加强硬地提出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的要求。

艾登的备忘录使斯大林完全了解了英国对苏政策和战后和平安排的意图，所以，同年 5 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前往伦敦与艾登和丘吉尔会谈时，他口袋里带着的方案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的议事日程是：一是与英国签订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二是敦促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其中的条约不仅要承认苏联 1941 年的边界，而且还要为苏联的安全作出起码的保证。

5 月 21 日，莫洛托夫在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说，“恢复被希特勒在反苏战争中破坏的苏联边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低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如果苏联政府放弃恢复被希特勒破坏的一切东西的要求，那么在苏联谁也不会在作出了牺牲后拥护苏联政府。另一方面，因为这场苦难的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恢复被破坏的边界是不够的。我们要求苏联的西北和西南边界的安全能够在未来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不包含这些最低条件的条约在苏联都将遭到人们的反对，不会获得同意。”[41] 在当天同艾登的会谈中，莫洛托夫提议“实际按照寇松线解决苏波边界问题或者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它在 1941 年 7 月 31 日对波兰人所作的声明，[42] 让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43] 在谈到联邦问题时，莫洛托夫表示，“有人企图弄一些联邦来反对苏联”，所以，他提出在条约中不要涉及这个问题。[44]

在 5 月 23 日与艾登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建议双方在条约（本来是在秘密议定书[45]）中，“充分考虑英国安全利益特别是在加来海峡地区和北海南部的安全利益、苏联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芬兰湾地区和黑海西北部地区的安全利益，以及苏联在恢复其被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侵略所破坏的边界时的利益、英国在返还其被敌国军队夺取的欧洲领土时的利益”。。[46] 这实际上是以苏联承认英国在北海和西欧的势力范围来交换英

国承认苏联 1941 年的边界以及芬兰和罗马尼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为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外交辞典里，所谓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那只是走向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一种排它性的一国安全设计和要求。

在 5 月 24 日的会谈中，当莫洛托夫再次要求讨论确定安全范围的问题时，艾登问他：苏联在芬兰湾和黑海西北部的安全利益指的是什么？艾登问道："这是否意味着苏军占领芬兰湾和黑海西北部？……不管怎样，关于充分考虑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措词比条约中有关苏联边界的提法更会遭到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社会舆论的极大反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不待签订和约就在绘制欧洲一部分的战后安排蓝图，并且我们在决定这些问题时没有考虑英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47]艾登要求讨论他昨天提出的英国关于条约的新草案。新草案回避了有关边界和安全的具体问题，规定苏联和英国签订为期 20 年的互助条约。所以，莫洛托夫和迈斯基在当天给斯大林的信函中认为，"这一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苏联不需要的空洞宣言。"但是斯大林在回电中却驳斥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空洞的宣言，我们认定它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条约草案中没有关于边界安全的问题，但这或许不错，因为我们有了行动自由。边界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保障我们国家某些地段边界的安全问题，将通过武力来解决。"[48]显然，斯大林已经厌烦同莫洛托夫在谈判桌上与对手进行没有结果的争论。他相信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会自动解决苏联的边界和安全问题。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放弃对旧草案的修改，同意讨论艾登提出的新草案。

5月 26 日，莫洛托夫同艾登签订了苏英关于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的互助条约。莫洛托夫的英国之行显然没有达到签订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和保证苏联西北部安全的条约的目标。

而迫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最后接受英国草案的主要原因乃是当时出现的不利于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形势：苏德战场的形势恶化（1942 年 5 月中下旬，红军在刻赤半岛和在哈尔科夫战役中的失利）；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比边界问题更为紧迫；美国反对苏英签订含有承认苏联 1941 年边界内容的条约。[49]

但是从政治角度讲，莫洛托夫此次英国之行仍然是成功的。条约确定了苏联和英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规定两国战后将继续进行合作，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大国地位。

莫洛托夫的英国以及其后的美国之行后，苏联对战后和平安排的工作准备加快了。次年 9 月 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李维诺夫任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和以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50]9 月 9 日，李维诺夫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该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是：停战后的占领；和会；国际组织；欧洲的国家联盟和国家集团；欧洲国家特别是苏联周边国家的战后安排；原委任统治地；海峡；殖民地；国际水路；国际航线；财政经济问题等。[51]

三　确保苏联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制的形成

1943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有力地加强了苏联在战后安排谈判中的地位。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成为实现苏联的领土和安全等方面要求的有力保障。事实上，西方除了被迫的逐渐的接受外，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这在同年 11 月召开的苏美英三大国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上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在建立东欧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

战后格局中的有力地位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除了第二战场问题外，会议讨论了战后德国的处置、苏联的西北边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建立未来的国际组织等主要是战后调整和安排的问题。

对战后德国的处置，三国都主张给予严厉惩处，并考虑和研究分割德国的具体方法。但斯大林反对丘吉尔关于将德国南部与中欧多瑙河国家组成多瑙河联邦的计划，担心它会受英美的控制。[52]

苏联的西北边界主要是苏芬边界、苏波边界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在苏芬边界问题上，斯大林要求恢复 1940 年的苏芬和约。[53] 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苏美英三国同意波兰的东部大体上以“寇松线”为界，也就是让苏联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54] 关于波兰未来的政府，苏联提出要把波兰与流亡政府区别开来，[55] 实际上是否定了波兰流亡政府战后继续执政的可能，因为在这之前苏联已经与流亡政府断绝关系，并且在苏联成立了以波兰共产党为主的“波兰爱国者联盟”。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归并苏联的问题，在斯大林同罗斯福的会谈中达成了下面的默契：

“罗斯福：我知道，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过去和不久前都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当俄国军队再次开进这些共和国时，我不会为此同苏联交战。但是，社会舆论可能要求在那里举行公民投票。

斯大林：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意志的表示，那我们将有不少机会让这些共和国的人民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罗斯福：这对于我来说是有益的。

斯大林：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这些共和国的公民投票应在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下举行。

罗斯福：当然不是…… …”[56]

苏联恢复其 1941 年西北边界问题上的要求得到基本的满足和它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立场以及西方的顺从和无力，这一切已清楚地表明，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和地位已经不可阻挡地得到增强和巩固，未来西方在东欧问题上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只能听任苏联自行其是。这是苏联成功地建立东欧势力范围的开端，也是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外交胜利。而这一切又是以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基础的。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会议试探性地讨论了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和条件。而苏联的条件就是，得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以及在远东的不冻港。[57]这是苏联要在远东开辟势力范围的征兆。

在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上，斯大林同意由罗斯福提出的建立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警察制”为核心内容的世界性国际组织。[58]因为这意味着苏联将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此外，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会谈中，谈到了实行托管的可能性。但鉴于丘吉尔的反对态度，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59]

德黑兰会议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景的愈发明朗，关于战后安排问题的迫切性也就愈益突出。 1944 年 1 月 11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停战问题委员会成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报告围绕着保障苏联安全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问题，对战后欧洲和世界的调整与安排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他说，“我认为，在构造未来和平与战后秩序时我们的根本目标应当是创造如下一种局面，即，使苏联安全和维护和平能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得到保障。”（着重线系作者所加。——下同）所谓的“长时期”的概念，迈斯基的解释是

40 年。在他看来，40年的时间足以完成两件大事，即，“（1）苏联将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不会再惧怕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侵略。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甚至在头脑中都不敢有这样的意图。（2）欧洲，至少大陆欧洲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世界该地区爆发战争的最大可能性”。“我的大致的估计是，如果苏联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来治愈战争给它造成的创伤，那么，我们在结束这次战争时所追求的安全与和平的‘长时期’应当至少30年至多50年。粗略地说，是两代人的时间。”

在结论部分，迈斯基把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设想概括为下列22点：

1. 保证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30—50年的和平。

2. 战后苏联应当获得以1941年边界为基础的有利的战略边界。佩萨莫、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并入苏联；苏捷有一条共同边界；苏联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签署规定苏联驻军权的互助条约；苏联能够自由地使用通过伊朗前往波斯湾的过境交通线路。

3. 德国在战后应当由盟国占领至少10年并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国家；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受到严惩，赔偿战争损失。

4. 战后欧洲只允许存在一个强大的陆上国家苏联和海上强国英国，欧洲其他地区不能存在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5. 法国应当恢复成为一个较大的强国，但不宜恢复它原来的军事实力。

6. 意大利不应拥有任何非洲领地。

7. 比利牛斯半岛不是苏联的直接利益地区，但是，从全欧政策的范围看，恢复民主的和对我国友好的共和制西班牙对于苏联是重要的。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是有利的。

8. 不希望在战后欧洲出现如多瑙河联邦、巴尔干联邦、斯堪的纳维亚联邦等各种联邦。

9. 波兰应当恢复独立，但领土面积应尽可能缩小。其东部应以1941年边界为基础，西部可以获得东普鲁士的全部或一部分以及西里西亚的某些地区。

10. 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作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

11. 匈牙利必须缩小领土面积并作出赔偿。

12. 在巴尔干，最好能签署苏联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互助条约。必要时可签署英国、苏联和希腊三国条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应当根据苏联的利益予以划定。

13. 在斯堪的纳维亚，应当保持原状。英国可以在比利时和荷兰拥有基地，但如果它在挪威的大西洋沿岸获得基地则违背我们的利益。

14. 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减弱土耳其作为海峡“哨兵”的作用。

15. 苏联希望发展和巩固同伊朗的友好关系。必须保留（可以作某些调整）1941年的英苏伊三方条约，加强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影响，以及建立国际机构以支援和发展通过伊朗的过境交通线路。

16. 加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对于泛阿拉伯运动应当采取原则上赞许的态度，但并不给予积极的援助。在这一地区应当避免同英国发生冲突和麻烦。

17. 力争能在不卷入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

18. 扩大和巩固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但是，促使中国发展和变为真正强国的行动力度，应当取决于战后在中国掌权的势

力属于何种性质。

19．按照广泛民主的原则在敌对国家和敌占国家建立战后体制。在同英美合作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施加一定的影响。

20．苏联希望建立一个按照“四大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起决定作用的原则建立的在战后时期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而且这种机构应有能力在必要时以强制方式贯彻自己的决定，原先的敌对国家在战后初期不得进入此类国际机构。

21．苏联对殖民地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它不得不在和会或其他国际会议上参与解决殖民地问题。必须对这个问题赶紧进行研究。

22．苏联十分关注能从美国和英国得到对自己战后恢复的援助。现在就应着手准备这方面的会谈。最好能保证在战后5—10年的时间内对恢复所最必须的商品按租借法案供应，而次要的商品按长期贷款的方式提供。[60]

关于战后或者至少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可能出现的组合，迈斯基认为，“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除了相对衰弱的法国和意大利，世界上只有四个真正的强国——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其中最后一个，亦即中国在最近一代人的时间里，从各种材料来判断，将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所以，世界政治领域中的领导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并且事物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三国相互关系的性质。”

最后，迈斯基提出苏联在战后时期可行的和最佳的外交政策路线是：“巩固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根据苏联的利益利用英美矛盾，以便今后同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接触；全力加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把苏联变成吸引真正民主的中、小国家和所有国家中（特别是欧洲国家中）真正的民主分子的中心；

继续维持德国和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直到这两个国家表现出转向真正民主和社会主义轨道的真诚愿望。”[61]

这就是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夕的 1944 年所设计的战后欧洲和世界安排的蓝图，迈斯基的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苏联对战后欧洲与世界的调整和重组的设想和展望。这就是：第一，确保苏联安全：苏联需要 30—50 年安全保障的时期， 50 年内苏联将能强大到敌人不敢侵犯它的程度，同时欧洲大陆将会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条以有利的战略边界为基础的环苏联安全带，具体是，恢复 1941 年的苏联边界；在苏联的西北部，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互助条约，让北欧国家维持原状（即保持中立）；在苏联的南部，削弱土耳其的影响，加强在伊朗的影响；在苏联的东部（远东），不战而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扩大和巩固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欧洲未来的格局是：苏联（陆上强国）和英国（海上强国）两强占支配地位；不允许存在国家集团和地区联邦；苏联和英国分别拥有东欧和西欧势力范围（苏联通过边界调整和签订互助条约的形式，英国在比利时和荷兰拥有基地）；德国被分解成若干个国家并被解除武装；法国不能恢复原来的军事实力；意大利不能拥有领地。第三，未来的世界格局是：建立以四大国作用为基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苏美英三国执掌世界政治领导权；苏美英三国实行合作共同安排敌对国家和敌占国家。

为了在战后国际舞台上扩大苏联的影响和加强苏联的地位，1944 年 1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宪法，把全联盟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其他国家建立直接关系、签署协议和交换外交代表和领事代表”，“规定加盟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代表资格”。[62]这显然是要在必要时能让苏联的各加

盟共和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占有更多的席位（就如后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那样）。

1944 年 6 月 29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停战总委员会改组为对德停战委员会并建立对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停战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同志任主席）。。[63]

在苏军进入东欧，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未来欧洲的两个主要大国的苏联和英国，充分认识到了调整它们在东欧和欧洲关系的重要性。

1944 年 5 月 30 日，英国驻法国临时政府代表库珀致函艾登，论述了战后英国对西欧的政策。库珀认为，“防止苏联统治欧洲大陆的最好手段”就是：（1）建立西欧集团；（2）恢复一个强大的和繁荣的波兰。艾登在 7 月 25 日给库珀的回信中没有否认“苏联将在欧洲奉行扩张政策的危险性”，“但是我相信，您所建议的政策不会减少而只能增加这种危险（如果它真的实施的话）。”艾登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想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他三年前的那份备忘录的范围内，即：英苏合作和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在西欧建立某种牢固的体系的话，那么它应该建立在英苏联盟和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强大的德国有可能复兴的坚决努力的基础上。如果能达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体系就应该是以英国、美国和苏联的联盟或者密切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艾登虽然探讨了建立西欧集团的某种可能性，但是他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并使德国有机可乘。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那么建立一个受我们保护的西欧集团的惟一后果就将是产生一个在俄国支持下的同样性质的集团。结果是，欧洲将分裂成两个势力范围，而德国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成为中立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事情的这种发展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显然将力图在东欧建立一个它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集团……不管怎样，

迄今为止对德国的恐惧是把西欧国家联合起来的向心力，这将是很好的。但这种恐惧能够持续存在吗？完全有可能的是，德国将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矛盾，这样，矛盾就会比现在所能设想的要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样的西方集团都将出现崩溃的趋势，如果找不到某种新的手段来巩固和支持它的话。按照我（显然也按照您的）观点来看，惟一可能的手段只能是对侵略性的和扩张性的俄国的恐惧。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西方集团是一种灾难，因为它会导致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德国位于两个阵营之间，这样它就有可能通过加入其中的一个集团来使其占据优势。”所以艾登认为，“……西欧集团作为首先是为了保护欧洲免遭德国的再次侵略而由英国和俄国建立的任何一种组织的组成部分，才能被接受。但是如果为了防止俄国今后可能在欧洲实行侵略和统治政策而建立西欧集团，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试验，这可能加剧它原本应当使我们避免的危险。”

对于库珀提出的恢复一个强大的波兰的建议，艾登否认了他的诸如强大的波兰“应能成为俄德之间的屏障”、“除了对俄国的憎恨外，波兰是分离俄国和德国的惟一因素”、“波兰愈强大愈有影响，对于国际安全与和平就愈好”等说法。艾登的观点与库珀恰恰相反：“正是俄国和波兰之间的摩擦是 1939 年力图把俄国拉到我们这边未遂的原因。当波兰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强大的、独立的和繁荣的国家，如果波兰与苏联关系不好，它对于国际和平和英国来说，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威胁。”艾登最后以模棱两可的语调说，英国的政策“应当努力在西欧建立某种防御体系，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建立国际组织……现在总参谋部正在研究与执行这种政策有关的战略问题，所以在着手详细地制定我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应当等待它提出的建议”。[64]

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苏联。10月9日，在讨论巴尔干半岛的形势时，丘吉尔和艾登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非常务实的方法划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丘吉尔对斯大林说，“不要为小事争吵了。”随即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与美国一致）——90%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 25%”[65]

从丘吉尔所确定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力量比例来看，苏联实际上并未占多大的优势。因此它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按照苏联方面所作的会谈记录，斯大林当即就表示了异议：“斯大林同志说，规定英国在保加利亚的25%的比例与表上的其他数字不协调。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必须作些修正，也就是规定苏联在保加利亚为90%，而英国为10%。”[66] 丘吉尔同意作出让步。但是，当天事情并未敲定。第二天晚上，莫洛托夫和艾登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讨论。莫洛托夫要求将两国在匈牙利的比例修改为：俄国75%和英国25%。他还力争扩大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影响。艾登建议修改在保加利亚的比例（俄国80%对英国20%）以交换在匈牙利的比例（俄国75%对英国25%），但他反对修改在南斯拉夫的比例。休会后，莫洛托夫提议：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比例为80%对20%，而在南

斯拉夫为 50% 对 50%。莫洛托夫还使艾登同意改变两国在匈牙利的比例。最后，两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比例为：苏联 80% 对英国 20%；在南斯拉夫仍为 50% 对 50%。[67] 虽然苏英两国在南斯拉夫的比例为对半开，但是由于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掌握该国的政局，所以苏联将在南斯拉夫据有支配性地位的趋势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希腊以外，丘吉尔和艾登实际上已经把巴尔干半岛丢弃给了苏联。这个玩弄其他国家命运于股掌之中的百分比协定，实际上是继德黑兰会议之后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基本上承认了东欧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会谈中，丘吉尔还直率地向斯大林表示他对苏联在欧洲推动“世界革命”的担忧。丘吉尔说，欧洲小国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怕得要死。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苏联政府曾经试图要让欧洲所有国家都改变信仰。他记得，1919—1920 年，整个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虽然他坚信英国不会发生革命。斯大林回答说，现在世界用不着吓得发抖了。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丘吉尔可以通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例子相信这点。[68]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明确告诉丘吉尔，苏联不会去触动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欧洲。

丘吉尔和斯大林 10 月会谈后不久，11 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一份题为《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更是大胆地提出要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战后苏联和英国关系中惟一大的矛盾可能会与欧洲力量平衡问题有关。由于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惟一强国，这种矛盾将会尖锐起来。“但是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尖锐性才会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推动英国与我们达成协定。这种协定只能在按照地理位置紧密接壤的原则友好地划分欧洲安全范围的基础

上缔结。苏联可以将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视为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范围。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无疑应纳入英国的安全范围。这种划分意味着，英国将不可以与纳入我们安全范围的那些国家建立某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和签订违反我们意愿的某种协定，自然也不能在那些国家谋取军事基地，不论是海军基地还是空军基地。我们对除了法国以外的英国的安全范围也应承担同样的义务，法国应当有权加入反德的英俄条约。”[69] 这里的所谓安全范围实际上与势力范围是等义的。这是苏联重要官员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要把北欧的瑞典、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南部的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安全范围。[70] 当然，这种超出原有的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过分要求，苏联没有公开拿到桌面上同盟国讨论，因为它必然会遭到西方盟国的坚决拒绝。一个月前（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已经明确规定苏联的势力范围是在东欧。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有关战后欧洲安排的计划中，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1944年1月，迈斯基曾经在《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中提出，“在斯堪的纳维亚，总的说来应当保留战前的‘原状’”。但是随着红军军事力量在欧洲的发展特别是红军于同年10月中旬向挪威境内进发后，保持“原状”似乎已经不能使苏联感到满意。

扼守波罗的海出海口关键位置的大、小贝尔特海峡位于丹麦的内水。它们是除了基尔运河外的波罗的海的惟一的出海口（莫洛托夫在1940年11月的柏林会谈中曾向希特勒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挪威的熊岛和位于北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则是苏联北部到达大西洋的通道。所以，苏联对丹麦和挪威的兴趣就在于它们关系到苏联能否获得从苏联西北部进入公海的安全出海口。为此，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的一些官员曾经提出过许多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是丹麦和挪威）扩大苏联影响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建议和计划。

1944年7月，李维诺夫在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讨论波罗的海海峡问题的会上，要求制定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安全的政治路线。从苏联的角度出发，最好的方案就是对除了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的所有军舰封闭进入波罗的海的入口，以及给予海峡和基尔运河以国际地位。李维诺夫认为，除此之外，奥兰群岛（芬兰——引注）应当转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则指出，苏联需要在博恩霍尔姆岛（丹麦——引注）建立军事基地。[71]

1945年5月9日，苏军占领了德军盘踞的博恩霍尔姆岛。苏联对丹麦表示，苏军在该岛的军事存在是暂时的，一俟“与德国有关的军事问题”得到解决，苏军就将撤出。然而，苏联驻丹麦公使韦特罗夫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斯堪的纳维亚司司长普拉欣却在同年7月10日致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建议：与丹麦政府签订苏丹共同防御博恩霍尔姆岛的协定，规定在岛上设置苏丹联合性的海空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应当服务于两个目的。它们应当确保苏联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同时它们对于苏联向“丹麦对外政策施加影响”也是重要的。关于军事基地的谈判应在撤军前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丹麦人将更能说得通。在博恩霍尔姆岛建立海空军事基地应继之以在吕根岛设置基地。[72]

1945年12月18日，就在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12月16至26日），李维诺夫在致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再次建议给予大小贝尔特海峡、松德海峡（厄勒海峡）和基尔运河以国际地位。只有苏联、波兰、瑞典和丹麦能够对有关它们的制度进行监督。李维诺夫还说，对进入波罗的海和基尔运河实行

某种有效的监督意味着要在这些水域建立军事基地体系。他建议在外长会议上对就博恩霍尔姆岛和吕根岛设立军事基地问题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试探，以使西方对苏联关于让波罗的海海峡和基尔运河国际化的计划作出更大的让步。[73]与此同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欧洲五司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决议草案，内称，建立波罗的海海峡制度是波罗的海国家（苏联、波兰、丹麦和瑞典）的特权。[74]但是试探的结果是不行。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都提出了波罗的海海峡问题。斯大林说，战争爆发时苏联将会被锁定在波罗的海。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说，英国人反对在该地区建立基地。斯大林说，“他根本不想要基地”，他考虑的是船只自由通过海峡的问题。[75]斯大林此言一出，苏联原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未及提出顷刻就变为废纸。1946 年 3 月 5 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向丹麦公使正式声明，它将从博恩霍尔姆岛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把该岛交给丹麦[76]之后，苏联不再建议丹麦重新审议波罗的海海峡制度或者要求丹麦同意苏联在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

对于挪威，一开始，苏联曾经同样企图染指它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1944 年 10 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欧洲五司的工作人员日丹诺娃在“对俄挪边界问题的简要报告”中提出了在挪威北部建立军事基地和修改苏挪边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她说，现在，随着空军的发展，斯匹次卑尔根似乎是某个时候把大西洋同我们北极地带联结起来的大大“缩小范围的”运河的另一岸。这样重新审议我们同挪威的边界就是与重新审议斯匹次卑尔根问题相联系的。她认为，芬兰把佩萨莫（佩琴加）交给苏联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进入大西洋的“运河”问题。“鉴于我们通过红军参加把挪威从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行动而获得的对外政治的主动权，利用挪威人想要依靠与苏联的友谊来对抗战后英国试图把因现在的战争进程而处于几乎是英国安全

控制下的挪威‘葡萄牙化’的迫切要求是较为适宜的。也就是说，看来，我们同挪威人就共同合作以保卫挪威北部——在那里建立海空基地和所需要的铁路等——达成协议是不会遇到困难的。否则的话，英国人就会获得这一切。建立战后苏挪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和确保我们对挪威必要的和经常的影响可以在今后更为方便的时候提出修正苏挪边界的问题。”[77] 1944 年 11 月 11 日，就在莫洛托夫即将与挪威外长举行会谈前几小时，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熊岛问题”的报告。杰卡诺佐夫主要关注的是苏联在丹麦的斯匹次卑尔根的经济利益，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了“熊岛对于确保苏联在斯匹次卑尔根的矿场安全和对于保卫苏联的北方交通线的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杰卡诺佐夫建议不仅要立即恢复苏联在斯匹次卑尔根的合法权利，而且要同挪威政府达成“关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它有权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一个或几个苏联海空军事基地的协定”。最好是达成“有关在熊岛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以捍卫我们在斯匹次卑尔根的权利和确保苏联北方舰队的航行安全”的协定。[78] 莫洛托夫在同挪威外长特柳格维·李会谈时提出了苏挪共同管理斯匹次卑尔根岛和把熊岛转交给苏联的要求。 1945 年 4 月 9 日，苏联向挪威驻苏大使提出了签订挪苏宣言的建议。宣言草案宣布，“保卫斯瓦尔巴群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挪威名称——引注）是挪威和苏联的共同事情”。以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又提出过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如，外交人民委员部官员韦特罗夫在 6 月 8 日致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建议向斯匹次卑尔根派遣“海军部队……以承担”该岛的“守卫任务”。这样做的目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斯匹次卑尔根问题”。[79] 韦特罗夫的建议得到了苏联军方的支持。 7 月 14 日，苏军总参谋长助理斯拉温中将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在北部边界

地带“改善我们战略地位的必要性”。他认为，从科拉半岛的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和不冻港的安全的角度看，理想的解决方法应是把苏联同挪威边界移动到塔纳河（挪威——引注，下同）和塔纳峡湾（挪威），也就是把整个瓦朗厄尔半岛（挪威）和从南部到瓦朗厄尔峡湾（挪威）的领土归并于苏联。同苏联在熊岛的军事基地一起，这将能建立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到科拉半岛的“广阔的陆地和海上战略掩护区”。在紧急情况下，向挪威租借瓦朗厄尔半岛 25—30 年能够解决问题。[80]但是由于担心这种向北欧中立国家露骨的扩张地肯定会遭到挪威和西方国家的反对，所以，苏联最终放弃了改变苏挪边界和在挪威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重新回到了维持北欧“原状”的轨道。

在苏联关于战后以苏英两国为主导的欧洲政治格局的规划中，还有一个在苏联和英国两大势力范围外建立一个由北欧中立国家和战败国组成中立国集团的设想。也是在李维诺夫的 1944 年 11 月的那份报告中，他提出，“第三种中立圈由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苏英双方要在相互经常协商的基础上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81]在李维诺夫的报告中，法国被划入了英国的安全范围。但在斯大林的设想中，战后中立国集团的核心恰恰是法国和意大利，它们被认为是抵御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影响的潜在力量。因此与迈斯基在 1944 年 1 月《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提出的要削弱法国和意大利的观点相反，斯大林从抗衡英国的角度出发，主张法国和意大利应当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1944 年 3 月，斯大林告诉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要求意大利是强大的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主要任务就是意大利人民在争取建立独立和强大的意大利的反德斗争中实行团结”。“两个阵营（即国王埃曼努伊阵营和反法西斯政党阵营）的存在削弱了意大利人民，这对英国人是有利的，他们就

希望位于地中海的意大利是软弱的。’[82]同年11月斯大林在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谈话中，表示赞同多列士关于法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队的观点，他说，“法国共产党人不必害怕建立庞大的军队。他们应当在军队里有自己的人。”[83]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提出法共应当解除武装。此外，在同年，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委托陶里亚蒂向法共的另外两位领导人马尔蒂和杜克洛转达建议：不要破坏法共在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里的路线。[84]所有这一些，除了大国合作的因素外，就是在斯大林当时关于战后欧洲格局的设计中，已经赋予了法国以中立国的地位。把法国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当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建立苏法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特殊关系，使之成为抗衡英美的力量，并且至少使法国不反对苏联建立东欧势力范围，则是值得去尝试的。

1945年2月，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苏、美、英三国又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时第二次首脑会议。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德黑兰会议的继续和深化，是要就德黑兰会议曾经讨论过的和已初步达成协议的问题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法。因为，战争快要结束，最终解决有关战后调整和安排的问题已不容迟延。

雅尔塔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问题、建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等。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是：关于德国问题，规定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确保德国不再能扰乱世界和平；解除德国的武装力量；惩办战犯；废除纳粹党及其组织和制度；德国支付赔偿；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并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由三国总司令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协调管理事务，并邀请法国参加。此外，在美

英占领区划出一个区域交给法国。[85]关于波兰问题，确定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同时让波兰在西部得到广大的领土让予，其范围待日后的和会予以解决。规定波兰临时政府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改组，吸收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86]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87]关于建立联合国问题[88]，会议确立了“大国一致”的原则（即所谓的“雅尔塔公式”），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程序问题外，在一切问题上均可使用否决权；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89]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会议背着中国并以中国的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同意在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签订了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障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优先权益，同时保持中国在满洲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给苏联。[90]最后，三国在雅尔塔会议公报中表示，在今后的和平时期，要保持并加强团结一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91]

雅尔塔会议对苏联来说，是一次取得广泛成果的会议。主要是：取得了分区占领德国的权力；确定了有利于苏联的苏波边界，保留了苏联支持的波兰卢布林政府；“大国一致”的原则确立了苏联在联合国的牢固地位和作用；在远东获得了极大的权益。所以，就建立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欧洲和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而言，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向苏联颁发了承认书和授权书。

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与安排的问题。同年7—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实际上是对雅尔塔会议

的决议和规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缮。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问题、波兰问题、对意大利等战败国的基本政策和黑海海峡问题等。规定：必须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苏美英法四国总司令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行使管理权；英美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并与流亡政府断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由和会最后决定；设立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国和意大利等战败国的和约问题；认为关于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应予修订；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92]波茨坦会议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明确了分区管理德国的原则和方法，确立了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地位和发言权；第二，继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确定了波兰的边界后，又迫使西方最终承认苏联支持的流亡政府。在几次首脑会议上，波兰问题几乎都是讨论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除了波兰本身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外，最主要的是波兰问题就是整个东欧问题的一个缩影，波兰问题如何解决，影响到未来东欧的走向。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初步成功和在波兰地位的巩固，预示着苏联在东欧影响的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强。

苏美英三国在战争后期的几次首脑会谈和首脑会议上就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形成了构筑战后国际格局的制度和方法。由于有关战后调整的问题基本上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最后解决的，所以这些制度和方法就在习惯上被人们称为雅尔塔体制。简单地说，雅尔塔体制就是对战后世界所作的安排。它以主要战胜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以及它们在战后的实力和地位为基础，把战后世界（主要是欧洲）划分为西方（美英）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概括起来讲，雅尔塔体制的内容是：(1) 划定势力范围：在欧洲：西欧仍旧保留资本主义，东欧则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德国由美英和苏联分区占领（后来变为西德属美英，东德归苏联）。在

亚洲：外蒙古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华北为美英的势力范围，中国的东北为苏联的的势力范围；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苏联，日本本土为美国势力范围。（2）建立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并确定以“大国一致”的原则作为安理会运作的基础。（3）战败国的殖民地和领地由联合国实行托管。

雅尔塔体制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又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雅尔塔体制是在与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过程中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筹划和建立的，因此，它必然要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对战后调整和安排的不同的要求和愿望。这两类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都具有强大的实力，并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的两种发展方向。由这两类国家缔造的雅尔塔体制反映了人类社会当时所处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人类反对法西斯的正义的解放战争。人类在战胜了法西斯势力后，对人类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有了新的觉悟和认识，必然将走向新的层次的进步、正义和公正。例如，联合国的建立，不仅反映了各国人民希冀通过这一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美好愿望，而且也为大多数国家提供了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的可能（即使在当时是微小的）。再如殖民地托管，毕竟它已经不是简单地让殖民地在大国之间辗转易手和相互交易，而是给了它们在今后的自治和独立的机会和可能，这也是历史的一种相对的进步。而且，有一大批国家在战后获得了新生，它们在法西斯被消灭和民主与自由重新得到弘扬后，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这些都是与纯粹为掠夺和称霸并在战后简单地分割战利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区别的。另一方面，在主要战胜国占支配地位的现实条件下，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带有大国意志和愿望的烙印和色彩。尤其是在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和

利益范围的情况下，新生的和被解放的国家的命运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大国的制约甚至支配。这种情况与一战以后是比较相似的。在主要战胜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在考虑战后和平时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因循强权政治和实力原则。所以，划分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也就成了战后安排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而这主要地并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的喜恶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智慧程度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如何调整和安排战后世界、如何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上，人类的整体认识水平是滞后的。因此，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所显示的经验仍然显得不够。这就是二战后世界的实际状况——时代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相互并存。主要反映大国意志和愿望的雅尔塔体制，实际上就是两类不同国家既想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主观意志和又要维护战后合作的共同愿望的矛盾的反映，是妥协和折衷的产物。它确立了苏联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的优势地位和作用，为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雅尔塔体制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满足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不同要求。对于西方来说，雅尔塔体制为它们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传统的中心地区——西欧。而对苏联而言，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对战后调整和安排的大部分要求和愿望。

在边界和领土方面，恢复了苏联 1941 年的边界并还另有收获。[93]在欧洲未来的政治格局中，确立了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和在中欧的德国的分区占领的作用，从而实际上确立了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强有力的牢固地位。在未来的安全格局中，苏联在它的欧洲部分由于获得了有利的战略边界，摆脱了战前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孤立状态。它在西北部的安全已经由于在东欧国家建立了势力范围而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在远

东，由于苏联参战和日本战败而使苏联得到领土收益以及在中国、蒙古和朝鲜获得特殊利益（特别是得到了中国的旅顺港海军基地），苏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处于优势地位。在近东，由于将要修改关于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和在伊朗的优势，苏联拥有了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借道波斯湾前往印度洋的的潜在能力。这样，苏联就在东欧（苏联的西北部）建立了广泛的势力范围，在远东（苏联的东部）建立了有限的势力范围，在近东（苏联的西南部）掌握了影响局势变化和开辟势力范围的手段。由此，实际上是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带。[94]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苏联在联合国享有的大国否决权保障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在战后的调整和安排方面，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它在战争时期制定的原则和计划。苏联已经由一个战前被包围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一个战后在各方面处于优势的世界性大国。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建立势力范围和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等方面的广泛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对雅尔塔体制感到满意并设法予以维持。[95]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雅尔塔体制既然给予了苏联以划定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就对苏联构成了某种约束。这种约束就是不能觊觎和染指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而从环俄罗斯安全带的牢固程度而言，它的相对薄弱之处就是在苏联的西南部边界（靠近近东——也就是斯大林所指的高加索以南的地方）。南部边界以外的海峡、地中海和波斯湾正是苏联外出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和谋求领土扩张，是苏联还在与希特勒德国合作时期就梦寐以求的目标。恰恰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制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在那里只能说拥有一定的影响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势力范围。从当时的苏联安全角度和扩大势力范围的目标来看，在海峡、地中海和波斯湾地

区开辟苏联的势力范围就成了苏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努力方向。后来，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正是苏联试图在西南部边境以外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结果。而这两场近东危机恰恰是冷战酝酿期间的重要事件。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苏联社会与斯大林对外政策基本方针

一　斯大林体制的演变与苏联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

战争使苏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据统计，苏联有 1700 多座城市和 70000 多个村镇遭到洗劫， 30000 多个工厂企业和 90000 多个农庄受到破坏。战争时期所遭到的物质损失和物质消耗达 25690 亿卢布。[96] 人员方面的损失为 2660 万。[97]

战争胜利后，人民期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得以休养生息并通过重建经济和家园过上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而要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在战争结束后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那种状况。它需要对战前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并根据战后新的形势和需要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正确的安排。这就是一个涉及到斯大林体制的重要问题了。其实，早在战前年代，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它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视外来文化为祸害的文化体制，使它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自绝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这里当然不能否定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实行孤立和封锁的政策）。这一切已经对苏联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和作用。

战争使国内的矛盾和问题暂时被掩盖起来。战后这些问题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在战争中忍受了重大牺牲后要求摆脱战时的超经济的强制。士兵在打出国界并与国外的人民和盟军官兵的接触中，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真面貌。由于前线士兵们身上具有那种潜在的自由因素，因此报刊上常把他们称为“新十二月党人”。战争结束后，回国复员的士兵们经常聚集在城乡的小饭馆和小酒店里，不仅相互间排遣心中的苦闷和忧愁，而且还无所顾忌地传播在国外的感受并且议论时事。这种所谓的“小酒店民主”[98]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渴望变革的心理。士兵们把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内，使国内的人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不再是一片漆黑。当然，谈不上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但是，人民要求改变原来的生活秩序和原来的生活方式的愿望却是非常真诚和强烈的。

应当说，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来是可以成为苏联修改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契机的。外部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来没有像战争结束时那样巩固；苏联国内因战争而产生的凝聚力仍未消失；战争虽然造成了严重的毁灭，但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可以百废待兴。人民正在等待着变革机会的出现。但是，斯大林不仅无意改革和变革，而且还要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强化战前的体制。他要人民相信，战争的结果表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99]这表明，斯大林体制不仅要在战后得到沿袭，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尽管斯大林根本不认为苏维埃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示出苏联社会的危机迹象。

经济方面。众所周知，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的，除了战争本身的原因之

外，绝不能忽视政府部门的具体责任。根据联共（布）中央1945—1946年的“视察”材料记载，战后，人们首先是工业城市和工人区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正常的”。1945年12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派遣组在图拉州的一个矿区进行的视察证实，矿工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生活特别艰苦的则是那些从国外被遣送回国的人和复员的军人，他们中许多人没有内衣。工人们居住在昏暗拥挤的宿舍里，几个月都用不上肥皂，每天以1200克劣质面包餬口。[100]奔萨州的一些工厂，有的拖发粮食供应卡，有的长期拖欠工资。还有的企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们必须在露天工作，冬天时就在没膝的雪地里干活，住处经常没有照明和供暖。由于没有御寒的冬衣，1946年，西伯利亚的一些州委书记只能请求联共（布）中央取消当年的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游行，因为“居民们衣服不够”。[101]

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同样是非常糟糕的。当时集体农庄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劳动力不足。1945年底集体农庄的居民人口比1940年减少了15%，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同期减少了32.5%。尤其是男性劳动力由1940年的1690万减少到1946年的650万。[102]庄员的生活水平比战前大大下降了。1940年集体农庄用于按庄员劳动日分配的谷物平均为20%左右，现金为40%以上，而到194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为14%和29%。[103]在一些地区，对庄员的劳动日的支付仅仅是象征性的。1946年的旱灾殃及苏联的大部分欧洲地区，遭灾的许多农庄已无法按劳动日分粮。[104]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梅尼希科夫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大胆直诉了农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的庄员已经 2—3 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105]在摩尔曼斯克，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死亡率非常高。许多地区的农民只能以各种劣质的代用品甚至家畜的尸体填肚，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106]

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时，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与缓解人民的生活困境是背道而驰的。即使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实行余粮收集制，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向国家交售 52% 的收成。[107]1946 年 9 月，提高了凭卡供应的食品价格，使食品供应出现了紧张的局面。与此同时，还缩减了获得定额供应卡的人数。在农村，享受定额供应的人数由 2700 万减少到 400 万。在城市和工人区，350 万没有工作的成年被赡养人被取消了定额供应卡，50 万张供应卡在整顿供应卡和废除滥用的供应卡时被取消。按定额供应的粮食销售减少了 30%。[108]结果，不仅人们的基本食品（首先是粮食）的供应得不到保障，而且也难以通过市场购买非定额供应的食品。因为市场上的这些食品特别是面包、土豆和蔬菜的价格扶摇直上。[109]于是，粮食投机大行其道，工人群众怨声载道。提高凭卡供应食品的价格对那些低收入、多子女的工人和丈夫在前线牺牲的妇女产生的打击最大。因此他们发出了无奈的哀叹和公开的抱怨：“食品变贵了，而我们是五口之家。家里钱不够。曾经指望将来会好起来，而现在又碰上困难了，这样的困难我们究竟要忍受到什么时候？”当钱不够买面包的时候我们怎样忍受困难呢？”

前我生活得也艰难，但是我能指望低价的食品供应卡，而现在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只能挨饿了。”[110]有的甚至公开指责政府，“工资提高 100 卢布，而物价翻了三倍，真是一出新喜剧。这样得利的不是工人而是政府”。“曾经指望战争结束后情况会好起来，所以一直等着改善，而现在生活却变得比战争年代还要困难。”[111]

1946 年 5 月，国家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决定发行总额为 200 亿卢布的公债，其中在城市居民中发行 125 亿，农村居民中发行 55 亿。财政部长兹韦列夫要求在短期内完成这一工作。[112]虽然他指示不能操之过急，要进行说服工作，但说是自愿认购，实际仍是强行摊派。

战争结束后，战时在工厂企业实行的军事化管理制度并未及时取消。1940 年，最高苏维埃曾经颁布了处罚旷工和迟到的命令。1941 年 12 月又颁布了《关于军工企业工人和职员擅离企业的责任法》，规定对擅离企业者处以剥夺 5—8 年自由的刑罚。[113]1947 年 3 月，苏联部长会议发布专门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某些企业中取消 1941 年的法令，但是擅离者仍可按 1940 年法令处以“较轻的”剥夺 2—4 个月自由的刑罚。[114]1948 年 5 月，正式宣布废除 1941 年的法令，但实际上该法令一直存在到 1956 年。仅 1948 年，因擅离企业而根据 1941 年法令被判刑的就达 24000 人。根据 1940 年法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1947 年为 215000 人，1948 年增至 250000 人。在铁路和水上运输部门，特别法庭一直存在到 1948 年 5 月。[115]

在农村，对农民实行的经济外强制仍然保存着。1948 年，增加了农业税收，而农产品的采购价格甚至不能补偿生产费用。为了减轻税收负担，农民们被迫砍伐果园，屠宰牲口，减少宅旁园地。这使得本来就不高的生活水平再次受到破坏。甚至到 1950 年，22.4% 的集体农庄分不到按劳动日应当付给的

现金，20%的农庄一个劳动日只值不到半公斤的谷物。[116]

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战争胜利后出现的喜悦之情不久就荡然无存，许多人对现状和未来充满了失望和忧虑。下面引用的是两位苏军将领在1946年12月评论当时社会情况的一段谈话：

雪里巴琴柯：现在大家都对生活状况很不满意，都在言谈中表现了出来。

戈尔多夫：唉，眼下办事全靠行贿受贿，吹牛拍马……

雷：是的，全是靠行贿受贿。你瞧瞧周围发生了什么，是让人难以置信的饥荒。你看，所有人都在这样讲："报纸上写的，都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现在人们连日常最必须的物品都没有，全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乞丐……我很奇怪，难道斯大林不了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戈：他全都了解，全都知道。

雷：我看这样的局面不会太久了，非有一种秩序才行……这种政策会造成什么后果的。现在集体农庄被偷得一光二净，什么也不剩了，连种子也没有啦。

戈：真有意思，俄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堕落下去呢？

雷：因为我们推行的就是这种谁也不愿干活的政策。应当直率地说，所有庄员都恨斯大林，都在等待他的末日。

戈：哪里有真理呀？

雷：人们都在想，斯大林只要一完，农庄也就解散了……

戈：可是人民都在沉默，害怕呀。

雷：没有什么前途啦。

戈：我们怎么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啊！……全都成了泡影了。

雷：不会有什么结果啦。

戈：要是全都做得及时，就不至于会这样。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117]

政治方面。战后斯大林仍然恪守他的社会主义成就愈大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极端观点。结果，战后苏联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经历了战争磨难的人民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1948—1949 年和 1953 年，斯大林在根本没有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又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其中前一宗案件，把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等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送上了断头台。还有 2000 多人因受此案牵连而被解职。

对人民的政治压制和对少数民族的侵权和迫害行为仍相当严重。被关押在集中营和劳改营的犯人，即便按照内务部保守的估计，也有 170 万之多。其中 54% 的人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118]而实际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一估计。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遣返事务特派员公署 1946 年 2 月 1 日的材料，从德国和其他国家遣送回苏联的人共有 520 万，其中 180 万是前战俘，340 万是平民。所有的人在返回祖国后都必须进入甄别营。[119]尽管当局表示“处于德国奴役下的苏维埃人的基本群众是忠于祖国的”，但是各地的政府对待这些遣返回来的公民是持消极和怀疑态度的。一位地方官员说，“我们没有就地从他们中区分出反革命来，我们把他们收编起来并装上木排流送。”[120]一位遣返回来的人说，“我没有感到有罪于祖国，但我不相信我会不受到迫害。在这里（指甄别营——引注）对待我们就像对待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惊恐。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送到哪里去。”[121]其他遣返者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担忧：“我们会有选举权吗？”“我们真的将要在押送下工作？”“被遣返回来的人还能入学吗？”等等。[122]当局之所以对待这些遣返回来的苦难公民像瘟疫似的并且尽量把他们孤立起来，原因无非是，其一，怀疑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其言行是否有损于当局。其二，这些在国外生活和逗留过人的将有可能向国内的

同胞叙述和传播未经当局审查的有关国外的情况。这恰恰是当局最为担忧和害怕的。这样，那些身心受到极大损害的战俘，在返回祖国后被打入另册，视为“有缺陷的人”而备受歧视。那些曾经身陷敌占区而后被强行掳掠到德国的被遣返的人，在饱受灾难回到祖国后，却被视为“异己”。他们始终无法真正被社会所认同。

许多战时制定的法令，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真正取消，有的甚至更严厉了。这方面的内容已如前述。此外，还新增了一些严酷的法令。如，1947 年 3 月，根据日丹诺夫的建议，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苏联各部和中央各部门名誉法庭》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建立了特别机关“以同损害苏联工作人员名誉和尊严的过失行为作斗争”。。[123]同年 6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颁布专门法令，规定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的人将被处以关押集中营 25 年的刑罚（1932 年 8 月的法令对此罪的判罚为 10 年）。这项法令还首次规定将对“不检举”盗窃国家和集体农庄财产行为的人追究刑事责任。[124]

在战争结束后和战后初期，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地区的各民族被大规模驱赶到专门为他们划定的居民点。据 1948 年 10 月的统计，被强行驱赶到特殊居民点的少数民族约有 200 万人。他们是：德国人、北高加索人、克里米亚人、卡尔梅克人和格鲁吉亚人等。[125]这还不包括其他地区被强行驱赶的少数民族。

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书报检查，实行思想和舆论的统制，严防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渗透，以“全民讨论”的方式，批判和讨伐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甚至由“名誉法庭”惩罚触犯禁令的“犯规者”。譬如，1947 年 6 月，克柳切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撰写的《癌症的生物治疗法》因在国外发表，就被“名誉法庭”指控为“反爱国主义和与外国公司合作”。。[126]许多书籍，

因被书刊检查机关认定没有“学术和文学价值”和“充满人民敌人的名字、人民敌人的引言和人民敌人的文章”而被从图书馆和图书发行网中剔除。[127]读书、看戏、听音乐，都得由中央机构予以甄别和确定，列出“推荐单”和“禁单”。[128]

1946年开始的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批判和处理，以及其后在哲学、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等领域开展的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运动，是战后斯大林体制对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大压制。正常的发展形式被阻滞，学术自由遭扼杀，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尽管战后初期苏联也曾出现过要求改革的思潮，但在斯大林体制的严密控制下，终究显得软弱无力，不起涟漪地就消退了。尽管战后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对照，与累积成堆的问题相比较，其成色就显得轻多了。最主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总之，战后初期，因战争的胜利而由历史所提供的苏联社会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机会被错过了。斯大林体制变得愈益僵化。

外交本质上是内政的反映和延续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一个在国内不断掀起阶级斗争浪潮的国家，是不在乎国际形势的安定与否的。一个在国内不知道创造和平稳定局面的国家，是不可能懂得和平的真正涵义的，因而是很难在国际上真正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在国内对人民实行压制的国家，是不可能懂得尊重别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一个对本国人民颐指气使的国家，是免不了要对别国人民指手画脚的。

斯大林晚年的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在国内不思变革、对国外继续保持封闭状态的国家。一方面，因战争的胜利苏联取得

了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并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因斯大林体制的僵化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正在愈积愈多。这种国外的显赫的地位与国内的孱弱的体制和疲软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怎么也无法使苏联去恰当地适应雅尔塔体制所赋予它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并正确地去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

二　大国合作与“世界革命”战略

大国合作是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虽然在这期间，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因为军事作战和战后安排等问题也常有龃龉、矛盾和摩擦，但是为了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双方基本上都采取了克制、忍让和妥协的合作态度。由此，双方不仅最终实现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目标，而且还初步完成了对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在雅尔塔会议公报里，双方表示要在战后时期继续维持合作。

从苏联方面来讲，它有更多的理由要在战后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合作，因为：

（一）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要求的雅尔塔体制本身，就是与西方合作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

（二）由于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只有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才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较好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1945 年他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吉拉斯的谈话中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

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129] 1946 年 5 月，斯大林在同波兰社会党和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在你们波兰、南斯拉夫和部分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使你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130]1946 年夏天，在同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要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他对哥特瓦尔德说，“我们那时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那种必须要付出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红军已经付出了。”[131]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得战后初期的大国合作成为可能。

事实上，迈斯基在《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对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如果在最近的将来欧洲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会恶化。”他说，“无论从自己战后经济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同苏联都没有（也未必会有）领土和经济争执，而上面提及的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会涉及我们。相反可以认为，美国在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时将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它会表现出双重性。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性来看，它必然倾向于美国。但是恰恰是美国将成为它在世界市场、殖民地、民航和贸易船队等方面的强大对手和竞争者。相反，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阵地，英国也可能倒向苏联。”[132]1944 年 7 月，当时的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柯在分析苏美关系时，对它们的发展前景也是持乐观态度的。他预言，由于美国“希望同苏联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它们两

国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致的。[133]虽然，迈斯基和葛罗米柯对未来的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估计都过于乐观并且迈斯基对英美之间的矛盾过于夸大，但是，由此可见苏联想要维持战后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愿望却是真实的。道理很简单，只有保持合作，苏联才能维护从合作中得到的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后来在回忆雅尔塔会议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维持同美国的结盟，对我们有利。这很重要”。[134]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本人也曾经多次表达了要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的愿望和决心。1945 年 4 月，他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致杜鲁门的唁电中表示相信，“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135]在同年 5 月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文中，斯大林说，“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136]同年 6 月在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文中，斯大林表示，“我坚信，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之间的牢固合作的利益，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的友好联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137]就是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后，同年 6 月斯大林在答记者问中仍然表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138]以后斯大林还曾多次表示维持合作是可能的。应当说，一直到战后初期的 1947 年，斯大林基本上奉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坚守雅尔塔体制所规定的势力范围的基本界限，并未有去触动传统的资本主义基地——西欧的试图。这在斯大林对丘吉尔所作的不在欧洲搞“世界革命”的承诺中、对法共和意共的指示中以及对待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中都得到了清楚的证实。

为了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同时也为了使苏联能与法国和意大利建立正常的关系，不让法国和意大利成为英国的势力范

围，斯大林明确指示法共和意共要采取防守的而不是进攻的政策。1944 年 11 月在与法共领导人多列士的谈话中，斯大林要求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他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存在着被盟国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存在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赖以立足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类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人的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让中间派的法国人相信。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现在和将来都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武器必须收藏起来。”[139] 在此之前的同年 3 月，斯大林在与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谈话中，建议重新审议意共的政治方针，即：“（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巴多里奥政府；（3）集中力量去建立和巩固反德斗争的团结和统一。”[140]

为了维护大国合作，斯大林不支持希腊革命。在西方的史学著述中，谈到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时，往往把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危机相提并论。但是，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进攻态势的话，那么对于希腊问题苏联则明显采取了保守和消极的方针。因为从苏联安全的角度看，两者之间是有较大区别的。从地理位置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就苏联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远逊于与苏联接壤和邻近的东欧国家以及土耳其和伊朗。因此，尽管战争后期希腊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革命形势也可以说一片大好，斯大林还是在 1944 年 10 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中把希腊让给了英国。对于斯大林来说，正

是希腊之“失”，才有助于东欧之“得”。这场交易充分说明，在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的排列顺序中，苏联的安全利益总是处于首位的。外国的革命如果无助于促进和保障苏联的利益，斯大林不会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1945 年 2 月，当规定希腊解放军予以遣散的瓦尔基扎协定签订之际，正值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聚会之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141]后来当美苏冷战开始时，虽然斯大林也曾经想利用希腊的内战对抗英美，但他还是不愿也不敢去破坏原来确定的势力范围的界限。从美国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危机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希腊问题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本能的恐惧。就斯大林而言，他对希腊问题的关注和介入远不及东欧、伊朗和土耳其，他在希腊问题上基本上是采取与西方合作立场的。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外[142]，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143]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144]夺回沙俄在 1905 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

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145] 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政策。为了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为了实现和保障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苏联必然要维护雅尔塔体制在该地区的存在，并在雅尔塔体制的框架内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一种符合远东新形势和符合苏联安全利益的友好合作关系。

1945 年 6 月底到 8 月中旬，斯大林与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了多达九次的会谈。[146] 在就外蒙古、旅顺和大连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双方以苏联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不支持新疆动乱和不援助中共作为各自的条件和承诺，达成了相互妥协，给予了相互满足。对于蒋介石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斯大林作了如下的承诺：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我们愿意与中国真诚相处，愿意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147]

8 月 14 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改称）、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和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同东北行政当局的关系的四项协定及两项附属议定书。

条约第五条规定：双方将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进行友好合作。在条约签订的当天，

两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互换了两项照会。苏联承诺，对中国的援助将完全提供给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东北的领土和行政之完整。苏联根据条约第五条规定，不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新疆事变。中国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将予以承认。根据四项协定及议定书规定：中长铁路为两国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共同组成中长铁路公司并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等； 30 年后，铁路无偿归于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方面担任；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租期 30 年。旅顺为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方面担任；苏联在基地区域内有驻军权；协定 30 年期满后，基地无偿归于中国。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负责作战事务；中国可派代表建立行政机构并可向苏军司令部派遣军事代表团。在一项《记录》中记载，在日本投降后，苏军将于三星期内开始撤出并在三个月内完成。[148]

显然，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

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 年 5 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149]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8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50]10—11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但是，8 月 12 日，蒋介石却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让伪军“维持地方治安”。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下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朱德在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后，于 8 月 15 日，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朱德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等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151]但是美国就此发表的声明再次重复了麦克阿瑟的命令。而苏联同样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军的受降权，它甚至不屑于表示自己的意见。[152]结果，中共只得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说，“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解放区……”[153]

中共在抗战后期考虑和规划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已经认识到与苏联接壤并且物藏丰富的东北的重要性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东北

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不丢，而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154] 8月 11 日，朱德在他的第二号令中，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和李运昌所属各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和东北进发。[155]虽然中共后来也认识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它仍然相信，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156]然而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共在东北面对的是一种受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三角关系制约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诸多限制，有时甚至是敌视。

1945 年 9 月 5 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所属的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队在攻克山海关后，乘火车经锦州到达沈阳。在车站上，曾克林部队遭到了沈阳苏军的阻拦。苏军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一斯坦克维奇命令苏军架起机枪，不让曾部下车。结果他们只好在火车上呆了一天。后经反复交涉，曾克林部队才得以下车。先是要他们驻扎在沈阳市外的苏家屯，转而又允许他们改驻市内的小河沿一带。[157] 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苏联又改变态度，要中共部队撤出沈阳。

9 月 14 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转达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进入东北，已经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158]11 月 19 日，苏方强令中共军队退出各大城市。[159]当天，中共吉林省工委和军区就撤出了长春。接着，苏军又要求中共长春市委和吉长部队等一律撤离长春市 30 公里之外。[160]11 月 20 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机关（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 3 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以外。

11 月 21 日，陈云前去交涉。当他说不能撤出城市时，苏军卫戍司令说，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必须在 11 月 23 日退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要他们来哈尔滨接收。[161]12 月，苏联又要求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从沈阳撤出。当双方发生争辩时，苏联驻沈阳卫戍司令竟然以武力胁迫中共部队从沈阳撤走。他对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彭真嚷道：“如果你们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162]12 月底，中共东北局及直属部队只得从沈阳撤出。

1945 年 8 月中下旬，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两次毛泽东均予以拒绝。但是在斯大林同期追来的两封电文的压力下， 8 月 24 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赴渝谈判。斯大林在两封电文中对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当时毛泽东就非常生气。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163]后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提到，“（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64]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多次前往苏联使馆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进行谈话。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涉及苏联的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等人在回答时要么是闪烁其词或不置可否，要么是婉转拒绝或冷言相对。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等人和苏联大使谈话中的一些问答。在 9 月 6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等人问：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苏联大使回答

（实际是避而不答）：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两党应该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协议。[165]在10月5日的谈话中周恩来等人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登陆，苏联将采取什么措施？答：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所有具体细节。周恩来问：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从苏联使馆得到哪些实际帮助？答：应当考虑到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166]在10月10日的谈话中毛泽东问：如果出现美国人在共产党地区登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竭力避免同美国人发生冲突。[167]在11月25日的谈话中王若飞问：共产党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阻止国民党向长春铁路派遣保卫部队？苏联参赞答：……为了不招致中国和美国社会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这样做。[168]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苏联参赞对王若飞抱怨说：中共代表不顾中国目前的局势，近来过于频繁地试图与苏联使馆和苏联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他说，这引起了严密监视共产党行动的有关机构的注意。因此他建议王若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169]所谓“应有的结论”很快就由苏联方面作出了很清楚的诠释：它要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1945年12月，中共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和王若飞[170]，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处与苏联使馆取得联系，要求会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当时，苏联使馆已经猜到，“中共代表团打算同苏联大使讨论有关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和参加由马歇尔主持的谈判问题，并弄清苏联的立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使馆不得同冲突双方讨论这样的问题，不得就如何实际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发表任何建议”。[171]于是，“使馆决定，大使不应当与中共代表进行会

晤，要设法以大使生病为借口不作会晤。委托我（列多夫斯基）会见代表团成员”。[172]会见时，叶剑英和王若飞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蒋介石向来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提议讨论有关停止内战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参与讨论的问题。中共是否应当参加马歇尔主持的国共两党谈判，因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直接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但是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在向延安紧急请示的同时，中共代表决定向苏联大使征求建议。其二：蒋介石和马歇尔打算在谈判中提及满洲问题。既然这个问题触及苏联的利益，就应当由苏联方面参与讨论这个问题。[173]叶剑英和王若飞坚决要求列多夫斯基把这一切报告给苏联大使，让他给他们提供急需的建议，因为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就要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举行会谈。[174]在中共代表就地等着的情况下，列多夫斯基去向称病躲藏的彼得罗夫大使汇报了情况。然后他代表大使向焦急等待的中共代表宣布了那种令人失望的公式化回答：“……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停止内战谈判的建议和指示，代表团应当向中共中央去征求，苏联使馆不能就这个问题给代表团提供什么建议。苏联大使认为，现在谈论满洲问题为时尚早，因为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还是马歇尔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至于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和停止内战问题，那么苏联政府的立场已经足以清楚地反映在莫斯科会议的公报里。”[175]

与对中共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几乎在这同时所进行的密切的高层外交往来。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在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再次明确向他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的立场。斯大林说，“（苏美英）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人国民政府的所有机关，停止内战。”“苏联政府的观点已经在（1945年9月

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和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里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176]斯大林坚定地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177]在蒋经国回国时带回的斯大林致蒋介石的信中，斯大林表示，“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按照苏中条约的精神发展，今后我将经常关注此事。”[178]

一直到美苏冷战开始，斯大林基本上恪守他支持和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承诺，不与中共建立实质性的关系。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亲美反共本性，斯大林对苏联与蒋政府能否建立真正的同盟关系和能否确保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是充满疑虑的。

蒋经国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说：关于满洲的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179]可是苏联最担心的，恰恰就是美国利用“门户开放”的旗号来侵蚀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蒋经国还就美军驻扎华北一事解释说：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他保证，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斯大林非常清楚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180]斯大林还抱怨在满洲有国民党散发的反苏传单。他最后告诫说：中国政府应当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满洲政策。[181]

因此，尽管斯大林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支持中共，但他绝对不会抛弃中共。因为有一点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即：要防止美蒋联合对付苏联，中共肯定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所以，虽然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消极冷漠的态度，但这并

不妨碍苏联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只是提供援助的时机和规模，要根据苏联远东战略的需要，视苏联同美国、苏联同蒋政府以及美蒋之间的关系状况而定。质言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它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的一个筹码和一张王牌，以使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温顺一点并阻止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一边倒。

事实上，主要是作为制约美蒋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方法，部分原因也确实是大家都为共产党人（尽管斯大林认为中共不是真牌的共产党人，但苏军中的不少官兵却认为他们应当对中共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苏军进入东北后，主要是通过隐蔽的非正式方式向中共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和支持，有的是应中共的要求提供的，有的则表现为以默许和放任的形式让中共自行其是。

1945 年 8 月 17 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代表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苏军进入沈阳（8 月 20 日）后不久，中共即在那里建立了沈阳市委。在大连、旅顺、锦州也建立了中共的党组织。[182]9 月 8 日，也就是在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队几经周折进入沈阳市的第三天，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曾克林研究后决定，曾克林部队对外暂时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该部队所到之处，都可接管。苏军将不予阻拦和限制。[183]1945 年 9 月 14 日，朱德等联名致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建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184]苏军不仅承认热河和锦州两省属冀热辽解放区范围，而且在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扩建后才撤出了该地区。[185]中共冀热辽军区在 8 月出关时的兵力是 1.3 万人，到 11 月已经发展为 11 万人。[186]而在整个东北地区，到 1945 年底，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都已经建立了省委或工

委。同时还选举了各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县大队）。此时，中共军队由关里调往东北的 10 万人已扩大到近 30 万人。[187]

中共在建立和扩大武装的过程中，从苏军那里得到了不少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武器。苏联远东军第 39 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在回忆录中说，“关东军被打败后，它所有的武器弹药都由苏军指挥部转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战利品包括后贝加尔方面军和第一远东方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武器：1565 门大炮、2139 门迫击炮和掷弹筒、600 辆坦克、860 架飞机、12000 挺机枪，2500 辆以上军车、13000 匹战马、679 个各种仓库和其他许多战利品。[188]此外，1946 年年底，苏联外贸组织同东北民主当局签订了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货物、建立医院和学校等设备的合同。[189]

虽然苏军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给予了不少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基本上不是主动提供的。就中共方面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否得到援助和得到多少援助，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要求和意愿。事实上，这种援助往往出现在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

譬如，当 1945 年夏秋美国军队在华北登陆并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时，为了抵制美国的渗入和牵制国民党政府，苏联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登陆并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 月初，苏军建议中共抽调 20—30 万部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并答应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 月中旬，苏军代表鼓励中共东北局放手干，还表示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甚至还建议中共将党的中心移到东北。[190]而当国民党政府在与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中作出让步后，苏联又转而压制中共。11 月 17 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

民党政府，“中国政府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军将为此提供必要的帮助”；“苏军严格遵守苏中条约”；“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给满洲共产党以援助”。[191]也是在11月中旬，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上级已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准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之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此后，苏军还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192]

后来，也是为了牵制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苏联又鼓励中共尽可能地多占一些地区。例如，1946年3月，苏军在沈阳和四平等城市采取突然撤退的方法，以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苏军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一斯坦克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3月9日，我们突然接到命令，撤出沈阳，不晚于3月11日把所有政权转交给中国人（指国民党当局——引注）。这样的命令多少是有些令人惊讶的。须知，3月5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到沈阳时在同我的谈话中还要我好好安顿，因为我将在满洲呆很长的时间。”[193]3月10日，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负责人李富春和黄克诚即向东北局提出进占四平的意见。苏军撤出后不久，3月17日，中共军队就占领了四平。[194]有的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的苏军驻扎区，苏联将其大部交给了中共军队接管。[195]

1946年5月，苏军从东北撤出后，为了遏制国民党军的军事攻势，驻扎在旅顺的苏军第39集团军应中共军队的要求，提供了一系列军事援助。5月下旬，在南满的国民党军已经夺取了四平、长春和吉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在辽东半岛发起了进攻。苏军旅顺卫戍司令沃罗申上校来到国民党军司令部。他在地图上标出了一条国民党军不得逾越的界线，他说，该线后面的区域处于苏军炮兵的火力之下。由此就形成了中共

军队可以利用的旅顺苏军辖区以北8—10公里的安全区域。[196]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向旅顺苏军司令部的请求，由苏联滨海军区司令部负责，从朝鲜北部给中共部队运来了两列车武器。这些武器是由苏军从在朝鲜的日军手中缴获的。苏军还在大连以北15公里处的大孤山半岛向中共军队转交了50车箱的武器。应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的请求，苏军旅顺基地专门为中共军队生产了飞机发动机的活塞涨圈（因为缴获的日军飞机上的活塞涨圈已经磨损，马达发动不起来）。驻旅顺的苏军还把20列机车由旅顺经对马海峡运往北朝鲜，然后又从那里运往东北解放区，以供中共部队调动之用。大连的造船厂则为中共军队生产和修理浮动工具。[197]

总之，战后初期，在大国合作政策和保障苏联权益的远东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斯大林在政治上对中共予以压制和制约。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美国侵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和阻止国民党政府向美国一边倒，斯大林又见机行事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时有时无，忽多忽少。所以，即便有这种援助，但从总体上讲，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基本上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远东的日本，斯大林满足于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占有。虽然，苏联反对美国单独占领和管制日本，但是，从维护大国合作出发，也未作更大努力去打破这一局面，并且听任美国在日本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从1946—1949年，苏共与日共之间没有任何官方联系，所有的来往都是通过曾任共产国际日共代表、回国后成为日共领导人之一的野坂参三与苏联情报部门进行的。[198]

此外，为了维持大国间的合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也是持消极态度的。

斯大林不仅冷落以朴宪永为首的南朝鲜共产党，而且还于1945年9月在给苏联远东部队的指示中命令：不要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的基础上，在北朝鲜帮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要向当地居民解释，……红军不追求在朝鲜推行苏维埃制度的目的。[199] 1945年9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胡志明主席致电斯大林，通知他："越南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建立。"同时，胡志明要求斯大林"提供某种可能的援助。"[200] 10月21日，胡志明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允许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201] 但是，这两封电报都被锁进档案箱而未予置理。倒是1946年3月签订的承认越南为自由国家同时保留法国殖民利益的《越法初步协定》受到苏联的欢迎。

对于殖民地托管，苏联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争取社会进步的具体可能性"。。[202] 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就曾提议对意大利殖民地实行托管。同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和美国都赞同对朝鲜实行托管。而在这之前，双方在朝鲜半岛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划界而治的三八线。对于非洲，苏联也认为当时不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逐步建立自治政府。这里苏联的对外政策都有大国合作的因素。

即便是在被苏联视作对它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东欧地区，考虑到与英美合作的需要，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除了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之外，也并没有非要在那里建立清一色的共产主义政权不可。相反，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容忍了多党联合政府的存在。 1943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波兰工人党书记芬德尔的指示中说，波兰应当是"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的国家。[203] 在苏联占领的匈

牙利，除了共产党以外，苏联当局还允许其他三个政党的存在，并且要求共产党领导人尊重现有的体制。[204]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力图避免东欧国家与西方发生冲突。如， 1945 年初，当英国明确反对铁托的巴尔干联邦计划时，斯大林马上命令将该计划束之高阁[205]，尽管起初他是赞成和鼓励这样做的。

总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保障“一国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在具体实施时，既有轻重缓急之分，又可双管齐下，一切以苏联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如果“世界革命”战略妨碍苏联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须暂时隐退或者改变策略和方法。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为了苏联最高的安全利益，苏联必须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革命”的战略必须暂时放弃。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在这段时期对外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持消极和冷漠的态度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这种合作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并且在战后显得愈来愈难以为继。

首先，从根本上说，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苏联和美国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顺便说一句，美国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中最后一个承认苏联的国家。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建立到 1933 年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官方关系中的“空白点”存在了 16 年）。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了盟国。但是，在这期间它们之间的龃龉、摩擦和矛盾始终不断。而且，这种同盟关系只是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战后，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对于战后与西方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斯大林实际上是有所预料的。 1945 年 1 月，

他在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这么说，“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资本家划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法西斯集团，另一个是民主集团。我们同资本家中民主集团结成了同盟，是由于后者不希望出现希特勒统治，因为这种残暴的统治将会促使工人阶级作出极端的反应和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现在同（他们中的）一个集团一起反对另一个集团，而将来再来反对剩下的那一个集团。”[206]从理论上讲，战后如果双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不会再有战时那种密切的同盟关系，起码也应当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在如何对待规定了战后世界调整和安排的雅尔塔体制方面，双方由于上面所说的本质上对立，观点和立场却大相径庭。由此导致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尖锐。

其次，苏联和美国对大国合作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罗斯福设想的大国合作是试图以大国一致和利益均衡的原则作为战后合作的基础。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同时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强大实力和门户开放的政策能够建立一种有利于美国的战后世界新秩序。而斯大林所追求的大国合作是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为基础的。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要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改变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为苏联谋取最大的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苏联周边地区消除西方国家的势力和其他敌对势力，建立环苏联的安全带。而这样一种努力必然要包括在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和在周边国家扶植苏联模式的政权或者谋求建立对苏友好国家。同时对斯大林来说，合作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拘泥于已有的协议和承诺或者中规中矩地死守原有的阵地。当有机会时也要主动出击，并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以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正如斯大林就是否签订由西方国家起草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对莫洛托夫所说的，“以后，我们可

以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履行。关键在于力量对比。”[207]

事实也证明，由于上述原因，就在战后初期合作的同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就已经开始了。

注 释

[1]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1，卷宗 8，案卷 77，页码 1—2，参见苏联外交部编：《危机的一年（1938—1939 年）——文件和材料》,第 2 卷，莫斯科，1990 年，第 321 页。8 月 28 日，议定书的第 2 条条款被修改为：“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将大致沿着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来划分。”（档案全宗、目录、卷宗、案卷同前，页码 3，参见《危机的一年》,第 2 卷，第 335 页。）

[2] 在这之前（9 月 7 日）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斯大林把波兰说成是一个压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等的法西斯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消灭这个国家就意味着少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波兰被打败我们把社会主义体系扩大到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中去，那有什么不好呢。”（转引自列别杰夫和纳林斯基编：《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第一卷（1942 年 6 月 22 日前），莫斯科，1994 年，第 11 页。）

[3] 《特档中的秘密文件》，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3 年，第 1 期，第 9 页。

[4] 《对外政策文件集（1939 年）》,第 22 卷，第一册，莫斯科，1992 年，第 136 页，转引自纳林斯基：《1939—1947 年欧洲边界和势力范围问题》，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82 页。斯大林对以双边互助条约的形式建立苏联势力范围感到满意。10 月 25 日，他对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认为，在（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互助条约中，我们找到了一种能使我们把一些国家纳人苏联影响轨道的方法。但是为此必须克制——严格遵守它们的内部制度和自主权。”（转引自同上，第 83 页。）这种所谓的“克制”很快就被一项更大胆的行

动所压倒：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接受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请求”。由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苏联正式吞并。直到1991年，三国才重新获得独立。

[5]《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4卷（1935年—1941年6月），莫斯科，1946年，第493—496页。

[6]在与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谈话时，莫洛托夫对整个布科维纳提出了要求。他说：“布科维纳是统一的乌克兰所缺少的最后一部分，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这个问题与比萨拉比亚问题同时解决是重要的。”经过磋商，德国同意了苏联对北布科维纳的要求，苏联则放弃了对南布科维纳的要求。《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4卷，第515—516页；《1939—1941年的苏联与德国》，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的苏德关系文件和材料，第2卷，维尔纽斯，1989年，第61页。还可参见《1940年11月的莫洛托夫柏林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5期，第82页。

[7]根据斯大林11月13日给莫洛托夫的补充指示，这里删除的一句话是：“和立即让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因为斯大林担心，德国和三国公约的其他参加国会把“关于印度的条款看做是旨在扩大战争的阴谋”。（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目录1，卷宗339，案卷2315，页码:1见别济缅斯基和戈尔洛夫编注：《前夕》（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谈判［文件集］），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91年6月号，第125页。）

[8]斯大林还指示莫洛托夫：“谈谈对于中国（蒋介石）谋求光荣和平的必要性，这里，苏联准备（或许由德国和意大利参加）充当调停者，我们不反对承认印度尼西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满洲国仍然属于日本。）”关于苏日关系——先维持在关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的范围内。斯大林还要求“询问有关波兰命运的情况——以1939年的协定为基础。”（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以下简称：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56，目录1，案卷1161，页码147—155，转引自别济缅斯基编注：《1940年11月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指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4期，第77—79页。）

[9]里宾特洛甫则说，“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去年建立起来的新关

系，我们，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们下了很好的赌注。苏联改变了自己的西部边界……德国战胜波兰和法国对此有着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21—30，31—41，49—67，《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5 期，第 71、77、81—82 页。）

[10]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谈话记录，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21—30，参见同上，第 71 页。

[11]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21—30，31—41，参见同上，第 73、77—78 页。

[12]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参见同上，第 89 页。

[13]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参见同上，第 93 页。

[14]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49—67，参见同上，第 83 页。

[15] 同上书，第 86 页。

[16] 同上书，第 87 页。对于如何付诸实现，莫洛托夫在会谈中并未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莫洛托夫访问归来后不久， 11 月 25 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到海峡问题时明确指出，“对于土耳其，我们要求获得基地，以便海峡不致被利用来反对我们。”（转引自别济缅斯基：《根据新文件看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5 年，第 6 期，第 142 页。）

[1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5 期，第 92 页。

[1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49—67，参见同上，第 87 页。里宾特洛甫则转告莫洛托夫，“他获得的消息表明，日本政府在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愿意承认苏联在外蒙和新疆的利益，如果能和中国达成协议的话。如果苏联加入三国公约（这相当于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有可能确定苏联在英属印度的利益范围。”“日本人在萨哈林岛的租让权问题上也准备作出让步”。（俄联邦总统档

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转引自同上，第 90 页。）

[19] 对于莫洛托夫有关德国没有完全履行苏德协定的抱怨，希特勒“劝慰”说，“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得到原先期望的 100%的成果，但在政治生活中，实现 25%的期望也该满意了。”他还颇有意味地说，“可能将来也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31—41，转引自同上，第 74 页。）

[20] 1940 年 7 月 31 日，希特勒把进攻苏联的日期确定为 1941 年 5 月，并且得到了他的军事将领的同意。在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结束后一个月，1940 年 12 月 18 日，以“巴巴罗萨”为代号的进攻计划正式下达。（《根据新文件看 1940年 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6 期，第 124 页；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下卷，第 1116—1117 页。）

[21]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49—67，转引自《1940 年 11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5 期，第 81 页。

[22]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49—67、68—82，参见同上，第 86—87、89 页。

[23]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参见同上，第 92 页。

[24]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目录 1，卷宗 338，案卷 2314，页码 41—44，见别济缅斯基和戈尔洛夫编注：《前夕》（1940 年 11月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谈判〔文件集一续〕，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91 年 8 月号，第 117 页。在返回莫斯科后没几天，11 月 17 日，莫洛托夫在致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迈斯基的电文中，指责德国人“想许诺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重新审议蒙特勒公约来哄骗我们”。（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目录 1，卷宗 326，案卷 2239，页码 112—114，参见同上，第 119 页。）

[25] 前引书《1939—1941 年的苏联与德国》，第 2 卷，第 132—133 页。

[26] 转引自《根据新文件看 1940 年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

《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6 期，第 142 页。

[27] 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盼望德国给予答复。1941 年 1 月 17 日，等得心焦的莫洛托夫在与德国大使舒伦堡的谈话中，对德国方面的沉默（“既不来致意也不给答复”）表示惊讶。舒伦堡按照指示回答说，“问题还没有讨论。”1 月 21 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告诉苏联新任驻德国全权代表杰卡诺佐夫，德国还必须与它的盟国协商给苏联的答复。以后，莫洛托夫又曾多次追问，均不见答复。（《根据新文件看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6 期，第 140 页。）

[28] 按照斯大林 11 月 25 日在同季米特洛夫谈话中发出的关于“要使保加利亚人广泛地了解这一建议”的指示，保共在首都索非亚散发了印有苏联建议的手写传单。但这引起了保当局的不满。（参见同上，142 页。）

[29] 《国际条约集》（1934—194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337—338 页。

[30] 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四卷（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 年，第 246 页。

[31] 同上书，第 246—247 页。

[32]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79，页码 1—69，参见勒热舍夫斯基编注：《1941 年 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文件集）》，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2 期，第 90—101 页。

[33]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1—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14—115 页。

[34] 同上书，第 115 页。

[35] 同上。

[36] 由于当时英国仍是一个能对欧洲大陆事务发挥重大影响的大国，所以苏联在筹划未来安排时基本上是把英国当作自己的谈判对手。以后，随着美国参战后的作用愈益增强，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才由苏美英三国共同讨论和解决。

[3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4—8。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

[38]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 月 28 日会议决定成立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并确定其基本任务是搜集外国有关战后和平安排的计划和方案的同一天，艾登向首相丘吉尔和内阁其他成员提交了这份备忘录。受雇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伦敦侦探站的剑桥五人帮间谍小组（菲尔比、麦克雷恩、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劳斯）获取了这份机密材料。几天后，这份文件就放在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整个战争时期，苏联通过剑桥间谍小组获得了英国政府内部的许多机密文件。除了 1942 年 1 月 28 日艾登备忘录外，其他落入苏联之手的重要文件有：1944 年 7月 25 日艾登就英国战后对苏联和西欧政策给英国驻法国临时政府代表库珀的复函——同年 9 月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送交斯大林；1945 年 6 月 29 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军事规划部撰写的《英帝国安全》的报告——同年 11 月送交斯大林。（参见察廖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1 期，第 92—105 页。）

[39] 《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 （1941—1945 年），同上，第 94—95 页。

[40] 同上，第 95—97 页。

[41] 同丘吉尔会谈记录（1941 年 5月 21 日），参见勒热舍夫斯基编注：《1942 年 5 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和与斯大林的通信》（以下简称《 1942 年 5 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 年，第 6 期，第 128 页。

[42] 英国政府在这项声明中表示不承认 1939 年欧洲因战争所发生的边界变动。

[43] 艾登表示，“这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在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已经迁就了苏联……英国政府是受早在战前就对波兰人承担的义务约束的。”(《1942 年 5 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 6期，第 132 页。)

[44] 同上书,第 134页。

[45] 由苏联方面提出的秘密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1. 除了恢复1940年3月的苏联和芬兰和约外，签订苏联和芬兰的互助条约。2. 除了按照1940年6月苏联和罗马尼亚关于边界的协定恢复两国边界外，签订苏联和罗马尼亚的互助条约。3. 签订英国和比利时、英国和荷兰的互助条约。（勒热舍夫斯基编注：《1942年5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和与斯大林的通信》（续），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69—170页。）

[46] 艾登回答：他不认为有必要确定英国的安全范围。他还表示，提及有关英国安全的措施会引起法国的不安。最后艾登以“必须与内阁成员就此问题进行磋商”为由婉言拒绝了莫洛托夫的建议。（《1942年5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续），同上，第166—167页。）

[47] 莫洛托夫认为，艾登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他在作了一番解释后说，承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是一件常识性的事情。至于说到美国的社会舆论，那么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都存在着对苏联抱着友好态度的人们，他们希望苏联成为反对希特勒斗争中的盟友。这些人在美国占大多数，所以没有理由担心美国大多数居民会反对我们的条约。（《1942年5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续），同上，第174—175页。）

[48] 同上，第172—173页。

[49] 5月24日，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在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明确表示，签订这些旧的（包含边界内容的）草案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并且给罗斯福向苏联提供援助增加了困难。至于英国的新草案，那罗斯福对它是持赞成态度的，所以他建议莫洛托夫签订英国的最新草案。他还表示，“把边界问题列入条约会使罗斯福处境变得复杂起来，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认为，第二战场比条约更重要。”（同上，第178页。）

[5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案卷237，页码49，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年，第4期，第118页。由李维诺夫领导的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于1943年正式成立，它的前身就是由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参见霍尔茨马克：《1944—1947年苏联外交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1期，第51页。）

[51]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案卷242、页码1—8.

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19—124 页。

[5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0—91 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出版社，1978 年，第 120 页。

[53] 斯大林说，“我们同芬兰议和的条件包括恢复 1940 年苏芬条约的效力。为此，如果芬兰人愿意的话，我们准备放弃汉科半岛，作为交换把佩萨莫地区还给我们。”（《苏联在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会议上》，第 2 卷：《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的德黑兰会议》[194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以下简称《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的德黑兰会议》]，文件集，莫斯科， 1978 年，第 161 页。）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反对。

[54]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28、31、88—90 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第 3 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123 页。

[55]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86—87 页。

[56]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的德黑兰会议》，第 168—169 页。

[57]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6、59—60、97—98 页。

[58] 同上书，第 83 页。

[59] 同上书，第 10—11 页。

[6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52—9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24—125、137—139 页。

[61] 转引自同上，第 139—144 页。迈斯基最后说明，所有上述关于未来和平最佳基本原则的想法，只是在战争并未能导致德国发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一旦爆发这样的革命，这些想法和从中引出的实际结论则应当加以修改。

[62] 联共（布）中央 1944 年 1 月 27 日全会决议，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2，目录 2，案卷 191，页码 1—6，参见俄罗斯《历史档案》杂

志，1992 年，第 1 期，第 61—65 页。

［63］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95，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44 页。

［64］转引自：《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第 97—99 页。艾登 7 月 25 日致库珀的复信于同年 9 月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探转给了斯大林。艾登在信函中所表露的对苏联软弱的真实面目使斯大林更加准确地摸准了英国领导人有关战后欧洲安排的基本思路和想法。而且从信函泄露的时间看，离 10 月的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只有一个月。这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在这样极其重要的时刻落入斯大林之手，它对斯大林在会谈中“战胜”丘吉尔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6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第 2 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337—338 页。

［66］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83，页码 3—16，转引自：《1939—1947 年欧洲边界和势力范围问题》，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89 页。关于英苏“百分比协定”一事，尽管丘吉尔在其回忆录里已经承认，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矢口否认。如，由葛罗米柯主编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指责丘吉尔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见该书上卷［1917—194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530 页。）现在这个“百分比协定”已经被俄罗斯的档案证明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不过，迄今为止，这份神秘的文件仍未全文公布，尽管它收藏于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号码已经为人们所知道。

［67］《1939—1947 年欧洲边界和势力范围问题》，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89 页；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第 575—576 页。

［68］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83，页码 18—21，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47 页。

［69］菲利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里》，载《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重要问题》，莫斯科，1995年，第59—60页。

[70] 此外，1944年初，军事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官员提出了要将几乎挪威的一半纳入未来的苏军占领区的建议。在西方盟国答应把斯大林期待的更多的德国领土作为苏占区后，斯大林否定了这一建议。（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第18—19页。）

[7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以下简称：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12，目录2，卷宗8，案卷6，页码89—98，转引自霍尔茨马克：《1944—1947年苏联外交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1期，第52页。

[7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5，目录30 卷宗123，案卷24，页码49—60，转引自同上，第55页。

[7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5，目录30 卷宗123，案卷24，页码61—64，转引自同上。

[74]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5，目录30 卷宗123，案卷24，页码66，转引自同上，第56页。

[75]埃里克森：《大不列颠与北海的基地问题（1945—1947年)》,载《斯堪的纳维亚历史》杂志，1982年，第7卷，第2期，第152页，转引自同上。

[7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8，卷宗33，案卷518，页码6—10，转引自同上。

[7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16，目录28，卷宗20，案卷5，页码1—18，转引自同上，第58—59页。

[78]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9，卷宗62，案卷936，页码40—48，转引自同上，第58页。

[79]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16，目录27 卷宗128，案卷22，页码5，转引自同上，第59页。

[8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16，目录27 卷宗128，案卷20，页码10—12，转引自同上，第60页。

[8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问题》，第59—60页。

[82] 同上书，第123—132页。

[83] 斯大林同志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的谈话，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 卷 390，页码 85—9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57 页。

[84] 纳林斯基：《斯大林与多列士（ 1944—1947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20 页。

[85]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 244—245、253—254 页。

[86] 同上书，第 177—179、247—248 页。

[87] 同上书，第 246 页。

[88] 1943 年 10 月，苏美英中四国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表示，将“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 年 8—10 月，在苏美英中分阶段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就除了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表决程度外的所有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89]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 168—177、202—203、245 页

[90] 《国际条约集》（1945—1947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第 8—9 页 。

[91]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 249 页。

[92] 同上书，第 505—517、527 页。

[93] 1945 年 6 月签订的苏捷条约和 8 月签订的苏波条约以及 1947 年 2 月签订的对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和约，确认了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后边界。这样就全部实现了斯大林在 1941 年 11 月与艾登会谈中提出的恢复苏联 1941 年 6 月以前边界的要求。苏联新获得的领土是佩萨莫、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和肯尼斯堡（后改为加里宁格勒。）

[94] 这里的环俄罗斯安全带的含义是，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政府都是对苏友好的政府（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对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或者不存在像战前那样对苏联怀有敌意态度和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的政府。

[95] 斯大林在战后把一张新的苏联国界图挂在墙上，说：“我们瞧

瞧看怎么样了吧……在我们北面一切正常。……我们把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历来是俄国的土地嘛！重新成为我们的了。白俄罗斯人现在全部都生活在一起，乌克兰人在一起，摩尔达维亚人，也在一起。西边也正常。”他马上转向东部边界说：“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萨哈林全是我们的了。您们看，多好啊！而且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用烟斗沿着中国画了条线说：“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正常……你看，在这里，我对我们的边界还不满意！”斯大林指着高加索以南的地方说道。（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中译本，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1—2 页。）

[96]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20 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 年，第 469 页。

[97] 战争期间苏联人员方面损失的计算和统计一直是有争议的。斯大林曾经在战后初期的 1946 年宣布苏联的人员损失为 700 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非真实的数字。因为斯大林担心公布了实际的数字会让人觉得苏联因巨大的人员方面的损失而变得软弱了。这里的统计数字引自《20 世纪俄国史》一书。它是以人口平衡表方法为基础进行统计的，包括：所有在军事作战和其他的敌人行动中牺牲的人；由于在后方、接近前线的地带和占领地区因死亡率提高而死去的人；1941 年 6 月 22 日时的苏联居民在战争期间离开苏联而战后没有返回的人（不包括在苏联境外的战俘）。（《20 世纪俄国史》，第 469—470 页。）在人员损失的总量中 76% 也就是 2000 万人是男性，这中间大部分是 1901—1931 年出生的男性，亦即男性居民中最有能力的人。1940 年苏联的妇女人口是 1.003 亿人，男子是 9230 万人。那时的人口不平衡存在于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间，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与战前不同的是，1946 年男女比例是 7440 万人比 9620 万人，男性多于女性是在 20—24 岁这一代人中间。在农村人口状况更加严重。1940 年男女比例是 1∶1.1，1945 年则为 1∶2.7。到 1953 年苏联人口达到了战前 1940 年的水平（战后边界内的人口，也就是包括 1945 年并入苏联的领土之内的人口。（《20 世纪俄国史》，第 470 页。）

[98] 祖布科娃：《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莫斯科，1993 年，

第 28—29 页。

[99]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 445 页。

[10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5，案卷 421，页码 2—3，《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37—38 页。另见《20世纪俄国史》，第 484—485 页。

[101] 奔萨和库兹涅茨克的工人们曾经上书莫洛托夫、加里宁和米高扬，申诉恶劣的日常生活条件。为此商业人民委员部专门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结果承认工人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5，案卷 420，页码 40об；案卷 421，页码 102，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37—38 页。另参阅《20世纪俄国史》，第 485 页。）

[102] 沃尔科夫：《战后年代苏联农民的劳动功绩（1945—1950 年的苏联集体农庄）》，莫斯科，1972 年，第 21 页。

[103] 同上书，第 256 页。

[104] 同上书，第 270 页。

[105] 阿克肖诺夫和祖布科娃：《变革的预兆》，载苏联《文学报》，1989 年 6 月 14 日，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39 页；《20世纪俄国史》，第 486 页。

[106] 苏联《文学报》，1989 年 6 月 14 日，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39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86—487 页。

[107]《20 世纪俄国史》，第 486 页。

[108] 阿克肖诺夫和乌柳卡耶夫：《论对不简单问题的简单决定》，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90 年，第 6期，第 83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41—42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88 页。

[10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99，目录 1,案卷 1，页码 105，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42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88—489 页。

[11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5,案卷 425，页码 3—4，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42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88—489 页。

[11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5、案卷

425，页码 38、40，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42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89 页。

[11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5，案卷 424，页码 10，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45 页。

[113] 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65 页页下注。

[114] 泽姆斯科夫：《历史的黑洞》，载苏联《虹》杂志，1990 年，第 6 期，第 47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65—66 页。

[115] 泽姆斯科夫上引文，第 47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66 页。

[116] 《从古至今的苏联史（12 卷）》,第 11 卷，莫斯科，1971 年，第 208 页，转引自同上。

[117] 苏《消息报》，1992 年 7 月 16 日。这两位将军于 1950 年被处死。

[118] 杜金：《斯大林主义：传说与事实》，载苏联《言论》杂志，1990 年第 7 期，第 23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67 页。

[119]《20 世纪俄国史》，第 474 页。另据泽姆斯科夫援引的资料，从德国遣返回来的人有 400 多万（泽姆斯科夫：《“第二次移民”的兴起（1944—1952 年）》，载苏联《社会学研究》杂志，1991 年，第 4 期，第 8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67 页。）

[120]《20 世纪俄国史》，第 474 页。

[121] 同上书，第 474 页。

[122] 同上书，第 474—475 页。

[123] 《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第 11 期，第 135 页，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54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93 页。

[124]《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54 页。

[125] 泽姆斯科夫：《特别居民点的居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档案），载苏联《社会学研究》杂志，1990 年，第 11 期，第 9 页，转引自同上，第 67 页。

[126] 同上书，第 54 页；《20 世纪俄国史》，第 493 页。

[127]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32，案卷

550，页码 113，转引自《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第 89 页。

[128]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32，案卷 291，页码 47 页，转引自同上，第 89 页。

[129]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8 页。

[130] 《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1944—1953 年），第 1 卷，1944—1948 年，莫斯科一新西伯利亚，1997 年，第 457—458 页，转引自穆拉什科：《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2 页。

[131] 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48 年），载《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 年）》，莫斯科，1995 年，第 90 页。

[132] 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42—143 页。

[133] 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转引自佩恰特诺夫：《二战结束后的三大国：苏联方面关于战后同美英关系设想的新文献》，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 13 期，华盛顿，1995 年 6 月，第 6 页。

[134]《莫洛托夫秘谈录》，第 66 页。

[135]《斯大林文选》，第 412 页。

[136] 同上书，第 425 页。

[137] 同上书，第 430 页。

[138] 同上书，第 478 页。

[139]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0，页码 85—9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54 页。

[140]《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6 年，第 1 期，第 20 页。

[141]《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2 册（194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265 页。

[142] 1944 年 6 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

一面指责蒋介石不用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进行抗日，而是与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争吵，另一面则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 年，第 6 卷，华盛顿，1967 年，第 799 页。）

[143] 按照 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年］，第 8—9 页。）同年 7 月 2 日和 7 日，在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谈话时，斯大林要求现在就应当就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问题达成协议（在日本投降后宣布），他说，苏联政府把维持现状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他表示，蒙古独立问题是苏联总计划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不能向中国派驻军队……但是我们可以向独立的友好小国派驻军队。（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页码 13、22、26。）

[144] 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还规定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年］，第 8—9 页。）在回答宋子文关于保证苏联在大连的优越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斯大林说，苏联的优越利益将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的构成和在为苏联船舶建立专门的港口方面。宋子文说：这就是说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将比中国人享有更多的权利。斯大林回答：或许就是这样。他补充说，太平洋的不冻港和中东铁路，所有这些的用途就是保障苏联在旅顺口和大连的权利。（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页码 5—6。）参加会谈的莫洛托夫在谈到大连时说，大连将是苏联远东舰船可以停泊的惟一的暖水港。（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页码 62。）

[145] 雅尔塔协定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年］，第 8—9 页。）

[146] 按照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中国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苏联本身也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

1947 年），转引自同上。）

[14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页码 31—32、38。

[14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第 1328—1340 页。

[14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第 197、199 页。

[15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1945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13—216 页。

[151] 同上书，第 238—240 页。

[152] 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394 页。

[1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 243 页。

[154] 伍修权：《东北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工作回顾》，载《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1 页。

[1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 219 页。但是由于对东北的情况不太明了，11 日夜间，中央又发出一份内部指示："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马上开往四省。"（《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 460 页。)

[15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 257 页。

[157] 《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2 期，第 6—7 页；曾克林：《我们是怎样取得东北这一战略基地的——忆党中央对挺进东北所采取的战略决策》，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573—575 页。

[158]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 1945 年 9 月 14 日。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4 页。

[159]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辽沈决战》（续集），第 9 页。第二天（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说："彼方（指苏联——引注）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 431 页。)

[160] 曹瑛：《四进长春》，载《辽沈决战》（续集），第496页。

[161]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32、40页。

[162] 彭真反击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62页。）

[16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8页。

[164] 《斯大林和蒋介石——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密使莫斯科》，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4期，第111页。

[16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案卷13，卷宗244，页码223—224。

[16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号不详）。苏联外交官贾丕才（当时系苏联驻华使馆三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周恩来来找大使，说首都重庆的局势很严重，可能有人要暗杀毛泽东。他问，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让毛泽东搬进苏联使馆，在这里他就安全了。彼得罗夫大使感到很为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而与莫斯科商量需要几天的时间。而且，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军阀曾经多次闯入苏联外交机构。周恩来明白了一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请求。大使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但没有得到回答。（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莫斯科，1996年，第23—24页。）

[167] 另一位外交官罗申（使馆武官）插话说，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这些事实，开展反对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0，案卷7，卷宗248，页码43—44。）

[168]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卷宗20，页码5—7。

[169] 同上。

[170] 团长周恩来此时还在延安。

[171] 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9年，第2期，第75页。列多夫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使馆

一秘。作为当事人，他曾在 1990 年撰写的《苏联和中国（1937—1949 年）——苏联外交官的回忆》（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 1990 年第 5 期）中半隐半现地谈到过中共代表团来苏联使馆的情况。在这次发表的《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披露了这次会见的细节。

[172] 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9 年，第 2 期，第 76 页。与中共代表的这次枯燥冷漠的会见是在 1946 年 1 月 1 日在苏联使馆进行的。而被列多夫斯基说成是“这段日子生病了”的彼得罗夫大使，却在前一天，即 1945 年 12 月 31 日，与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和武官罗申等人在蒋介石的官邸与蒋边喝茶边谈话。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他的私人代表、儿子蒋经国已于 12 月 30 日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同蒋介石会谈记录——1945 年 12月 31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0，卷数 7，卷宗 248，案卷 ки－032，页码 1—3。）

[173] 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9 年，第 2 期，第 76 页。

[174] 同上。

[175] 同上。另外可参见列多夫斯基：《苏联和中国（1937—1949 年）——苏联外交官的回忆》，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176] 《斯大林和蒋介石——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1月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密使莫斯科》，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4 期，第 110—112 页。

[177] 同上书，第 114 页。

[178] 同上书，第 129 页。

[179] 同上书，第 116 页。

[180] 同上书，第 119 页。

[181] 同上书，第 125、128 页。

[182] 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 292，目录 6980，案卷 59，页码 166，参见杜宾斯基：《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 年），莫斯科，1980 年，第 263 页；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 394，目录 9070，案

卷 47，页码 192，参见阿格廷科：《苏联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军事援助》，莫斯科，1975 年，第 106 页。

[183] 曾克林回忆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设宴招待他和副政委唐凯同志，并向他俩介绍了作陪的苏军一些军长。“他们亲热地称我们‘同志’，并尊称我俩为‘将军’。他们说，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又签订了中苏条约，所以你们进驻沈阳受到限制。但我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目标和你们是一致的，碍于条约限制，你们最好不要称八路军。”（曾克林：《我们是怎样取得东北这一战略基地的——忆党中央对挺进东北所采取的战略决策》，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二辑，第 575 页。）

[184]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第 466—467 页；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 210，目录 3173，案卷 144，页码 278，参见杜宾斯基：《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莫斯科，1966 年，第 569—570 页。

[185]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第 467 页；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 210，目录 3173，案卷 144，页码 278，参见杜宾斯基：《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第 570 页。

[186]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二辑，第 549 页。曾克林的回忆录中提供的数字则是：由出关时的 1.6 万人发展到 12 万人。（参见曾克林上引文第 577 页。）

[187]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辽沈决战》（续集），第 18 页。

[188] 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载《沿着中国之路》（1937—1945 年），回忆录，莫斯科，1989 年，第 302、303 页。第 39 集团军军委委员博伊科在回忆录中援引苏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有关向中共提供援助的一段话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博伊科：《解放使命》，载《沿着中国之路》，第 338 页。）

[189] 阿格延科：《苏联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军事援助》，第 107 页。

[190] 《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 年 10 月 8 日；《辰兄［指苏联——引注］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 年 10 月 25 日。转引自牛军前引文：《论中苏同盟的起源》，第 184 页。

[191] 吉利恩和迈尔斯编：《在满洲的最后机会》（张嘉璈日记），哈佛，1989 年，第 132 页。

[192] 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第 185—186 页。

[193] 科夫通一斯坦克维奇：《沈阳卫戍司令》，载《沿着中国之路》,第 356 页。

[194]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辽沈决战》（续集），第 13—14 页；梁必业：《第一纵队四战四平》，载《辽沈决战》（续集），第 70—71 页。

[195]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90 页。

[196] 博伊科:《解放使命》,载《沿着中国之路》,第 335 页。

[197] 博伊科上引文，第 336—337 页；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载《沿着中国之路》，第 303—304 页。

[198] 和田村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 年）——根据新的俄国档案文献，提交香港“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 年 1 月）论文，第 4 页。

[199] 转引自同上，第 5 页；《苏联与人民朝鲜的关系（1945—1980 年)》(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81 年，第 13 页。

[200] 胡志明致斯大林电，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6，目录 29，卷宗 197，案卷 31，页码 187，转引自布哈尔金：《克里姆林宫与胡志明（1945—1969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126—127 页。

[201] 胡志明致斯大林电，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6，目录 29，卷宗 197，案卷 31，页码 188—189，转引自同上，第 127 页。

[202] 塞维茨和伍德贝：《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布尔敦，1985 年，第 24 页。

[203] 季米特洛夫致芬德尔，1943 年 4 月 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通信》，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64 年，第 5 期，第 122 页。

[204] 查尔斯·加蒂：《匈牙利和苏联集团》，达勒姆，1986 年，第

33—37 页。

[205] 布兰科·佩特拉维奇：《巴尔干联邦》（1943—1948 年），贝尔格莱德，1991 年，第 128—135 页，转引自《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第 20 页。

[206] 引自纳林斯基：《苏联对外政策与冷战的起源》，载《苏联对外政策的回顾（1917—1991 年）》，莫斯科，1993 年，第 122 页。

[207] 《莫洛托夫秘谈录》，第 66 页。

第二章

大国合作时期与西方的争夺和对抗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有限进攻和出击

一　土耳其海峡危机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东临黑海，北倚地中海。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所以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历史上曾经十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近代衰落时，土耳其就开始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所谓的“东方问题”正是列强在土耳其进行角逐和争夺的产物。俄罗斯的西南部不仅与土耳其隔黑海相望，而且其陆地边界也与土耳其接壤。从 19 世纪起，控制土耳其海峡从而自由地由黑海进入地中海，一直是沙俄梦寐以求的愿望。为此，沙俄与西方国家在这里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一战后协约国与土耳其于 1920 年 8 月签订几乎使土耳其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规定海峡由国际共管，实际上是由英法控制。对此，作为黑海沿岸国之一的苏俄虽然无能为力，但却是极其不满的。 1922 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胜利后，协约国与土耳其新政府以及苏俄、罗马尼亚等黑海沿岸国家共

同重新讨论黑海海峡条约问题。苏俄为了打破协约国对海峡的单独控制，提出“不论平时或战时都不准任何军舰通过海峡”，只有“商船有充分的贸易航行自由”。。[1]但是，苏俄的建议遭到协约国的拒绝。 1923 年 7 月，在协约国同意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驻兵后，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了《黑海海峡公约》。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船只不论平时或战时均可自由通过海峡（只要土耳其为中立国家）；如果土耳其参战，中立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其他国家军舰是否可以通过，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海峡地带实行非武装化，由黑海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加以监督。显然，这种自由通航海峡的规定对海上大国英国是极其有利的，它使英国仍然保持了在海峡地区的优势地位。

由于海峡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战前夕的欧洲舞台上的三大力量——英法、德意和苏联在海峡地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和争夺。苏联认为，《洛桑条约》（指《黑海海峡公约》）的主要缺点，是它规定海峡对任何国家的军舰一律开放。[2]三方都对土耳其施加影响和压力。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使土耳其感到那种自己不能在海峡保持武装并任由其他国家的军舰自由通航的状况已经不适合自己的安全需要。土耳其提出了重新修改海峡制度的建议。1936 年 6 月至 7 月，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一些黑海国家在瑞士蒙特勒召开了讨论海峡问题的国际会议，审议海峡重新设防和军舰通过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与会各国通过了关于海峡新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公约规定：无论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可自由通过海峡。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必须是 11.5 万吨以下的水面舰只，且停留期不能超过 21 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为参战国，是否准予通过海峡，由土耳其酌情决定。解散海峡国际委员会，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

区设防。[3]从苏联的角度看，《蒙特勒公约》虽然对黑海和非黑海国家在平时通过海峡作了有利于前者的有区别的规定，但是，对于在战时土耳其保守中立的情况下交战国中的黑海和非黑海国家均不准通行的规定是不满意的。[4]因为，它不能使苏联获得在任何时候自由通过黑海海峡的权利，同时又没有限制其他大国在海峡地区的优势。

二战爆发后，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德国。在与里宾特罗甫和希特勒讨论划分欧洲势力范围时，莫洛托夫多次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海峡问题的立场，即，“《蒙特勒公约》是不合适的’。[5]希特勒表示，“海峡问题的解决应有利于苏联”。“也就是说，让商船在和平时期能够进入海峡，而俄国军舰任何时候都能自由进入，但非黑海大国的军舰不得驶入。”[6]这是希特勒为了同苏联达成新的势力范围而抛出的诱饵。 11 月 25 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明确表示，苏联希望以租借的方式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7]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想要获得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航行自由的愿望并未改变。所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1941 年 12 月的一份关于战后和平安排的报告中提出，“无论如何都不能保持…… 黑海的原来的状况。”[8]而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停战委员会委员迈斯基则在1944年 1月 11 日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表示，“苏联希望削弱土耳其的影响，特别是它在巴尔干的影响。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力争减弱土耳其作为海峡‘哨兵’的作用。”[9]他们俩人的着眼点都是要使苏联获得黑海海峡的出海口。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蒙特勒公约》“需要修改”,修改时‘应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不可能接受土耳其扼住苏联咽喉的局面”。[10]实际上，随着苏军在军事上胜利的扩大，苏联已经不满足于海峡的自由通航权，而是要获得对海峡的控制权和实现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11]

1945年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驻苏大使萨利姆·萨尔佩尔递交了一份宣布废止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承认1925年12月17日签订的苏土条约在维持苏联和土耳其友好关系中的作用，但认为必须确认，由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项条约已经不适应新的局势，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改。”“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向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声明，希望按照1935年11月7日议定书所规定的废约方法废除上述条约及其有关附件。”[12]

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举动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反应。美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有可能要求同土耳其进行双边谈判，对后者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即将离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斯坦哈特认为，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它对待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方式来对待土耳其。他并且预料苏联的行动方式是：批评土耳其政府并在报刊上发起攻击（已经开始了）；散布保加利亚军队进军土耳其边界的流言（正在传播）；与土耳其进行双边谈判。他不认为苏联会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他相信，如果苏联提出过分的要求，土耳其人肯定会加以抵制。[13]3月底，土耳其外长哈桑-萨卡在与美国离任大使进行告别谈话时对苏联的意图甚为担忧。他表示，土耳其准备修改《蒙特勒公约》，但不会对苏联割让领土或者向苏联提供基地。4月4日，土耳其政府通知苏联，它准备本着认真和善意的态度研究就缔结新约所提出的建议。[14]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病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上任仅一星期，就于4月19日接见了土耳其驻美国大使巴伊杜尔。接着在4月23日的白宫会议上，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对总统说，波兰的事情不是孤立的，它是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一部分。其时，在东欧问题上，美国已处于被动地

位。福莱斯特尔把土耳其问题与东欧问题联系起来，其意图正如他自己告诫总统的那样，“如果俄国人不改变他们的僵硬态度，美国对他们早摊牌比晚摊牌要好。”[15]4 月 25 日，美国新任驻土耳其大使威尔逊劝告总统，因为东欧已经丢失给了苏联，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使美国支持土耳其。[16]

但是，苏联却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同年 6 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缔结苏土条约的三项要求：土耳其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交给苏联；土耳其必须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两国将同意在多边协定达成之前修改《蒙特勒公约》。。[17]这些要求差不多就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置了。

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历史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俄国曾于 1806 年、1828 年、1855 年和 1877 年四次入侵该地区。前三次，在西方干预下，俄国被迫将两地归还土耳其。1877 年俄国第四次入侵，终于如愿以偿地将两地占为己有。1921 年的苏土条约规定两地归还土耳其。因此，从历史上看，两地的主权归属起码是有争议的问题。苏联对它们的要求并无充足的法律根据。而在海峡建立苏联基地的要求，公然侵犯了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至于苏联想撇开美英等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单独与土耳其修改海峡制度，在当时情况下是注定行不通的。莫洛托夫在提出上述要求的时候，曾闪烁其辞地暗示，如果土耳其与英国绝裂或者改变土耳其外交政策，那么上述要求就是不必要的了。[18]这清楚地表明，苏联要求的实质无非是要把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同年 7—8 月的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明确指出“《蒙特勒公约》是决定用来对付俄国的”，“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小国，卡住了一个大国的咽喉，不给它出路”。他要求“使苏联的船只有可能自由地进出黑海”，并表示，“一旦发生复杂事件，由于土耳其无力保证自由通航的可能性，苏

联希望用武力保卫海峡。”丘吉尔则表示，“黑海海峡的自由通航应取得三大国及其他国家的同意和保证”。杜鲁门认为，“黑海海峡应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自由水道，应由我们大家来保证。”[19]三大国都同意要对《蒙特勒公约》进行修改。但问题在于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和在海峡驻军的要求，绝非这种一般性修改所能满足的。

为了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还对土耳其进行武力威胁。苏联把200辆坦克调往伊朗边界，将其中的约1/3部署在伊土边界。在邻国保加利亚，苏军进行大规模的调动。苏联的报刊和电台也掀起了攻击土耳其的宣传活动。[20]

为了抵制苏联的要求，美国于1945年11月2日提出了修改《蒙特勒公约》的四点主张：（1）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向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2）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对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3）除和平时期有限吨位的军舰外，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对非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除非获得黑海国家特别许可或者经联合国授权行事；（4）《蒙特勒公约》应作某些修改，如，以联合国制度取代国联制度和取消日本的公约签字国的资格。[21]美国的这些主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即，自由进出海峡的权利。但苏联要的是控制海峡的权利。因此苏联仍然不肯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1946年8月8日，苏联向土耳其提交了有关修改《蒙特勒公约》的照会。照会提出了修改公约的五项原则。前三项内容基本与美国四点主张的前三点相同。第四项原则是：“作为进出黑海的惟一海上通道的海峡，其制度的建立应当是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权限范围内的事情。”第五项原则是：“作为最有利害关系、最能保障商船航行自由和海峡安全的国家，苏联和土耳其将通过联合手段来组建海峡的防御以防止其他国家出于敌视黑海国家的目的利用海峡。”[22]照会的要害就是要把西方

国家赶出海峡地区，谋求建立苏联对海峡的独家控制权。

苏联的这些要求显然已超出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权和独立。美国等西方国家本来就有意在土耳其所在的中近东地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它们强烈反对苏联对海峡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在经过仔细研究后，于 8 月 15 日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一项备忘录。备忘录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土耳其。这种控制是要以所谓对海峡的联合防御为幌子。一旦实现的话，美国就难以阻止苏联控制整个中近东地区。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有着资源和交通方面的利益，不让苏联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实现其对海峡和土耳其的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备忘录强调，惟一能阻止俄国的方法，就是要明确表示，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准备以武力来对付侵略。[23]8 月 19 日，美国照会苏联，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认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而且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土耳其应当继续是海峡防卫的主权责任者。照会警告，对海峡的进攻将必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事情。[24]英国在 8 月 21 日给苏联的照会中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与此同时，土耳其则在 8 月 22 日给苏联的答复中驳斥了所谓土耳其没有履行《蒙特勒公约》的指责。[25]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抵制下，苏联只有知难而退了。以后，虽然苏联继续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但并未采取导致冲突的实质性行动。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超出了它的正当的安全利益范围。作为一个黑海大国，苏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当拥有黑海出海口的权利。但是，海峡毕竟是在土耳其国家的领土之内，并且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地区，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也不仅仅是苏联一家。而苏联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基地并单独控制海峡的要求不仅明显地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权和利益，也违背了其他与海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利益。因此，这种要求势必引起

有关国家的反对和抵制。莫洛托夫后来在回忆时也并不讳言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他说，“战争末期，我们向土耳其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不同意。盟国也不支持。这是我们的错误。”“我提出由我们和土耳其控制海峡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不完全正确……”“斯大林是出色的政治家，但他也犯错误”。[26]

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举动在时间上正好发生在罗斯福逝世和杜鲁门接任并且由战时到和平的转折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和加深了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猜疑和敌视，动摇了双方战后继续合作的决心和信心。它与苏联同期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连成一体，使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结束后迅速走向对立和对抗，不仅加快了美国对中近东政策的调整，而且也促进了美国对苏联“遏制”政策的形成。1946年2月，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全面分析的凯南电文正是在这期间出现的。以后，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更是以援助土耳其和希腊为理由，完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当然，美国对苏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自有其本身的客观因素。但是，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不当行为，正好使战后急欲向中近东扩张的美国感到有机可乘，并且利用苏联的这一失误向该地区渗透。[27]

二　伊朗危机

位于西亚的伊朗是苏联的南部邻国。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是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门户。通过伊朗南下波斯湾并进入印度洋一直是沙俄的扩张目标。由于波斯湾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19世纪后半叶以来，沙俄同英国和德国就在这里展开了

激烈的争夺。1907 年 8 月，《英俄协定》将伊朗一分为三，英国占东南部，俄国据北部，剩下部分为中立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俄占领了伊朗北部和西部，英国占据了伊朗的南部。由此形成了俄英对伊朗的北南分据的局面。

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废除瓜分伊朗的《英俄协定》，并从伊朗撤军。此后，英国几乎占据伊朗全境。1919 年 8 月的《英伊协定》基本上确定了英国对伊朗的保护关系。苏俄虽然废除了《英俄协定》，但是伊朗政府却仍然与旧俄的公使保持着正式关系。1920 年苏俄红军追击邓尼金白军进入伊朗北部。在红军的支持下，在伊朗的阿塞拜疆成立了民族政府；在拉什特建立了吉兰共和国。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同年 8 月伊朗承认苏俄政府并派遣使团前往莫斯科与苏俄谈判两国关系的问题。1921 年 2 月，苏俄与伊朗签订了《苏伊友好条约》。条约规定，苏俄废除沙俄与伊朗或与第三国签订的损害伊朗权利的所有协定和条约；苏俄放弃沙俄在伊朗的一切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和租让权（但伊朗不得把租让权转让给第三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如有第三国试图在伊朗推行侵略政策或者利用伊朗领土作为反苏基地，而伊朗在告知苏俄后又不能消除这种危险，苏军有权进入伊朗并在危险消除后立即撤军。条约签订后，同年 6 月，苏军撤出了伊朗。

二战期间，为了消除德国在伊朗的破坏活动，确保盟国援苏物资经伊朗顺利进入苏联，苏联和英国于 1941 年 8 月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而这两个地区恰好是它们历史上的传统势力范围。1942 年 1 月，苏英伊三国签订了盟约，规定在盟国同“轴心国”的所有军事行动结束后 6 个月之内，苏军和英军从伊朗领土上撤出。同年底，美军进入伊朗，接管和承担原先由英军负责的铁路和港口业务。对德战争结束后，1945 年 5 月，伊朗要求苏美英三国从伊朗撤军。但是，苏联

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

伊朗与苏联有 2500 公里长的边界，伊朗的北部历史上就曾是沙俄的势力范围。 1941 年 8 月苏军进入伊朗后，实际上就是恢复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关于战后安排的设想中，伊朗与土耳其一样都是苏联南部安全的重要环节。迈斯基在 1944 年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苏联应当得到保证，能自由而方便地使用通过伊朗前去波斯湾的过境线路。”[28]迈斯基还专门列出《伊朗》一节，作了具体的阐述。他写道：“对于伊朗，苏联的目的应当是保持并进一步发展同它的友好结盟关系。这是因为伊朗掩护着我国的高加索侧翼，并保障我国同波斯湾的交通。为此必须：（1）略作调整后仍然保留 1942 年签署的英苏伊三方互助条约。如果三方条约因故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应当签订苏伊之间的双边互助条约。（2）战后应当建立用以维护和发展伊朗交通路线的（苏英伊或苏英美伊的）混合机构，因为显而易见，靠伊朗一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而如果没有良好的过境交通道路，我们要出海进入波斯湾只不过是幻想。（3）应当特别注意通过大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措施（苏联的医院、为伊朗儿童举办的学校、苏联电影、苏联戏剧、接受伊朗青年去苏联留学、在伊朗学校开设俄语课、苏联援助伊朗筹建武装力量，等等）协助开发伊朗北部地区。[29]由此可见，苏联战后对伊朗政策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与伊朗保持同盟关系，确保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从而保障苏联南疆的安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斯大林的直接关注下，联共（布）中央领导的“党的外交”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国家外交，在伊朗问题上双管齐下，各显身手。具体方法是：其一，由外交人民委员部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突破点，同时以拖延撤军为手段，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排除英国在伊朗

的势力和影响，确立苏联在伊朗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其二，由联共（布）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实施革命，借以牵制伊朗政府，并在必要时成立听命于苏联的政府。1941 年苏军进入伊朗后，同年 10 月伊朗人民党成立，其骨干就是前共产党人。人民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积极分子 30 年代曾经受训于苏联的党校。所以，伊朗人民党成了联共（布）“党的外交”的有用的工具。

早在战争期间，苏联就利用占领之便，组织人员对伊朗北部的石油资源进行过勘探。但是，如要正式开采，则必须与伊朗政府签订专门的协定，以获得租让权。[30] 差不多在这同时，美英两国的石油公司与伊朗进行了有关获取伊朗南部俾路支地区石油租让企业的谈判。1944 年 8 月 8 日，美英两国达成了双方在石油政策方面共同行动的专门协定。这刺激了苏联要在伊朗石油问题上获得与美英对等权力的欲望。

8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有关伊朗石油开采权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英美在争夺伊朗石油资源的斗争中存在着矛盾，但同时要注意它们试图对“任何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这第三国当然指的是苏联。贝利亚希望苏联参加英美石油谈判，“以便在国际石油领域捍卫苏联的利益”。他认为，“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正在暗中进行破坏以阻止将伊朗北部的油田交给苏联开采。”因此，他建议，“要同伊朗进行强硬的谈判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租让权”。[31]

同年 9—10 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卡夫塔拉泽率团前往伊朗进行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他不仅要求获得以前沙俄在卡维尔一霍雷恩油田的开采权，而且还提出要获得为期 5 年的伊朗北部大片地区的广泛的开采权。此外，他要求订立两国政府间的协定而不是一般的商业契约。10 月 11 日，伊朗赛义德

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表示所有关于租让权的谈判将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 12 月 2 日，伊朗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政府与外国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32]这一决定同样适用英国和美国。因此，也遭到了英美石油公司的反对。但是，苏联却认定伊朗的决定是受英国的反苏政策指使的。 1945 年 2 月，联共（布）中央驻伊朗的情报员在一份报告中说，英国通过伊朗议会进行活动，伊朗议会是英国的驯服工具，“对我们早先的扩大经济利益的愿望进行强烈的抵制（拖延有关租让权的建议）”。[33]联共（布）情报员断定，存在着对苏联在伊朗的经济利益的“英国威胁”。他为此建议，作为一种对抗手段，可以利用伊朗议会即将进行的选举，以使亲苏分子夺取伊朗北部省份所有 54 个席位。[34]

苏联在伊朗的举动一直就为美国和英国所密切注视。 1944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分析美国在中近东目标的报告中指出，英苏矛盾是英苏法三大国地区特殊利益冲突的传统因素。在苏联的主要战略利益中，保障其南部边界安全和阻止建立敌视性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间接目标就是试图在中近东传播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美国打算用经济手段来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但绝对不能排除的是：要对“中东出现的将会构成对该地区国家和整个世界威胁的矛盾和行为”做好准备。[35]英国政府对于苏联在伊朗的企图也已经察觉。英国是苏联在伊朗的主要竞争对手。它对伊朗的政策就是在战后继续维持英国的势力范围并削弱苏联在伊朗的影响。

1945 年 5 月 19 日，伊朗政府照会苏美英三国，要求它们提前从伊朗撤军，因为对德战争已经结束了。英美对此表示接受和支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由于伊朗的建议，英国获得了“把俄国人赶出波斯”的期盼已久的机会。[36]当时对日战争尚未结束，英国冒着它在伊朗阿巴丹的石油加工设施受到袭

击的危险，匆忙准备撤军。5月31日，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向苏联递交了建议盟国提前从伊朗撤军的信函。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于6月14日通知苏联说，美军司令部在波斯湾的使命已经结束，正在采取措施削减美国驻伊朗的军队。显然，英美的用意就是迫使苏联同它们一起提前撤军。但是，苏联不敢撤也不愿撤。

1945年5月25日，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从伊朗提前撤军的理由。他认为，“苏军撤出伊朗无疑将导致该国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的崩溃……反动的亲英分子将竭尽全力并使用一切手段，以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我们在伊朗的工作成果。所以，可以认为，拖延我们军队撤出伊朗的时间和力争尽可能地保障我们撤军后的利益是正确的（主要方法是获得石油租让权，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37]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在伊朗采取的行动正是按照卡夫塔拉泽的建议展开的，即：拖延撤军、力争获得石油租让权、支持和扶植亲苏组织、打击亲英分子。

于是，对于伊朗和英美要求提前撤军的建议，苏联一概三缄其口。在同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提出分三阶段撤军的建议，即，第一，从德黑兰撤军；第二，从除阿巴丹（驻有英军）和除东北和西北部（驻有苏军）以外的伊朗撤军；第三，从整个伊朗撤军。但是，苏联拒绝了。最后，三大国仅就从德黑兰这样的有限撤军达成协议。而且，斯大林认为撤军期限应从对日作战结束后算起。[38]不过，虽然撤军可以拖延，但是毕竟不能不撤。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这样，按前面达成的对日作战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计算，1946年3月2日便成为正式撤军的法定期限了。[39]

随着撤军日期的临近，苏联对伊朗内部事务的干涉加强

了。在苏联的支持和指导下，同年 9 月 6 日，在伊朗阿塞拜疆成立了伊朗民主党。[40]该党要求在伊朗境内实行民族自治（包括使用阿塞拜疆语），按居民人数在议会中获得占总数 1/3 的席位，而不是现在的 1/6。[41]12 月，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领导人比雪华里在大不里士组建了民族政府。与此同时，苏联还支持伊朗境内库尔德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42]伊朗政府认为阿塞拜疆自治运动是损害伊朗统一的叛乱，增派政府军急驰大不里士，但为苏军阻挡。

伊朗政府于 11 月中下旬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准许其向伊朗阿塞拜疆增兵。[43]但苏联方面不予答复。 11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认为，让伊朗政府军前往伊朗阿塞拜疆是由 1943 年德黑兰宣言中关于盟国尊重伊朗的主权和独立的条款保障的。[44]但是，苏联政府在 11 月 26 日给伊朗的照会中、11 月 29 日和 30 日致美英两国大使的信中拒绝了让伊朗政府军前往伊朗阿塞拜疆的要求。苏联的理由是，伊朗增派军队将加剧伊朗北部地区的混乱并可能导致流血，这将迫使苏联政府向伊朗增派军队以维护秩序和保障自己的边界安全。[45]

伊朗面对苏联的强硬态度，绝望之中只能向美国政府请求帮助。11 月 29 日，伊朗新任驻美国大使阿兰在向杜鲁门总统递交国书时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在这危急的形势下，我真诚地请求您，总统先生，继续保护伊朗的权利……只有贵国能拯救我们，因为你们一贯捍卫道义标准和原则，并且你们的手是干净的。”[46]

接下来的 12 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成了各方在伊朗问题上较劲的重要场所。伊朗政府提出要把伊朗问题列入外长会议议程，甚至由首相和外长组成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会议。[47]英国和美国都积极准备在会上讨论伊朗问题。英国驻伊朗候任大使

布拉尔德被列入了英国代表团的名单之中。[48]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韩德逊表示，美国将要“承担讨论伊朗问题的领导者的责任”。他还认为，伊朗局势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否在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的小国的主权基础上相互合作的考验”。[49]而苏联的对策是，不同意在外长会议上讨论伊朗问题。苏联官员在为外长会议准备的材料中，提出把英军撤出希腊和美军撤出中国与伊朗问题挂钩。如果美国提出向伊朗派遣盟国特别委员会，苏联应以“干涉（伊朗）内部事务”为理由予以否决。[50]到这个时候，伊朗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国际化的可能，而这是苏联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三国同意成立一个伊朗问题三方委员会。但在撤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英美提出“委员会应着手研究使盟国军队能最快速地撤出的问题”，而苏联建议改为“尽可能地加快盟国军队的撤出”[51]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直截了当地问莫洛托夫：“你们不同意 3 月 2 日为撤军的日期？”莫洛托夫一口回绝，“我们不同意”。他提出的理由是，冬季出现了复杂的条件。他还建议，将伊朗问题搁置起来，留待未来的三方委员会去处理，因为伊朗代表团没有参加会议。[52]由于美国的和缓态度，最后的会议公报没有提及伊朗问题。[53]但是，伊朗问题的延宕解决，对苏联是不利的。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伊朗在美国的支持下，进一步把伊朗问题国际化了。

美国立场的变化发生在 1945 年底和 1946 年初。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开始以“力量均衡”的传统模式来看待中东问题，并且把伊朗问题与土耳其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被打败后，俄国向西方和东方“扩张”道路上的两个主要障碍消除了。伊朗和土耳其事件证明，苏联想要摧毁最后的障碍

急速地南下前往印度以及英国已无力保卫的其他殖民地。国务院的官员们希望美国政府在“苏联尚未在伊朗和土耳其推进得更远的时候”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54]

在美国的支持下，1946年1月19日，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团长塔基–扎德向联合国安理会代理秘书长杰布递交了要求调查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信函。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伊朗卡瓦姆政府还表示愿与苏联方面就此问题进行正式谈判。苏联当然不希望使伊朗问题国际化。于是，伊朗代表团从2月19日起至3月5日访问苏联。苏伊双方就苏联撤军、阿塞拜疆局势和苏联获得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的问题，进行了紧张的谈判。苏联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是：伊朗政府应当通过与伊朗阿塞拜疆领导人的谈判使该地的局势缓和下来；改变伊朗敌视苏联的态度；解决石油租让权的问题。[55]

在有关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上，苏联的具体做法是：先不提苏联在1944年提出的给予它在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只要求伊朗同意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苏联的股份占51%，伊朗占49%）。在伊朗表示拒绝后，苏联在愤怒之中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莫洛托夫在2月28日给卡瓦姆的备忘录中说：“为了迁就伊朗”，苏联政府“牺牲自己的利益”，提出可以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但是，既然伊朗拒绝了这一建议，那么苏联政府就认为这是不愿意考虑“苏联的利益”，是一种国家歧视行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声明，它在向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作了报告后，已决定取消苏联方面的妥协性建议，恢复1944年提出的有关在与英国在伊朗南部的租让权相同的基础上给予苏联在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正式建议。”[56]关于伊朗敌视苏联的态度，莫洛托夫翻开了历史老账：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就向苏俄提出了领土要求。二三十年代，伊朗当局试图把靠近巴库的石油租让权给予外国。“所有这些

事实表明，伊朗统治集团对苏联抱有敌视情绪，随时准备损害苏联利益并威胁苏联阿塞拜疆和苏联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地区。”[57]

实际上，苏联就是要以撤军为筹码，获得石油租让权，同时为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争取一定的地位，从而确保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卡瓦姆首相提出的建议是：“如果苏联政府在立即从伊朗撤军和阿塞拜疆问题上满足我的要求，那我就有足够的时间返回德黑兰就建立这个公司（指苏伊石油合营公司——引注）的所有条件进行协商并且提交合适的草案让议会批准。”[58] 苏联方面没有答复伊朗的建议。

3 月 2 日的法定撤军日期前，英国从伊朗撤军完毕。而在此之前，美军在 1 月 1 日前已经撤出伊朗。苏联只是在 3 月 1 日通过塔斯社宣布，从 3 月 2 日起，苏联将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伊朗“局势比较平静的地区”。也就是说，苏联拒绝如期从伊朗完全撤军。

3 月 18 日，伊朗在美国的支持下再次把苏联撤军问题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由于英美两国已经撤军，苏联继续驻军伊朗使自己在外交上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3 月 24 日，苏联新任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向卡瓦姆首相递交的一封信函宣布，苏联将从 3 月 24 日起恢复撤军，并在一个半月之内撤退完毕。卡瓦姆则表示，国王已同意按苏联的条件建立两国石油合营公司。[59] 4 月 4 日，苏伊双方就苏联撤军和建立苏伊石油公司问题最后达成妥协：苏联在半个月之内撤出全部军队；伊朗将把关于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的协定交给议会批准（限期为从 3 月 24 日起计算的 7 个月之内），[60] 并且同意调整与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的关系，用波斯语和阿塞拜疆语两种语言处理公文，给伊朗阿塞拜疆的民主组织和工会以活动自由，增加伊朗阿塞拜疆在伊朗议会中的席位。在苏伊的妥协中，伊朗作出了

较大的让步。

5 月 9 日，苏军从伊朗全部撤出。伊朗危机至此结束。在苏军撤退的前一天，斯大林给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领导人比雪华里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苏军撤退的理由、对伊朗形势的基本估计和该党今后的活动及其任务。关于苏军撤出的原因，斯大林写道，“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驻伊朗，您当然就可以指望为争取实现阿塞拜疆人民革命要求的斗争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不能让苏军继续留在伊朗，主要是因为苏军驻扎在伊朗有损于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军可以留在伊朗，那为什么英军不能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希腊？美军不能留在中国、冰岛和丹麦？所以，我们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以便打落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上的这件武器，发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从而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为有理和有效。”关于伊朗的基本形势，斯大林认为，“在伊朗现在没有深刻的革命危机。伊朗的工人很少并且组织得也不好。伊朗的农民暂时还没有表现出认真的积极性。伊朗现在也没有爆发与外敌的战争，只有像这样的战争失败的时候，才能削弱伊朗的反动集团。”关于伊朗民主党今后的任务和活动，斯大林指示，“苏军暂时还在伊朗，你们有可能在阿塞拜疆展开斗争，发动带有深远要求的广泛的民主运动。……我们让卡瓦姆政府去同代表伊朗最反动分子的亲英集团发生冲突。不管卡瓦姆过去是什么样的反动分子，他现在不得不为了自卫和维护自己的政府去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并在伊朗民主力量中寻找依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冲突以迫使卡瓦姆作出让步，我们应当支持卡瓦姆，孤立亲英分子，从而为进一步实现伊朗民主化创造某些基础。这就是我们根据形势给您的建议。”[61]

从斯大林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第一，斯大林是从全球范

围内苏美和苏英关系的角度考虑苏联撤军问题的。照斯大林的说法，苏军撤出伊朗是为了使美英军队撤出其他国家。但是这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美英军队当然没有理由留在任何别的国家内。但是，伊朗问题在于，苏美英三国关于撤出伊朗是有协议的。在美英已经撤军并且伊朗政府再三要求撤军的情况下，苏联拖延撤军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斯大林最后不得不撤军的原因是，其一，继续驻军伊朗于理于法都不能自圆其说；其二，面临美英的巨大压力，还未作好与它们撕破合作关系的准备。所谓的“打落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上的武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维护面子的遁词。第二，斯大林本来打算通过“党的外交”，利用伊朗人民党和民主党在伊朗发动革命，给伊朗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迫使它就范于苏联。但是，这种策略并未奏效，结果只能承认伊朗不存在革命的危机，实际上是承认对伊朗输出革命的失败。

一场伊朗危机，使苏联输得惨到极点。它大大削弱了苏联本来在伊朗的地位和影响。此后，苏联便想尽力维护与伊朗政府的关系，指望它实施两国达成的协议。但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危机后，伊朗对苏联的厌恶感更甚。所以，在苏军撤出后，卡瓦姆政府已无意去履行苏伊协议。11 月 21 日，卡瓦姆政府以选举为借口把军队开进包括伊朗阿塞拜疆在内的所有省份，伊朗阿塞拜疆的自治运动很快就告瓦解。此时，苏联已鞭长莫及，只是发出了“友好的警告”。[62]1947 年伊朗新议会又拒绝批准关于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的协定。这样，苏联对伊政策的目标几乎化为泡影。

苏联在伊朗危机中拖延撤军、支持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成立民族自治政府和强行谋取在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等行为，与它同时期在土耳其试图获得领土割让和建立海峡基地的举动一样，从苏联南部安全的角度看，都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防御要

求和防御范围，是一种在苏联南部疆域以外建立势力范围的进攻性和扩张性的重要步骤。实现这种要求和计划，就是直接侵犯了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的主权和破坏了两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又给同样企图在那里谋求势力范围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可乘之机。土耳其和伊朗危机的进程及其结果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两场危机，对战后初期的苏美英三国之间尤其是苏美之间的关系以及战后国际形势的走向和国际新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一）危机推动了英美联合的步伐。在迈斯基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报告的设想中，在战后时期苏联能够与美英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未来的苏美英三大力量的格局中，苏联处于最有利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战后国际形势的特征之一就是英美矛盾的上升和剧烈，美国不敢向苏联势力范围扩张，英国在与美国的争斗中将会倒向苏联一边。迈斯基的估计虽然过于乐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战后，作为昔日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竭力要保持它海外利益，作为战后最有实力的美国则力图谋取和扩大它的海外利益。而英国决不会轻易地让出它的海外利益。所以，说美英两国在战后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是危言耸听。但是，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尤其是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由于苏联对安全的过度的追求和在苏联周边建立势力范围的试图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不示弱的扩张性和进攻性，使得英美这两个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很快就置它们的矛盾和分歧于一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1946 年 3 月，丘吉尔在富尔敦演说中号召英美联合遏制苏联，1947 年 3 月，英国甘愿把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希腊和土耳其拱手相让给美国，除了英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反苏意识外，也反映了英国对苏联的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行为的惧怕。环顾战后初期的欧洲，除了苏联以外，昔日在欧洲舞台上

激烈角逐的德法意等大国或战败或战伤，而大英帝国本身也已雄风不再，哪堪与军事实力强大的苏联抗争？所以，英国除了委身于美国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与迈斯基关于战后英国因为同美国的矛盾将会倒向苏联的估计完全错位。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估计并不能说明迈斯基把握问题的能力太差，某种程度上是苏联那种不合常规的鲁莽行为常常使事情的发展进程无法预料。

（二）危机加深了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如果说猜疑和敌视的情绪在战时就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它们之间的敌对意识。1946 年 2 月初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对资本主义严词嘲讽和批判的斯大林演说、2 月下旬的分析苏联对外政策意图的凯南电文、3 月的号召美英联合对付苏联的丘吉尔“铁幕”演说和 9 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全面分析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先后出现在 1946 年这同一年里，绝不是偶然的。在上述的演说和电文中，彼此对对方的批判实际上都反映了他们在危机期间所获得的对对方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三）危机加快了各自对对方政策的调整，使本来就并不牢固的合作变得岌岌可危，由此还加剧了双方在欧洲的矛盾和对立。1947 年 3 月宣布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其产生的外在环境之一正是这两场危机。杜鲁门主义是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契机而出台的，而遏制苏联的意识正是在伊朗和土耳其两场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同样，在杜鲁门主义出现之前，苏联就已经在考虑成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来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争夺了。通过这两场危机以及在东欧的争夺，苏联也已认识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苏联关于两个阵营的思想并非是在 1947 年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苏联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和东欧等地矛盾和

对抗的现实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总之，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就其内容和结果看，可以说是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战时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转折和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直接酝酿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

第二节　建立东欧安全带和巩固战争胜利成果

一　东欧安全带不容染指

在环苏联安全带中，东欧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距苏联的欧洲地区（亦是苏联的中心地区）最近，并且历史上经常是外部敌人入侵俄罗斯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理所当然地成为斯大林战后建立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首选地区。而在东欧国家建立对苏友好政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1946 年 3 月，斯大林强调，“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理由是，“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内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63]另一方面，战争后期，苏军已越境进入东欧国家作战，这就为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和条件。正如斯大林所说，“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64]东欧对于苏联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同时满足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安全和革命的

两大目标。所以，斯大林对东欧的政策就是要利用苏军进入东欧作战的机会，在东欧地区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苏联牢固的安全带。同时，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以共产党为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其转化为苏联模式的政权，从而把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总之，东欧对于苏联是一个有着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的地区，不容他人染指。

由于苏军进入东欧所形成的苏联在东欧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以及根据盟国之间的协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已经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和奥地利的一部分成了苏联的占领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在上述地区的安全带的自动建立和苏联安全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因为西方被迫同意东欧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此自动放弃了东欧并且听任苏联在东欧建立苏联模式的政权。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有关成立临时民主政府和尽快进行自由选举的规定，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就是试图在战后的东欧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建立西方模式的议会制政府。只要这样，西方就能保持在东欧的影响。

1946 年秋天，苏联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对苏联采取什么立场，在美国存在着三种意见”。第一种是，“美国的政策应当保障苏联拥有某种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应当限于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阵地。大约 80% 的美国报刊持与此相反的立场。”第二种是，“利用美国垄断核武器生产秘密的优势，趁早与苏联闹翻，因为迟早要翻脸。这种意见在美国也没有得到支持，而且迄今为止，这种观点没有对军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三种是，“主张对苏联采取不让步的坚定态度，试图以此把苏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65] 而“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哪一种对外

方针会占据上风”。[66]

所以，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过是实现苏联安全战略和革命战略的第一步。只有在东欧排除西方的影响和其他敌对势力，建立不仅对苏联友好而且与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在东欧确立苏联的安全带并使苏联的安全战略在东欧地区真正得到实现。但是，由于实行大国合作和东欧国家内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力量对比的现实状况，苏联还不能马上实现建立苏联模式的政权这一最高纲领，而只能首先争取实现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最低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由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但是要实现这一最低目标也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在战后的东欧，除了苏军驻扎而使苏联在东欧国家具有牢固的地位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东欧的影响并不弱于苏联。为此首先必须削弱和消除西方国家在东欧的影响和势力。战前在东欧国家具有影响的主要是英法德三国。战后，除了英国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外，美国在东欧的影响大为增强。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向东欧国家提供所需的经济援助。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要争取获得美国的援助。[67]东欧国家在经历了独裁统治和德国占领后，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向往。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就存在着浓厚的反苏和反俄的情绪。战争后期苏军乘胜追击进入东欧地区，帮助和支持这些国家最终战胜了法西斯。由于苏军在东欧的解放作用，当地的人民是欢迎红军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在 1945 年 5 月 5 日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描绘当时首都布达佩斯人们对苏联人的情感时说，“有意义的是，上面没有作过任何指示，俄国人的医院里就堆满了无数的花束、卷烟和食品。”[68]1944 年

夏天的一则报导说，“很明显，在最近两个月里对俄国人的恐惧减弱了。居民们对英美和俄国人行为所作的比较是不利于前者的。在罗马尼亚人看来，俄国人没有进行轰炸（指西方国家轰炸布加勒斯特、普罗耶什蒂和其他工业中心）或者轰炸的是纯粹的军事目标，而没有轰炸平民。为此，居民们对英国人的好感正在减弱，同时俄国人的威信增强了。”[69]

但是一些复杂的现实，如战后边界调整、赔偿、拆卸工业设备和苏军在当地的不端行为等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在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加剧了反苏情绪。

在战后的巴黎会议上讨论东欧国家的边界调整问题时，苏联的立场常常引起某些东欧国家的不满。1946 年 9 月红军政治部第七分局从匈牙利发回的报告说，“匈牙利特别是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对苏联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反对听取匈牙利代表在匈一罗边界问题委员会里的诉说产生了消极的印象。在很多知识分子中间反苏情绪增强了。”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必须结束“在东西方之间的‘荡秋千’和摇摆的政策”，“匈牙利只有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采取坚定的面向西方的方针，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在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争取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审议与罗马尼亚的边界问题。”[70]

在赔偿问题上，苏联的那种严厉索取的做法使一些东欧国家经济更加困难，招致它们的埋怨和愤恨。1947 年春天，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在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抱怨道，“赔偿占了匈牙利预算的 50%。”“以后要维持这一比例是困难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反对这种有损于我们（共产党）威望的事情。”[71]在波兰，工人们对把许多工厂设备、原料和粮食运往苏联表示极大的不满和反对。波兰工人党主管经济工作的明茨在给波党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铁路信号灯工厂的设

备……被运往俄国，而工人们聚集在工厂门口，不让运走。所有的冶金工厂都威胁要举行罢工。”1945 年 5 月，拉科西在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种情况：“工人代表团每天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诉说，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为红军认真地干活，要求至少把部分设备留下来，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工作。游行示威有时采取了严重威胁所有恢复工作进行的形式。[72]赔偿问题使东欧那些战败国的居民对苏联产生了怨恨的情绪。拉科西对此说，“一部分居民因为必须要支付沉重的赔偿而对苏联充满敌视情绪，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正在鼓励对苏联的仇视。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眼睛盯着英国和美国。”[73]

除此之外，苏军在东欧占领区的不端行为更是加剧了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不满情绪。1945 年 1 月 7 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列瓦在给拉科西的报告中说，苏联占领当局所采取的过火行为“甚至引起了与我们接近的人的惊恐”。苏军把居住在匈牙利的德国人作为劳力送往苏联，“……如果德国人不够，他们就抓匈牙利人，抓那些一句德国话都不会说的人，还把那些反法西斯的人抓进监狱和集中营。甚至还发生共产党组织的党委书记、党的领导人和民族大会的代表（原文如此——原注）被抓的事情，而原因仅仅就是他们有一个德国人的姓名……俄国人这么做的时候没有征得政府的同意，也没有（同我们）事先的约定（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总之，事情变坏了”。[74]

由于苏联的上述行为，苏军在东欧国家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解放作用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和改善它在东欧国家中的形象。红军政治部第七分局的领导人在 1946 年春天的报告中说，“红军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时得到了该国工业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农村地区红军将面临的是一个敌视性环境，因为大部分匈牙利农民对红军和苏联抱有敌视情绪。”[75]1948 年春天，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发回苏联的报告还说，“在波兰所采

取的在波兰人中间加强和普及波苏友谊思想的措施，不仅遇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反俄残余和反苏情绪的抵制，而且还碰上了许多波兰人对美国和西欧国家怀有的深厚的友好感情的抵抗。”[76]

虽然，在东欧国家的人心向背中苏联并不是占据很有利的地位。但是，总的说来东欧国家并不完全消极地看待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可能东山再起的德国的有力的约束和抗衡因素。在经历过德军占领的惨痛后，东欧国家的所有政党几乎都对未来的来自德国的新的侵略保持着极为戒备的态度。同样也就在这方面，它们把苏联看做是抵制未来德国新的可能侵略的因素。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其他政党在这方面是有着共识的。波兰社会党人斯坦契克曾经这么说，“如果由于国际上各种利益的角逐产生了英国想要建立西方集团的形势，那么就必须认识到，这是为走向新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如果这种集团产生，那么它将会是有某种目的的。如果它今天不是针对苏联的，那么过个 1 年或 5 年后它可能就是。这里并不是说对苏联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战争将使我们丧失独立，可能还会使我们的国家都不存在。要知道德国会被请来跳舞。这里没有什么观点上的区别，这是必须讲清楚的。”[77]

不管怎样，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是由盟国之间协议规定的客观现实。东欧国家中的非共产党力量对此认识得是很清楚的。波兰农民党的元老维托斯于 1945 年秋天告诫农民党的领导人放弃公开的反苏立场，他说，“我们的切身利益使我们有必要与所有的邻国特别是苏俄实现全面的关系正常化。不要采取那种不符合实际政治的立场和态度。”[78]罗马尼亚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特特勒斯库于 1945 年 1 月把对苏友好当作自己的政策基础。[79]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945 年的

时候没有哪支政治力量对与苏联的关系持反对态度。鉴于打败法西斯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增强，贝奈斯建议流亡在伦敦的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家们要承认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存在。[80]

总之，在战后东欧的基本现状是，首先，由于同时存在着苏联和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由于国内存在着各种和各派的政治力量，东欧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按西方制度和苏联模式）都是存在的。其次，由于苏军进入和驻扎东欧，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是非常强大的，并且是以大国间把东欧划入了苏联势力范围的协议为基础的。正是根据这些现状并且考虑到大国合作的因素，苏联制定了对东欧政策的最低和最高两个纲领。最低纲领是，使东欧国家成为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由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此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安全的需要。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党一党政府取代联合政府，在东欧建立苏联模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并以此把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扩展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战后初期，从 1945 年至 1947 年上半年，苏联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来经营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以首先实现苏联的最低纲领，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使东欧国家成为苏联的安全带。

（一）鉴于东欧国家内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要求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结成民族联盟，并以此为基础成立联合政府。

日丹诺夫在 1945 年同芬兰共产党人谈话时说，“如果单干什么也干不成……联盟比政府中的联合都重要……”[81] 所以，苏联要求东欧共产党建立民主力量联盟，并且尖锐批评共产党人中间的左派激进主义。 1945 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

希金批评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宗派行为。他说，“匈牙利共产党脱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都采取的共同路线。在那里，都建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这种符合我们政策的联盟在匈牙利只存在到市级选举时为止。共产党只有通过与民主政党的联盟才能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匈牙利面临的今后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和恢复经济以及破产的财政的任务要求共产党必须这么做。只有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民主力量的联盟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82]

（二）要确保共产党在新的联合政府中的主导地位，抵制西方国家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任何试图。这是苏联要求有一个对苏友好政府和保证苏联安全需要的前提，是决不会对西方国家作出任何让步的。

在波兰，苏军进入以后，1944 年 7 月，由共产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赫尔姆宣布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权。8 月，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卢布林。1945 年 1 月，卢布林临时政府得到苏联的承认。同月临时政府又迁往华沙。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提出，解散苏联支持的卢布林临时政府，建立总统委员会以便就另行成立一个新政府问题进行商议。具体是，“这个总统委员会将着手建立一个由华沙政府现有人员和国内外波兰民主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承诺举行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将选出波兰永久性政府。”[83]这个要推倒卢布林临时政府另起炉灶的建议立即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苏联主张扩大和而不是解散临时政府。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认为，增加国内外的波兰民主人士来扩大这个政府，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将会是有效的。”[84]斯大林说得更明确，“改组临时政府

比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要好办得多。”“与其建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我们宁可同意扩大波兰临时政府。”[85]最后雅尔塔会议公报的规定满足了苏联的要求：“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当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86]但在如何扩大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苏联与美国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同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前往苏联与斯大林等人就波兰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霍普金斯认为应给波兰人民以自由选举自己政府和社会制度的权利。而斯大林则重申波兰对于苏联安全的重要性。按照双方达成的妥协，6 月 28 日组成了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在新政府的 21 名部长中，原来卢布林临时政府的成员占了 16 名，处于绝对优势。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只有 5 名。1947 年 1 月，以波兰工人党为主的民主联盟在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获得 80% 以上的选票）。[87]同年 2 月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

在波兰军队和安全部门中，不仅共产党人占据了重要的职务，而且还直接重用了苏联的各种干部。1945 年秋天，在波兰安全部门中共有人员 28000 人（1944 年 12 月有 2500 人）。[88]其中 200 名骨干是在苏联古比雪夫的内务部学校里培养的。此外，有“大量的红军军事人员和苏联公民”包括 259 名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87 名苏联共青团员在波兰的安全部门工作。[89]

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些战败国，苏联利用驻军的优势和苏联担任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权利，建立了以共产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政府，牢牢地掌握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进程。在罗马尼亚，在苏军攻入以后的 1944 年 8 月，安东尼斯库政权被推翻。先是建立了由农民党和自由党执政的沙那德斯库政府（只有共产党部长一名）。而后又建立了由勒迪斯库将军执政的政府。1945 年 2—3 月，苏联副外交人

民委员维辛斯基多次对罗国王施加压力，以保障停战协定和维护后方秩序为理由，要求解散现政府，任命与共产党和社会党结成全国民主阵线的农民阵线首领格罗查为政府总理。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的 17 名大臣中有 14 名来自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民族民主阵线。在 1946 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中，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民族民主联盟获得了胜利。[90]

在保加利亚，早在 1944 年 9 月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境内后，成立了由以共产党主导的祖国阵线和其他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为确保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保加利亚摄政委员会成员、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书记巴甫洛夫制定了一个把其主要对手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代表赶出联合政府的计划。1945 年 6 月他把这份计划送交苏联。同年 8 月，苏联方面同意实施这项计划。[91]1945 年 11 月，几经周折后保加利亚大选正式举行。在反对派的抵制下，祖国阵线获得多数。 1946 年 9 月，保加利亚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

在匈牙利，1944 年 12 月在苏军入境的形势下，由共产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组建了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和多党联合政府。1945 年 11 月匈牙利举行大选。小农党获得了 75% 的多数选票。但在苏联的压力下，小农党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92]1946 年 2 月，匈牙利宣布成立共和国。

在捷克斯洛伐克， 1945 年 4 月初，在科希策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费林格任总理，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任副总理，贝奈斯任总统。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人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掌握了重要的权力。[93]1946 年 5 月的大选中，共产党成了第一大党。哥特瓦尔德组织了新的联合政府。[94]

南斯拉夫早在 1943 年 11 月就成立了由南共领导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 1944 年 12 月，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南

流亡政府总理苏巴希奇达成了组建临时政府和举行选举的协议。3 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规定，南斯拉夫成立了新政府。铁托任总理和国防部长，苏巴希奇任外交部长。

在阿尔巴尼亚，1944 年 5 月成立了临时民主政府。阿共领导人霍查任总理。1945 年 12 月举行选举，由阿共领导的民主阵线获得压倒性胜利。1946 年 1 月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三）在建立新政权和实施非法西斯化的过程中，打击和镇压敌视苏联的势力和共产党的反对力量。[95]

早在苏军进入东欧国家后，苏联就以清洗和保障后方为借口，镇压反苏和反共的政党和组织。在波兰，根据波兰国家军指挥部的资料，仅从 1944 年 7 月到 12 月，被镇压的波兰国家军的士兵就达 3 万人，其中的一半被送往苏联。[96]为了阻止与伦敦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国家”的领导人进入盟国在 1945 年雅尔塔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苏联对波兰国家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45 年 3 月底，16 名波兰地下国家组织的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而他们是应苏方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的。[97]苏联官方的理由是波兰国家军在红军的后方开展活动。而真正的理由完全是政治方面的。1945 年 6 月 17 日，伦敦电台指出，他们是“在英国和美国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吸收他们参加讨论建立民族统一政府问题的会议后被逮捕的”。[98]苏联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破坏了国际法的准则和盟国之间的协议。盟国对此提出了抗议。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回答丘吉尔的指责时坚定地阐述了苏联在维护红军后方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在谈到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时，斯大林说，“他们进攻我们的仓库以夺取武器。他们破坏我们的命令……”抵抗力量“破坏所有的战争法规。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

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这些‘力量’继续进攻我们的士兵，那我们还将逮捕他们’,。[99]

在东欧其他国家，苏联也参加了镇压新政权政敌的行动，虽然不像波兰规模那样大。1944—1945 年，苏联逮捕了一些匈牙利公民，指控他们参与法西斯活动和从事亲法西斯的活动。他们被押往苏联，关进劳改营。[100]拉科西在 1945 年 3 月 17 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几千名上班或者下班的工人在街头就被截住并被当做战俘送往各种营里。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在布达佩斯许多法西斯分子乔装打扮穿上了便服。结果有成百上千的同志失踪了。”[101]1944 年秋天，罗马尼亚政府向苏联监察委员会提交了两封抗议照会，抗议苏军逮捕和枪决罗地方政权的代表，抗议苏军指挥部的行为与停战条件不相符合（指进行逮捕、禁止集会和破坏罗政府的权力）。[102]

1945 年 5—6 月，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同各国党的领导人就各国的政治形势进行了会谈。当他们（科斯托夫、哥穆尔卡、拉科西、尼耶德利）报告自己国内的形势时，季米特洛夫给他们指示的主旨就是，坚决进行政治镇压。当哥穆尔卡谈到 1945 年夏天前采取行动镇压反政府地下活动时，季米特洛夫建议“打他们的嘴巴”。当哥穆尔卡表示反对，说不希望发生兄弟残杀的内战时，季米特洛夫说，“必须清洗……必须同反动派斗争…没有集中营是不行的。”[103]类似的指示还给了拉科西和科斯托夫，要他们对法西斯分子进行审判。[104]这里所谓的法西斯分子不仅是指旧政权的拥护者，也指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指示实际上就是继续执行 1943 年解散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只有哥穆尔卡试图说明镇压的方针有可能引发内战。

二 在对德、日等战败国的处置问题上与西方的矛盾和斗争

二战后等待盟国处理的战败国是德国、日本、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对战败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处置作为整个战后安排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已经有所考虑和规划。1941 年 12 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必须估算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给我们造成的财政经济损失。”“必须对有关消除德国及其盟国的危害性问题做好准备。这包括边界问题和工业、财政、航运等问题以及战败国首先是德国安排的问题。”[105]洛佐夫斯基为此建议成立秘密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06]

1944 年 1 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停战委员会成员迈斯基在《关于战后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提出，“苏联与芬兰和罗马尼亚应当签署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这两国境内拥有陆海空军基地。”“德国在战后应当由盟国占领至少 10 年，分解为若干个程度不同的独立国家，并从三方面（军事上、工业上和思想意识上）解除武装。德国必须缴纳大额的战争赔偿（包括劳务赔偿），而从扩展意义上理解的战争罪犯则应受到严厉惩处。”“意大利应予保留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但不再拥有任何非洲的领地。”“对于匈牙利应当通过修改仲裁法院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决定和运用其他方法严格按照民族原则缩减其领土面积。应当对匈牙利征收战争赔偿，而且在战后初期使之处于国际孤立的状态。……在巴尔干，最好能签订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与苏联的互助条约。”“苏联并不愿意同日本作战，但是很希望英美军队能击溃日本。

根据苏联的利益，最正确的做法是，随机应变以便在战后从总体上重新划分世界版图时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而不卷入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这并非易事，但也不是无法做到。”[107]

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对德国等战败国的处置的基本要求和态度是：德国等敌国必须被解除武装并被占领；德国应当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国，意大利应当被大大削弱，日本必须向苏联割让领土；东欧等战败国必须以条约的形式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所有的战败国必须作出赔偿。

战争期间，苏联与西方盟国就如何处置战败国的问题以双边会谈和国际会议的形式多次交换过意见，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和谅解。这些协议和谅解是雅尔塔体制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讲，在处置战败国问题上双方的基本点是：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德国将由苏美英法四国实行分区占领；[108]日本将对苏联作出领土割让（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苏联），日本本土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德国等所有的战败国必须作出赔偿；德国等战败国必须交出殖民地；东欧的战败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所有的战败国都应当实现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但是，当具体实施这些协议和谅解的时候，双方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又产生了许多分歧和矛盾。双方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对战败国的处置问题。

德国问题是战后处置战败国问题的焦点。盟国之所以成为盟国就是为了战胜法西斯德国这一共同的目标。因此，德国问题在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怎样处置德国特别是德国的最后发展道路的问题（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关乎双方在整个欧洲的根本利益的大问题。在德国问题上，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要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的重要环节和保证苏联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

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和未来来自德国的新的可能侵略。同时，还要在经济上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

与其他大国一样，苏联最早是主张肢解德国的。1941年11月21日，莫洛托夫在给迈斯基大使的电文中说，“至于说到斯大林同志本人对奥地利和莱茵州等问题的观点，斯大林认为，奥地利应当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从德国中分离出来，而德国本身则应该被分割成若干个独立的国家，以此保证欧洲国家的未来安宁。”（着重线系引者所加。）[109] 同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同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讨论战后欧洲安排时说，“削弱德国是绝对必要的，首先可以采取把莱茵州及其工业地区从普鲁士其他部分分离出来的办法。至于莱茵州下一步的命运应如何安排——作为独立国家或者保护国等等——以后可以讨论。也许，对巴伐利亚也应该这样做。”[110]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讨论了分割德国的具体方法。罗斯福建议把德国分解成五个部分。丘吉尔提出了将德国南部与中欧多瑙河国家组成多瑙河联邦的计划。斯大林虽然赞成美国的计划，但是，总的来说，他认为美英的计划都不适当。他相信，除非德国受到严惩，否则它就会在20年内东山再起。[111]斯大林认为，德国的民族性格没希望改造。他建议在德国境内外建立一些军事据点，这将对德国起到牵制作用。他认为盟国应永久占领这些据点以防止德国再战。[112] 斯大林还认为这种计划也适用于日本。最后会议委托一个新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这一问题。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从德黑兰会议后，苏联对于肢解德国问题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分割德国以及分割后的管理都是一些极其复杂和棘手的问题。而分区占领对于确立苏联在德国的地位来说要容易和简便得多。所以，在1945

年 3 月的专门研究分割德国的会议上，苏联正式提出了它的否定意见。苏联代表古谢夫说，“苏联政府并不把分割德国的决定看做是一项必行的分割德国的计划，而把它看成是当其他办法不足以防止德国的危害时对它施加压力的可能的前景。”[113] 1945 年 5 月 9 日，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明确表示，苏联“既不打算割裂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114] 由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盟国的分歧，分割德国的计划实际上已不可能实行。同年 7—8 月的波茨坦会议正式决定在战后的德国实行大国分区占领制度。这一制度牢固地确立了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苏联在德国问题上与西方的较量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员问题上，丘吉尔以法国能起抵制德国的作用为理由，提出要让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但是斯大林担心，更多的西方国家的参加将会损害苏联的利益。后来在保证比利时和荷兰不会参加管制委员会后，斯大林才同意让法国参加。[115]

在德国赔偿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同样很大。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代表迈斯基提出苏联的赔偿要求是：拆迁德国的工厂等设备，两年之内完成；让德国每年支付实物赔偿，持续十年；拆迁德国重工业的 80%（军火工业则 100%）；德国应给予苏联的赔偿总额为 100 亿美元（以拆迁和逐年交货的形式支付）。迈斯基认为，赔偿的优先秩序应为，（1）每个国家对赢得胜利所作贡献的大小；（2）每个国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116] 丘吉尔承认，“苏联遭受到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大”，但他认为，苏联根本不能从德国那里得到这笔数目。因为他怀疑这种索赔的方法是否可行。[117] 罗斯福表示愿意支持苏联对赔偿的任何要求。他说，他赞成向德国索取最大限度的赔偿，但是要以人民不致受饥挨饿为限度。[118] 丘吉尔提出赔偿计划的基础应当是“按需分配”，而斯大林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应当

是“按功分配”。[119] 会议决定由三国外长为一个专门的赔偿小组委员会制定指导原则。最后，雅尔塔会议议定书规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 200 亿美元，其中 50% 应归苏联所有。[120]

在 1945 年 8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又展开了争论，会议的议定书规定，“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经济单位”。但在赔偿问题上又规定，苏联的赔偿要求基本上将在苏占区予以满足（部分可从西占区获得），而美英等国的赔偿则将在西占区获得。[121] 波茨坦会议这种在把德国的经济作为一个统一单位的条件下确定分区赔偿的原则，客观上使未来的赔偿落实和实施变得较为复杂和困难了，并使苏联与美英等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产生了更加尖锐的分歧和矛盾。1946 年 5 月，驻德美军副司令克莱宣布，除了已经预支的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莫洛托夫立即指责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声明”。[122] 此后，美国和英国通过把它们的两个占领区的合并，逐渐使西占区成为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同样，苏占区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波茨坦会议确定的分区占领的原则，虽然分别给了每个大国在德国的一个占领区，但却使每个大国对德国的要求更加相互矛盾和不可协调。会议的议定书规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美、英、苏、法四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的指令，分别在其各自的占领区内实行”。他们“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共同处置有关全德的事宜”。[123]

至于所谓的德国的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对苏联与美国和英国这些不同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在认识上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就必然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双方都根据自己的对德政策需要，在各自的占领区进行摧毁旧制度的整肃工作。[124]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格罗提渥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认为，“在苏占区消灭了康采恩、

大银行和法西斯经济，还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在西占区则相反，竭力阻挠消灭康采恩，大银行继续存在。大地主和军国主义的支柱没有被触动。要进行反对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它在不同的占领区也是完全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的。”[125]

关于建立全德政府的问题是苏联与美英等国的又一个摩擦点。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由大国建立外长会议来讨论对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五国和约，同时还要准备对德和平解决的方案。而要与德国签订和约，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能与之交涉的统一的政府。从 1945 年的波茨坦会议到 1947 年为止的历次外长会议，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每次都要为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德国问题上，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要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的重要环节和保证苏联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同时，还要在经济上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无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讲，苏联都希望能维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德国分裂，那么苏联的影响在政治上只能局限于苏占区，在经济上就无法从西占区得到补充的赔偿。因此，虽然 1945 年斯大林就担心德国可能分裂[126]，但是他仍然认为分裂是可以防止的。在 1946 年巴黎第二次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提议成立一个能够控制全部领土的政府。作为过渡方法先“成立德国中央行政机关”。[127]

而美国正好相反，它不仅已经放弃德国的经济统一，而且开始设想政治上的分裂了。 1946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时，公开阐明了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128]他说，“当民主政治在德国土地上根基不深和负责制在地方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不应建立中央德国

政府”，“我们不能让德国成为一个任何强国的卫星国”。[129]

1947年1月31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格罗提渥和乌布里希等人就德国问题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任务进行了会谈。当格罗提渥谈到“盟国将反对举行全民选举”时，斯大林插话说，“还反对建立一个德国中央政府，反对民主化，反对德国的复兴，为了阻止出现来自德国的竞争，他们竭力不让德国复兴，这就是他们的政策。”[130] 格罗提渥说，“如果建立占领区机构会不会使德国的分裂加深？不，如果建立中央政府，分裂的局面就不会延长。”斯大林主张，“如果对方不同意建立德国中央政府或者中央行政机构，那我们就自己干。”[131]斯大林认为，“你们（德国统一社会党——引注）赞成统一的德国，反对联邦制是正确的。”“联邦制是反动阶级借以保持自己特权和避免产生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鼓噪的占领区的统一是占领者的统一，而不是德国人民的统一。这与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132]斯大林在谈话时还提出，“没有统一的政府，经济统一是不可能的，没有完全的统一，只有经济的统一，仅仅是占领者之间的统一。”“如果不能在较快的时间里建立中央政府，那就必须（在最坏的情况下）在苏占区实现统一。”[133] 最后斯大林指出，“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应当建立中央政府，它可以签订和约。”[134]

斯大林的指示不仅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而且也是1947年3—4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的指导方针。会上，苏联代表提出，“在保证各州立法权的条件下，设立两院制的全德国会和全德政府”；国会和州议会应在普选的基础上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产生。[135] 苏联的建议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反对。美国代表提议建立一个由各州政府首脑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式的临时政府。并且未来的政府应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将同州政府实行分权。[136]

在日本问题上，虽然斯大林满足于对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占领并且承认美国对日本单独占领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放弃了增强在日本的影响的努力。苏联战后的对日政策，除了领土方面的获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防止日本成为听命于美国的反苏国家。因此即便是承认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苏联也要力争和设法减少美国在日本的绝对影响。

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斯大林就曾要求将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美国的麦克阿瑟并列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认为，“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137]1945 年 8 月 16 日，针对麦克阿瑟发出的把日本本土划入美国单独占领范围的“总命令第一号”，斯大林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提出，让苏联占有整个千岛群岛，并对日本北海道实行分区占领。[138]最后美国同意了苏联的前一项要求，但拒绝了分区占领北海道的建议。[139]同年 8 月 21 日，美国提议成立由参战各国组成的“远东咨询委员会”。对此，苏联认为应先行成立对日管制委员会，使其在对日本的管制问题上享有决定权。 12 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结果是成立两个国际性的管制日本的机构：由美、苏、英、中等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和由美、苏、英、中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尽管如此，由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拥有决定性的权力，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仍没有改变。

除了在上述两个国际性机构内与美国进行较量外，苏联还通过情报部门与曾在苏联呆过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保持秘密联系，试图让日本共产党奉行一条温和的路线在国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以此牵制美国在日本的管制行动和增加苏联在日本的影响。在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第二天（8 月 10 日），

原共产国际总书记、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利用在中国延安的野坂参三及其反战联盟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对野坂参三同志和他的反战联盟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在日本建立新体制的时候野坂参三同志的组织是可以被利用的。我请求你们给予指示。”[140]野坂参三及其一行于 9 月 9 日离开延安，两星期后到达长春，并在那里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将军。 10 月初，野坂参三等人抵达莫斯科。10 月 11 日，野坂参三在会见红军情报总局局长库兹涅佐夫时表示，希望在关于苏联战后对日政策和日本共产党在这段时期的任务等问题上得到指示。[141]10 月 16 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建议：帮助野坂参三等人回到日本；“只能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或者红军情报总局的可靠和合适的代理人而不是联共（布）中央的渠道”同野坂参三保持联系。[142]联共（布）中央的一位负责人波诺马廖夫在向莫洛托夫书面汇报他同野坂参三谈话时说，“在谈话中我们让野坂参三明白，苏联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希望与民主的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野坂参三极为满意地听取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表示，我们完全理解遭受美国帝国主义蹂躏的日本所处的困境。”[143]

野坂参三对于苏联既默认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又不甘心把日本拱手相让给美国是非常理解的。他认为，日本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天皇制”的口号应当改为“天皇让位于他的儿子’。[144]野坂参三于 1946 年 1 月 12 日回到日本。他回国后就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在他的倡议下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一条主要通过和平与合法手段进行革命的温和路线。野坂参三还接受了苏联的钱款资助。[145]但由于美国在日本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就如同苏联无法在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

员会里与美国竞争一样，苏联也没有能够利用同日本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来牵制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和扩大苏联在日本的影响。

在处理意大利的问题上，早在战争后期苏联同美英两国的争斗就已经开始了。意大利作为传统的西方国家不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一点苏联是明白的。但是意大利作为战败国在战后不能成为反苏国家，这一立场苏联也是坚定的。在苏联关于战后安排的设想中意大利是被作为抗衡西方特别是英国在地中海势力的中立国来考虑的。所以在战争后期意大利投降后，苏联并未打算削弱意大利的力量。

1943年7月，英美盟军开始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同月，墨索里尼下台，由巴多里奥将军组织政府。9月，意大利向英美盟军投降（意大利的北部仍被德军所占领）。英美盟军在意大利问题上撇开苏联，自行其是，引起了苏联的不满。斯大林对此向美英明确表示了他的不安。作为修正，斯大林提议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盟国军政委员会以管理意大利。[146] 10月，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在讨论意大利局势时，苏联与美英发生了重大分歧。苏联代表认为军政委员会应当保持协调，不仅在民事问题上而且在军事组织上均应发挥作用，这样成立新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就没有必要了。美英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其在意大利的影响，因而坚持要让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真正的权力，军政委员会只能起顾问的作用。[147]作为妥协，苏联放弃了在意大利拥有同美英平等的权力，而美英则同意成立由美英苏与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代表组成的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代替军政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出建议以协调盟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但是，该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作用几乎等于零。由于美英军队占领着意大利，苏联只能默认美英独占意大利的事实。[148]但是苏联并不甘心放弃对意大利的影响。就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

基在那不勒斯与巴多里奥将军进行谈判以建立苏联与意大利的特殊关系。[149]1944 年 3 月，斯大林指示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不要去触动意大利的君主体制并且要求意共参加巴多里奥政府。[150]

战后，意大利同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等战败国一起成为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五国和约问题上激烈争论的对象。[151]

1945 年 9—10 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一开始，苏联与西方国家就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关于意大利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问题[152]的处置；意大利的赔偿；的里雅斯特[153]和意南边界问题。苏联提出要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以便使苏联在地中海有一个“商船基地”。美、英、法提出的方案虽然各不相同[154]，但它们都害怕苏联会由此获得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据点，因而一致反对苏联的建议。会议达成了将意大利殖民地置于某种托管之下的协议。苏联要求意大利向它赔偿 1 亿美元，美英则认为意大利没有赔偿能力，反对向意索赔。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对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苏联建议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整个伊斯特拉半岛应当归属南斯拉夫，而美国则主张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归意大利，其行政由国际共管。最后商定把的里雅斯特辟为自由港，由国际共管。意南边界应当按人种分布原则来划分，具体方案由专家委员会拟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在讨论对意和约问题时苏联谋取地中海基地的企图。根据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规定，将于 1946 年 1 月 18 日在伦敦召开苏美英法四国副外长会议讨论五国和约问题。1 月 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对意和约问题给苏联代表团下达了如下的指示：

“1. 在讨论意大利殖民地问题时，最初的立场应当是坚持

建立单独托管制和由苏联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十年。

苏联代表团的第二步立场应当是同意关于建立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五国集体托管制的建议，建议应规定，每一块托管领土都应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和一名附属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行政长官。要确保其中有一块领土（的黎波里塔尼亚或昔兰尼加）的行政长官的职位由苏联来担任。

苏联代表团同意建立集体托管制的条件应当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之中的一个港口为苏联提供一个不大的商船和军舰基地。

2. 解决意大利殖民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应当与解决多德卡尼斯群岛问题同步进行。

苏联代表团应当在同希腊人进行初步谈判的时候提出下列条件，即，如果以租借的形式向苏联提供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一个岛屿（最好是罗德岛、斯坦帕基亚岛或斯科尔帕多岛）作为商船基地，那就同意把多德卡尼斯群岛转交给希腊。”[155]

1946 年 2 月 5 日，莫洛托夫在给苏联驻罗马大使的电文中要求他向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说明：“我们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使苏联有可能切入地中海，英国试图在那里占据几乎支配地位以损害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利益。如果苏联能切入地中海并与意大利相邻，那将只能对民主意大利有利。”[156]但是，苏联在地中海建立军事基地的试图遭到了美英法三国的一致反对。

在讨论对罗、匈、保三国和约时，苏联与美英双方更是恶语相加。美国援引《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攻击这些国家不民主，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或者辞职或者改组。然后才能与它们缔结和约。苏联则指责美国违反雅尔塔协议，让没有向上述三国宣战和没有参加对三国的停战协定的法国和中国参加对三国和约问题的讨论。苏联宣布将拒绝参加有法国和

中国外长出席的外长会议。此外，苏联还严词谴责美英干涉希腊内政。第一届外长会议没有发表任何文件便悄然收场。

以后，苏、美、英、法四国又召开了巴黎四国外长会议、21国巴黎和会和纽约四国外长会议，经过长期的争论，各方作了相互妥协，才通过了关于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1947年2月10日，各有关国家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

五国和约规定了五国的领土和边界变动、政治民主化、军备限制和经济赔偿。与苏联有关的内容和结果是：苏联从意大利获得1亿美元的赔偿；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苏联就此成为多瑙河国家）；匈牙利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把从匈牙利收回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转让给苏联以及由此形成的苏匈边界；芬兰将贝柴摩（又称佩萨莫）地区包括巴伦支海上的不冻港贝柴摩在内割让给苏联；苏联放弃根据1940年和约所获得的对汉科半岛的租借权；芬兰赔偿苏联3亿美元。

对于苏联极为关注的意属殖民地，和约规定，“意大利对于它在非洲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大利索马里兰各属地放弃一切权力”。另由苏美英法发表了一个相关的联合声明，宣布和约生效后一年内决定对上述属地的处理，如届时不能解决，则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审理。[157]

虽然苏联通过上述和约，分别在领土调整和经济赔偿方面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对于苏联来说，未能在位于地中海南部的意属利比亚获得军事基地，显然是最大的缺憾。苏联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在总结巴黎和会的结果时承认，“确实，苏联外交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所以莫洛托夫在闭幕会上说，‘不能认为大会的工作结果是令人满意的’”。[158]在这

些未能实现的所有目标中，争取对意属利比亚托管权的未遂努力，当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五国和约是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双方最后一次勉强的合作。双方在和约谈判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敌视和对立。自此以后，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便急转直下。

第三节　大国合作政策在对抗中动摇

一　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与凯南电文和丘吉尔“铁幕演说”

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以及双方在战后世界的安排（特别是东欧）和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的处置等问题上的分歧、矛盾和对立，已经开始使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逐渐发生动摇。在危机和对抗中，双方相互间重新打量、了解和认识对方，并据此调整和改变对对方的政策。[159]

1946 年是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各自调整对对方政策并且开始走向冷战的重要的过渡期，因为经过将近一年的较量和斗争，彼此之间对对方都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看法。其结果就是，双方已经在观念上都把对方视作敌手。

1945 年 9 月 2 日，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还欢呼“光荣属于取得对日胜利的苏、美、中、英武装力量！”一年不到，1946年 2 月 9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中已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斯大林认为，二战的结果证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

会组织形式”。斯大林在谈到二战的起因时说，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接着，斯大林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经过一段时期，便要引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均势的猛烈破坏，而那些自认为没有足够的原料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各国能够采用协商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可以避免战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这就不仅仅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了，而是极其明确地把现代资本主义与战争画上了等号。斯大林总结说，“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二次危机，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60]按照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观点，这样的经济体系必然还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姑且不论斯大林把现代资本主义同战争划上等号的理论是否符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单就斯大林发表演说的时机来说，也不能说是适宜的。

首先，斯大林发表演说的时间距二战结束（以 1945 年 9 月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为准）只有 5 个月。对饱受战争灾难的各国人民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重建未来美好的生活。换言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演说中谈论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战争的话

题，其效果恐怕只能是引起人民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对战争的警惕。

其次，在斯大林发表演说的 1946 年，尽管已经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尽管由于在解决战后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苏联同美英等战时盟国的歧见和矛盾愈来愈深，但毕竟双方尚未达到拔剑相向的决裂地步。在诸如东欧问题、德国问题、五国和约问题、朝鲜问题、日本问题、原子能管制问题等方面，苏联同美国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可以说，双方的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在这种微妙的时刻，斯大林的演说把资本主义同战争画上等号，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显然是不明智的。

再次，因为战争胜利而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比其他社会制度都优越，也未免牵强附会。不错，苏联在二战中经受了生死考验，由此而盛赞苏维埃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未尝不可。但须知，美国和英国也是战胜国，它们在二战中的业绩同样也不俗。战争并没有证明它们的社会制度妨碍了它们在二战中的胜利。总之，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美苏仍是盟友（尽管已是勉强的盟友）的情况下，斯大林发表这样的演说，客观上产生了引起西方国家猜疑和加剧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后果。美国《时代》杂志称斯大林的演说为“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161] 当然，从斯大林的角度讲，演说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产生战争和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乃是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持的一贯的观点和信念，并非是刻意向美英等国发出的挑战书。但演说表明斯大林对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仇视，因而必然要产生严重的后果。

当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美国方面对苏联也已经开始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斯大林演说之前的 1 月 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162]2月22日，也就是斯大林演说后不久，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华盛顿发回了全面论述苏联行为和政策的长达8000字的电文。电文首先分析了“苏联官方宣传机器对战后问题的看法”，概述了它的七个特征，其中的两个特征是：苏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它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所困扰。这些矛盾是不能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163]凯南概述的这些观点，正是斯大林在2月6日演说中所说。凯南认为，“从苏联政策的角度来看，苏联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以削弱所有的或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苏联及其在国外的朋友，将“致力于加深和利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终于发展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把这场战争转变为革命起义。”[164]凯南在分析“苏联的看法在官方一级的实际运用”时指出，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165]在“从美国政策的角度应该得出的实际推论中”，凯南认为，苏联“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遇到强大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因此，只要“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166]

在我国史学界有关冷战的论述中，凯南的电文被很多人作为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而加以援引和揭露。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对凯南电文所产生的这种客观作用和效果的认定是有根据的。但是，同样也不能忘记，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上讲，凯南电文都与斯大林的演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冷战酝酿和准备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重大事件。如果只抓住凯南电文这一“铁证”，而不看斯大林演说的重要背景，

是无法理解和认识冷战是怎样酝酿和起源的。不惟凯南电文，就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某种程度上也与斯大林演说有着一定的联系。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语词尖锐地说，“从波罗的海的斯特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167]丘吉尔为此呼吁美英联合，实行各方面的合作，以制止苏联的扩张。斯大林愤怒地谴责丘吉尔是“战争的挑拨者”，奉行“反苏战争方针”。[168]但他忘记了 1 个月之前自己说了些什么。

许多史学家在谈到冷战的起源时，无不异口同声地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发起冷战的信号。[169]对的，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说斯大林先于丘吉尔的那篇演说同样也是苏联对美国和西方进行冷战的信号吗？因为就在选民大会上演说后不久，斯大林便开始考虑重建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了。

二　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分析和批判

在斯大林演说及凯南电文和丘吉尔演说大约半年后，1946 年 9 月下旬，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170]诺维科夫报告起草的背景和过程大

致是这样的：1946 年 7—10 月，讨论制定五国和约的会议在巴黎举行。会上，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和矛盾。9 月中旬，在和会的保加利亚政治和领土问题委员会里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给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下达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十天内完成。诺维科夫曾以工作日程紧张和在巴黎缺少撰写报告所需要的官方文件和报刊资料为由，要求把报告完成的日期由 9 月底改为 10 月底或 11 月初，完成的地点由巴黎改为纽约（届时恰逢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但莫洛托夫坚持要诺维科夫挤出几天时间就地完成这一报告。诺维科夫只得从命，并在 9 月底如期竣笔。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莫洛托夫曾询问他的写作进程并给了一些具体的指示。由于报告是按照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就连诺维科夫自己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做是我写的”，莫洛托夫应是报告的未署名的共同作者。莫洛托夫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着重线号并作了眉批。所以说，这篇报告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苏联官方的意见和观点。[171]

凯南的电文全面分析了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诺维科夫报告则详尽地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和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

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倾向，它的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172]（着重号系莫洛托夫所加，下同。——引者）杜鲁门总统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其他代表人物曾多次发表讲话，其真实意图就是：美国有权领导世界。美国外交的所有力量——陆军、海军、工业和科学——都是服务于这一对外政策的。为此

目的，已经制定了广泛的扩张计划，并且通过外交活动和在远离美国疆界的地方建立海空军基地体系，通过军备竞赛，通过制造更新式的武器，正在推行这一计划。”

报告指出，“战争结束后，欧洲的经济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种因战争而产生的经济萧条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所有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现在都大量需要消费品、工业和运输设备等。这种形势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了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前景——这使美国垄断资本得以向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渗透。

这种局面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将极大地增强，它将是美国在通向世界霸权道路上跨出的一个步伐。”

报告认为，杜鲁门政府已经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的对外政策。“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是由民主党内谋求加强成为战时反希特勒同盟基础的三大国合作的集团（如罗斯福时代）制定的。政治上反复无常但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杜鲁门就任总统以及随即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为国务卿，表明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加强。美国对外政策路线不断增强的反动性，使其日益接近于共和党人倡导的政策，成为民主党内的极右翼分子同共和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密切合作的基础。这种两党合作，在国会两院里具体表现为形成了一个以（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和（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非正式的反动的南方民主党和共和党老一辈守旧集团，并在两党人士发表的基本相同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在国会和通常由共和党领导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出席的国际会议上，共和党人都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这就是为何甚至在官方讲话中被称作‘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的缘由。”“现在，那些奉行罗斯福同爱好和平国家进行合作方针的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在下降。[173]这些人在政府、国会和民主党领导

层内正愈来愈退居后台。以（亨利·）华莱士和（克劳德·）佩珀的支持者为一方同反动的‘两党一致’政策的拥护者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矛盾，最近十分清楚地反映在华莱士的讲话中，这一讲话导致他辞去了商业部长的职务。华莱士的辞职表明，贝尔纳斯奉行的与范登堡和塔夫脱合作的反动方针获得了胜利。”

报告说，“美国力求建立世界霸权的明确意图，还反映在和平时期增强军事潜力和在美国国内外建立大量的海空军基地方面。

1946 年夏天，国会通过了有关在义务兵役制而不是在志愿兵役制基础上建立和平时期军队的法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军队的规模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即，设想到 1947 年 7月 1 日达到约 100 万人。同战时相比较，海军的规模在战争结束时仅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削减。现在，美国的海军在世界上占第一位。远远领先于英国海军，更不要说其他国家了。

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已急剧增长，按照 1946—1947 年度的预算，达到了 130 亿美元（约占总预算 360 亿美元的 40%）。这比相应的 1938 年的军费增长了十倍多，那时的军费甚至还不到 10 亿美元。

在维持庞大的陆海军的同时，预算规定还要把这些大量的开支用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建立众多的海空军基地。按照官方现在的计划，在未来的几年里，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分别建立 228 个和 258 个基地供应站和无线电通讯站。这些大量的基地和供应站都位于美国的疆域之外。在大西洋的下列国外岛屿上，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建造基地，它们是纽芬兰、冰岛、古巴、特立尼达、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亚速尔群岛等；在太平洋是：前日本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和马

绍尔群岛、波柠群岛（小笠原群岛——引注）、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加拉巴哥群岛（属厄瓜多尔）。

美国在远离其本土 10000—12000 公里且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端的岛屿上建立美国基地，清楚地表明美国陆海军指挥官战略概念中的进攻性。美国海军正在加紧研究从海上向欧洲地区登陆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解释。为此目的，美国海军舰队在 1946 年访问了挪威、丹麦、瑞典、土耳其和希腊。此外，美国海军还经常在地中海游弋。

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武装力量在美国实施其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报告逐一详细地分析了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和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关于美苏关系和美国的对苏政策，报告认为，美国早在战时就曾设想，战争的结果将使苏联“精疲力尽，或者甚至完全被摧毁”。但“现实并没有证实美帝国主义者的估计”，“苏联的国际地位比战前加强了”。

报告认为，“在反动的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建立友好关系后，由贝尔纳斯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现在是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74]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战后美国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

报告谴责美国试图破坏苏联在东欧邻国的地位和颠覆东欧国家的政府。“美国政府现行的对苏政策，还旨在限制或消除苏联对邻国的影响。为了在与苏联毗连的前敌国和盟国中推行这一政策，美国试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在这些国家中支持各种反动势力以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美国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美国资本打入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这种政策目的在于削弱和推翻对苏友好的执政的民主政府，并在

将来以一个驯服地听命于美国政策的新政府取而代之。”

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报告认为，两国既是潜在的竞争者，又是可能的盟友。“美国统治集团显然是赞同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想法的”，只是尚未建立正式的联盟。但它们在军事问题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报告预言，“虽然美英两国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但是目前美英关系为其深刻的固有矛盾所困扰，不可能长久维持。”

关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报告认为，这是美国“限制苏联在战后世界中的国际作用”的“总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占领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和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以使德国不再成为侵略性的势力。……相反，在占领的主要任务——使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完成之前，美国就已经考虑终止盟国占领德国领土的可能性。这将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创造前提，而美国则计划使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为其所用。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种政策已经清晰地勾画出它的反苏锋芒，对和平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竭力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按照这一政策，美国政府甚至并没有减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目前在中国，驻扎着 50000 多名美国士兵。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参与对人民解放力量的军事行动。乔治，马歇尔将军的所谓‘调停’使命不过是为了掩盖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中国正在逐渐地被改造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桥头堡。美国的空军基地遍布中国领土，主要的基地设在北京、青岛、天津、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美国在华主要的海军基地位于青岛。第七舰队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30000 多名士兵部署在青岛及其附近。美军在华北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它们准备在那里驻扎很长时间。”

关于美国的对日政策，报告认为，“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国内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扶植日本的反动阶级和集团，以利用它们来反对苏联……”

报告最后指出，美国国内正在开展反苏宣传运动，谈论针对苏联的“第三次大战”。“自然，现在谁也没有确定战争的日期，但是，美帝国主义中的最好战的集团正在进行考虑。”

报告为此强调，“必须充分注意的是，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下列事实证实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当作其未来敌手的；美国的战略基地设置在有可能成为对苏联领土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内；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175]

从上面冗长的引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仅仅在战争结束一年后，苏联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持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的态度，对苏美关系的发展和未来实际上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如同凯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样，诺维科夫报告同样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的作用。作为战后苏联首次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进行比较全面分析的官方文件，诺维科夫的报告堪称凯南电文的对应物。

所以，当我们在考察冷战的酝酿和起源的时候，既要注意到凯南电文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也不能忽视斯大林的演说和诺维科夫报告，而是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认真的分析，舍此，我们就无法准确地去把握冷战起源的历史画面。

注　释

［1］《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347—348 页。

［2］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844 页。

［3］《国际条约集》（1934—1944 年），第 78—83 页。

［4］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册),第 847 页。

［5］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会谈记录，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68—82，转引自《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5 期，第 91 页。

［6］莫洛托夫与德国总理希特勒会谈记录，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675，页码 49—67，转引自同上，第 86—87 页。

［7］《1939—1941 年的苏联与德国》，第 2 卷，第 132—133 页。

［8］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1—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 1995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9］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52—93，转引自同上，第 138 页。

［10］《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203—204 页。

［11］莫洛托夫在回忆中几次说，“我提出由我们和土耳其共同控制海峡的问题。……海峡应由苏联和土耳其共同守卫。”“我们对土耳其有过土地要求。”莫洛托夫自己也承认，“行不通。如果我们进去，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斯大林说：‘给点压力！共同控制’。”，“我对他说：‘人家不干’,‘你要求嘛！’”（《莫洛托夫秘谈录》,第 93—94 页。）

［12］《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第 3 卷，莫斯科，1947 年，第 146 页。

［1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1221—1228 页，转引自布鲁斯·库里霍姆：《冷战在近东的起源：大国在伊朗、土耳其和

希腊的冲突和外交》，普林斯顿，1980 年，第 256 页。

[14]《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第 3 卷，第 163—164 页。

[15]《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257 页。

[16] 同上。

[17]《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258 页。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出的主意。他写道，在一次拖得很长的“晚餐”上，贝利亚开始反复地讲：现在属于土耳其的某块土地过去一直是属于格鲁吉亚的……贝利亚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以此蛊惑斯大林，唆使他采取行动。他使斯大林确信现在是取回那些土地的时机。他争辩说，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它无力抵抗。斯大林作了让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了一份正式备忘录，强硬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土要求。（《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48 页。）

[18]《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258 页。

[19]《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347—349、370 页。

[20]《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356 页。

[2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1237—1240 页，《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266—267 页。

[22]《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材料集（1946 年）》,莫斯科，1952 年，第 169 页。

[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 年，第 7 卷，第 840—842 页，转引自《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361 页。

[2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 年，第 7 卷，第 846—847 页，《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362 页。

[25] 同上书，第 362—363 页。

[26]《莫洛托夫秘谈录》，第 93—94 页。

[27]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引起了相反的结果”。他说，“贝利亚没有预料到土耳其会以接受美国的支持来回答我们的要求。贝利亚和斯大林只是把土耳其人吓得立刻投入美国人的怀

抱。由于斯大林的那份给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美国人才得以渗入土耳其，并就在我们的国境边上建立了军事基地。”〔《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448—449 页。〕在美国给希腊和土耳其的 4 亿美元中，有 1 亿美元是给土耳其的。这笔款项的很大部分是用于重建土耳其的陆军和海军、军事化的经济和建设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的（伊·切尔尼科夫：《为了和平与睦邻》（1935—1970 年的苏土关系），基辅，1977 年，第 96 页。）

［28］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52—9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26 页。

［29］同上书，第 132 页。

［30］1942—1943 年，以苏联科学院为代表、由苏联中亚军区和外高加索前线工程兵司令部下达任务，在伊朗东北部进行了石油勘探。（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94，目录 30，卷宗 347a，案卷 48，页码 1、99、102、158，转引自叶戈洛娃：《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 3 期，第 26—27 页。）

［31］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6，卷宗 37，案卷 461，页码 16—18，转引自同上，第 27—28 页。

［32］同上书，第 28 页。

［33］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817，页码 29，转引自同上。

［34］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817，页码 132об.，转引自同上，第 29页。

［3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37 页。

［3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836，目录 11，案卷 22，页码 62，转引自《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0 页。

［37］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33，案卷 466，页码 11，转引自同上，第 31 页。

［38］《冷战在近东的起源》，第 272 页。

［39］根据 1945 年 12 月 8 日苏军总参谋部的资料，英军驻伊朗的总

人数为 2 万—2.5 万人，美军为 4 万—4.5 万人。（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30，目录 2，案卷 16，卷宗 5，页码 25，转引自：《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4 页注 39。）根据西方史学家的估计，苏军驻伊朗人数为 3 万左右。（转引自同上。）

[40] 伊朗人民党曾对苏联支持成立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提出异议，但在联共（布）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建立民主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都将服从全联盟共产党（即联共［布］）”。（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819，页码 189，转引自同上，第 33 页。）

[41] 《消息报》，1945 年 9 月 14 日，转引自同上，第 32 页。

[42] 在伊朗阿塞拜疆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的同时，伊朗库尔德斯坦人民掀起了民族自治运动。1945 年 10 月底，他们也建立了民主党，不久又在美哈巴德组建了民族政府和军队。苏联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5，案卷 557，页码 11，转引自同上，第 32 页注 27。）

[4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96，目录 7 卷宗 33，案卷 465，页码 10、11；案卷 461，页码 53，转引自同上，第 34 页。

[4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444 页。

[4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33，案卷 467，页码 15；案卷 466，页码 12，转引自《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4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464 页

[4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30，目录 2，卷宗 5，案卷 16，页码 20、23，转引自《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48]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30，目录 1，卷宗 2，案卷 8，页码 14，转引自同上，第 35—36 页。

[4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488—489 页。

[5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33，案卷 466，页码 11、12，转引自《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

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5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30，目录 2，卷宗 5，案卷 16，页码 1—2；全宗 094，目录 31，卷宗 351a，案卷 3，页码 23，转引自同上，第 36 页。

[5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30，目录 1，卷宗 1，案卷 1，页码 240，转引自同上，第 36—37 页。

[53] 美国此时对中东的政策尚处于调整之中。因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对苏联采取的政策常常呈现出矛盾状态，即，时而强硬时而温和。强硬的一面已如上述。温和的一面如，1945 年底，伊朗驻美大使多次催促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决定性步骤，而美国国务院则倾向于对此持谨慎态度(参见同上，第 35 页)。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前夕，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联领导人说，美国准备"承认苏联在伊朗领土内获得石油租让权的合法愿望"，美国反对的仅仅是苏联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第 489 页，参见同上，第 36 页。)

[5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 年，第 7 卷，第 2—4 页。

[5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5，案卷 551，页码 23—26，《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第 39 页。

[5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6，案卷 562，页码 1，转引自同上，第 38 页。

[57] 档案全宗、目录、卷宗、案卷同上，页码 2、3，转引自同上，第 39 页。

[58]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5，案卷 551，页码 21，转引自同上。

[59]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5，案卷 551，页码 35；卷宗 36，案卷 562，页码 6，转引自同上，第 40 页。

[6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8，卷宗 36，案卷 562，页码 8，转引自同上。

[6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34，案卷 544，页码 8、9，转引自同上，第 40—42 页。

[6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34，案卷 543，

页码 16，转引自同上，第 42 页。

［63］《斯大林文选》,第 464—465 页。

［64］《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89 页。

［65］这份情报是联共（布）中央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获得的。这份对奥地利外交部长访问美国进行分析的情报是寄给奥地利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的。奥地利共产党获得后把它转交给了联共（布）中央。［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910，页码 242，转引自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48 年），载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1995 年，第 70 页。］

［66］同上。

［67］《“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71 页。

［68］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84，页码 167，转引自同上，第 77 页。

［69］波基瓦伊洛夫：罗马尼亚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载《1939—1945 年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抵抗运动》，第 2 卷，莫斯科，1994 年，第 34 页，转引自同上。

［70］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25，页码 87，转引自同上，第 108 页注 5。

［71］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19，页码 11，转引自同上，第 108 页注 6。

［72］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37，页码 15，转引自同上，第 108 页注 7。

［73］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314，页码 8，转引自同上，第 109 页注 9。

［74］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82，页码 52—53，转引自同上，第 108—109 页注 8。

［75］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914，页码 205，转引自同上，第 72 页。

［7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22，目录 30，案卷 2，卷宗 214，页码 61，转引自同上。

[77]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68，页码 136，转引自同上，第 74 页。

[78] 同上书，第 78 页。

[79]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125，目录 33，案卷 6，卷宗 127，页码 8 转引自同上。

[80] 同上。

[8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174，页码 96、103，转引自同上，第 79 页。

[8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77，目录 27，案卷 11，卷宗 121，页码 25，转引自同上，第 79—80 页。

[83]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74 页。

[84]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75 页。

[85] 同上书，第 182 页。

[86] 同上书，第 218 页。

[87] 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认为，“1947 年 1 月在波兰的选举中发生了舞弊”。他们提出的证据是，其一，在选举之前，当局采取残酷的措施镇压主要竞争对手米科拉伊契克为首的波兰农民党。1947 年 1 月 16 日，苏联领导集团收到一份由苏斯洛夫署名的情报资料说，波兰国家安全机关在选举前的三个月里，对“地下反动组织”采取了 2000 多次行动，“逮捕了大约 4000 名匪徒并收缴各种武器 3000 件以上”（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284，页码 7。）其二是，苏联大使馆 1947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提到波兰选举的结果对政府是不利的。但是后来公布的结果却是以共产党为首的联盟获得了胜利。（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122，目录 30a，案卷 3，卷宗 247，页码 10、34，《“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113 页注 95 和 96。）

[88] 同上书，第 82 页。

[8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68，页码 101，转引自同上。

[90] 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说，有材料证明，1946 年秋天在罗马尼亚的选举中共产党人也同样运用了类似的“技术手段”。当时的联共（布）中央书记邦达拉什在苏联使馆说，正是依靠“技术”，共产党才能

指望“获得” 90%的选票。（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2125，目录 34，案卷 16，卷宗 131，页码 120，转引自同上，第 95 页。）

[9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4，目录 34，案卷 10，卷宗 115，页码 103—104，转引自同上，第 81 页。

[92] 1945 年秋天，小农党总书记巴洛克在回答英国《每日电讯与晨邮报》记者关于为什么小农党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说，“如果你同另一个人玩扑克并且知道他在作弊，可是如果门外又站着一个令你恐惧的全身武装的人，我仍然要劝你把牌打下去。”（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 4459，目录 27/1，案卷 5183，页码 20，转引自同上，第 80 页。）

[93]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报告说，1945 年捷克斯洛伐克在重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苏联的经验”。国家安全部门处长级以上的干部先后都换成了共产党人。（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138，目录 27，案卷 4，卷宗 135，页码 5，转引自同上，第 81 页。）

[94] 捷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但它对待选举的态度却令人回味。哥特瓦尔德在 1946 年 4 月选举前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的有利的结果。”（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901，页码 33，转引自同上，第 112 页注 92。）

[95] 就像苏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扩大“人民的敌人”的内涵和外延镇压政治反对派一样，在东欧的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苏联也任意解释和扩大“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的概念，以此打击和镇压敌视苏联和共产党的反对力量。

[96] 《“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83页。

[97] 同上。

[98]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67，页码 281，转引自同上，第 83—84 页。

[99] 《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克里米亚会议》（文件集），莫斯科，1984 年，第 95 页。

[10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667，页码 61，《“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84 页。

[10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82，页码 132，转引自同上，第 86 页。

[10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454，目录 1，案卷 2，卷宗 82，页码 69，85—86，转引自同上，第 84—85 页。

[103]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50，页码 151，153—154，转引自同上，第 85 页。

[10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1、40、57—58、225—226，转引自同上。

[105]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1—3，转引自《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106] 同上。

[10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37，页码 52—93，转引自同上，第 137—139 页。

[108] 苏联、美国和英国开始时都曾经赞成并且提出过各自的分解德国的打算和计划，但是后来终因意见分歧和实施困难而放弃了。分区占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分割制度。

[109]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59，目录 1，卷宗 399，案卷 3614，页码 24—23；卷宗 423，案卷 3798，页码 345，转引自克宁：《1941—1943 年苏美英关系中的德国问题》（文件简介），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4 期，第 93 页。

[11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79，页码 1—69，转引自《1941 年 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文件集），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2 期，第 92 页。需要说明的是，在葛罗米柯等人主编的《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17—1945 年）中谈到英国和美国有关肢解德国的计划时说，“与此相反，苏联没有准备任何肢解德国的计划……”新的史料证明，这些话不是实事求是的。

[111]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开罗和德黑兰会议，1943 年，第

511 页。

[112] 同上书，第 511、532 页。

[113] 《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政策的真相》，莫斯科， 1959 年，第 13 页，转引自葛罗米柯等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17—1945 年），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546—547 页。

[114] 《斯大林文选》,第 423 页。

[115] 哈里曼和阿贝尔：《特使》（1941—1946 年），纽约，1975 年，第 402 页。

[116]《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19—120 页。

[117] 同上书，第 120—121 页。

[118] 同上书，第 121—122 页。

[119] 同上书，第 123 页。

[120] 同上书，第 227 页。

[121]《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426、428—429 页。

[122]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的演说和声明》，莫斯科， 1950 年，第 47—53 页，转引自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59 页。

[123]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422 页。

[124] 《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80—95 页。

[125] 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91，页码 43—54，转引自《“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有关 1947 年 1—2 月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会谈的文件》，载俄罗斯《历史档案》， 1994 年，第 4 期，第 37 页。

[126]《皮克关于同斯大林谈话的笔记》， 1945 年 6 月 4 日，转引自《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第 24 页。

[127]《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100 页。

[128] 在这前一天，美英占领区实行经济上的统一。

[129]《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第 264 页。

[130] 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俄现代史文献

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91，页码 43—54，转引自《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载俄罗斯《历史档案》，1994 年，第 4 期，第 36 页。

[131] 同上。

[132] 同上书，第 37 页。

[133] 同上书，第 40 页。

[134] 同上。

[135] 《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107 页。

[136] 同上书，第 108—109 页。

[137] 《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 年，第 370—371 页。

[138]《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年，第 267—268 页。

[139] 杜鲁门对此的解释是：“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371 页。）

[140] 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8 月 10 日，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16,页码 97 转引自和田春树：《1945—1953 年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根据新的俄国档案文献)》,第 2 页。

[141] 同上书，第 3 页。

[142] 季米特洛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6 年 10 月 16 日，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22，页码 38，参见同上。

[143] 波诺马廖夫等人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11 月 17 日以后),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722，页码 140,转引自同上，第 4 页。

[144] 同上。

[145] 同上书，第 5 页。

[146] 卡罗琳·肯尼迪一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年苏联的欧洲战略》，第37页。

[147] 同上书，第38页。

[148] 苏联后来把盟国对意大利问题的处理当作一个处理未来被解放的国家的先例，即，谁占领了被解放的国家，谁就将在该国发挥支配作用。在波茨坦会议上当丘吉尔抱怨英美代表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处境艰难时，斯大林马上回击道，俄国人在意大利也没有权利。（见《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365—366页。）

[149] 《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年苏联的欧洲战略》，第69页注24。

[15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74，案卷259，页码8，《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20页。

[151 波茨坦会议议定书规定，设立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制定对上述五国的和约事宜；在具体制定某一和约时，外长会议将由在有关敌国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代表组成。（《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418—419页。）根据这一规定，1945年12月，美苏英三国外长又达成了所谓的“四三二公式”来处理五国和约问题，即：美、苏、英、法四国负责准备对意大利和约，美、苏、英三国负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和约，苏、英两国负责芬兰和约。1945年9月—10月(在伦敦)，1946年4—5月和6—7月（在巴黎）以及1946年11—12月（在纽约），讨论五国和约的外长会议先后举行了三届会议。其间在7月29—10月14日，美英法苏四国加上其他有关的17个国家共21国在巴黎召开了五国和约会议。

[152]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是：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另外意大利还拥有地中海东部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当时均为英军所占领。

[153] 的里雅斯特位于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部，原属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半岛划给了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市区意大利人占多数，郊区以外的伊斯特拉半岛则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二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军解放了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整个伊

斯特拉半岛。与此同时，英军也占领了该地的某些地区。

[154] 英国只提意大利必须放弃殖民地，但却不提其归属。美国主张利比亚独立或者由联合国实行托管。法国建议仍由意大利托管。

[155]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284 ，页码 29，转引自纳林斯基：《1939—1947 年欧洲边界和势力范围问题》，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8 年，第 3 期 第 92 页。

[156]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19，页码 1，转引自同上。

[157] 1949 年第四届联大通过的决议规定，利比亚不迟于 1952 年 1 月 1 日独立；索马里交意大利托管 10 年，期满后独立（1960 年 7 月 1 日，意属索马里宣布独立，并与刚获独立的英属索马里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1950 年，五届联大通过决议，规定厄立特里亚作为自治单位并入埃塞俄比亚。

[158] 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38—1947 年）》，莫斯科，1989 年，第 348 页。

[15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期间，1945 年 6 月 29 日，英国总参谋部委员会下属的战后规划部向总参谋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英帝国安全”的报告。报告在对英国“潜在的敌人”进行了排比分析后，认定苏联是“将对英帝国构成极其严重威胁”的头号敌人，建议创建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广泛的西方联盟集团，这样的联盟除了“防止德国的复兴外”，“还有能够扩大对敌视我们的苏联的防御手段的很大价值”。报告还详细分析和论述了与苏联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发生战争时苏联的进攻手段和英国的防御措施。（参见察廖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 [1941—1945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1 期，第 100—102 页。）这份属于特殊机密的报告于同年 11 月 6 日由苏联侦探机构呈交斯大林。它使斯大林透彻地了解了英国对苏政策的新变化。报告把苏联当做英国几乎惟一的敌人并且要求组建西方集团来对付苏联的建议不能不对斯大林重新思考对西方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60]《斯大林文选》,第 441—442、445 页。

[161]考德威尔：《论苏美关系》，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 13 页。

[162]《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519 页。

[163]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 年，第 52—53 页。

[164] 同上书，第 54 页。

[165] 同上书，第 58 页。

[166] 同上书，第 61 页。

[167] 同上书，第 66 页。

[168]《斯大林文选》,第 462—463 页。

[169] 丘吉尔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的。斯大林认为，丘吉尔并不是“孤独”的，他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朋友。(见《斯大林文选》,第 462 页。)

[170] 诺维科夫的这一报告长期不为史学界所知。直到 1990 年报告才被公诸于众。这年 5—7 月，由苏联外交部研究与协调中心和美国和平研究所共同组织了由两国史学家参加的冷战问题讨论会。会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轮流举行。7月，苏联外交部研究与协调中心主任苏斯托夫在华盛顿向与会者提供了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报告的俄文原文，引起与会者极大的震惊。报告被人们称为苏联的凯南式电文。

[171] 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38—1947 年）》，莫斯科，1989 年，第 352—353 页。

[172] 针对“战后谋求世界霸权”这句话，莫洛托夫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不同于战前吗？”。这表明莫洛托夫认为，战前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都是谋求世界霸权。

[173] 在页边的空白处，莫洛托夫给这句话画了一条垂直线，“合作”一词被画了两条线。

[174] 莫洛托夫给这句话打了一个很大的交叉形记号。

[175]《战后美国对外政策——1946 年 9 月 27 日诺维科夫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载美国《外交史》杂志，第 15卷，第 4 期，1991 年秋季号，第 527—537 页。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回忆录来鉴定，这不是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而是在关于五国和约的巴黎和会上撰写的报告。报告的俄文出处是：苏联对外政策档案，全宗 06，目录 8，卷宗 45，案卷 750。

第三章

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

第一节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冷战的开始

一 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

1945—1946 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清楚地证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如同凯南电文和丘吉尔富尔敦演说一样，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从时间上来说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斯大林在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斗争后再次确定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斯大林准备修改大国合作政策的信号。而接下来（3 月）的丘吉尔号召英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的演说，又进一步挫伤了斯大林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愿望。斯大林在回答如何估计丘吉尔的演说时说，“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站

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丘吉尔“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1]这表明斯大林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作为前任首相的丘吉尔演说，而是把它与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斯大林认定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拨者’。[2]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3]

由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与西方的合作逐渐地让位于同西方的较量和斗争。他开始考虑在合作愈来愈趋于破裂的情况下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形式。显然，这种斗争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像战前那样苏联一国单独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因为毕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掌握着政权，而在西欧则存在着虽然没有单独执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参政的不容忽视的共产党（如法共和意共等）。它们是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时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这样，如何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类似集团的力量以增强苏联抗衡西方国家的力量，就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萌生了。此外，把有关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组织，不仅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且有利于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控制和操纵。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形式上便不复存在了。[4]战争后期的 1945 年 4 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建议：因为共产国际已经在 1943 年解散，有必要建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协商组织，以交流经验，并以此为目的创办一份共产党的国际性报纸。斯大林对此“举双手”表示同意。[5]虽然如此，由于苏联当时实

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这样一种形式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容易被人认为是恢复共产国际，从而会损害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所以，斯大林虽说是表示同意，但是并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去促成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因为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然而仅仅经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一年不到的激烈斗争，大国合作的政策便开始动摇并愈发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和计划从1946年春天开始，陆续见诸于他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

1946年3月28日至4月2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密访莫斯科，主要是就即将开始的五国和约谈判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4月1日，拉科西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拉科西回国后的讲话看，双方不仅就五国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也谈到了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拉科西回国后在4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他访问苏联的情况。[6]4月18日，他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工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概述了苏联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7]5月17日，拉科西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则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他首先批评共产国际“妨碍而不是促进共产党的发展”。。[8]他指责第三国际，“从一个中心出发来指导整个运动。结果就是各党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一成不变地因循中心所确定的方向并且等待中心下达指示”。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国际不能再建立。相反，国际应当是这样一种机构，即，它不妨碍各党的前进，它为各党根据当地的环境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提供方法。……新的国际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排忧解难和把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它们

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合适计划。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科西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不能马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原因是，法共、捷共和罗共正在忙于参加国内的选举；五国和约谈判正在进行。“但是一旦选举完毕，和约签订，那时这件事就要提上日程，我们就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9]

1946年4月底，铁托提出各国共产党“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应当有一项协同一致的政策”的建议，这显然正合斯大林的心意。[10]同年5月底至6月初，斯大林在同来访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但是，显然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心，斯大林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共产国际的旧形式”，“谈不上”会这样考虑。斯大林还批评共产国际通过下达指示领导各国共产党，说，共产国际束缚了各党，“当我们解散共产国际时”，“我们获得了行动自由”。[11]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想法的产生，表明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了。

在由苏联返回南斯拉夫后，铁托在他的记事手稿中写下了有关未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的一些问题。[12]在各党关系方面记载了：相互提供情报，交流经验，“工作中的一般协调”，“消除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情报局的政治目标有，“广为宣传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当指“人民民主国家”——引注），“支持世界进步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的斗争”。手稿特别指出了“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斗争”和与“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关于情报

局“不能做的事情”，手稿写道：第一，情报局“不能对某些党发布命令，如果该党不同意的话”，不能对它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第二，情报局“应该严格考虑个别国家的特殊性”。[13]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没有提到后来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提出的关于“两个阵营”的著名论断。这里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未发展到提出“两个阵营”说法的阶段，或者是斯大林故意对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隐瞒了他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真实意图。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苏联并没有紧锣密鼓地去张罗成立情报局的事宜。这里或许既有大国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因而不能大事声张以免受于西方以把柄的担忧，也有怎样才能更好地使对恢复共产国际心有疑虑的各党便于接受苏联设计的共产党情报局模式的考虑。所以，苏联只是悄悄地对此进行秘密筹划和酝酿而没有把它提上急迫的议事日程。虽然苏联还没有把它的计划向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盘托出，但是意图和目标却是明确的和不可动摇的。只是实施该计划的具体进程取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

然而在这过程中，匈牙利共产党却在1946年夏末秋初时居然不适时宜地（在苏联酝酿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提议要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14]结果不仅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而且还受到苏联的一顿羞辱。1946年9月9日和14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分别致函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认为匈牙利想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和不可容许的”，“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匈牙利共产党扮演这种多瑙河流域共产党的统一者的角色是正确的”。他还嘲讽匈牙利曾经是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而且“匈牙利民主建设中的成就明显不及斯拉夫国家”。另外，苏斯洛夫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也

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日丹诺夫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决定请求斯大林批准答复拉科西：会议“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建议不要召开。[15]匈共关于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显然是与苏联正在酝酿和准备的召开更大范围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建立一个协调各党行动的机构（如共产党情报局）这样一个重大计划相悖的。

1946 年 9 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那份全面分析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显然对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诺维科夫的报告揭露了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者的倾向”和“谋求世界霸权”的特征，认定美国已经制定并且正在推行一项“广泛的扩张计划”。。[16]由于这份报告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撰写的，所以可以说它是苏联官方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正式的估价和鉴定。报告的内容和措词表明，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的勉强合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美国已经成了苏联的真正的敌人。这就从根本上为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和同美国进行全面对抗起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1947 年 3 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3 月 12 日，正是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揭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宣读的咨文中，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提出的向他称之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 4 亿美元的援助，重要的是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谴责苏联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宣布美国将予以抵制的决心。杜鲁门认为，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式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

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美国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17]从杜鲁门总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苏联已成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性的敌人；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并且要予以坚决的抵制。这样杜鲁门实际上就是公开宣布美国将要对苏联采取一种全面遏制和对抗的政策。正如后来杜鲁门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捩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18]

杜鲁门讲话后，4月9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反驳。斯大林也没有点名。他说，“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斯大林举例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斯大林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19]应当说，斯大林的公开反应和反击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那篇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讲话虽然措词严厉，但在具体的遏制措施和方法出台前，只能算是一种政策性声明。二是杜鲁门的讲话虽然是进攻性的，但它并没有触及到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三是先作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以静制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只是那个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出现后，杜鲁门主义才被与马歇尔计划捆在一起，受到苏联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击。

但是，既然杜鲁门主义已经发出了对苏联遏制和对抗的明确信号，那么苏联当然不会仅仅限于作些口头上的反应。1947年春天，斯大林同来访的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

某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问题。[20]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三点建议，（1）由一些共产党共同创办一份定期的情报刊物。该刊的目的是讨论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2）为了创办拟议中的刊物，应当召开将参加该刊物的共产党会议。（3）由波兰工人党担任会议的倡议者。哥穆尔卡对此表示同意。接着，就拟定了与会各党的名单草案，打算以波兰工人党的名义邀请这些党与会。[21]引人注目的是，与上次同南共和保共领导人的谈话不一样，斯大林没有提议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发展已日益紧张。1947 年 2 月由美苏等 21 个有关国家签订的对意、芬、罗、匈、保五国和约是在争吵声中缔结的，并且它的签订完毕也就同时标志着可供美苏合作的余地几乎已经消失。而 3 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更是毒化了美苏两国关系。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只能是前进而不可能后退。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卡的会谈中只提为创办共同的刊物召开一次会议而不提建立情报局的事宜，可能的解释就是，毕竟那时联共（布）还没有建立对东欧各党任意摆布的绝对控制，可将它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眼下的上策就是，先以创办刊物为名将各党代表拉来开会，然后再迫使他们接受建立情报局的决定。后来的事实对此作了可信的证明。

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西欧国家内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7 年 5 月 4 日，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拉马迪埃政府的工资政策，结果总理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团结一致的规则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了政府。[22]在苏联的战后欧洲格局的设想中，法国和意大利一样，至少应当成为独立于美英和不反对苏联的中立国家。因此在战后初期让法共和意共参政从而确保苏

联在西欧影响的这种联合政府的策略，也是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内容和因素之一。然而先是在法国尔后又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共产党的部长们先后被赶出政府。这种事态的发展不能不使苏联感到忧虑和不安。6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电法共总书记多列士，[23]代表联共（布）中央“对法国最近的导致法国共产党人被逐出政府的政治事态感到忧虑”。他说，“苏联工人因法国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共产党的急剧变化而焦虑不安，这些变化的政治后果使他们感到担忧。”接着他以愤慨的口吻说，“很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行动是征得联共（布）中央同意的。您自己明白，这是不可信的，你们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联共（布）中央意料之外的。”他要求多列士就法国和法共的情况向联共（布）“通报”。[24]苏联之所以对法国的形势感到“焦虑不安”并要求法共向它“通报”情况，其一是法共的行为是没有同联共（布）商量的擅自行动；其二是这样的行动结果不仅降低了法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几乎使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的策略陷于破产，从而削弱了苏联在法国和西欧的影响。为了维护苏联在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影响，为了使法共的行动与联共（布）保持一致而不是擅自行事，有必要尽快召开有关各党的代表会议并建立协调各党行动的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从地理分布来看，不只限于东欧国家而且还包括西欧的法共和意共，就是有力的证明。

除了西欧国家的政治形势因共产党被逐出政府而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外，东欧国家的某些共产党那种加强地区之间联合的“小串连”（诸如，1946年夏末秋初匈牙利共产党提出要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和1947年7月底和8月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在未经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已就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以及东欧某些国家

对马歇尔计划恋恋不舍的态度，更使苏联感到忧虑不安。匈牙利共产党的建议被苏联以政治上不合适为由而断然驳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行动则被斯大林斥责为“匆忙”的和“错误”的，“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25]试图去巴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被斯大林痛加训斥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显然，如果放任自流，东欧各党和各国也会产生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从而威胁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影响。大国合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培育东欧国家独立倾向的温床，而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外，在美苏对立日益加剧和严重的情况下，如同西欧一样，东欧国家的以共产党人为主的联合政府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在苏联看来，都是值得严重怀疑的。所有这一切进一步使苏联感到必须加快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以便统一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

正当苏联筹备召开一些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时候，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方面又发生了一件可以预料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时提出了复兴欧洲的计划。他陈述了欧洲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给欧洲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他认为，解救的办法是要“恢复欧洲人民对他们国家和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否则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政治和稳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马歇尔声明，“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即使不能取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该取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26]这项复兴欧洲的计划后来就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第一，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就是要通

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来保证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生存和稳定。换言之，恢复欧洲正常的经济乃是要为恢复欧洲的政治制度创造条件。实际就是要防止苏联利用欧洲混乱的经济形势进行渗透。第二，美国实际上清楚地知道，这项计划是不可能得到所有欧洲国家同意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肯定是有条件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反对，那无疑主要就是苏联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对于苏联的可能的反对，美国心中并不是没有底的。

1947 年 6 月美国方面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成为苏联最终实施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计划的强大的助推力。苏联在经过起初的试探和犹疑后，迅速认定：马歇尔计划“归根结底是要建立西欧集团作为实施美国政策的工具”[27]；“在马歇尔计划的幌子下，正在筹划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28]这样在苏联看来，建立以共产党情报局为组织形式的苏联东欧集团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就是在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惟一的选择了。马歇尔计划于是成为苏联改变大国合作政策的契机。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和美苏在东欧问题、德国等战败国问题的一系列较量后逐渐开始动摇的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在进入 1947 年完成了五国和约的最后一次勉强合作后，由于宣布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为标志），在东欧国家可能的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的发展，为组建西方集团奠定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最终使苏联抛弃了大国合作的政策，由大国合作转变为集团对抗。

二　集团对抗的开始：建立共产党情报局

在 1947 年春天斯大林与哥穆尔卡讨论了为创办各国共产党的情报刊物而召开一次各党代表会议并商定由波党充当发起者之后，同年 7 月下旬，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工人党向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法国和意大利等八国共产党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信。[29]信中谈到了“讨论欧洲的兄弟党面临的问题”的必要性和为此召开“一些共产党参加的局部性情报会议”的问题。为了消除可能的担心，哥穆尔卡在信中保证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一些有关国家形势的情报和交流意见。除了创办一份将阐述一些国家工人运动问题的刊物外，我们没有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构的目的。”[30]

波党在发出邀请信后，于同年 8 月初派遣自己的代表分别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会议的组织问题进行讨论。虽然几乎所有上述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同意召开这次会议，但是他们对会议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匈共领导人“态度积极”。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持同意态度”，“但缺乏热情”。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对拟议中的会议持谨慎态度。南共领导人铁托认为有必要召开会议，但要求扩大与会国的名单，邀请希腊共产党代表参加会议。[31]

然而，苏联方面对于未来的会议却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不仅是被邀请的各党就是为这次会议积极奔走的波兰工人党对此也一无所知。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联共（布）将把两个问题列入会议的议程。第一个是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协调各党行动的问题。就第二个问

题，苏联代表团将提出“建立情报局形式的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的想法”。至于斯大林同哥穆尔卡会谈中所说的创办各党刊物的问题，仅仅是作为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一目的的补充而被提及。[32]对于讨论上述两个问题的具体安排，日丹诺夫提出：关于国际形势，由联共（布）代表担任报告人是“适合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当对世界形势的实质作出评价并由此确定各党的基本任务。“第二个问题——关于协调各共产党行动”，“可由波兰人来作报告”。[33]但是，联共（布）代表团在会上讨论协调各党行动问题时将声明，“仅仅是以各党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作这样的协调。另一方面，又要提出“有关各党之间就涉及它们的问题所作的协商必须执行”的建议。而且是，“就所有涉及联共（布）利益的问题，有关各党均必须与联共（布）协商”，就像联共（布）“应当就涉及其他各党的问题与各党协商一样”。[34]这种字面上所说的所谓的相互间自愿协商的“民主”，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过是一种掩盖各党必须与联共（布）协商并且与它保持一致的真实意图的文字游戏。

虽然会议的邀请信是波党发出的，并且其后同各党的会谈也是由波党进行的，但是几乎所有与会议直接有关的重要决定都是由苏联作出的。在筹备会议时，波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同东欧各党领导人的密电往来都是通过莫斯科进行的。[35]关于与会各党的名单问题，以波党的名义给苏、南、捷、保、匈、罗、法、意八党发出了邀请信。这八党加上波党本身就是后来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成员党。对于铁托提出的邀请希共参加会议的要求，联共（布）中央在给铁托的密电中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理由是，如果希共参加会议，它的敌人就会以此诬蔑它是“外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是“按照外部指示行事”的。[36]关于会议开始的日期问题，原来确定的是1947年9月15日，后来匈牙利领导人提出改为9月22日，苏联领导人对此表示

同意。[37]会议的地点选择了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名叫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城。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在 8 月 15 日的一份有关会议筹备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会议“应当是秘密性质的”，只有在会议结束后“才能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和呼吁书”。[38]波党领导人贝尔曼对是否要在会后宣布召开了各国共产党会议表示疑虑，因为西方会就此鼓噪说，共产国际又恢复了。但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这么透露。”莫洛托夫也认为，会议的总结公报和创办各党报纸的消息应当公布。[39]这表明斯大林此时已不在乎甚至就是要让西方国家知道各党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因为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和对抗已经公开化，并且苏联也不再需要大国合作了。

但是，对于会议应当在秘密状态下召开，各党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匈牙利希望派一架飞往苏联的飞机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党代表不办理出境手续也不经匈有关部门的同意，直接从机场登机前往波兰。铁托建议意共代表先来南斯拉夫，随后再直接飞往波兰。[40]9 月 17 日，巴拉诺夫向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9 月 22 日会议的组织措施计划》。他建议，“联共（布）代表团和所有服务人员从莫斯科启程时均应匿名，不办理出国证件和签证。为此必须指示科鲁格洛夫同志（内务部长——原注）和外贸部副部长科鲁季科夫同志，在中央机场不要检查证件就对飞行者放行，并且在起飞时把无关人员清除出机场。”他说，波兰方面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扎姆布洛夫斯基已经告知，运送参加会议的各党代表前往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飞机将在（波兰的）累格尼察市降落，“对代表团及其随行人员不作任何证件检查”。他在计划中还提出，要“带 5—6 部新摄制的苏联影片为与会者放映”和“设 8 个有若干图书（新书）和包括《哲学问题》杂志在内的小型图书馆以供

参加会议的兄弟党代表阅读’，。[41]

一直到会议召开，苏联始终对与会各党隐瞒它召开这次会议的真实意图。各党仅仅是被告知要在会上通报一下各自党的活动情况。除了知道将要创办一份刊物，各党对于通报完各自党的活动后将要讨论什么问题均一无所知。在会议召开前一星期，铁托致电莫斯科，请求告知“哪怕是议程的基本事项”以便南斯拉夫代表团能够确定自己的基本方向。联共（布）的答复是：“按照我们的看法，把什么问题列入各党代表报告后的会议日程里，这应当由会议本身来决定。”至于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供会议讨论，“我们认为，每个代表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42]明明是苏联已经把包括会议日程在内的一切事项全都安排好了，但它就是不肯也不敢对各党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

会议召开前两天，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莫申托夫飞抵波兰，他是按照上述的《9 月 22 日会议的组织措施计划》，前来亲自察看供各党代表团飞机降落的累格尼查机场以及“将要举行会议的地点和场所”的。然后，他将听取哥穆尔卡等人就有关问题的通报并向联共（布）中央报告“会议准备工作的情况”。[43]

9 月 20 日和 21 日，各党代表团先后抵达波兰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44]

1947 年 9 月 22 日下午，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各党的两位正式代表分别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45]南共政治局委员卡德尔和吉拉斯，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政治局委员明茨，罗共总书记乔治乌一德治和政治局委员波克，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和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巴什托瓦斯基，匈共政治局委员法尔卡什和列瓦，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人）政治局委员切尔文

科夫和波普托莫夫，法共政治局委员杜克洛和法容，意共副总书记隆哥和雷阿勒。[46]

波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致开幕词。[47]从 9月 22—24 日各党代表分别就本党的情况作了报告。代表本党作报告的是：联共（布）的马林科夫、波党的哥穆尔卡、捷共的斯兰斯基、南共的卡德尔和吉拉斯（两人都作了报告）、匈共的列瓦、保共的切尔文科夫、罗共的乔治乌一德治、法共的杜克洛、意共的隆哥。日丹诺夫把各党代表的报告向斯大林作了通报，并且还对这些报告作了评价。波党、捷共、南共和匈共代表的报告被评价为“内容丰富”、“详细”，给人产生了“好的印象”。其中南共代表的报告最受赞扬。[48]保共代表的报告“质量和政治水平”为“中等”。罗共代表的报告“给人总的印象不是很好”。[49]日丹诺夫对法共和意共的评价是否定的。他说，杜克洛的报告“给人以不好的印象”，而隆哥的报告给人留下的是“难堪的印象”。[50]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马林科夫代表联共（布）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活动的报告。他除了介绍联共（布）的活动外，还提出有必要“采取明确的措施”以建立各党之间的“经常联系”。他称“协调行动”就是联系的目标之一。[51]至于是什么样的“明确措施”和怎样“协调行动”，马林科夫没有具体地详谈。等到各党代表的报告完毕后， 9月 24 日晚上，马林科夫按照苏联方面早就制定好的计划向会议提出建议：（1）由日丹诺夫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2）由波党代表作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在会议接受马林科夫的建议后，苏联代表立即就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52]

9月 25 日上午，日丹诺夫向会议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经斯大林事先审阅并多次修改后完成的。非常值得指出的是，在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的初稿中还没

有“两个阵营”的说法。它只是说，东欧“人民民主政权”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结果的话。[53]在后来的修改中陆续出现了诸如“反帝阵营和民主阵营”、“新阵营”和“新民主”以及“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阵营”等提法和措词。最后的提法是：“战后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两个阵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的民主阵营——的形成。”[54]

会议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55]

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对法共和意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责法共和意共放弃阵地，脱离反对“美国操纵”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56]东欧各党特别是南共、罗共和匈共积极支持苏联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57]在一片指责声中，法共和意共代表被迫表示接受这些“同志式的批评”。[58]日丹诺夫还批评包括法共和意共在内的“某些兄弟党的活动家”“经常强调”“自己对莫斯科的独立性”，而不是“坚决表示他们支持莫斯科爱好和平与民主的政策”。[59]

按照苏联方面最初的计划，苏联原先还打算在会上批评捷共和南共。捷共的路线被认为“太温和”。后来在给斯大林的有关会议计划的报告中，日丹诺夫删除了对捷共的批评。[60]在日丹诺夫报告的草案中，南共被批评犯了“左倾错误”。草案说，这些错误就是认为苏联似乎是从大国政策考虑，不愿损害自己同大国的关系，因而没有为支持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进行有力的斗争。[61]但在会议召开前，日丹诺夫在其报告

中勾销了对南共的批评。[62]

对于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既定计划，由于估计到要在会上取得一致意见比较困难，苏联代表没有在会上公开予以提出，而是采取会外个别接触、探询和交换意见的方法来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这也说明，联共（布）当时确实尚未拥有对各党的绝对的控制力量，无法在会上使自己处于那种一呼百喏的地位，因而只能借助于场外外交的手段。而且，场外外交进行得并不顺利。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给斯大林的密电中称，已经与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了谈话，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意有必要建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63]但是作为会议东道主波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却坚决反对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他反对的原因和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根据当初他与斯大林的商定，发起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意见、交换情报和创办一份有关各党的刊物。由波党向有关各党发出的会议邀请信也是这么说明的。而现在联共（布）突然间提出要建立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并且还要波党代表充当提出这一问题的报告人，这就等于在各党代表面前把哥穆尔卡置于一种撒谎者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哥穆尔卡产生了一种受了斯大林蒙骗的侮辱感。其二是，哥穆尔卡担心共产党情报局会演变成类似共产国际那种组织并使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

关于哥穆尔卡如何反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存在着各种说法。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密电中说，波党代表“怀疑并反对建立公开的情报局”。[64]卡德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哥穆尔卡是在会上公开反对建立情报局的建议的。对于日丹诺夫作出的不涉及恢复共产国际这类机构的保证，哥穆尔卡说，拟议中的各党的新中心事实上很容易就转变成共产国际这样的机构。[65]按照贝尔曼和普塔希尼斯基的说法，哥穆尔卡对出席

会议的波党同事表示，他反对建立情报局。他甚至对他们说他要辞职。[66] 根据卡德尔和吉拉斯在各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于苏联提出的建立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的建议，哥穆尔卡仅同意建立纯粹情报性质的机构，并且是“完全非公开性质的”。。[67] 在日丹诺夫所作会议记录手稿中，记载着几句没有说明是谁说的话：“情报局——范围狭小的基地”,它“等于共产国际”;“将变为共产国际”。[68]

对于波党的反对意见，苏联显然是没有料到的。因为按照联共（布）代表团原先的建议，情报局的总部将设在波兰首都华沙。波兰的反对打乱了苏联的既定计划和部署。 9 月 25 日，莫洛托夫在与苏联代表团的直线联系中甚至表示即使建立一个没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也行。但是，斯大林随后就给代表团发来了另一项指示：必须使情报局具有协调职能。[69] 在苏联代表的积极努力下，各党代表团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在波党代表团内部，政治局其他委员均力劝哥穆尔卡不要反对建立情报局。哥穆尔卡终于改变态度。[70] 9 月 27 日，在最后一天会议之前，波党代表团通知苏联，他们撤消反对意见，并且同意情报局总部设在华沙。但是苏联已经另有选择了。联共（布）代表的答复是，情报局总部将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71]

在这之前，由于波兰反对建立情报局（包括让华沙成为情报局总部），9 月 25 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就与南共和捷共代表就情报局总部所在地问题进行了磋商。南共代表非常乐意地建议让贝尔格莱德作情报局的总部，并且没有征得铁托的同意就说这是不变的答复。捷共代表虽然同意让布拉格作情报局的总部，但显得热情不够，说要回国一趟征求哥特瓦尔德的意见后才能给予答复。[72]

9 月 27 日，哥穆尔卡在会上正式建议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并且说，情报局不仅具有交流经验而且具有“在必要时”

“在自愿基础上”协调各党活动的职能。[73]这一天，会议在完成了苏联所制定的既定任务后闭幕。九党代表会议最终变成了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

但是会议结束时各党代表并没有拿到会议的最后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几天，各党的领导机构才从苏联那里领到了这些文件。苏联领导人单方面对会议文件作了重要的修改。[74]如，会议通过的文件规定情报局是在“自愿基础上”发挥职能，但在最后的文本里取而代之的是“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75]这样“自愿”就没有了。这种修改显然是更强调情报局内部的步调一致和服从而不管你是否自愿。

九党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反映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看法，表明了苏联准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斗争和全面对抗的决心和打算。而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则构成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力量基础。情报局由东西欧九国共产党组成，表明它不仅仅是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组织，而是跨越东西欧的全欧性质的共产党政治集团。从目标上看，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是既要规范和统一各党的行动和步伐，又要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它与同时期出台的“莫洛托夫计划”一起，既是苏联对外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必然反应。

三　从怀疑到否定：对马歇尔计划的抵制和反击

当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 1947 年 6 月 5 日提出援助欧洲的复兴计划时，立即就获得了英法等国的欢迎和支持。 6 月 17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巴黎举行会晤，商

讨如何响应马歇尔计划的事宜。会谈结束后，他们决定邀请苏联于 6 月 27 日在巴黎召开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 。

苏联方面对于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苏联正在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如能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自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马歇尔计划至少在形式上是面对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提供援助的条件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76]因此苏联最初对马歇尔计划是感兴趣的。莫洛托夫为此指示要认真准备讨论马歇尔计划。“应当同意这个建议（指马歇尔计划 ——引注），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不能完全消除那至少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所有的消极面，力争他们不把某些条件强加给我们。简而言之，就是某种类似于租借法的东西。”[77]1947 年 6 月 2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同意对英法政府关于召开三国外长巴黎会议的照会给予积极的答复。[78]第二天（6 月 22 日），苏联在给英法的复照中表示愿意参加巴黎外长会议。照会说，“苏联政府同意欧洲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它们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当然，如果美国方面——它的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增加 ——能提供符合上述目的的援助，那么，这项任务的完成将会变得容易些。”[79]同一天，苏联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大使们奉命转告三国政府，苏联同意它们想要参与马歇尔计划的要求：“鉴于一些欧洲国家（荷兰和比利时）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们认为，友好盟国（指上述三国——引注）也应当表现出确保自己参与研究上述经济计划的主动性并且提出自己的这方面要求。”[80]但是，另一方面，在 1947 年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和尖锐的情况下，想要让苏联相信马歇尔计划是要真诚地对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只是

在尚未弄清楚马歇尔计划的真正意图和目的之前，抱着如能通过这样一个计划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争取一些贷款也未尝不可的想法，苏联才表示愿意参与讨论马歇尔计划，而没有贸然地立即予以拒绝。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在表示愿意参加的同时，苏联方面对马歇尔计划的意图和目的马上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6 月 21 日决定对英法关于召开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三国外长会议的照会给予积极答复和苏联政府 6 月 22 日同意东欧国家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后没几天， 6 月 24 日，出现了两份分析马歇尔计划的文件。一份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给莫洛托夫的报告。瓦尔加认为，“美国的经济状况在提出马歇尔计划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歇尔计划首先是缓解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的工具，在美国没有谁怀疑经济危机正在来临……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将会提供比它们迄今为止已经提供的更多的贷款以便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找到出路，即使事先知道这部分贷款永远得不到偿还……在这种背景下，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在于：如果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必须以贷款的形式向国外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国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的话，那么就必须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81]也就是说，马歇尔计划是为了谋求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另一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同一天（6 月 24 日）致莫洛托夫的电文。就像他在 1946 年 9 月的《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报告中揭露美国追求世界霸权和推行扩张计划一样，诺维科夫以他特有的敏感分析了马歇尔计划的反苏的政治目的。他确信，“这里构成‘杜鲁门主义’实质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阻挠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增强反苏力量和为加强美国资本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创造条件——无疑都没有实质性的

改变。对‘马歇尔计划’所作的认真的分析表明，归根结底，这一计划就是要建立西欧集团作为实施美国政策的工具……所以，‘马歇尔计划’与原来曾经采取过的旨在使欧洲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资本和建立反苏集团的分散行动不同，它规定要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82]这里，诺维科夫第一个明确地把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联系起来，指出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反对苏联的西欧集团。应当说，诺维科夫这一分析是很有洞察力的。马歇尔计划并非是要援助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而只是想通过有条件和有选择地对欧洲的经济援助，首先稳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动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防止苏联利用经济恶化和社会动荡对欧洲特别是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以确保传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生存。同时要通过经济援助为组建一个强大的西方集团奠定经济基础以限定甚至侵蚀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所以，概括地讲，马歇尔计划具有稳定西欧和侵蚀东欧的双重目标。而正是后一点在苏联看来是动摇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划定的东欧势力范围并且破坏苏联的东欧安全带。这当然是苏联所无法容忍的。瓦尔加和诺维科夫对马歇尔计划所作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分析基本上被苏联领导人所赞同和接受，从而成为苏联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应对和抵制马歇尔计划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自瓦尔加和诺维科夫报告提出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实际上已经从怀疑转向批判和否定。

所以，6月27日莫洛托夫率领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时，与其说是怀着争取美国援助的希望去的，莫不如说主要是抱着斗争的态度去的。苏联政府在代表团临行前所给予的一系列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指示规定，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要获得有关“所打算给予欧洲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和条件”的情报，“特别是，苏联代表团应当搞清楚下列一

些问题：将要给予的援助的形式、可能的范围和条件”。苏联代表团必须坚持如下的立场，即，“关于美国给欧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的问题不应当从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的观点出发来进行讨论，而应当从通过由欧洲国家自己拟定申请的方法查明欧洲国家对美国援助（贷款和提供商品）的经济需求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进行讨论。为此，苏联代表团不应当允许外长会议歪到查明和检查欧洲国家资源的歧途上，而抵制提出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坚持：会议的任务是审议欧洲国家的申请和查明美国方面满足欧洲国家申请的可能性，而不是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指示特别强调，“在讨论有关美国援助欧洲的任何具体建议时，苏联代表团都应当反对那些可能损害欧洲国家主权和破坏它们经济独立的援助条件。”此外，要“反对在外长会议上审议有关利用德国经济资源来满足欧洲国家需要的问题，反对讨论美国向德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83]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外长会议前也进行了紧急的准备工作。6月 17—18 日，英法两国外长在巴黎就如何响应马歇尔计划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他们表面上邀请苏联参加巴黎外长会议共同商议有关马歇尔计划的事宜，但私下却告诉美国驻法国大使卡弗里，“他们希望苏联拒绝合作，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准备‘勇往直前，即使遭到苏联的拒绝’。”[84]6 月 24 日，美国副国务卿克莱顿前往伦敦同英国外长贝文就如何对付苏联协调对策。克莱顿说，“如果计划的实施从作为某种核心的西欧开始，美国政府会感到满意”。[85]这实际上就是要排斥苏联。克莱顿表示，如果苏联想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在欧洲复兴等问题上作出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同时他明确反对提及“租借法”这一词语。他还告诉贝文，即使苏联不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也将支持欧洲国家继续干下去。

所有这些清楚地证明，在会议开始之前，双方在如何对待

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立场就已经不相吻合。一方甚至不愿另一方参加。而另一方也不是为了获取援助而主要是为了进行斗争而决定前去巴黎的。巴黎外长会议成了双方的斗争场所。[86]会上英法和苏联所阐述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英法建议，欧洲各国就各自的经济资源提出报告，然后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制定统一的欧洲复兴计划，确定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方向，规定每个国家在美援中的份额。苏联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苏联认为，实现这些建议的结果，就是“欧洲各国将陷于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应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的地位而取悦于少数强国”。苏联的建议是：专门设立一个促进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接受欧洲国家的申请，查明它们对美援的需要数量。在此基础上，确定美援的可能幅度。苏联还认为，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应当首先得到援助。[87]归纳起来，双方的分歧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先查明受援国的经济资源等情况，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然后确定受援国的援助份额。苏联则认为提供受援国的经济资源等情况会损害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主张应当查明受援国对美援的需求和确定美援的数量，然后由美国负责提供。换句话说，美国的立场是：我想怎么给就怎么给，按照我的要求才能给。苏联的观点是：我想怎么要你就应当怎么给，必须按照我的要求给。美国着眼的是，首先通过援助来复兴和控制欧洲特别是西欧；其次是通过援助来引诱东欧，使之脱离苏联的轨道。苏联的立足点则是，反对美国通过援助来控制欧洲，特别是要抵制美国以援助为手段拉拢东欧，蚕食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所以，怎么对待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援助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能否控制欧洲（特别是西欧）和苏联能否保住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局性问题。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和对立是怎么也无法弥合和消除的。

法国外长皮杜尔曾试图寻求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但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强调苏法方案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他说，“我对此的回答是，这样的差别是存在的。差别在于，苏联的方案是要使会议和将有可能建立的委员会仅仅讨论与美国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直接有关的问题，而法国的方案还要求制定一个既包括与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有关的问题又涉及它们之间经济关系问题的经济计划。”[88]

会议期间，双方不仅无法就实施马歇尔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双方的意图和目的都暴露得愈来愈清楚，因而双方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6月30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电中向莫洛托夫报告了苏联间谍获得的有关在克莱顿访英期间英美就实施马歇尔计划问题所达成的私下协议。根据维辛斯基的报告，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1. 英美同意，马歇尔计划应被视为欧洲复兴计划，而不是对欧洲的援助，它不应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延续。

2. 英美同意，欧洲的复兴可以通过建立煤炭、钢铁、运输、农业和食品等一系列职能委员会的方法来实现，由其中的一个主要委员会来领导……

3. 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建立的任何组织均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对此的解释就是因为德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4. 英美认为，德国仍然是欧洲经济的关键。因此，德国事实上是任何一种复兴（欧洲）大陆计划的基础之一。

5. ……英美将反对从现有产品中向苏联支付赔偿。”[89]

在苏联看来，协议的头两点证明，美国的援助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慷慨解囊，而是在由美国指导下的、欧洲通过自救方法实行的复兴过程中有条件的援助。同时还证明，美国想要主导欧洲的复兴过程。而后三点表明，美国不仅要把德国纳入马歇尔计划中去，而且还要阻止苏联向德国索取赔偿。苏联本来

就没有对会议抱什么希望，现在当暴露了英美之间的私下交易的这份协议落入苏联之手时，苏联除了震惊、失望和愤怒之外，只能进一步选择对抗。在 6 月 30 日的会上发言中，莫洛托夫强调，“为欧洲国家制定包罗万象的计划”不是会议的任务，“德国问题应由英法美苏四大国审议”。[90]这就是说，苏联明确反对美国主导和操纵欧洲的复兴进程，反对把德国纳入马歇尔计划中去。到这个时候会议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6 月 30 日深夜在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他对会议已经失望。他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已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它们都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克服自己的经济困难。它们惟一的希望就在于美国，美国要求英国和法国建立某种全欧性机构以易于美国干涉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英国也想利用这种机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法国多少也有点这种想法。”“由于我们的立场与英法的立场根本不同，我们不认为有可能就该问题达成某种实质性的共同协议。”[91]7 月 2 日，莫洛托夫奉命宣布退出会议，并发表声明，谴责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为某些谋求霸权的强国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92]这样，英法苏三国巴黎外长会议终因双方歧见太深而不欢而散。

但是苏联的退出并未能阻止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步伐。会议结束后，贝文和皮杜尔在一项联合声明中代表英法两国政府邀请所有欧洲国家（除了佛朗哥执政的西班牙）参加欧洲经济会议。 7 月 4 日，22 个欧洲国家接到了正式的邀请。会议定于 7 月 12 日在巴黎召开。

已经在上次巴黎外长会议上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与英法进行过激烈交锋的苏联当然无意参加会议并且还要阻止和挫败会议在这方面的努力。7 月 5 日，苏联政府指示苏联驻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要他们会见驻在国的外长并发表否定马歇尔计划

的声明。声明说，“苏联代表团认为，（马歇尔计划的）要求中包含了这样一种试图，即，干涉欧洲国家内部事务、把自己（美国）的计划强加给它们以及使它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口产品，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属于美国的利益。”[93]但是既然英法邀请的对象也包括了所有的东欧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如何动作就是一个值得仔细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了，因为苏联之所以否定和敌视马歇尔计划，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计划除了要稳定和控制西欧外还包含着引诱东欧国家脱离苏联和瓦解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危险因素。所以东欧国家对马歇尔计划如何反应就不单单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了。

苏联起初没有下令阻止东欧国家参加巴黎会议，而是要求它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发难。也是在7月5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奉命向铁托转达了联共（布）中央的电文。电文说，“我们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准备拒绝参加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召集的于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我们对你们在有关美国的奴役性贷款问题上所表现的坚定性感到高兴。但我们认为，你们最好是参加会议，派自己的代表团到那里去，向美国及其附庸英国和法国挑战，从而阻止美国随心所欲地推行其计划。然后再退出会议，并尽可能多地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也带离会场。”[94]苏联的这一立场还转达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芬兰党的领导人。最能领会苏联意图的莫过于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还在7月4日，他在美国驻保加利亚政治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同苏联大使的会见中就很有见地地说，“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拒绝参加会议会让人有借口指责这些国家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性。”[95]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否真有？像上面和下面的莫斯科接二连三地给东欧国家领导人作出的指东道西的指示作了最好的说明。7月6日，莫洛托夫电告苏联驻波兰和南斯拉夫大使，

让他们通知贝鲁特和铁托，希望他们挑选几位负责人来莫斯科，“以便就巴黎会议问题进行事先磋商，避免会议期间出现不必要的麻烦”。[96] 这种所谓的“事先磋商”就是要为参加会议的东欧国家代表团事先制定行事规则和方法，防止它们在苏联不在场的情况下任意行动或者捅出漏洞。

但是几个小时后苏联领导人就打了退堂鼓，决定收回成命。7 月 6 日深夜，苏联驻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芬兰的大使同时得到本国的指示，要他们转告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铁托、拉科西、乔治乌－德治、贝鲁特、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霍查、库西宁：“联共（布）中央建议在 7月 10 日以前不要答复英国人和法国人（指英法的会议邀请——引注），因为鉴于苏联不参加，有些国家的朋友（指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引注）反对参加 7 月 12 日召开的会议。”[97] 7 月 7 日夜间，苏联大使再次向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转达联共（布）中央的急电：“苏联政府得到的有关 7 月 12 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性质的材料证实了两个新的情况。首先，会议组织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打算对他们那个不尊重小国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作什么修改。其次，会议组织者们实际上试图以制定欧洲复兴计划为幌子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鉴于这两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撤消 7月 5 日发出的电文，并且建议拒绝参加会议，亦即不要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各国可自己斟酌提出拒绝与会的理由。”[98]

从 7月 5 日到 7月 7 日短短的两天内，苏联的立场由让东欧国家怀着斗争的目的前去参加会议转为命令它们不要与会，这真是瞬间之内发生的 180 度的急剧转变。其原因，首先正如电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苏联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要组建一个反对苏联和东欧的西方集团。这一点诺维科夫在 6 月 24 日

分析马歇尔计划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现在苏联领导人则对此深信不疑了。其次，马歇尔计划对东欧一些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当时有不少东欧国家对美国的经济援助是有所指望的。如果让东欧国家在苏联不在场的情况下参加会议，在美援的诱惑下，发生某些有损于东欧同苏联关系的事情也未必没有可能。再次，因为当时东欧国家实行的是联合政府的体制，在有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共产党人没有绝对掌握外交部门。如此，苏联就是想要事先制定行事规范并且在会议期间对这些国家实行幕后遥控，也会因为非共产党人在外交部门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和困难。譬如，苏联非常担心捷克斯洛伐克让其驻法国大使诺赛克代表捷参加巴黎会议。苏联驻法国大使波戈莫洛夫提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诺赛克大使是以内政方面的保守分子和对外政策方面追随西方而闻名的”。。[99]

对于苏联立场的这种短时间内的来回变化，大多数东欧国家虽然难以适应，也只好无奈地顺从地去执行苏联的指示。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指示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抵制。苏联驻捷临时代办博德洛夫在 7 日夜间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后，8 日即去见捷共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哥特瓦尔德，向他转交了联共（布）中央的电文。没想到后者竟然说，已经不可能改变捷政府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人）”。在场的捷外交部国务秘书（共产党人）克莱梅季斯也附和说，他们现在什么都无法改变了，“因为事情都做完了，答复已经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报上也公布了，（驻巴黎大使）诺赛克已经接到指示，委任他参加会议”。。[100]愤怒的斯大林立即下令召见捷领导人。第二天（9 日）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代表团奉召抵达莫斯科。在同哥特瓦尔德单独举行的会晤中，斯大林非常气愤地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捷政府立即废除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哥特瓦尔德被迫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在随后与

捷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会见中，斯大林明确地阐述了他对马歇尔计划的观点和立场。斯大林认为，巴黎会议将是西方实行孤立苏联的更为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指出，西方试图恢复德国经济特别是鲁尔矿区，目的就是使鲁尔成为西方集团的工业基地。针对捷代表团的懦弱的反对意见，斯大林强调，“参加会议将使你们摆错位置。‘阵线’被突破就意味着西方的成功。瑞士和瑞典还在犹豫，你们去参加会议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决定。我们知道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谁也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因为参加巴黎会议你们就将被当做反苏的工具。无论苏联还是苏联政府都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101]在接到捷代表团的通报后，捷政府于 7 月 11 日举行了政府非常会议。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捷副总理希罗基宣布废除原先作出的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102]

由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否定，所有的东欧国家，不论是对马歇尔计划心存疑虑的还是心向往之的，都步调一致地跟着苏联大唱马歇尔计划的反调，宣布它们将不参加 7 月 12 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经济会议。

随后苏联便开始对马歇尔计划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 9 月，苏联代表团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谴责马歇尔计划的声明。声明说，“‘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意味着把欧洲各国置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内政的直接干涉……这个计划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企图以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国家集团来对付东欧国家。”[103]在同月举行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马歇尔计划又被与杜鲁门主义联系起来。会议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揭露说，“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的欧洲一章而已。”[104]

为了抵御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冲击，防止东欧

可能出现的对苏离心倾向，同时考虑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欧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和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所可能遭到的经济损失，苏联在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立即开始着手加强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对东欧国家进行政治安抚和经济援助。

就在捷代表团 7 月上中旬访问苏联期间，双方还就两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保证两国之间顺利的和长期的商品交换以利于确保两国经济计划的全面完成和劳动力的完全利用，有必要加深两个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为此两国决定尽快签订一项长期贸易协定。[105]1947 年 12 月 11 日，苏捷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五年（1948—1952 年）的供货和支付协定，规定两国每年的贸易额为 500 万捷克克朗。同时签订的贸易和航行协定，决定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此外还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06]

7 月 10 日，苏联同保加利亚签订了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以及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供 500 万美元商品贷款的协定。[107]

7 月 15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和匈牙利供货和支付协定。还签订了苏匈贸易和航行条约，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08]

7 月中旬，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给予后者 6 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供其购买轻工业、林业和农业机器。[109]

8 月 4 日，签订了苏波相互提供货物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波兰提供大量的棉花、铁矿和锰矿石、石油产品等。波兰则向苏联提供焦炭、纺织品等。 1948 年 1 月 26 日，苏波两国又签订了 1948—1952 年的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规定双方的贸易量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 5 亿美元。而在此前的 3

月，苏联已经向波兰提供了一笔为期 10 年的总数为 2800 万美元的贷款。[110]

8 月 25 日和 26 日，苏联又分别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贸易协定。[111]

通过上述协定，苏联“把以前流向西欧或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112] 据统计，1946—1947 年，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贸易急剧下降。[113]

苏联为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而与东欧国家在这段时期内签订的贸易和经济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它进一步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两年后（1949 年）当经互会成立后，它又正式发展为独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的封闭型的苏联东欧经济集团。

如果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确立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外活动和对外政策统一的基础，从而确定了苏联东欧阵营（集团）的基本轮廓的话，那么莫洛托夫计划的实行则为这一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加强集团内部的团结和巩固苏联的东欧安全带

一　东欧国家联合政权的转变和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

当 1947 年美苏关系的紧张状态转变为冷战后，联合各自的盟友并且组建国家集团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和加强与对方的争夺，便成为美苏双方进行冷战的必然步骤了。实际上，从战后

初期开始，在与苏联的对抗和争夺中美国和英国就已经逐步结成了联盟。冷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实施马歇尔计划入手，以抵御苏联威胁为名，由缔结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发展到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1949年）。北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以苏联东欧集团为敌手的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与此同时，苏联则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为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始建立以它为首的苏联东欧国家阵营（集团）。

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国家实行的联合政府的策略，在美苏对立愈益激烈并发展为冷战的新形势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里，让那些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与共产党相处在一个联合政府内，无论怎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既可能威胁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既定地位，又可能动摇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为了组建一个坚强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并确保苏联的安全带，东欧国家内部的多党联合政权的畸形局面必须结束。这是苏联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变为集团对抗政策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也是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需要。

苏联在东欧国家内改变联合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共产党的努力严格说来在冷战爆发前夕在某些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冷战爆发后这种努力扩大到了所有的东欧国家，并且所采用的手段更加坚决和严厉。

在冷战爆发之前国际形势由于美苏对立的加剧已日益紧张。受美苏关系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东欧国家联合政府内部各党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和激烈。为了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手段，对联合政府内非共产党政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114]

首先是组织一系列所谓“揭露反对共和反对民主的阴谋”

的活动。第一件“揭露”发生在匈牙利。1947 年初，为了在五国和约签署后消除共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小农党的威胁，由共产党掌握的秘密警察部门宣布揭露了“霍尔斯蒂分子反对共和阴谋”的案件。[115]2 月 26 日，也就是五国和约签订后半个月，小农党的总书记科瓦奇被捕。此外还逮捕了包括其他小农党领导人在内的“阴谋家”。小农党的另一位领导人、总理纳吉·费伦茨愤怒地对苏联方面说，“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检查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该党的党员正在受到迫害。”[116]经过这一“揭露”，小农党在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中的影响大为削弱。匈共领导人拉科西在 1947 年春天对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工作人员说，“在揭露反对共和阴谋之前，共产党人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 12 月上旬之前，我们党处于防御之中。现在可以说，我们正在进攻……揭露反对共和阴谋对我们帮助很大。反动分子以为，（五国）和约签订后，当苏军撤退时，他们的力量就能超过共产党。在揭露了反对共和阴谋后，反动派转入了守势。[117]拉科西建议要继续打击阴谋分子：“科瓦奇已经名誉扫地。现在该轮到纳吉·费伦茨了。”[118]1947 年 4 月 29 日，拉科西在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中表示要继续制造新的“阴谋”。他说，“我们重新提出了阴谋问题。很遗憾阴谋分子没有武器仓库，要不然我们可以更坚决地打击他们。我们需要某种轰动性的事情。不管怎样，我们要重新把阴谋问题提到第一位。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人民疲乏了……我们不想在群众面前扮演扰乱安宁的角色。”[119]5 月 28 日，匈牙利政府以纳吉涉嫌阴谋案件为名，要正在瑞士休假的纳吉回国受审，从而迫使纳吉不敢回国而提出辞职。[120]

在罗马尼亚，1947 年 7 月，国家农民党的领袖马纽被逮捕，随后以勾结美英特务的叛国罪被判处终身劳役（后改为终

身单独监禁)。同年秋天，当局开始揭露“‘历史党派’阴谋”。其锋芒直指共产党在民主政党联盟中以前的盟友——民族自由党[121]，迫使民族自由党人、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特特勒斯库辞职。

在保加利亚，1947 年夏天揭露了农民党领袖佩特科夫领导秘密军事组织和在国内建立“英美帝国主义者基地”的阴谋。[122]8 月 16 日，佩特科夫被判处死刑。

在捷克斯洛伐克，从 1947 年秋天起，共产党开始“逐个揭露一系列反国家的间谍破坏组织”的活动主要是针对斯洛伐克民主党的。该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被指控组织恐怖活动和怠工、图谋暗杀贝奈斯总统以及同亲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等有联系。[123]这些“揭露”的目的是为了改组由斯洛伐克民主党控制的斯洛伐克政府，使共产党达到与民主党的力量平衡。

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由于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优势地位，因此在 1947 和 1948 年这两国都没有发生如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的尖锐的国内政治斗争。但也不乏审讯反对派的案件。如 1947 年 9 月，南斯拉夫农民党的领袖约瓦诺维奇被指控勾结英美和试图在南斯拉夫发动叛乱而被判处 9 年徒刑。就在同月，在阿尔巴尼亚有 24 人被指控在英美的支持下阴谋推翻政府。[124]

其次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1948 年，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在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按照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都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合并。各国的右翼政党有的被解散，有的则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东欧各国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政党所采取的打击和镇压的措施得到了苏联的充分的政治和外交支持。苏军驻扎在东欧国家这一现实，为共产党创造了一种极为有利的活动空间和政治安

全感，对非共产党政党则形成了一种强大心理和政治威慑，同时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东欧国内的政治进程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时处于一种徒唤奈何干着急的窘境。正是由于苏联在东欧国家中强大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反共政党和势力在共产党的进攻和打击下迅速溃败。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西方国家发出的软弱的抗议被苏联置之不理。米科拉伊奇克曾经多次向苏联发出呼吁，抗议对波兰农民党的镇压。但都被苏联无情地驳回。在波兰选举前的 1946 年 10 月 3 日，米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说，“波兰农民党的会议被由波兰工人党组成的武装队伍……驱散……不仅把个别党员而且把整个农村支部一起逮捕。”[125] 苏联方面予以驳斥说，“据苏联政府掌握的可靠情报，波兰的选举准备工作是按照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进行的。”[126] 西方国家曾对东欧国家的选举结果和镇压反对派的措施提出怀疑和抗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对于苏联军事当局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罪逮捕匈牙利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美英都曾向苏联提出过抗议照会。但是苏联回答是，科瓦奇本人已经供认了反苏罪行。苏联驻匈使馆私下承认，“科瓦奇问题超出了匈牙利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的退却会影响苏联的威信，更不用说可能意味着匈牙利共产党的严重失败和出现反动派的反攻。’[127] 某种程度上，西方的抗议还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如西方对保加利亚农民党的首领佩特科夫案件的干预。[128]

通过揭露各种“阴谋”和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等手段和方法，到 1947 年下半年和 1948 年初期，大多数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牢固的统治地位。

但是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如果说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由多党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一党政权的转变进行得相对迅捷和顺利的话，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转变则显得较为困难和复杂。其主要原因，一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

阶级政党力量比较强大，二则是捷共一些领导人存在着通过议会活动来夺取政权的想法，对运用极端方法夺取政权显得优柔寡断，由此就使得捷的政权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在东欧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战前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居于东欧国家的前列，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民主传统也较为浓厚。战时（1943 年）捷总统贝奈斯就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建立了民族阵线。战争末期（1945 年 4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了捷民族阵线政府。总统仍为贝奈斯，总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副总理之一是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战后在 1946 年 5 月的大选中，捷共以获得 38% 的选票赢得了胜利，成为第一大党。随后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联合政府。

在战后初期建立的东欧国家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一般来说都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内，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却显得较为平衡。国家元首是非共产党人（贝奈斯），而总理则是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在 26 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人占 9 名，其余为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代表。另外还有 2 名无党派人士（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

对于二月事变以前捷共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苏联基本上是不满意的。苏联曾经多次派人前往布拉格观察和了解捷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捷共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并不占据优势，而且斗争的手段也不够坚决有力。此外，捷共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苏联的步伐也不是协调一致的。

1947 年下半年，当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已砸碎联合政府体制的枷锁而掌握全部政治权利时，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仍然在政治舞台上与其他政党同议国是。当斯大

林下令不得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时，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齐声应诺，只有捷共一人出头违抗禁令，说与会的决定已经公布，若要收回决定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结果惹得斯大林把捷共领导人召来莫斯科反复训斥后才使捷共领导人改变想法。[129]从当时捷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来看，捷共在联合政府里还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力。受其他政党的掣肘，它无法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而苏联之所以改变原来同意东欧国家参加会议的计划，其原因之一就是捷共没有完全掌握外交部门的权力（外交部长马萨里克是与国家社会党有联系的无党派人士），并且代表捷参加巴黎会议的捷驻法国大使又是一位非共产党的保守派人士。

1947 年 7 月，在斯大林的训斥和压力下捷撤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和拒绝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捷已开始被纳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苏联东欧集团之内，同时也预示着捷联合政府的体制即将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一开始就立场明确而又坚决，即支持、帮助和督促捷共与非共政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直到把它们从捷政治舞台上彻底地清除出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对捷国内斗争缺乏一项明确的对策，对非共政党的援助显得犹豫不决和软弱无力。

从这年夏天起，捷共开始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进攻。捷共依靠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和团体，组织各种集会、游行和警告性罢工，引导群众寻找敌人、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分子等，并且给反对派贴上“反革命的”、“反动的”和“破坏共和国”等标签。[130]而国家社会党则在同年 7 月召开秘密会议，筹划联合其他政党建立反共阵线。 9 月中旬，共产党控制的内务部宣布破获了斯洛伐克的“反国家的阴谋”。据称斯洛伐克的反共活动家卷入了这起阴谋。[131]

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着捷国内围绕着控制政权

所进行的激烈斗争。1947 年 6 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专程前往布拉格转交日丹诺夫就法共被赶出政府致多列士信函的复本。回国后古利亚耶夫向斯大林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国内局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严厉批评了捷共在与非共产党斗争中的软弱立场。报告说，“该国的政治形势的特征是各党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得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支持的反动分子相当活跃。他们的讲话明显地带有反共和反苏的特征，吹嘘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的并不重要的功劳，赞扬美国和英国民主的优点。”至于捷共的政策，报告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党“并不总是以应有的方式来估计反动政党的敌意宣传和大量言论所带来的危害”。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共产党人在国家机关甚至由他们领导的政府一些部中的数量很少。例如，在由诺赛克领导的内务部中，在 48 名部局和分部的领导人中，共产党只有 14 人，在财政部担任领导的 75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5 名共产党人，在其他政党掌握的部中情况就更坏了。如，在社会民主党人劳斯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里，131 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只有 13 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里 51 人中只有 7 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里只有 2名共产党人，他们甚至只是担任次要的职务。”而在国家机关的中下层部门里，“反动政党国家社会党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由此，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人主要的活动是集中于夺取议会中的多数，而同时却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摧毁反动派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和中产阶级等中的最重要的阵地。结果这支拥有良好的组织机构的百万人的党没有动员起来以应有的措施与人民民主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132]古利亚耶夫的报告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在随后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撰写的报告中对捷各部领导

人的党派属性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在捷 165 名各部门领导人中，只有 42 名共产党人，在更小的机构领导人中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比例是 858∶154。[133]

1947 年 8 月，由苏军中部集群政治部编写的一份有关捷军队情况的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右派政党——国家社会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和其他反动分子为消除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影响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表面上在政府会议上继续同共产党人保持合作并经常支持他们提出的建议，但他却受到右派政党的强烈影响，在军队中贯彻他们的政策。”在斯沃博达的同意下，解除了担任教育工作的共产党人军官和从事侦探工作的共产党人军官的职务。斯沃博达将军竭力与总统军事办公厅保持密切的合作，后者“事实上领导着军队，在军队中推行国家社会党人的路线，并让自己的人担任军队中的指挥职务”。[134]9 月 17 日，也就是情报局正要开会的时候，莫洛托夫在该报告中写了如下的批注：“致日丹诺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在波兰的会议上必须同捷克人谈谈这个问题。”[135]

尽管事实上捷共在国内斗争中并非无所作为，但是在 1947 年特别是下半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的那种尖锐的国际形势下，捷共竟然还热衷于议会活动而不采取坚决的斗争手段，难怪苏联要指责捷共“太温和”。

1947 年底，苏联驻捷使馆在一份关于捷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批评了捷共的行为。报告说，右派政党使共产党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孤立和针对共产党人的勾结的恐惧之中……共产党人害怕受到孤立，有时对右派政党作出过度的让步。例如，共产党人未能在学校中贯彻新法律，没有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进行清洗。[136]

同年 12 月，苏联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什梅拉莉在访问布拉

格后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中也对捷共提出了批评。她说，捷共领导人以不能破坏法律为借口，拒绝在国家机关中进行清洗，而是试图通过劝说非共产党的官员们加入捷共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化。“大多数党员和同情我们的无党派人士都认为，党与反动派斗争不力……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赛克、涅耶德雷和久里什——都对我说，‘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党应当承认，反对派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满足了他们的许多愿望’。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春天必须要拿起武器，否则他们就要拿起武器’。所有的党员都非常满意哥特瓦尔德同志今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当时他说：‘我们将转入进攻’。但是过了两星期后可以听到人们在说：‘话又说过了，很少有行动’。这样的情绪在老党员中是很强烈的。’[137]

鉴于捷共的表现，苏联对捷即将到来的国内选举感到担忧。苏联使馆的一份报告说：“共产党人在现在和1948年直到选举前还将更加困难，因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将愈益减少，并且通常来说，会反对他们……在斯洛伐克的情况将更加困难，在那里共产党完全是少数，民主党实际上决定着斯洛伐克内部生活的所有问题……现在所有政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选举前一直到群众中努力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就能获得应得的多数选票。”但是，“得到西方代表积极支持的该国内部的反动派仍然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右派政党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多数和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的所有条件。”[138]

捷共个别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如，1948年1月，捷共领导人之一的久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们的同样下场（意即捷共也将被赶出政府）。。[139]

而捷总统贝奈斯和其他非共产党政党以及西方国家对捷国内局势的发展却并不持乐观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已有所预料。例如，贝奈斯在 1947 年 9 月 10 日同国家社会党代表谈话时指出，“不能排除他们（共产党人）发动叛乱的企图。”[140]9 月 30 日，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莫斯科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兴趣，可能它竭力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尽快地完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141]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采取行动，非共产党政党和西方国家将如何动作？贝奈斯总统清楚地知道，单凭他和其他非共产党政党的力量是无法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进行抗争的。因此他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的援助。1947 年夏天他对回国的捷驻瑞典大使塔博尔斯基说，“许多事情取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有当苏联的推进被西方的武力显示所阻止，我们才能保全自己。”[142]贝奈斯确信：“如果西方表现出信心和坚强，那我就没有可担忧的。那样我们就能保持平衡。我想，西方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绥靖和牺牲别人最终是不会得到回报的。”[143]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贝奈斯总统的想法又错了。西方国家虽然不希望捷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内，但是，它们对捷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对策，也未打算给捷非共产党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早在 6月 2 日议员霍拉就曾援引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的话说：“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共产党发动政变，西方将怎么办？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指望我们会给超过道义援助的东西。”[144]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47 年夏末，捷国内发生的严重旱灾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政党之间的斗争。非共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指责共产党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对苏联和苏捷关系提出批评。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反对派政党分别

向苏联和美国发出了请求援助的呼吁。对此苏联和美国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年秋天，苏联就向捷运来了谷物。苏联的援助增强了因它强令捷拒绝马歇尔计划而下降的威望。[145]相反美国却袖手旁观，拒绝援助，并且坐待局势恶化。[146]苏联和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对捷国内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大肆宣传，同时攻击美国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47]而具有反共倾向的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则十分沮丧地说，“华盛顿和伦敦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都不理解，它们不答应给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为严重的错误。”[148]

当 9 月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擂响了进攻的战鼓后，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就曾表示有必要在近期内对反对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149]同年 11 月，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对非共产党政党实行打击的几种方案：（1）在未来的选举中争取获得 51% 的多数选票（上次大选得票率为 38%），从而可以使捷共单独组建政府而不需要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2）促使非共产党政党发生分裂，使它们摆脱右翼领导人的控制，从而使它们驯服于共产党。（3）改变民族阵线的现行结构（意味着共产党占支配地位）。[150]但在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力量较为均衡的情况下要获得一半以上的多数选票，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且全会认为，捷共的对手将会在 1948 年 5 月的选举前发动政变。因此，第一种方案自然就被否定了。最后会议在后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行动纲领，即：依靠非共产党政党内部的左翼，团结国内所有的左派力量，孤立民族阵线中各党的“反动派”。[151]与此同时，非共政党也在积极准备夺取政权。 11 月，在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中间派人士劳斯曼取代左翼领导人费林格担任党的主席。 12 月底，劳斯曼与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举

行秘密会议，表示要联合起来为“捍卫议会民主、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斗争。[152]

此时的布拉格，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斗争气氛越来越紧张。为了寻求支持和削弱对方，双方都在政府中采取相互对立的行动和措施。捷共领导的国内贸易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分别提出了取消了纺织品私人贸易、合并所有银行以加强对全国的财政控制和进行新的土地改革。这些措施有助于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并让其他反对的政党站到对立面上去。国家社会党为了扩大其支持的基础，建议大幅增加公务员的薪水，捷共则竭力反对。1948 年 2 月 10 日，该议案在政府会议上获得通过，使共产党遭到了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的失败。[153]这自然又使联合政府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

三天后，2 月 13 日，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在政府会议上，指责共产党的内务部长诺赛克[154]解除布拉格地区的 8 名高级警官的职务并代之以共产党人。总理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事情。于是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联合起来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责成内务部长撤消调换警官的命令并于下次的 2 月 17 日的会议上汇报执行决议的情况。但是内务部长拒绝执行决议。双方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

捷共按照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各党协调行动的规定，向苏联驻情报局代表尤金通报了捷国内的最新事态。而国家社会党等政党的领导人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捷使馆频繁往来。2 月 17 日，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 13 日会议关于撤消调换警官的决议。会议再次不欢而散。

2 月 18 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谋求支持。总统的鼓励是：“你们可以指靠我。”[155]而捷共则到人

民中间寻求支持。当天晚上，捷共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宣言，谴责资产阶级政党制造政府危机和企图夺取政权，号召全体劳动人民粉碎反动派的阴谋。

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已经使捷共领导人认识到采取非议会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2月17日，苏联驻捷临时代办博德洛夫根据他同哥特瓦尔德的谈话向莫斯科发回一份报告。报告说，右派政党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孤立了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人作出的一些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要通过共产党人拟定的法律和新宪法是不现实的。报告强调，在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后，哥特瓦尔德没有排除右派政党在贝奈斯的支持下有可能采取对现政府表示不信任以组建新内阁的步骤。哥特瓦尔德强调，如果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的措施，也就是在共产党人掌握的内务部和大多数部队的支持下夺取国家的全部权力，彻底镇压反动派”。报告指出，在哥特瓦尔德的计划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筹备并于2月22日召开工厂委员会的全国会议，会上“将提出并通过工人对政府的要求。之后还计划召开农民会议”。[156]

在捷局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回国休假的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和苏联前驻捷大使、副外长佐林于2月19日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下机后立即宣布美国将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157]他对记者表示，他坚信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密切联系。[158]

佐林到达后出言十分谨慎，称他来捷的使命是：监督苏联向捷运送的小麦的交货和参加即将举行的捷苏友协会议。[159]接着他从机场径直去探望正在患病的捷外长马萨里克。佐林先是以温和的语调安慰马萨里克，说斯大林完全信任他。同时要求他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佐林坦言，“我们对你们国家发生

的事情非常不安，所以我们不能漠然处置。”[160] 佐林在捷交通部长那里的谈话更为露骨，他对部长秘书说，捷政府危机是非常严重的，苏联无法理解贝奈斯总统的立场，要知道他事实上已经在对抗“人民的意志”。佐林感到惊奇的是，贝奈斯总统对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不理解，即苏联是站在哥特瓦尔德和捷共一边的。[161]

随后，佐林会见了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据佐林自己说，他“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劝告：要更加强硬，不要对右派让步，不要动摇，他（哥特瓦尔德）无疑是领会了”。。[162]

捷国内的局势继续在恶化。第二天（2 月 20 日），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三党 12 名部长拒绝出席政府会议并向贝奈斯总统提交了辞呈，遂引起了捷政府危机。

佐林立刻与哥特瓦尔德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举行了会谈。佐林敦促他们果断地行动，但是后者却表现出犹豫的态度。佐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要捷共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的条文。”但是，捷克人就是“非常害怕”这一点。佐林接着说，“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去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更坚定的行动，但是，想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正常发展的想法仍然笼罩着他。”[163]

哥特瓦尔德希望苏联方面能采取强硬的行动，出动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以对右派政党产生影响。佐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哥特瓦尔德给他看了一份捷特工搞到的情报。情报说，一个加拿大特工说美国统治集团试图在发生“共产党人叛

乱”时把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我回答说，我认为，这些说法缺乏某些可信的根据，目的是为了吓唬他们（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时表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军部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界推进，那就好了（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发生影响）。哥特瓦尔德要求把这一点告诉莫斯科，我答应会转达。”[164]这种要让苏联在危机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想法使佐林认为，“哥特瓦尔德竭力想避免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采取某些坚决的措施。”[165]

为此，佐林在报告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向捷领导人施加压力：“如果莫斯科通过党的途径指示哥特瓦尔德采取坚决的行动，不要沉湎于议会幻想”，那是有益的。二是通过媒体公开表明苏联对捷政府危机的立场：“根据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表明我们对所有事情的态度。所以，如果莫斯科电台和报刊（首先是《真理报》）表达我们对事情的观点并且以此支持朋友和揭露右派的宣传，那就好了。”[166]莫斯科对此迅速地作出了回答。莫洛托夫告诉佐林：“《真理报》将在2月22日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表评论。关于让驻德国和奥地利苏军出动的建议和通过党的途径向哥特瓦尔德下达指示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还命令佐林在接到莫斯科指示前不要去会见贝奈斯总统。[167]

但是不管怎样，正是在同佐林谈话后，哥特瓦尔德等捷共领导人不再迟疑彷徨，而是迅速地行动起来。2月20日深夜，电台发表了《捷共主席团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告人民书》严厉谴责资产阶级部长们以辞职为手段制造政府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在以哥特瓦尔德为中心的民族阵线周围。

2月21日，捷共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组织了由包括所有大企业和煤矿的1000名代表参加的集会。与此同时，捷共还发动了劳动群众致电致函贝奈斯总统的运动，要求他接受 12

位部长的辞呈。当日，哥特瓦尔德同贝奈斯举行了言辞激烈的谈判。当贝奈斯说“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威胁不仅要组织总罢工，而且要让工人民警走上布拉格街头。他还意味深长地对贝奈斯说，“这里还有苏联呢！”[168]看来，哥特瓦尔德是确信苏联会满足他提出的向捷边界调动苏军的要求的。

2月22日，哥特瓦尔德在捷苏友好协会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现今的政府危机就是反动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整个发展方向、改变迄今为止我们国家所奉行的所有政策，从而改变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废除我们对盟国义务的全部试图……我们决不允许动摇和破坏我们同苏联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联盟。正是现在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同苏联联系在一起。”“……任何改变我们新制度和恢复慕尼黑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都是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和阴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诚实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是不存在动摇的……我们通过同我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苏联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选择了自由、独立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169]

在捷国内政局风紧云急的时刻，为了配合佐林在布拉格的使命，苏联《真理报》于2月22日发表了一篇谴责捷国内外反对派的措词严厉的文章。《真理报》写道，“反动的部长们辞职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反对派试图阻止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现届政府的纲领。三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集团策划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的阴谋。这个集团根据外部的指示行事，引发了危机，以它的不负责的行为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威胁了它的安宁。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动部长们的辞职意图就在于此。国际反动派试图假借他们之手分裂人民民主国家的队伍。对于这样的反人民

的政策不应当进行妥协。”[170]

三党部长辞职的目的是为了让总统解散政府并提前举行大选。按照捷宪法规定，只有在多数部长辞职的情况下，总统才能解散政府并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反之，只能以新的人选来代替辞职的部长。当时捷政府成员共有 26 名，12 名部长辞职尚构不成反对的多数。这样社会民主党的 3 名部长和 2 名无党派人士部长是否加入到辞职的行列中去就是决定本届政府存亡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事实证明，三党的算盘是完全打错了。第一，在 2 月 13 日的政府会议上曾经与三党一起投票通过要求共产党内务部长撤消调换警官命令决议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政府危机期间，先是持两边摆平的“中立”态度，而后实际上采取有利于捷共的立场。 2 月 23 日，佐林在会见社会民主党主席劳斯曼时非常关切地询问该党是否支持由哥特瓦尔德组成的新政府。[171]佐林的意图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当天，社会民主党在劳斯曼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公开支持捷共的左翼活动家开除出党，同时不让本党的部长辞职以免使捷共失望。会议通过的决议希望“争取在原来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恢复政府”。[172]此外，2 名无党派部长斯沃博达和马萨里克也没有辞职。第二，捷共并没有打算通过提前举行大选在议会中与其他政党一决雌雄，而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捷共走的是直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非常实际的道路。第三，三党既无勇气也没力量在议会外进行斗争。[173]

新的史料表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对捷社会民主党立场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2 月 20 日，波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要求波社会党中央执委会立即派团去布拉格以设法改变捷社会民主党对捷共的立场。 2 月 21 日，波社会党代表团抵达布拉格。代表团首先会见了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和多兰斯基。然后又会见了捷社会民主党主席劳斯曼，并向他建议召开一次

秘密联席会议以讨论捷国内局势。在 22 日召开的会议上，波代表团告诉捷社会民主党，“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合适的，“坐在街垒上面”是危险的。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在布拉格期间与捷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它通报捷社会民主党领导内部的情况。波代表团的活动成功地削弱了此前一周里也在布拉格的法国社会党人吉–莫勒的影响（他要求捷社会民主党按照第三种力量的方式行事）。只是在哥特瓦尔德告知贝奈斯将接受部长们的辞呈和即将组成新政府后，代表团才回到华沙。代表团回国后，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向苏联驻波使馆提交了一份关于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情况的报告（这表明，代表团的访问与苏联是有联系的）。报告说，代表团成功地“在右派和中派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把动摇分子拉到了‘左派’这里”。代表团对捷社会民主党施加影响，以便“打击右派和保障别的党接受捷共的建议”。“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了消除贝奈斯的抵抗，必须让劳斯曼领导的捷社会民主党同捷共和哥特瓦尔德携起手来。’[174]

23 日，哥特瓦尔德在内务部长诺赛克陪同下再次会见贝奈斯总统，要求他接受 12 名部长的辞呈。贝奈斯则反过来要求哥特瓦尔德与三党的部长们会谈，但遭到拒绝。哥特瓦尔德对贝奈斯说，他准备递交一份新内阁候选人名单，新内阁将在“清除了反对派的”、“新生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建立。[175]当天晚上，一边是 1 万多名大学生高呼着“贝奈斯总统万岁”的口号在布拉格街头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另一边则是共产党在市政厅主持召开了各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了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参加了会议，公开表明他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共产党人。

24 日中午 12 时，工厂代表大会组织全国总罢工，参加者达 250 万之众。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占领了国家社会党中

央的大楼。25 日，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局势，政权转到了由他们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手中。非共产党政党的机关均被占领，这些政党的领导发生了分裂并重建了党的中央机构。当天下午，四面楚歌的贝奈斯总统已经无力抗争，他同意 12 名部长辞职并且签署了哥特瓦尔德新政府的名单。 27 日，新政府宣誓就职。在新政府成员中虽然仍有其他政党的代表，但已经不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地位已坚如磐石。

捷二月事变发生后，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捷代表曾在联合国控告苏联破坏了捷的独立。智利和阿根廷等国也要求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但这些努力已经无法扭转捷国内政局的发展。同年 6 月，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资产阶级民主最后一点残余的象征被铲除。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对捷二月事件的反应并没有超越美苏既定的势力范围的原则。一方面，美国反对并试图阻挠捷局势朝着共产党建立一党政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西欧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承认捷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而对捷局势的发展不愿采取一种可能导致美苏直接对抗甚至冲突的干预立场。 2 月 26 日，美英法三国对捷二月事变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政府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发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诚于自由事业。”[176] 这项声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其一，声明谴责的对象是事件及其结果，而与事

件有关的捷共和苏联概未提及。其二，声明除了空泛的谴责外并未表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它所表露的更多的是无奈。倒是三国的社会舆论对捷二月事变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2月 28日，捷驻美国使馆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报刊和政治家们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揭露新的慕尼黑阴谋和苏联扩张的威胁，声称美国面临着忧郁的将来。”“人们再次批评国务院没有明确的对外政策路线。”[177]3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的纪念马萨里克[178]的大会上人们指出：“世界再次处于重大决定的十字路口。就像在制造慕尼黑阴谋的不幸日子里那样，捷克斯洛伐克的牺牲再次敲响了警钟。”[179]在巴黎，有舆论批评西方三国的联合声明说，“这些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变提出抗议时没有任何幻想，他们的声明将会产生某些后果。”还有人哀叹：“我们大家都是慕尼黑分子。”[180]

在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对捷二月事变的立场逐渐趋向强硬。 3 月 17 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抨击苏联及其代理人“摧毁了中东欧一些国家的独立和民主的特性”。[181]但是，从后来的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的报告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捷二月事变所持的消极立场。 4 月 30 日，斯坦哈特在关于捷二月事变的长篇分析报告中断言，“显然，1948 年 2 月那样的危机早在 1943 年 12 月 12 日捷苏友好和军事合作条约生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他并且从捷克民族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分析说，捷克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捷克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逆来顺受的历史，它特别珍惜生命，不愿为自由进行枉然的斗争。这样他就把捷二月危机的原因和结果归咎于捷国内没有决心反对内部独裁和反对外部对独裁支持的力量。[182]美国大使甚至说，“没有证据证明苏军在捷边境进行集结……没有苏联进行干预的直接证据。甚至 2 月 19 日飞来布拉格的苏联大使佐林的活动也不能

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干预。”[183]斯坦哈特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二月事变与1943年的苏捷条约存在着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承认捷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所以，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缩小与捷的贸易关系；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84]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无意采取过激的行动同苏联在捷进行直接的对抗，但是他们要防止捷二月事变对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和以捷事变为契机建立统一的西欧的意图是十分明白的。1948年3月初，法国外长皮杜尔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加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185]3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在四、五个星期内，美国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国际危机，美国应当准备采取“比抗议信更坚定的行动，如果俄国威胁意大利、法国、希腊或者土耳其的话。”3月17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迅速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拨款并加强西方军事联盟。[186]3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在参议院宣读了修改后的军事纲领。[187]4月18日，戴高乐在法兰西民族统一大会上要求“建立一个以法国同美国的合作为物质和道义基础的西欧”。他认为，这将能为西欧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188]5月17日，法国总统阿里奥尔更进一步表示，“如果不能建立统一的欧洲，那么我们至少要加强欧洲的这一部分（即西欧）的统一。”[189]

在具有传统中立主义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平主义的气息因二月事件而荡然无存。挪威、瑞典和丹麦，“对俄国的好感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挪威和瑞典首相公开攻击本国议会中的共产党人。丹麦电台甚至要求公民向警察局报告任何企图夺取政权的可疑行动。[190]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苏联

东欧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促使美国加快了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步骤和推动西欧国家联合的进程，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美苏冷战的局面。不久之后，美国与西欧国家商议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和由此引起的苏联封锁柏林，都与捷二月事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变，就其意义来说，标志着在东欧国家最终完成了由多党联合政权向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历史性转变。到 1948 年初期，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清除了与共产党对立的政党和势力，并把它们逐出了政治舞台。这样，战后初期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产生的多党联合政府的体制，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终于走完了它的短暂的历史之路而让位于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随后东欧各国相继走上了苏维埃化的道路，通过斯大林方式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实际上被纳入了苏联的发展模式，

从战后初期的多党联合体制到 1948 年初期的共产党一党政权，这种转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对立和斗争在东欧国家的反映和折射。在政治上分别对美苏两国具有一定依附性的东欧各种政党之间的斗争逃脱不了美苏关系的制约。在美苏合作的条件下它们可以在多党联合政府的体制下共存。在美苏关系破裂并且发生冷战的形势下，它们也就无法继续共处，而必然要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苏联而言，东欧是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东欧国家确立共产党的一党政权并实行苏维埃化，就是那种适应冷战需要的打扫自己后院的事情。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以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进行对抗和斗争。

二　加强集团内部的统一与规范各党各国的行动

1947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初期，东欧国家联合政府体制的崩溃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确立为苏联东欧集团的建立廓清了道路。对于苏联来说，在打倒和清除了东欧各国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增强集团内部的统一和联系。具体而言就是：整顿和统一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思想，全面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以派驻顾问和专家的形式援助东欧各国并对其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进行监视和控制，统一和规范各党各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政策和行动。

（一）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统一各党的政治思想。1947 年下半年和 1948 年上半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曾经多次撰写关于东欧各党情况的报告，以仲裁者和法官的口吻揭露和批评各党及其领导人所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报告指责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政策具有反苏倾向。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报告认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竭力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经常脱离正确的路线，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大多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191]

关于波兰工人党。报告认为，在“波兰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它们表现为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波兰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责为“使波兰苏维埃化”。。[192]报告严厉批评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工人党有关波兰道路的特殊性和认为波兰可以避免像俄国那样的流血革命、避免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观点。报告指出，绝对不正确的是：哥穆尔卡认为，与苏联不同，政权执行机关和法律机关的职能应当予以区分，国家政权应当建立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上。[193]“在这些关于波兰的发展与苏联根本不同的论调基础上就产生了应能证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势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报告认为，南共领导人“对苏联不友好”，这表现在，南共领导人“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和苏军在解放南斯拉夫和战后建设中的作用……铁托在公开讲话中无视苏联在团结进步和民主力量以及同英美反对派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195]报告认为，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铁托竟然说，“巴尔干应当同苏联一起成为指出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196]铁托“实际上是一个人领导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使他在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产生了领袖主义、自尊和自负”。[197]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报告指责捷共领导人“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198]赞同与贝奈斯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采取共同的立场来解决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所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国家政策的实质就是承认有必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捷克国家和斯洛伐克国家’”。捷共领导“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

益’。[199]报告尖锐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和平道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报告认为，“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200]

报告批评上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缺乏农村政策的远景规划，仅仅采取一些“实际上不触动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局部措施’。[201]报告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低估富农的消极作用和“滑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放任自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202]波兰工人党则“不要集体农庄”，放弃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提出自己的合作社计划。[203]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削弱了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作用和使工农联盟的前景变得暗淡。[204]

报告还严厉批评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在1947—1948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进程中忽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建党原则。报告认为，波兰工人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上使波兰工人党的思想适应于波兰社会党的思想”。作者认为，“波兰工人党在靠近波兰社会党的过程中把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优势让给了它……波兰工人党提出的这种思想使得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观点很快就融合了……现在当统一的波兰工人党快要建立的时候，‘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危险性还会增大……”[20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指责为“以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对待党的建设，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建设原则”，党变成了“仅仅适应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206]

上述报告的内容表明，在冷战已经开始和两个对立集团正在形成的形势下，苏联不能容忍东欧各党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等“异端邪说”的存在。它必须纠正东欧各

党的政治思想中的混乱状态，包括在组织上撤换和清洗个别党的领导人。后来被苏联认为有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东欧国家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如哥穆尔卡、斯兰斯基、科斯托夫、古萨克、拉伊克和巴特拉什卡等人都遭到清洗。

（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加强联共（布）与东欧国家各党之间在政策和行动方面的联系和协调，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和建立常设编辑部。在情报局其他组织机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机关刊物不仅仅是情报局的思想理论宣传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协调各党政策和行动的具体工具和手段。

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并将其编辑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是在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公报中确定的。但是有关组建编辑部和出版刊物的具体事宜在公报中没有提及。大会通过的哥穆尔卡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指出，“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由情报局任命”，并且建议委托“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所在国的党中央”组建编辑部作为一种实际机构。报告还说，编辑部的人选最后将由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予以确定。这次会议将于 1947 年 11 月底或者不晚于 12 月 15 日的任何时候召开。[207]虽然报告委托联共（布）和南共共同承担组建编辑部的任务，但是它一开始就被联共（布）所垄断和主宰。

1947 年 10月 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工作人员》的决议。决议规定，将派尤金率领一些苏联代表去即将组建的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由尤金担任情报局刊物的主编。决议还责成尤金等人同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在 5 天内“向中央”（实际是政治局）提出“关于刊物计划和纲领的意见”，具体地说，是关于头三、四期刊物的计

划。[208]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舍夫利亚金和帕什科夫在到达南斯拉夫后即把苏联关于由尤金担任情报局刊物主编的决定通知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并就副主编人选征求他们的意见。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和吉拉斯提议，一名副主编由南斯拉夫选派，另一名让法共担任。[209]之后，日丹诺夫和尤金带着政治局决议和南斯拉夫的建议前往索契，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汇报情况。他们在索契呆了 5 天。斯大林同他们一起审议了刊物的方向和性质、编辑部干部配备和物质基地的问题，并就刊物的所有基本问题包括刊物的类型和名称等作了指示。[210]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政治局于 10 月 16 日通过了《关于驻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情报局刊物的纲领、制度和头几期刊物的计划》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尤金在将于 10 月底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情报局成员国各党代表会议上活动纲领的草案。 10 月 24 日和 25 日，以尤金为首的一个 16 人的工作组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负责人格里戈良一行 3 人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211]

10 月底，情报局各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秘密举行。[212]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是：联共（布）代表尤金，匈共是列瓦，罗共是瓦西里金，保共是波普托莫夫，捷共是格明杰尔，南共是齐赫尔，波党是德卢斯基，法共是艾特若斯，意共是科隆比。

会议决定尤金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四名副主编是格里戈良（联共[布]），齐赫尔（南共），艾特若斯（法共——负责法文版），克拉米诺夫（联共［布］——负责英文版）。责任秘书舒米洛夫（联共［布］）。编辑部下属各部的负责人是：政治部主任尤金（兼），各党工作经验交流部主任叶菲莫夫（联共［布］），理论部主任斯特鲁奇科夫（联共［布］），时事部主任舍夫利亚金（联共［布］），民主运动论述部主任戈尔希奇（南共）。除

了主编是联共（布）代表外，在四名副主编中联共（布）代表又占了二名。各部主任除了南共一名外，全部都是联共（布）代表。这就是说，在这份代表九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苏联代表占有绝对的优势。[213]

按照哥穆尔卡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将在 1947 年 11 月底或 12 月 15 日之前的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编辑部人选。因此这次 10 月底的秘密会议设立的编辑部只是临时性质的，它的任务是出版头三期的刊物。联共（布）代表格里戈良在会上谈到，要在刊物上发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材料和揭露美国政策的文章以及其他宣传性文章。会议确定了刊物的每期发行量、各党的刊物分配额和出版费用的分摊。[214]

会议规定，与会各党中央应委托本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作为通讯员和撰稿人与编辑部保持经常合作；还应任命一名常任情报员为每期刊物寄送有关本党政治生活和党的活动的报导，各党中央应当选派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来负责这项工作。[215]

会议结束后，11 月中旬，尤金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所要刊登文章的选题计划寄给了情报局各成员国的党中央，要求得知：“你们的撰稿人能够写哪些选题的文章？什么时候完成？”64 个选题基本上是情报局成立大会文件中所论述的主题发展，包括“民主力量”反对西欧、亚洲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角度出发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作用的“理论问题”等。有的还个别地予以定题。如尤金向季米特洛夫约题有：“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性质”“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构”“论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216]

12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 1 月上旬召开由各个共产党中央两名代表参加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

议[217]以解决建立情报局刊物常设编辑部的专门问题。”决定说，“我们组建常设编辑部的计划是：建立由各党九名代表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设一名主编、三名副主编和一名责任秘书。”尤金和格里戈良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驻情报局的代表。苏联方面对刊物所承担的费用由原来的 40%提高到 50%。[218]

1948 年 1 月 18 日，共产党情报局召开了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确定了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常设编辑部。主编为尤金，三名副主编是格里戈良、齐赫尔（南共）和艾特若斯（法共）。责任秘书舒米洛夫。编委会由代表各党的 12 名成员组成，除了上述 5 人外，他们是：南共的戈尔希奇、波党的芬克尔施泰因、罗共的布伊卡、意共的帕耶塔[219]、匈共的比罗、捷共的沃达–佩克萨和保共的哈拉切夫。[220]刊物的各部主任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由波党代表芬克尔施泰因接替了尤金所兼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各党所承担的费用也作了些调整。[221]

此外，为了保持与情报局各党的联系，尤金还在 1948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他说，编辑部需要在贝尔格莱德修建一个无线电通讯中心，以便同“所有参加会议的各党和联共（布）中央”建立秘密的双向无线电通讯。他建议在编委会上讨论这一计划，使所有各党的代表熟悉该计划，然后以主编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该计划。如果莫斯科作出肯定的决定，还要规定各党中央委员会也要同意接受。[222]后来尤金又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负责人巴拉诺夫一起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写了一份报告，重申应当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以同情报局各党保持联系（但没有包括法共和意共）。报告说，捷、波、匈、保和罗共中央“同意与情报局编辑部建立双边秘密联系”。“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同意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中心，并委托南内务部部长兰

科维奇同志监督这项工作。”报告还附有随后将交政治局批准的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草案。[223]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创办和常设编辑部的设立是建立各党之间联系和协调的非常重要的组织步骤。

其次是加强集团内部的国家间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1948 年 2 月 4 日、18 日和 3 月 18 日，苏联分别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些以前的战败国现在的苏联东欧集团的成员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此之前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于 1943 年 12 月、与波兰和南斯拉夫于 1945 年 4 月已经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些条约虽然是战争时期或者战争后期签订的，但是在联合政府体制崩溃和冷战爆发的新的条件下，它们已经具有了全新的互助合作意义。这些条约大多规定缔约国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同盟、联合、行动或措施；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互相协商；如果出现侵略，双方立即相互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除了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外，从 1947—1949 年，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也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些条约的缔结不仅使苏联与东欧国家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并且也构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互保障的安全体系。1949 年 1 月，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224]这样由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联结起来的苏联东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它成为马歇尔计划的直接对立物。至此，一个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已经基本形成。[225]

（三）向东欧国家派遣苏联顾问和专家，在援助和指导东欧国家的同时，监视和控制它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早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顾问在东欧某些国家就已经开始

出现了。只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大多是短期性质的，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就诸如边防、海关、警察和内务部队、保卫和密码制度以及重要的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向驻在国提供咨询性意见。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随着东欧国家完成了向一党制政权的转换和被纳入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了苏联东欧集团后，规范化的苏联顾问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般来说，苏联顾问可分为两种类别，即军事顾问和文职顾问。前者是在驻在国的军事、安全和保卫等强力部门司职。后者则派往驻在国的经济部门工作。通常情况下，苏联顾问和专家是根据受援国的请求派往的。他们大多数是苏联各部门的精英人物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内务部的资深军官。

正规性地向东欧国家派遣苏联军事顾问是从 1949 年开始的。其重点是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国家安全机构和边防部队。1949 年秋天，在苏联国家安全部属下建立了一个向东欧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援助的专门局。据统计，同期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顾问分别为 29、13、11 和 8 人。[226]1950 年 9 月，共有 21 名苏联军事顾问在阿尔巴尼亚工作。[227]1950—1951 年，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或者增加了军事顾问的数量或者延长了他们的任期。情况比较特殊的是波兰。不仅苏联安全部和军事侦探机关的顾问早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就已经在那里活动了，而且苏联军官直接在波军中充任指挥官。以后，苏联军官在波军中的比例虽然降低了（1949 年苏联军官的比例是 6%，1952 年降为 2%），但是他们在波军中所担任的职务却越来越高：从师级到国防部长（如罗科索夫斯基）。[228]1953 年，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要求，波军中的苏联军官编制改编为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的顾问制度。同年，苏联在

波兰的军事顾问已达150名（其中18人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229]而在南斯拉夫，由于苏南矛盾的发展和两国关系恶化，1948年3月，苏联撤走了在南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

苏联军事顾问在驻在国并非仅仅提供一些业务咨询和建议。根据1951年通过的《顾问训令》的规定，苏联军事顾问在驻在国的权限和义务主要是：以口头形式向驻在国的安全和警察机构提供帮助；在苏联安全部批准的情况下，向驻在国领导人通报关于安全机构工作的情况。苏联顾问不能撤换地方工作人员并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们，禁止私自招募间谍和审讯被逮捕者，禁止参与驻在国领导人的决策工作，禁止对驻在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提出建议。[230]事实上，除了正常的业务外，他们还担负着监视驻在国政治变化情况和定期向莫斯科报告驻在国领导人的情况（包括领导人的情绪、计划和分歧甚至个别领导人的身体状况等）。在有些国家，苏联军事顾问还参与甚至策划当地的政治案件和政治清洗。例如，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和195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件”。[231]又如，1949年9月和11月，经斯大林同意，苏联分别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派遣了苏联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以帮助他们调查党内的间谍网和可疑的党员。[232]根据波兰领导人贝鲁特和罗科索夫斯基的请求，斯大林还决定让驻波兰的苏联军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登记入册成为该党党员，使他们有权“参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生活”。[233]

系统的文职顾问制度则形成于1952年。这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两项标准化的文件：《关于改善对在人民民主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领导的决定》及其附件《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机关和企业

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工作条例》。《决定》规定，在苏联驻东欧国家的使馆里设立由大使领导的经济参赞，对顾问实行政治领导是大使的基本职责之一。在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递交的年度报告中，有关顾问活动的章节是必不可少的。而苏联顾问和专家执行生产技术任务则归把他们派遣出国的机构管理。在《条例》中，苏联顾问的职责具体是：熟悉驻在国的党的政策；作为地方领导者的被咨询者（顾问）在实施具体措施时提供帮助；在提出和解决组织问题和实际问题时“表现出主动性”。苏联顾问无权干预地方领导人作出最终决定，无权直接参加为实施这些决议的实际活动。顾问可以就驻在国的内外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必须取得大使或者（由大使委托的）经济参赞的同意。参赞在发生争端时可以向驻在国最高机关发出呼吁，但是必须与大使协商一致。《决定》和《条例》规定顾问的作用是被咨询者，禁止他们实际参与执行某项具体的任务，确定了垂直的职业关系和从属性。[234]

文职顾问的序列是：总顾问、高级顾问、顾问和专家。总顾问在政府和一些重要的部里工作；高级顾问和顾问是在部、某些政府部门、大型的建筑工程和企业里工作；按照科学技术援助协定派遣的专家则归顾问领导。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则负责对顾问制度进行最高的政治监督。。[235]

从苏联方面来说，向东欧国家派遣顾问不仅是要满足它们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对专业人才的需要，而且也是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增强集团内部的整体力量和监督乃至控制驻在国各种事务的重要手段。而就东欧国家而言，首先，在新政权草创时期，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在一些强力部门引进苏联军事顾问。其次，由于专业干部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经济建设中聘请苏联文职顾问和专家是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办法。再次，从政治角度看，在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

后，接受苏联顾问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不言自明的。

（四）在对外关系方面规范各党的行动和统一各党的步调。具体而言，就是东欧各国必须与苏联保持一致，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必须与苏联事先进行协商并征得它的同意，不能擅自行事，更不能在国际事务中撇开苏联独自扮演积极的角色。

还在情报局成立之前苏联就已经试图规范各党的行动了。1947 年 5 月初，法共由于在议会中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而被逐出政府。6 月 2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函法共领导人多列士，指责法共的行动没有同苏联进行商量，是“完全出乎联共（布）中央的意料之外的”，要求多列士就法共的情况和法共的路线向苏联进行“通报”。。[236]同年 7 月底和 8 月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宣布已经就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取得了协议。但是苏联认为在 1947 年 2 月签订的五国和约（内含对保和约）于 9 月 15 日生效之前，南保两国签订条约是不合适的。在给这两国领导人的密电中，斯大林严词斥责他们的行动是“匆忙”和“错误”的，并强调他们“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协商”。[237]

1948 年 1 月 17 日，季米特洛夫在与记者谈话时说，从长远目标来说，将要建立一个不仅是巴尔干半岛而且还将是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盟。该谈话于 1 月 20 日在保加利亚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上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真理报》也于 23 日进行了转载。当时人们都认为这项计划是由苏联制定并且得到斯大林批准的。但其实苏联并不赞同建立那种可能使苏联无法驾驭的地区性联盟。而且苏联更反对这种事先没有征得苏联同意的擅自行动。1 月 24 日斯大林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密电中以激烈的口吻批评了他的谈话。电文说，季米特洛夫有关“人民民主国家联邦或者联盟”的讲话，“在莫斯科的朋友看来是有害的，它损

害了人民民主国家并且有利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这些国家”。[238]1 月 28 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称编辑部从来没有赞同季米特洛夫关于联邦问题的观点，相反，它认为这种联邦是“可疑的和臆造的”。 2 月 10 日，在与南共和保共领导人的秘密会谈中斯大林再次重申了他的批评。他认为，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使西方有可能嚷嚷东欧国家要建立集团甚至联盟，让“美国反动派”把它当做定于 1948 年秋天进行的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时的王牌。[239]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对有关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为东欧国家规定了统一的立场。希共领导人在这之前曾经与苏联讨论过建立希腊临时政府的问题。按照计划，希腊临时政府将在该国北部革命地区建立，革命的北部将得到东欧首先是与希腊毗邻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然后依靠它们的支持和由苏联通过它们提供的援助，革命的北方将在进一步的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向希腊其他地区发展。[240]但是由于担心在实行这一计划时苏联或者东欧国家在希腊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冲突，斯大林最终决定对此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第一，与希腊接壤的国家（指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应当最后承认希腊临时革命政府，而让其他“离得远点”的国家首先予以承认。第二，他怀疑希腊民主军能否取得军事胜利。因此他主张缩减希腊民主军开展的武装斗争，停止从南、阿、保领土上向希腊民主军提供援助。[241]同年 12 月，斯大林在与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丘瓦欣谈话时，指责南斯拉夫企图把军队引进阿领土并将其部署在阿希边界是“一种挑衅”。斯大林要求尽快解决不断遭到失败的希腊游击队的问题。他指示丘瓦欣，让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协调行动，把希腊游击队及其家属通过水路转运苏联。[242]

总之，特别是在冷战爆发后，东欧各党的政治思想必须统

一，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必须接受苏联的监视和指导，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要同苏联进行事先协商并且遵守苏联制定的规范和规则。而南斯拉夫正是由于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表现出过多的擅自行动的独立倾向，因而遭到了苏联残酷无情的讨伐。

三　苏南冲突：讨伐异己

苏南冲突是苏联领导人为了适应冷战的需要而对集团内部所进行的一次整顿和整肃。显然，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只有以它为首的苏联东欧集团内部首先达到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和行动上的步调一致，才能在冷战中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有力的对抗和斗争，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苏联的安全带。

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 1948 年公开冲突之前一直具有一种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关系不同的特点，即，两国的关系既亲密和热切又存有龃龉和矛盾。关系亲密和热切，是因为两国的国内体制和对外政策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存有龃龉和矛盾，是因为除了在大方向上基本相同以外两国的不尽一致的民族利益、各不相同的地位和环境使它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相悖和做法牴牾。

与其他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的东欧国家不同，南斯拉夫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国家，人民阵线内部除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就如吉拉斯在 1945 年 4 月同斯大林的谈话中所说，“南斯拉夫政权实质上是苏维埃政权；共产党掌握了所有经济命脉，国内也没有什么反对党。”[243] 除了共产党掌握全部政治权利外，在经济领域，从 1944 年开始，

就已经采取限制和没收反动分子的财产等措施，建立了大规模的国有经济。1945 年，工业中的国有经济的比例已经达到 82%，批发贸易和银行基本上也已掌握在国家手中。1946 年 12 月南斯拉夫颁布国有化法令后，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90% 的工业企业、所有的交通、银行和批发贸易以及大部分零售贸易都已经为国家所掌握。相应地，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和计划经济体制也建立了起来。[244]在农村，1945 年 8 月颁布了土地改革的法令，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没收的土地只有一半分配给了贫农，另外一半则收归国有，建立了国营农庄和劳动合作社。此外还实行了粮食义务交售制。[245]总之，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看，南斯拉夫可以说是东欧国家中最早实行了苏维埃化的国家。而这一点正是早期的苏南亲密关系的基础。在两国发生冲突以前，苏联与南斯拉夫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工业化。苏联是南斯拉夫的主要的贸易伙伴。苏联通过供应武器、培训南斯拉夫军官和派遣苏联军事顾问，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国内体制的相同使苏联和南斯拉夫早在 1945 年就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了同盟关系。南斯拉夫把与苏联的结盟当作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障自己安全和满足自己利益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战后顺利地进行恢复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因素。[246]苏南两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苏联积极支持南斯拉夫在战后领土调整等方面的要求，南斯拉夫则与苏联一起与美英等西方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南斯拉夫是苏联所有“卫星国”中最富有进攻性的国家。而在苏联看来，南斯拉夫是它的第一号盟友。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在苏联的报刊上，在提到东欧国家时南斯拉夫总是被列在第一位。南斯拉夫被认为是东欧

国家中民主改革进行得最早最快并且取得很大成就的国家。南共被认为是久经考验的外国共产党之一，而铁托则是它们中最著名的领导人。[247]在 1947 年 9 月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密电中逐一评价了各党的报告，其中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是最高的。[248]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南斯拉夫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独立和解放的，这就使它具有较为稳固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对苏联的依附相对较小。因而在那些主要依靠苏军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自然便拥有某种自尊和自豪感。对于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的党——联共（布）和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和巨大作用，南共和南斯拉夫当然是承认和接受的。所以南斯拉夫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在国内外政策的大方向上与联共（布）和苏联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作为一个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南斯拉夫更注意维护和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南斯拉夫有自己的政策、考虑和做法，不仅不愿轻易受苏联的指挥和摆布，而且有时还会向苏联提出一些其他东欧国家连想都不敢想的要求（如南斯拉夫公开向苏联表示了要合并阿尔巴尼亚的愿望并要求苏联承认南斯拉夫在阿占有支配地位；要让保加利亚按照与南联邦六个共和国相同地位的方式加入到南保联邦之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务中，南斯拉夫认为自己的斗争经验同样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而常以第二号领袖自居，为一些东欧国家共产党甚至西欧共产党出谋划策。

对南斯拉夫在对外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对苏联既密切合作又擅自行动、既服从又对抗的情况，苏联是早就有所察觉并保持警惕的。为了维护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盟友的关系，苏联在冷战爆发之前，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是恩威并重的做法，试图既

满足它的某些要求又能抑制它的擅自行动的独立倾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南两国在对外事务中的分歧和矛盾愈益深刻和尖锐。在与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这些分歧和矛盾成了冷战开始后建立苏联东欧集团的主要障碍，从而转化为苏南之间的一场公开的激烈冲突。

苏南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和双边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从苏联方面来讲，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南斯拉夫在对外事务中不同苏联协商和协调，擅自行动和自行其是，表现出太强的自主倾向，甚至想充当巴尔干地区的领袖。例如：

1. 巴尔干联邦问题。早在战争期间，南共领导人铁托就通过其发言人公开阐述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其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入，它将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而就希腊而言，“不是必须使希腊加入这个联邦，就是我们必须同它结成永久性的联盟”。。[249]同年9月保加利亚解放后，南保两国开始讨论建立南保联邦的问题。苏联当时也是持赞成态度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在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谈话中表示，苏联希望看到战后东欧一些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相互结合，成立若干联邦。[250]但是当时组建联邦的步伐由于遇到了两个难题而停滞不前。其一是，1945年1月初，西方国家反对建立南保联邦和签订南保互助条约。它们的理由是，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被置于三大国的管制之下，无权处置它领土。这样就决定把事情搁置到对保和约签署以后。[251]其二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本身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南斯拉夫是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它希望未来的南保联邦是以六加一的形式组建，也就是说加人

联邦的保加利亚的地位与其他六个共和国是一样的。而保加利亚则主张未来的联邦是南保两国以一加一方式组成的双重联邦。斯大林支持保加利亚的立场。

1946 年 5 月 27—28 日，斯大林在同铁托的会谈中，改变了在对保和约签署之前南保不建立联邦和不签订互助条约的立场。这样苏南两国在南保联邦问题上便出现了分歧。斯大林提出要让保加利亚加入（南保）联邦。但是铁托却认为，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斯大林严厉地说，“必须这样做。”铁托解释：搞联邦之所以不会有结果，是因为事情与两国的不同体制有关。还有，在保加利亚其他政党有很大影响，而在南斯拉夫，虽然存在着其他政党，但是整个政府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斯大林说，这用不着害怕。在初始阶段先限于搞一个友好互助条约，尽管实际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铁托同意了。这时，莫洛托夫指出，现在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与保加利亚的和约尚未签订。保加利亚被视为是一个前敌国。但是斯大林认为这并没有重要意义。他举例说，在波兰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承认之前苏联就已经同它签订了友好条约。[252]但是几天后，在斯大林与南保两国领导人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另一次会谈时，事情又发生变化。决定南保条约应在对保和约缔结后签订。[253]

1947 年 2 月，在巴黎和会上，姗姗来迟的五国和约（包括对保和约）终于缔结了。于是南保两国立即开始恢复签订条约和建立联邦的谈判。 7 月初，铁托通知苏联驻南大使，南保条约已经准备就绪，将于 7 月底季米特洛夫来访时签署。[254]与此同时，季米特洛夫也将此事电告斯大林以征求意见。同时他表示，条约将于 7 月签署，不论到时对保和约是否得到批准。[255]斯大林在复电中表示赞同南保缔结条约，但认为必须等到对保和约生效的时候。[256]同年 7—8 月，季米特洛夫率保

加利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布莱德举行会谈。8月1日，南保两国政府在会谈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就即将签署的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进行了准备并达成了一致意见。[257]虽然南保两国没有正式签订条约，但是实际上就是宣布草签条约。这就违背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斯大林在致南保两国领导人的电文中，指责他们因“自己的匆忙行事”而“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可能被“英美反动派”所利用以“加强针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特别强调，南保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协商”。[258]南保两国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的批评，在对保和约生效前，没敢正式签订两国条约。[259]

虽然南斯拉夫领导人执行了苏联的指示，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独立行动的倾向，仍然无法平息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不满和解除苏联领导人由此而对他们产生的更大的警惕。1948年2月，在同南保领导人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旧事重提，再次严厉批评南保两国1947年8月关于南保条约的声明没有同苏联进行协商。[260]

2. 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战时和战后初期，南阿两党和两国建立了主从式的特殊关系。位于巴尔干半岛西端的阿尔巴尼亚，除了西隔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相望外，它只有两个陆地邻国：东南与希腊相邻，东部与北部与南斯拉夫毗连。对于革命后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得到美英支持的君主制的希腊当然是其必然的敌人。而政治目标与其相同且幅员人口更大更多的南斯拉夫则不仅成为其天然盟国和保护国，而且也是阿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联系的中介。南阿两国的特殊关系从下面的情况中可见一斑：南斯拉夫第一个承认阿临时民主政府（1945年4月；而苏联同阿建交是在1945年12月）；南第一个同阿

签订友好互助条约（1946 年 7 月；苏联与阿没有签订类似的条约）；霍查作为阿政府首脑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前往南斯拉夫（1946 年 6 月；霍查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在 1947 年 7 月）；霍查是第一个被南斯拉夫授予南人民英雄勋章的外国人（1946 年 6 月；霍查获得苏联的苏斯洛夫一级勋章是在 1947 年 8 月）。[261]阿共中央五中全会（1946 年 2—3 月）在谈到阿南关系时表示，“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同南斯拉夫进行更加紧密和具体的合作。我们的人民应当懂得，这种兄弟关系是我们生存的保证。”[262]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广泛的援助。至于苏联对阿的援助，在 1947 年 7 月霍查访问苏联之前，其范围和规模是有限的。[263]而且这些援助并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南斯拉夫提供的。当时在阿南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地拉那通往莫斯科之路要经过贝尔格莱德。”[264]1946 年 7 月，访南归来后的霍查告诉苏联驻阿公使丘瓦欣：铁托说，他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对他说，苏联政府认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必须给予全面援助的兄弟共和国。这里指的是，苏联将通过南斯拉夫来帮助阿尔巴尼亚，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直接援助阿尔巴尼亚只能引起盟国的责难’。[265]

在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除了要求得到的里雅斯特外，合并阿尔巴尼亚是南斯拉夫当时最大的追求和努力目标。阿南共同计划协调委员会的南斯拉夫成员对阿方成员说，“你们不应当把你们国家看做是独立的国家，而应当看做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266]1946 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准备同阿尔巴尼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规定两国实行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的协定。虽然苏联在表面上支持南阿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无论从维持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维护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的立场考虑，苏联显然都不希望如此迅速地实行

南阿一体化。1946 年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拉夫里谢夫在铁托访苏前夕撰写的《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应当对南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些限制，特别是要推迟（至少在最近）签订南斯拉夫设计的南阿秘密军事条约和任何把阿并入南斯拉夫联邦的决定。这样可以避免西方国家可能作出的消极反应。[267]

1946 年 5 月 27 日，在同铁托的会谈中，斯大林问他，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联邦？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斯大林认为，现在南斯拉夫要同时解决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和的里雅斯特这样两个问题是困难的。所以，斯大林建议，应当首先考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友好互助问题；通过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铁托对此表示同意。[268]在 6 月 8 日同铁托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建立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联邦还不是时候。[269]

铁托与斯大林会谈后不久， 1946 年 7 月，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经济合作的协定。通过关税联盟、协调经济计划、统一关税和建立股份公司等方法，两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了。南斯拉夫还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等部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南共驻阿共代表兹拉季奇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制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干部问题的政策和决定时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许多决定实际上都是由他倡议并制定的。[270]

1947 年 5 月和 7 月，阿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斯皮鲁和阿共总书记霍查、内务部长佐泽（也是副总理）相继访问苏联。7月 15 日，斯大林同霍查在宴会前后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斯大林详细询问了阿国内的各种情况，并表示苏联将加强对阿的援助。在谈到阿南关系时，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表示不满，他说，阿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应当表现出独立性。[271]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说，“由于

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占领而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苏联政府满足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贷款，苏联将用这笔贷款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轻工业、林业和农业机器设备。”[272]霍查对苏联的访问使苏联开始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起直接的合作关系。尽管苏联驻阿公使对南斯拉夫人说，苏联仍将通过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273]，南斯拉夫显然对苏阿关系的发展非常担忧，特别是对苏联专家在阿的活动感到不安。所以，南斯拉夫设法贬低和消除霍查访苏的效果。苏联一南斯拉夫一阿尔巴尼亚三方复杂的关系，使阿党和政府内出现了尖锐的斗争。

1947 年 11 月，南共驻阿共代表兹拉季奇在阿党政治局会议上指责阿领导人斯皮鲁等对南斯拉夫采取不友好甚至敌视行为，阻碍阿南合作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合作。斯皮鲁与苏联驻阿外交使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对苏联公使丘瓦欣说，南斯拉夫驻阿代表建议关闭鲁比克的炼铜厂，他们对阿决定在苏联帮助下在地拉那建立纺织联合企业抱极其怀疑的态度。他们对阿有关的外贸组织施加压力以便让阿把国内生产的 2/3 的原油运往南斯拉夫（这将使阿库乔夫煤油厂面临关闭的危险）。斯皮鲁认为，南专家的所有建议和劝告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阿自主地发展经济，而是为了要把阿经济纳入南经济发展计划之中。他强调，“这意味着要把我们同苏联分离开来，剥夺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接受苏联援助的可能性。”[274]在佐泽的支持下，阿政治局准备审查斯皮鲁的问题。但斯皮鲁在审查之前突然自杀身亡。斯皮鲁事件使苏南阿三国关系更为复杂化。1947 年 11 月底，铁托委托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与斯大林面谈与阿有关的问题，但苏联方面说斯大林不在莫斯科。12 月 4 日和 7 日，日丹诺夫受斯大林的委托与南大使进行了两次会谈。南大使在会谈中谴责斯皮鲁用类似英美间谍的方法进行反南活动，

并提到了斯皮鲁曾与苏驻阿使团保持全面的接触。他指出阿能从南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东西，南已向阿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他说，南担心的是它已经觉察到阿对南履行义务正在受到阻挠。他特别指出，在斯皮鲁自杀后，铁托打算给阿共以“全面的支持”以使阿共保持“纯洁和团结”。[275]

1948年1月17日，斯大林与来访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专门为阿尔巴尼亚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谈。双方认为，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发展应当完全与南斯拉夫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到联合。但是同时斯大林要吉拉斯注意到不能匆忙地使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实行联合的必要性，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和遵守必要的强调阿尔巴尼亚人自愿与南联合的规则，要消除南斯拉夫人是要奴役他们的印象。[276]

但是1月19日，铁托在接到吉拉斯关于同斯大林会谈的报告后，致电阿领导人霍查，建议在阿南部的科尔察向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军事基地以供南一个师驻扎，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英国人和美国人支持下的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威胁。[277]不管如何，铁托准备向阿派遣军队的计划既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278]

1月28日，莫洛托夫通过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询问铁托：莫斯科得到的有关南斯拉夫想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的消息是否准确？“因为莫斯科没有从南斯拉夫得到这样的通报”。苏联担心，“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会利用南斯拉夫军队的这一行动“以‘保卫’阿尔巴尼亚独立为借口对这件事情进行军事干预”。[279]铁托只得承认有派兵去阿的打算，但他强调这是征得阿尔巴尼亚同意的。他还说，希腊借口打击隐藏在阿的希腊游击队准备入侵阿尔巴尼亚。而由于阿军队软弱，阿希边界容易遭到进攻。他希望苏联能接受他的说法。同时保证在苏联作出决定之前，南斯拉夫不准备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280]但是

铁托对莫洛托夫有关英美可能进行干预的担心不以为然。他对苏联大使说，如果入侵阿南部，那么南斯拉夫和苏联将不得不“解决这一麻烦”。[281]

铁托这种始则隐瞒继而辩解的态度引起了苏联的极大不满。三天后，莫洛托夫向铁托发去了一封语调严峻的电文。他称：南斯拉夫不同苏联商量并且没有最后通知苏联就决定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是“不正常的”，这表明“在理解两国相互关系”方面苏联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82]铁托接到莫洛托夫的电报后，显得“很不安”。他向苏联大使承认，没有同苏联商量就作出决定是一种错误，并保证不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他还进而保证，今后将就对外政策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同时他又辩解说，在这之前南斯拉夫采取的行动是与苏联协商过的，它同苏联在理解相互关系方面不存在严重的分歧。[283]

但是，这一次苏联不愿意简单地接受南斯拉夫的这种不彻底和不诚恳的认错了。因为在苏联看来，南斯拉夫在擅自行事方面已有不少“前科”在身。这次准备向阿尔巴尼亚派兵的瞒天过海的做法已属旧病复发。无独有偶，就在铁托作出派兵决定的前两天（1 月 17 日），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事先也没有征得苏联领导人的同意，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联邦或邦联。[284]一个在 1 月 17 日，公开宣布要建立东欧国家联邦；另一个在 1 月 19 日悄悄建议向阿派兵。再回溯半年前的 8 月 1 日，正是它们两家一起，未同苏联协商，在对保和约尚未生效的时候就宣布就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达成一致。这样竖向联系南保两国半年前的擅自行动，横向比较它们两国现在的犯规言行，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行为绝非一时之糊涂。一种可怕的前景——东欧国家自行其是和各自为政从而使

苏联领导人苦心经营苏联东欧集团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的可怕前景，终于使苏联人拍案而起，这次一定要同他们新旧账目一并算清。

1948年2月10日，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和杰拉斯等与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一起被召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开门见山地指出，苏联、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这些分歧是不允许有的。接着，他逐一例举了三件严重分歧的事例：“第一件是，南保缔结联盟条约——没有在苏联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商；第二件是，季米特洛夫宣布要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联邦——没有在苏联和保加利亚之间进行协调；第三件是，把一个南斯拉夫师派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科尔察——没有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调。”[285]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阿的独立是由三个大国苏联、英国和美国通过专门的协定予以保证的。阿是我们最为软弱的一块地方，因为其他（东欧）国家或者是联合国成员国或者得到了承认。但是阿没有被承认。如果南斯拉夫进入阿尔巴尼亚，英国和美国的反对派就可以利用这件事情，作为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采取行动。我们不应当派军队去，而应当加紧努力建立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我们应当训练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他们遭到进攻，就让阿议会呼吁南斯拉夫提供援助。[286]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半开玩笑说，南斯拉夫人害怕俄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因此它们赶忙派出它们的军队。[287]关于南保联邦以及阿尔巴尼亚加入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如果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希望的话，它们明天就可以实行统一，这方面不存在限制，因为保加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卡德尔说，鉴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南斯拉夫不急于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联合。但是斯大林却说，不应当再迟了，这样做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南斯

拉夫和保加利亚必须联合，然后让阿尔巴尼亚加入，这可以通过议会根据人民的意愿来达成协定。斯大林认为，应当先开始实现政治联合，这样（对西方来说）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至于保南联合，斯大林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已经成熟，甚至可以开始讨论（联合的）国家的名称了。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训斥和开导下，南保两国领导人先后承认错误，并同意与苏联领导人签订就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288]

实际上，南苏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希望南先与保建立联邦，然后再让阿加入。而南斯拉夫至少在这个时候并不想建立南保联邦，与阿的联合倒是它所希望的（但不是联邦而是统一）。这种轻重缓急并非无关紧要，它表明，至少在那时，斯大林是反对阿与南实现统一的。至于相互协商议定书，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更是一种犹如紧箍咒的东西，它是被迫接受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

（二）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指责和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

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实质就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争夺对该地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前者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者则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保护。战争后期，南斯拉夫就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危机。苏联一方面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与盟国的合作关系，主张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大使的讨论中和与铁托的电文往来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下述的意思，即，首先使南斯拉夫军队留在的里雅斯特，并与西方军队划定分界线，然后通过外交谈判谋求更多的土地。[289]但是，铁托却担心由西方国家在的里雅斯特建立控制会使南失去该地及其附近地区。[290]在西方压力和苏联的建议下，铁托于 1945 年 5 月 21 日起同西方国家就的里雅斯特问题进行谈判。但铁托心里总有不甘。 5

月 26 日，他在卢布尔雅那就的里雅斯特问题发表讲话时，发泄了他心中的不满和怨恨。他说，南斯拉夫不想“替别人付账”，成为他人的“零钱”，也不愿被纳入“某种利益范围的政策中”。[291]从当时的背景看，铁托抨击的锋芒当然是针对西方国家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点名是谁，有可能被解释是同时针对西方和苏联的。所以，苏联对他的这番讲话十分恼火。几天后，苏联以一种严厉的方式私下警告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得再发表类似的言论。南斯拉夫领导人马上接受了批评并且作了道歉。[292]

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还是认为，苏联对它的支持不够，一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与西方妥协。1946 年 7 月，在五国和约会议上讨论对意大利的条约时，法国代表提议，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联合国的特别控制区，既不给南斯拉夫也不给意大利。苏联代表表示同意。铁托立即致电斯大林，指责苏联代表在谈判中没有给南斯拉夫以足够的支持。斯大林在回电中反驳了铁托的指责，强调妥协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的里雅斯特交给南斯拉夫”。[293]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指责和批评引起了苏联的不满。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为 1947 年 9 月的九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准备的分析材料中讲到，南斯拉夫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的里雅斯特问题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忽视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斗争的共同利益”。[294]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原来是打算批评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的。报告的草案说，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就是认为，苏联似乎是从大国政策考虑，不愿损害自己同大国的关系，因而没有为支持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进行有力的斗争。[295]后来因为考虑到会议必须集中力量批评法共和意共，并且还要让南共在这方面

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最后草案的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所犯的这一“错误”（他们竟然敢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苏联领导人的记忆中是不会被抹去的。

（三）南斯拉夫试图谋求苏联集团内部第二号领袖的位置。

在南斯拉夫看来，如果说，在苏联东欧集团中苏联是不可置疑的老大哥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作为苏联的第一号盟友就是当仁不让的二兄弟。二兄弟也就是二把手。除了本身要听从苏联的吩咐和安排外，它也应当能够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批评、提供劝告和给予指导，发挥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的第二中心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这样看待南共地位和作用的。譬如，据吉拉斯说，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等人就把南斯拉夫尊奉为继莫斯科之后的第二个中心，经常向南共领导人请教。[296]在其他兄弟党面前，南共经常流露和表现出一种因独立开创江山而具有的自尊和高傲，指责这个“不成熟”，批评那个是“错误的”，甚至给人贴上“机会主义”的标签。[297]1945 年和 1946 年，南共抨击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为使的里雅斯特归属意大利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理，沦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帮凶，成了它们的尾巴，帮助了“南斯拉夫的敌人”。[298]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和吉拉斯分别对法共和意共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它们的领导人脱离“革命”路线和滑向妥协主义。[299]1948 年 1 月，铁托指责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联邦的讲话是“有害的”。[300]

南斯拉夫充当第二号领袖的角色还表现在南共试图在对外事务中发挥次一级的领导作用，向别的党提供建议。并且有许多时候是撇开和隐瞒苏联的。南共曾经建议奥地利共产党，在苏占区内成立一个单独的共产党政府。[301]南共还同匈共一起支持意共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计划，如果

美国干预1948年4月选举的话。[302]

南作为苏联的一号盟友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苏联为首的集团力量，因而苏联是赞美的，但是南充当二号领袖和地区领袖则会动摇和削弱苏联在集团内部的中心地位和领导作用，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同意和答应的。1948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中，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欲望和试图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指责。报告说，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铁托竟然说，“巴尔干应当同苏联一起成为指出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303]报告还指责南斯拉夫“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304]

综上所述，在苏南冲突爆发之前，两国在对外事务和双边关系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愈益尖锐和严重。1948年2月是战后苏南关系的分水岭。如果说，在这之前苏联试图通过劝告和许诺、训诫和命令的软硬兼施的方法来消除双方的分歧和解决双方矛盾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特别是美苏冷战已经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屡教不改”使得苏联彻底失去耐心和放弃希望，只想通过打压和惩罚的方法来使南斯拉夫彻底屈服和就范。1948年2月10日的苏南会谈是斯大林给南斯拉夫领导人“改过自新”的最后一次机会。不管双方的分歧在会谈中是否真正得到克服，反正已经签订了两国相互协商的议定书。接下来就是南斯拉夫如何去执行的问题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去后的表现却是“变本加厉”地拂逆莫斯科的意志和与莫斯科对着干。

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从苏联返回的南代表团所作的报告，作出了全面否定苏南2月10日会谈结果的决定。会议决定，不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

商。[305]（按照斯大林在 2 月 10 日会谈中指示，南应当首先与保结成联邦。）

2 月 21 日，铁托在同希腊共产党领导人扎哈里阿季斯和约奥尼季斯的会谈中，同意继续向希腊游击队提供援助和支持[306]（斯大林要求停止援助）。

2 月 25日，南斯拉夫代表兹拉季奇和南军事使团团长库普列沙尼将军在地拉那同阿领导人霍查等会谈时，让阿尔巴尼亚人同意由他们向苏联提出必须让南斯拉夫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3 月 17 日，南斯拉夫代表还要求阿“表现出主动性”，提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的建议。[307]

3 月 1 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 2 月 19 日会议的基础上再次决定，拒绝建立南保联邦。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同保加利亚的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不适当控制的手段。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会议批评和指责苏联有意阻挠有关进一步开展苏南经济和军事合作的谈判，决定要在发展经济和建设军队方面奉行自我保障的方针。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不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向它们施加压力。[308]

3 月 9 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在致莫斯科的电文中说，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斯尔曾蒂奇违反以前的惯例，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要的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资料，理由是，南斯拉夫政府决定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这些材料。拉夫连季耶夫指出，南政府的决定在 1947 年夏天就作出了，但是根据同卡德尔达成的专门协定，列别杰夫迄今为止仍可继续从经济委员会得到这些资料。大使的结论是，“非常清楚，斯尔曾蒂奇的讲话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309]

现在，南斯拉夫的行为在苏联看来简直就是在苏联集团内部掀起的造反。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 2 月 19 日和 3 月 1 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谋反”会议成了苏南关系的转折点。从南斯拉夫方面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南斯拉夫正式开始奉行独立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两次会议表明南斯拉夫已经由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 3 月 9 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信件中所说南斯拉夫不给苏联代表所需的有关南经济情报的事情则成为苏南冲突的导火线。剩下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时候和应用何种方式来惩罚和镇压内部的叛逆者。3 月 11 日，拉夫连季耶夫紧急奉召回国。

在与南斯拉夫的正式“战斗”打响之前，苏联没露任何声色。对于它已经知道的南斯拉夫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反苏”决定以及随后采取的令苏联愤怒之极的行动，既不向南斯拉夫质询，更不像以前那样痛加指责和训斥，而是先在一些边缘和外围问题上开始与南斯拉夫相互指责和较劲。这情景就像正式战斗前的热身。

1948 年 2 月 28 日，南领导人卡德尔会见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就南驻阿使馆发回的下述报告向苏联提出质询： 2 月 22 日，在地拉那庆祝苏军建军 30 周年的招待会上，苏联驻阿使馆代办加加里诺夫提议为铁托干杯，但是他又带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他（铁托）致力于加强民主联盟的力量及其团结的话。”[310]

3 月 11 日，铁托在与即将回国述职的拉夫连季耶夫会谈时对苏南经济关系的现状表示不满。他质问苏联为何要推迟关于签订两国新的换货议定书的谈判。[311]他说：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政府与其他东欧国家都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却不与南斯拉夫签订。他甚至这样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时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

欧国家更为巩固。无法按照（苏联）外贸部的说法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苏南之间没有贸易协定，而这是不能向人民隐瞒的。”“（苏联的）决定尤其令人不能明白的是，它是在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应为其时在苏联进行经济问题谈判的南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引注）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之后才通知它的。”铁托认为，苏联的决定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样对待南斯拉夫，使“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还问苏联大使，苏联是否对南斯拉夫有什么不满意的。因此，他请大使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这个问题。[312]对于苏联卢布和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的比价，铁托说现行的比价对南斯拉夫是“非常不利的”。[313]铁托还提到了两国在南斯拉夫海军建设问题上的分歧。[314]

3月13日莫洛托夫致电铁托，把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质问统统顶了回去。关于加加里诺夫为铁托干杯的事情，他说，“业已查明，卡德尔所获得的消息是不正确的，因为加加里诺夫没有说过任何侮辱性的话。显然，这件事情或者是误会或者是诽谤。”关于苏南新的换货议定书，他说“众所周知，现在有一个苏南1947—1948年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到今年5月31日期满。显然，在此之前肯定要签订1948—1949年的新协定。看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被误会了，或者受到了诽谤。”关于卢布与第纳尔的比价，他说，“众所周知，卢布对第纳尔的汇率问题如同对所有其他外国货币的汇率问题一样，已经在卢布与美元比价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对我们提出任何异议。持异议的只有南斯拉夫。如果我们现在把第纳尔作为例外，我们就将动摇卢布汇率，对此，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关于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问题，他说，有必要再安排几次南斯拉夫代表同苏联代表的会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给南斯拉夫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主

要在于南斯拉夫要有一个考虑到我们和你们近期能力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否则，作出的计划可能是纸上谈兵，从实际建设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价值。”[315]

3月18日，铁托复函莫洛托夫。关于加加里诺夫干杯事件，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诽谤的问题”。关于苏南缔结新的换货议定书的问题，他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表示，即苏联政府愿意签订1948—1949年贸易议定书。”但是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某种形式的诽谤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卢布与第纳尔的汇率问题，他说，南斯拉夫“从未提出过全面变动汇率的问题，因为它知道这一汇率是以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根据的”。南斯拉夫“只是请求在某些部门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因为在那些部门卢布与第纳尔的官方比价特别加重了南斯拉夫对苏联的财政义务，例如对于文职顾问、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在苏联学习的我国干部，等等”。关于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海军建设计划问题，他说，南斯拉夫政府“已注意到苏联代表的最新意见，虽然它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南斯拉夫的物质能力，而且它的专家们也正在制订新的、将大大压缩的建议。十分清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苏联战后恢复和建设对苏联生产部门提出的大量需求，所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只是期待苏联在其能力范围内提供援助”。最后他建议“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关于1948年贸易交换及军火供应的谈判”。[316]

后来的事实证明，莫洛托夫在3月13日电文中所说的苏南肯定要签订一个1948—1949年新的换货协定只是在对南斯拉夫虚与委蛇。而铁托关于要继续进行有关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3月18日，莫洛托夫正式拉开了苏南冲突的序幕。[317]他

在致铁托的电文中说，“据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南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做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立即把……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318]同一天，苏联驻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铁托，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319]

也是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这份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而撰写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所作的正式的组织定性和结论，也是随后批判和讨伐南斯拉夫的理论纲领。报告指责南领导人在确定实际任务和发展前景时“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世界所有反帝的进步力量的经过考验的和得到承认的代表”——苏联和联共（布）采取“不正确的敌意态度”；低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困难特别是富农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中表现出机会主义”；在南共组织建设中“实际上是执行了取消派的政策”“把党融化于人民阵线之中”。报告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陶醉于在巩固人民民主国家中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时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320]

3 月 20 日，铁托对莫洛托夫 3 月 18 日的电文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对于苏联方面撤回全部专家的做法，铁托自然是无可奈何。他说，“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做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他认为，苏联方面撤回专家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苏联专家在南斯拉夫期间，“对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友好的，而且确切地说，是兄弟般的和最殷勤的”。至于南斯拉夫不给苏联代表经济情报的问题，“你们的人早已被告知，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获得一切必需的和重要的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提供，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铁托认为，莫洛托夫在电文中所说的理由不是苏联方面撤回专家的原因，他“希望苏联政府坦诚相告这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告诫莫洛托夫，“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取情报，我们认为对待这种情报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321]

铁托的回电表明南斯拉夫并没有任何认错更不要说“悔过”的表示。如果说在这之前莫洛托夫尚未完全排除事情有回转余地的话，那么现在铁托的“死不认罪”不仅使苏联觉得要让南斯拉夫投降已经无望，而且更激起了苏联要痛打南斯拉夫的决心。自此以后，苏联便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的讨伐。在 3 月 27 日、5 月 4 日和 5 月 22 日的电文中，苏联领导人指责和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反苏言论，坚持反苏立场，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322] 而南斯拉夫则针锋相对地回击苏联对它批判和讨伐。

6 月 19 日，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局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报告。[323] 在这基

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奉行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路线，实行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决议认为，南共领导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各党的对立地位，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南共中央已将它和南共处于共产主义统一阵线和情报局之外。决议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起来撤换他们的领导人，形成国际主义的新领导。[324]

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与南斯拉夫问题有关的决议，决定把情报局总部迁往布加勒斯特[325]，解散两个由南斯拉夫起主导作用的巴尔干地区组织：贝尔格莱德工会公约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326]会议建议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成员党断绝与南共的一切关系。[327]

1949 年 11 月，情报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了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更为可怕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把南斯拉夫领导人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杀人犯和间谍，认为南共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和新战争挑拨者的帮凶。[328]

苏南冲突是美苏冷战开始后不久苏联最大的一次自戕行为。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在冷战的背景下打扫和清理自己的东欧“后院”，消除内部的杂音，达到步调的一致，从而使苏联东欧集团能作为一支强大的整体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有力的抗衡和斗争。但它的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苏联所采取的那种蛮横无理的高压手段和不讲策略的穷追猛打，不仅无法制服内部的“叛逆者”，反而造成了集团内部的大动荡。结果是清理变成了自毁。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这使苏联失去了一个

重要的盟友，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苏联东欧集团的整体力量。美国迅速地利用了苏南之间的冲突和裂缝，通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成功地对东欧实施了“楔子战略”。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集团，是苏联在冷战初期的重大的失误和失败。它对南斯拉夫的批判和讨伐完全是自乱阵脚和自毁长城的内部残杀。

第三节　在德国的出击与远东政策的转变

一　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

1948 年的柏林危机是冷战开始后美苏双方以战败的德国为舞台，围绕柏林问题而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的对抗。在柏林危机爆发前，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已严重恶化，并且朝着集团对立的方向发展。冷战伊始，美苏便首先在柏林迎头相撞，乃是因为德国作为一个被分区占领的国家，集中体现了美苏双方在争夺德国和欧洲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柏林危机中美国和苏联进行强硬的对抗，使人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美苏冷战对战后和平与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危险后果。

柏林危机是苏联在冷战开始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的一次主动出击，目的是为了通过切断柏林的交通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迫使它们或者停止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或者甚至把它们赶出西柏林。由于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和决心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极端措施，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冷战的

局面。

苏联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冷战后整个德国的发展和走向发生错误的判断。其二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发生错误的判断。

战后，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败的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和管理，德国的首都柏林亦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全德事务。按照这种分区占领制度，苏联在占领和管制德国中的地位是有利的和牢固的。因为，苏占区的面积占全德的 40%，人口占 36%，生产资源占 33%。大柏林的面积为 889 平方公里，苏占区占 409 平方公里；大柏林的人口约为 350 万，苏占区拥有 100 万；美、英、法三国算在一起的西占区的面积是 480 平方公里，人口 250 万。而且整个大柏林又位于苏占区之内。根据波茨坦会议的规定，苏联可以在苏占区内自行其是已不必待说，就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它也拥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权力。因为委员会实行的是一致性原则，这就使苏联处于以一抵三（美、英、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对德国问题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加强对全德事务的影响，并借以增强苏联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从盟军攻入德国并确定分区占领制度开始，德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国当局均按本国政府的旨意各行其是，使各占领区域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逐渐形同虚设。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现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忧虑苏联“想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双方都从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

1946 年 5 月，美国宣布停止从美占区拆迁设备用于支付赔偿。1947 年 1 月，美英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同年 3—4 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围绕着有关德国的经济、政治、赔偿以及和约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在会议期间（3 月 12 日），美国宣布了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接下来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相继出现，美苏冷战爆发。欧洲的分裂包括被分区占领的德国的分裂已势不可免。

冷战开始后，德国作为四国共管的战败国，首当其冲地成为冷战的战场。分区占领制度进一步动摇。1947 年 7 月讨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 16 国经济会议已经将德国的西占区纳入了欧洲复兴计划之中。7 月，在美国政府给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让德国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和使德国的经济更能自给自足。[329]这表明，美英在西占区将会有更大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要把西占区变为依附于西方的单独国家。

对于西方国家组建单独的西德国家的试图，苏联方面也已经有所觉察。1947 年 10 月 3 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中说，“分析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和美英在德国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已经不是宣传手段或政治讹诈，而是对德国进行政治和经济肢解，把西德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并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方集团中去的实际威胁。”[330]但是苏联决心阻止西方国家的这一试图。因为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建立，不仅会使苏联失去对整个德国问题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植起来的西德将会加入并且增强西方集团的力量。所以，1947 年 11 月 2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给参加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把签订对德和约放在

首位，使和约与“恢复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联系起来。指示要求反对美国提出的召开由所有对德宣战的国家参加的和会，主张召开由盟国中德国的邻国和其他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德共同作战的盟国代表参加的和会。[331]

1947年11—12月，在冷战气氛中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在讨论德国问题时，因双方歧见太深而不欢而散。两次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及其盟国已决意在德国问题上同苏联最后决裂，使西占区成为独立的国家，以避免“整个德国”“被拖进东方轨道的真正危险”。[332]正是在这次外长会议期间，法国同意把法占区与美英双占区合并。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变”。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的一党政权。“二月事变”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不仅加快了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步伐，而且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建立西德国家问题上的决心变得不可动摇。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美、英、法三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未来西德国家的具体事宜。会议召开前夕，2月13日，苏联照会东道国英国政府，谴责三大国的“单独行动”。伦敦会议召开时，苏联又发出了第二封抗议照会，指责西方国家奉行分裂德国的路线。[333]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背景下，美、英、法三国的西占区和苏联的苏占区分别成为依附于各自占领国的单独国家，已成难以扭转的定势。实际上，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乃是当时解决旷日持久的德国问题的可行选择，虽然它是以德国人民的暂时分离的痛苦为代价的。试想，一个国家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几个国家共同占领并实施全权管理，它何以继续保持统一呢？如果硬要把不同的占领区重新凑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该如何确立它的政治属性呢？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而在战败的条件下，德国人民已无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力。显然，就美苏而言，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另一方都不会答应和接受。因此，与其维护一个徒具虚名的统一的德国，使其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莫不如现实地承认和接受德国已经分裂的事实。总之，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再来侈谈德国的政治经济统一，已是毫无意义的了。1947 年讨论德国问题的两次外长会议的失败，就是明证。

但是，苏联却无法认识到在冷战的条件下由四大国共同管制的德国从分区占领走向正式分裂的必然趋势，仍一厢情愿地试图恢复德国形式上的统一。正是这种对冷战后德国走向的第一个错误判断，使苏联以为，只要凭借苏占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封锁柏林的交通，就能造成西方国家难以呆在西柏林的条件，从而迫使它们在德国问题上作出让步。

苏联既没有估计到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也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抵制封锁的实际能力和手段。换言之，在它看来，西方国家似乎不会为了柏林甘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样它也不认为，在封锁的条件下，西方国家有能力满足西柏林对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正是苏联对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的第二个错误判断，使苏联迈出了封锁柏林的第一步。

就在西方六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 1948 年 3 月 9 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国，商讨对策。正是在这期间苏联制订了有关封锁柏林的计划。

3 月 12 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给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报告说，美国和英国拒绝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 准备采取措施建立西德国家，并打算同它签订单

独的和约或和平规则”。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是“西方国家把德国变为自己的据点和把它纳入正在建立的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证明。斯米尔诺夫建议要更加坚决地对抗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能再局限于提出抗议，这些单方面的行动实质上触及了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不仅能制约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而且能有力地挫败它们组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集团计划的措施。”[334]斯米尔诺夫还建议：(1) 召开苏联、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长会议，邀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观察员。会议将通过评估西方国家在德国活动的宣言； (2) 会后苏联应提议召开新的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接受这一建议，那时组建西方集团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将被瓦解。如果我们的建议被它们否定，那就很清楚，这些大国将最终拒绝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在这之后，苏联将发表声明，西方大国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盟国管制机构和占领区的决议失去了效力。因此，苏联政府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保障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组织边界保卫等。[335]

斯米尔诺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付西方国家的行动计划和措施很快就被付诸实施。

3月20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伦敦会议是一次“秘密勾结”，并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已不复存在，苏联将退出这一机构。[336]

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分界线的命令》。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的交通局局

长特别受命把客运和美英法三国军队的交通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337]

3 月 27 日，索科洛夫斯基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强化了对通过大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

3 月 30 日，苏联驻柏林军事长官德拉特温致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通知他，从 4 月 1 日起，苏联将对美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交通实行新的规则。据此，将检查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运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338]

从 4 月 1 日起，苏联开始实施其封锁柏林的最初步骤。先是美国继而是英国的客车在苏占区边界被拦截。当它们拒绝接受苏方检查时，苏方便不让其通行。 4 月 3 日，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的汉堡和巴伐利亚至柏林的交通，要求列车须经赫尔姆斯泰特驶往柏林。[339]这样柏林危机的帷幕便被拉开了。柏林地区出现了对抗性的紧张形势。

4 月 17 日，德拉特温和苏联驻德军事当局政治顾问谢苗诺夫在给莫洛托夫和军事部长布尔加宁的报告中谈到了实施限制柏林和苏占区与西欧交通措施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的管制措施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的威信。德国居民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俄国人面前退却了’，这证明了俄国的力量。”报告指出，“克莱建立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空中桥梁’的试图失败了。美国人承认，这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报告还建议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从柏林运往西占区的货物要有苏联驻德军事当局的货物运输许可证，对运往西占区的邮件实行新的规定。接下去，以保障飞行安全为借口准备限制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航空。[340]

苏联这时采取的局部封锁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建立西德，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但是如果有

可能的话，则将把西方国家的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人员从柏林赶出去，使整个柏林并入苏占区。 3 月 26 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皮克说，拟定于同年 10 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结果对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会比 1946 年更好。皮克又说，“如果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表示，“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也许能赶走（他们）。”[341]

4 月 23 日，谢苗诺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谈到了西方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人员从柏林迁往西占区的迹象。但他认为，由于他们大概想要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以抵抗我们的压力，因此，逼迫西方国家撤出这座城市未必会是轻而易举的。[342]

在苏联对柏林交通实施限制的同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德国货币改革问题上的争端又使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48 年 5 月 18 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同样的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343]

6 月 7 日，西方国家公布了筹建西德的伦敦议定书。 6 月 11 日和 12 日，苏联切断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两天。 12 日，苏联又以“维修”为由，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 16 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柏林管制总部。[344] 18 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将从 6 月 20 日起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第二天， 19 日，苏联宣布，“德国西占区发行的货币将不容许在德国苏占区和位于德国苏占区之内的在经济上是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地区流通。”[345] 6 月 22 日，苏、美、英、法四国财政专家就货币问题进行谈判，未果。此时苏联代表发出警告，将实行经济和行政制裁，以“使在柏林只有一种货币，即，苏占区货币”。[346] 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西方三国驻德军事长官，

苏联已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进行货币改革。6 月 23 日，美英法三国决定把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扩大到柏林西区。6 月 24 日，苏联当局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完全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地面交通联系，使柏林危机进入高潮。[347]在陆地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从 6 月 25 日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架起了“空中桥梁”，向西柏林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炭等急需物品。与此同时，美国等还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行反封锁，阻止向苏占区运送煤炭和钢铁等。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爆危机的直接的催发剂。令人惊讶的是，苏联采取封锁柏林这种重要行动时，它开始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术原因”。这种幼稚的手法似乎注定了苏联在以后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必然要处于下风。7 月 3 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会见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恢复柏林交通。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了这种帮助，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技术困难。同时他道出了封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和造成苏占区经济混乱的西占区货币改革。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在的技术障碍排除时，不会出现新的这方面的障碍”。[348]

虽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危机中尖锐地对抗着，但双方都没有也不敢下决心走向武装冲突。7 月 6 日，美英法三国各自照会苏联。7 月 14 日苏联复照三国。双方除了相互进行指责外，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美国等表示可以就柏林管理的分歧问题进行谈判，但强调谈判只能在封锁解除后进行。[349]苏联认为谈判不能仅仅限于柏林管制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不能与四大国管制德国的总问题分开的。[350]7 月 31 日，莫洛托夫在与美英法三国大使会谈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把讨论柏林问题与四方共同管制德国问题分割开来是不可能

的。”[351]8 月 2 日，斯大林在会见三国大使时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立场和观点。斯大林认为，是西方国家在柏林发行的 B 记马克和伦敦会议的决定引起了苏联所采取的封锁柏林交通的措施。因此如要苏联取消封锁，西方国家就必须：第一，废除 B 记马克，代之以苏占区通用的德国马克；第二，西方国家应当作出保证，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将推迟到四国代表会晤并就所有涉及德国的基本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352] 由于西方国家大使不愿意就停止执行伦敦会议决定作出保证，斯大林不再要求将这一点作为取消封锁的条件，但是他希望把苏联政府关于推迟解决西德政府问题的要求记录下来。西方代表同意苏占区德国马克在柏林流通和收回柏林西区的 B 记马克。条件是，在采取这一措施的同时，取消对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交通限制。[353]

但是，苏联的立场实质上仍然没有发生变化。1948 年 8 月 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苏联方面关于苏美英法四国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苏联的草案规定，将于 8 月 15 日废除在西占区宣布货币改革后对德国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客运和货物运输实行的双向限制。与此同时，苏占区的德国马克应成为柏林的惟一货币，由苏占区的德国发行银行调节整个柏林的货币流通。草案还规定，近期内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或四国代表的单独会谈“以讨论涉及柏林的未决问题和涉及整个德国的其他未决问题”。最让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是草案中的下面一段内容：“在四国代表的谈判中讨论了苏联政府希望推迟实施伦敦会议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决定直到上述四国代表会议产生结果时的问题。为此，西方三国代表表示，三国政府暂不处理建立西德政府的问题。”[354]1948 年 9 月 1 日，在西占区召开的制定西德宪法的议会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立场。

但是西方国家在货币问题上还是作出了让步。根据在莫斯科制定的四国政府协议，建立了由四国驻德军事长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以监督实行有关在柏林发行统一货币的措施。9 月 1 日至 7 日，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军事长官会议讨论了财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问题。莫洛托夫在给本国代表的指示中说，不能从在莫斯科达成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扩大财政委员会权力的决定上退让。美国驻苏联大使史密斯表示，“在除了有关柏林的其他问题上，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没有任何扩大财政委员会对德国发行银行实行监督的意图。”他还说，“三国代表始终承认，对财政委员会的监控不应当破坏苏联当局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责任。”[355]

苏联在谈判中没有抓住这一机会与西方国家达成妥协，而是拖延谈判，坐等“空中桥梁”行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最终屈服和让步。有关“空中桥梁”遇到困难和即将失败的情报显然误导了苏联政府。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拉季阿尼的报告就很有代表性。他叙述了他于 1948 年 11 月 20 日同联合国新闻署副署长奥登（法国人）的谈话。他说，一位奥登非常熟悉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告诉奥登，“柏林的‘空中桥梁’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军方认为，目前正值冬季，飞行条件极为复杂，全体人员都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让飞行员继续飞行。物质方面的损耗非常快。这位美国代表团成员说，美国军事指挥部和国务院担心近期内‘空中桥梁’的作用将很快丧失”。[356]

但是，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第一，柏林危机爆发后，柏林作为四国共管的的单一城市的地位已经难以维持。1948 年 12 月，柏林终于分裂为各自为政的东西柏林两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货币体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似

乎更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在去除了四国共管柏林的空壳后，西方国家获得了在西柏林不受苏联束缚的自由行事的机会。第二，最重要的是，美英的“空中桥梁”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到 1949 年春天，美国向西柏林空运的物品达到了平均每天 8000 吨的水平，这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运送给西柏林的物品基本上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锁对苏占区和东柏林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反封锁，苏占区和东柏林无法从西占区和西柏林得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钢等重工业原料。而苏占区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这就使苏占区受到了反封锁的严重打击。苏占区和东柏林的许多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紧张，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说，“可以肯定，我们的反封锁对于东德所造成的损害要大过西德。”[357]这确实并非夸大之词。

局势的这种演变，是苏联始料未及的。苏联发现，在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它已明显处于下风。这就迫使苏联在柏林危机的谈判中作出最后的让步。1949 年 1 月底，斯大林终于表态了。他在答记者问中说，如果美英法国同意把建立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不认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么障碍。[358]这是苏联方面在谈到解除柏林封锁时第一次没有把它同纠缠不清的柏林货币问题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已接近无条件解除封锁，因为推迟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对西方国家来说，已经无关宏旨。从 2 月中旬开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赛普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走向解除封锁的措施。苏联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 4000 节车厢。4 月，苏占区甚至已编制了包括西占区列车运行在内的火车时刻表。尤其耐人寻味的是，3 月 29 日，苏联驻

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原职由崔可夫将军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机期间，一贯采取强硬立场，他的离职表明了苏联立场的变化。

1949 年 5月 5 日，苏、美、英、法四国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宣布自 5 月 12 日起，取消从 194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根据协议的规定，四国于 5 月 23 日在巴黎召开了外长会议。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锁外，没有任何具体成果。而一场柏林危机最终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

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苏联和西方国家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是西方国家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因此，较量的结果并不是打个平手，而是率先采取封锁的一方——苏联的失败。封锁了一年多，苏联既没有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国家赶出柏林，倒使自己尝到一些苦果。

柏林危机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却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其一，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和合作，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的挑战为名，于 7月中旬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 60 架 B—29 战略轰炸机。其二，危机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早在封锁前，美国根据它的对外战略，就明确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联盟。1948 年 3 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之后，美国便开始同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讨论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问题。美国提议要把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和冰岛作为“垫脚石”国家也纳入大西洋安全体系中。但要实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因为北欧国家长期奉行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政策。1948 年 1 月，当英国呼吁建立西方联盟时，北欧国家的反应极为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

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359]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已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增加。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最后除了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麦和冰岛均加入了 1949 年 4 月成立的北约组织。由于柏林封锁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的危机感，促使它们加快了筹建北约的步伐。在达成解除封锁协议的一个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脱胎问世了。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在柏林问题上所表现的粗暴和野蛮，使得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军事支援，而这一点又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60]北约组织的建立当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战略的产物，但是苏联挑起危机的不当行为，起码也是加快北约组织产生进程的因素之一。

二　全面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

如前所述，战后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和立场是消极冷漠的。

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开始和苏联改变其大国合作政策，苏联的远东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进行冷战的情况下，在远东已经没有必要勉强维持雅尔塔框架内的大国合作关系。

但是，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除了美苏在欧洲的冷战这一根本原因外，还存在着一些适足促成这一转变的具体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恰好在那个时候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革命露出了耀眼的胜利曙光。

1947 年夏秋，在经历了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年战略防御的困难时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转入了全面的进攻。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新的根本任务。[361]194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陕北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362]

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在时间上恰巧与美苏关系恶化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爆发冷战同步发生。在中国，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并由此转入了战略性反攻阶段。而在欧洲，同样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标志着美苏冷战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和共产党情报局（1947年9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毛泽东于同年10月中旬和12月下旬曾经两次通过函电向斯大林作了介绍和通报。[363]正当斯大林在欧洲陷入与美国进行冷战的苦斗局面时，毛泽东在函电中向他通报的有关中国革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情况，无疑是鼓舞斯大林斗志和提高斯大林信心的好消息。因为，如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将获得一个极其重要的盟友。

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使苏联和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冷漠态度和偏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的新闻媒介增加了对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评论。12月1日，莫斯科电台在一篇广播评论中赞扬说，“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拥护。他们为着保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进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计划的斗争，并且加强了在这个斗争力量中的领导威信。一切真正的爱国分子都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起来了。”[364]12月16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方面的消息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封建反动

派及美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新高潮。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在胜利地发展中。”[365]1948 年 1 月，苏联的多家报纸全文转载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1 月 19 日《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向苏联人民介绍说，“国民党现在在一切战场上都已转入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则屡战屡胜。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进程的决定性的转折点。”[366]

1948 年 2 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检讨了苏联在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错误。斯大林说，他们曾经认为在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却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是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是正确的。[367]

正是由于斯大林对呈现出高潮的中国革命的重新认识和美苏在欧洲进行的激烈的冷战，使斯大林决定要对中共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1948 年 5 月中旬，斯大林对即将派往中国解放区的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向新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两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我们就不怕任何突发性事件的威胁。因此，对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368]6 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前往中国。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 50 名，技师 52 名，技术员和熟练工人 220 名。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止 1948 年 12 月 15 日，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 15000 公里和总长 9000 多米的 120 座大中型桥梁。[369]这对辽沈战役（1948 年 9—11 月）的胜利起了较大的后勤保障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仍然没有放弃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合作

的打算。在冷战开始的条件下能在远东得到像中共那样的盟友从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整体力量，固然是求之不得的收获。但是如果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能与苏联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从而确保苏联在华的特殊权益和远东的安全，那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此外，即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革命后的中国是否一定按照苏联所设想的轨道发展？斯大林并不太信任的毛泽东会否成为亚洲的铁托？所以，尽管因为 1947 年夏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转入了战略进攻，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且逐渐增加了对中共的援助，但是苏联并没有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维持和平和建立合作的愿望，并且令人惊讶地还要调停国共内战。

早在 1947年秋天，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会谈时，就主动要求为结束国共内战进行调停，并表示要对中共施加一些影响。同年 10 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向中国驻伊大使郑亦同提出了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苏联大使指出，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意味着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大使还表示，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说，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苏联大使建议苏联和中国就新疆、满洲和国共冲突等问题举行会谈。[370]

1948 年 1 月，罗申奉召回国。罗申回国之前再次提出了由苏联调停国共冲突的问题。 2—3 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莫斯科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中提出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处。所以，罗申在回国前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司徒雷登认为，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调处”。“从中国政

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371]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接受苏联的调停建议。这当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失望。[372]不管怎样，苏联并没有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

1948年2月，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从1948年到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罗申一直为调停而与国民党官员保持接触。他甚至这么说，苏联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373]1948年6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罗申想要美国一起参与调停。[374]同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说，罗申向他们提议进行防止中苏“冷战”的会谈。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当努力去寻找两国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罗申承诺，苏联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给国民党政府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抑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解决。同时罗申威胁道，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375]8月25日，罗申在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会谈中，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376]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接受苏联调停国共关系的建议，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377]如果说，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使得苏联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但同时又仍把国民党政府视为合

作伙伴的话，那么，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美苏冷战中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一边，拒绝与苏联进行合作，加上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的辉煌胜利，苏联已经完全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支持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将它彻底打倒。

促使斯大林积极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美苏在欧洲的冷战、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政府愈益追随美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指出的，那就是 1948 年 2 月开始的苏南冲突。

其时愈演愈烈的苏南冲突使正在形成中的苏联东欧阵营（集团）被撕破了一个令斯大林疼痛的口子，它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同美国进行冷战的整体力量。费了很大心力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情报局，还没有来得及去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找错方向和目标地被用于讨伐南斯拉夫。 1948 年 6 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谴责南共的决议虽然疾言厉色地要南斯拉夫回头是岸，但是斯大林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南斯拉夫离情报局从而也是离苏联东欧集团愈益远去。 与此同时，美国却不失时机地利用苏南冲突对苏联东欧集团推行它的“楔子战略”，试图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正当苏联在欧洲失去了它的第一号盟友南斯拉夫的时候，不期然在远东中国革命的形势竟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顺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则势如破竹。这一切预示着，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新盟友已呼之欲出。它将足以弥补失去南斯拉夫的损失而且有余；它将可以参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被用于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新的对抗和较量。所以，对斯大林来说，除了伸展双手去迎接这个未来的盟友外，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迟疑的呢？相反，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加快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 1949 年起，苏联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支持乃是从政治

上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方向上给中共提出建议和劝告，同时就涉及双方关系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并寻找解决的方法。这清楚地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与苏联合作和全然倒向美国一边，由于中国革命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苏联不再枉然地与国民党政府发展友好关系，而是努力去与即将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关系，支持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中国革命，以争取在冷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远东获得一个能保障和促进苏联权益的重要盟国。这在 1949 年 1 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电文往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总部和 6 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林在电函中告知毛泽东，国民党政府已于 1 月 9 日照会苏联政府（同时还照会美英法三国），建议苏联充当国共停战和谈的调停人。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授意下提出的。“这一建议的目的就是要宣布南京政府是赞成停止战争和建立和平的，而中国共产党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方面进行和谈的话，就会被说成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斯大林在这里对毛泽东表现出少有的尊重，他把苏联政府答复国民党政府的草案预先告诉了毛泽东：“我们准备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将赞成在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想要知道，另一方——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有鉴于此，苏联希望能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并询问它是否同意苏联的调停。我们就是这样考虑给予答复的，你们对此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你们不同意，请把更合理的答复秘密地告诉我们。”同时，斯大林也对中共如何答复国民党的和谈建议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他已经事先替中共拟

就了回答的方案："我们还认为，如果他们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大致应当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贯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的。由于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而是南京政府发动的，所以，它必须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那些发动了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不能参加这种谈判。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调停者。中共尤其认为，那个派遣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舰直接参与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大国（当指美国——引注）不能充当调停者，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在结束中国的内战方面保持中立和客观立场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就应当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不同意，就请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378]

从斯大林的电函中可以看出，第一，苏联是赞成和谈的；第二，苏联认为，发动内战的战争罪犯不能参加和谈；第三，苏联认为，卷入并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美国不能充当和谈的调停者。

1 月 11 日，斯大林又发出了一封补充电函[379]．"从前一封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为你们制订的答复国民党建议的草案就是旨在阻止和谈。显然，如果没有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充当调停者，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谈的。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蒋介石和其他战犯被排除在外，国民党是不会愿意进行谈判的。所以，我们预料，国民党将会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结果人们就会看到，中共是赞成和谈的。这样就无法指责中共想要继续把内战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就是破坏和谈的罪人，由此国民党和美国所玩弄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揭穿，而你们也就可以继续进行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380]斯大林的续电表明，他想对毛泽东补充说明的是，他提出的赞成和谈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中共去同国民党和谈，而是一种欲

擒故纵的策略。只要附上不让蒋介石等战犯参加和谈和不让美国参与调停的条件，那么，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有胆量与中共进行和谈的。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就将势不可挡。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复电[381]中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和谈的骗局，希望苏联政府不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他认为，“……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次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382]1 月 14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坚持认为应当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国共和谈。电文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和如何对付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和谈花招的办法。兹摘要援引如下：

“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

对于如何答复国民党的和谈建议，斯大林认为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议，这就等于宣布一定要将国内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还有另一种答案。这便是（1）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2）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3）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作为一个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4）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当立即停止。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不过，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人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建立和平的人。”

如果国民党接受上述条件（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

“第一，应当不停顿地采取军事行动，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 3/5 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席、 2/3 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实施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愿意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最后，斯大林提出让毛泽东暂缓他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马上派一位政治局重要委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383]

也是在 1 月 14 日（在还没有收到斯大林的这份电文的时候），毛泽东对斯大林 1 月 11 日的补充电文作出了答复，表示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在电文中说，“就基本方针而言，即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 1月 1 日在其和

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384] 斯大林在 1 月 15 日的电函中满意地指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进行‘和谈’运动。也就是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385]

苏联与中共在有关和谈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为米高扬访问中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4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8 日，米高扬一行在中共中央总部西柏坡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当前的中国革命形势、革命胜利后中共面临的任务、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和未来的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米高扬代表斯大林和联共（布），就中国革命的当前形势、革命胜利后中共所面临的任务提出了如下的建议：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米高扬认为： （1） 中共应当尽快夺取大城市，这会为共产党人提供无产阶级的基地。 （2） 不要拖延成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当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府，这样做有好处。譬如，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应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有好处。成立政府后，共产党人将不再是游击队员，而是以政府名义进行活动，这就更便于进一步同蒋介石作斗争。[386] 关于革命胜利后中共所面临的任务，米高扬建议如下：（1） 对待外国资本问题。米高扬指出，斯大林的意见是，“在外国财产问题上，我们主张将日本人和法国人的财产，可能的话，还有英国人的财产收归国有。对美国人的财产则应采取慎重的政策，目的是让美国人知道，新（共产党）政权将考虑他们的利益。”[387] （2）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米高扬指出，斯大林在 1948 年 4 月给中共的电函中说，“暂时不能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不能废除土地私有权，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不能没收依靠雇佣劳动生活的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些改革只能过一段时间再搞。”[388] （3） 民族政策问题。苏联

并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在民族问题上走得太远，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版图。应当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389]

由于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所以如何构建新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成为西柏坡会谈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主要是：（1）1945 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问题。米高扬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和中国解放运动。……这个条约对中国解放运动有一定好处，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只要日本一签订和平条约，就马上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口撤军。……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马上撤军，苏联会满足这一要求的。”[390]在中长铁路问题上，米高扬则坚持要维护苏联的“权益”。他说，“至于中长铁路条约（协定），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俄国出资修建的。……也许这个条约（协定）没有充分体现平等的原则，但是我们打算同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391]（2）关于中共同联共（布）的关系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共希望在主要问题上直接同联共（布）中央联系”。

在会谈时谈到了苏联对中共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给予中共很大的帮助，对此，中共十分感谢联共（布）。[392]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提出了各种援助要求。据米高扬说，毛泽东曾经在 1949 年 1 月 8 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科瓦廖夫的帮助下，中共正在制定在 1949 年修复整个华北即长江以北地区全长 3000 公里铁路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些最必需的物资，还需要机车、机器、设备、油以及修复华北铁路的其他物资。但除了我们自己

能够供应的物资外，我们还需要你们的紧急援助，只有当你们提供了这些物资中的一大部分时，我们才能够开始铁路的修复工作。现附上两份订货单，我们需要您帮助获得这些物资……请您审阅一下这些清单……"[393]米高扬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领导人正在着手安排落实上述及其他请求。在 2 月 1 日同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要求苏联提供一些反坦克炮和武器制造设备，并希望苏联派遣顾问来帮助组织军队、军事院校和安排后方工作包括兵器工业。米高扬表示原则上同意。周恩来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援助要求。在 2 月 2 日的会谈中，任弼时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提出了苏联可以给予的几种形式的援助：共建苏中合营经济联合企业；苏联贷款；苏联可以享有承租权。任弼时请求苏联派遣至少 500 名各种国民经济问题专家。在 2 月 3 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在解放后的中国如果要建立工业基地，没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是难以想像的。这种援助对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援助的形式可以是：（1）传授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2）为我们提供有关书籍，向我们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在 2 月 6 日和 7 日的会谈中，毛泽东请求苏联领导人向中共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用这些贷款供应一些必需的物资，并表示以后中国会连本带息偿还这笔贷款的。最后，中共领导人决定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莫斯科讨论下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以及贷款问题。[394]

米高扬访华使苏联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情况的了解和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了苏联同中共的政治关系。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9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之前，斯大林为答复毛泽东的征询提出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

和看法。斯大林强调，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成就是辉煌的，但是反蒋战争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已经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害怕人民解放军进到与中国毗连的国家的边界，将在这些国家以及在由蒋介石分子占领的岛屿上创造出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武装冲突，以便保住这些岛屿和亚洲。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进攻南方时，从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增大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条建议：（1）不要急于进行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准备工作以推进到与邻国毗连的边界。（2）从南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调两支精良部队，将其部署到港口地区，并予以充实，使其保持戒备状态，以阻止敌军的行动。（3）暂时不要缩减中国人民解放军。[395]这份电文表明，第一，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因此他要求不要急于把军队推进到边界地区以防止西方的干预。第二，电文再次证明，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缓过江的建议。

4 月 21 日，当国民党和谈代表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在中国革命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的情况下，1949 年 6月至 7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396]

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两国领导人就中国当前的局势、两党和未来两国的关系以及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这些问题既有涉及中国今后发展方向和未来中苏同盟的重要战略的，也有事关苏联对华援助的具体安排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总起来说，双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和共识。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胜利后的内政外交。7 月 4 日，刘少奇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

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中共当前面临的国内外任务以及中共的具体对策和设想等，并且请求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给予指示。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革命后将要建立的新民主国家“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革命后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斯大林批语：对！）”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1）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斯大林批语：对。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划上着重线。）（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斯大林批语：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斯大林批语：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斯大林批

语：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斯大林批语：对。）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斯大林批语：对。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上双着重线。）”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斯大林批语：对！）”

（二）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1.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报告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批语：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斯大林批语：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斯大林批语：对！）”

2. 对待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 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3)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那一种方式为好？（斯大林批语：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397]

（三）关于苏联对中共的各种援助和支持。在这方面苏联既有给予满足的也有予以拒绝的。

1. 新疆问题。在 6 月 27 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对于解放新疆，斯大林表示“我们可以提供 40 架歼击机”以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398]

2. 台湾问题。7 月 11 日，在由中共代表团列席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刘少奇 7 月 4 日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无法在军事上支持中国解放台湾。他强调，由于战争，苏联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国家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流域一片荒芜。苏联如果在军事上支持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从而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斯大林几近危言耸听地表示，“如果我们这么做，俄国人民将不会理解我们。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我们无视其所遭受的灾难和作出的努力，因为我们的轻率而抛弃我们……”为此斯大林建议召开有军事首脑和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399]刘少奇

在与北京进行了联系后，在7月27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说他已被授权撤回中共中央对台湾问题的请求。[400]而就在两天前（7月25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文中还叮嘱他在台湾问题上请求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电文说："从受到封锁之日起，上海的严重困难更甚。但是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必须占领福摩萨（即台湾——引注），但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们同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莫斯科在6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技术人员。除此之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和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在占领福摩萨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也要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军进攻台湾的时候，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都将被我们占领。"[401]由于斯大林不支持，中共只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向苏联谋求援助的努力。

3.给予贷款和派遣专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对中共的满足是最大的。斯大林在刘少奇甫抵苏联的第二天（6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便慷慨地表示将向中共提供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双方议定，苏联将分期分批地向中国派遣各类专家200余名。刘少奇访问结束时，约有80多名苏联高级专家与他同机抵达中国。[402]

4.军事援助问题。双方初步拟定的援助项目有：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派一支分舰队去协助中国青岛的海防、为中国的海域进行扫雷、为中国创办一所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厂等。[403]

刘少奇访苏是继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使双方收获颇丰和均感满意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交流，它使中苏两党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特别是它使中共的国内政治路线和未来的对外

政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与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政策）得到了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认可和信任，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中苏战略同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感到喜悦和欢欣，是因为它的大政方针得到了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批准；是因为在它刚刚踏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就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哥”为其铺路和护航；是因为在它经历了一场夺取政权的内战后可以依靠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来学习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苏联感到高兴和满意，是因为它的远东安全和在华权益较之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将更有保障；是因为在以它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和阵营中有了未来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新盟国，无需再为走脱一个南斯拉夫而伤感和悲哀；是因为在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进一步的冷战中苏联集团的整体力量将会大为增强。

三　反对和抵制美国对日媾和

与涉及美苏两国对外利益（主要是欧洲利益）核心的德国问题不同，日本问题在美苏冷战爆发之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所以，对日媾和并没有在战后立即被提上日程。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满足于对日本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占领；美国则利用它单独占领日本本土的有利条件，撇开所有盟国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在日本进行美国式的改革。虽然苏联反对美国独家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但是却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404]

1946年底至1947年初，美国国务院开始组织起草对日和约。同年3月，拿出了被称为“博顿方案”的初稿。[405]博顿方案表明，在美苏冷战前，美国有不少人（主要是在国务院）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视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406]但是当美苏冷战爆发后，美苏两国在日本问题上的意图和目的就

变得截然对立了：美国试图使日本成为西方集团的一员，并保留在日本的军事基地；苏联则不仅要实现战时对日本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化，而且不允许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

在博顿方案之后，紧接着出台的是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媾和方案。1947 年 3 月 17 日，麦克阿瑟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必须与日本媾和的时刻已经到来”。以后，麦克阿瑟对日媾和的设想更见具体化，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建议 1947 年夏天在东京举行和会；（2）缔约后 6 个月之内撤退一切占领军队；（3）允许日本在和会上表述意见并拥有表决权；（4）美国应推动各国在不论有无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约；（5）倘若不行，美国可以同日本单独媾和；（6）必须订立一项能有助于保证和平的条约，而不是像凡尔赛条约那样在 25 年之内制造另外一场战争的和约。[407]这是美国最早公开提出的对日媾和方案。它的要害在于：扶植日本和对抗苏联；可以没有苏联单独对日媾和。虽然，美国国务院声明与麦克阿瑟的方案没有关系，但麦氏的方案显然推动了美国对日媾和的步伐。7 月 11 日，美国副国务卿希尔德林提出了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该建议的要点在于：不是在四国外长会议上，而是在远东委员会里举行美、苏、英、法、中等 11 国代表会议，磋商对日和约问题；会议的表决程序倾向于采取 2/3 的多数表决制。[408]坚持大国一致原则的苏联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而使自己在委员会里处于孤立的少数地位。苏联于 7 月 22 日答复美国建议时，提出就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事先进行讨论并由它来准备对日和会。[409]

在美国第一次对日媾和努力失败后，同年 10 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负责人凯南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推迟对日媾和的建议。凯南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如过

早地结束对日本的管制，就很难制止共产党的渗透，因为目前看不出日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有任何可靠的保证。因此他建议，要放慢步子，最好把会议拖到 1948 年春天。凯南认为，用逐步修改占领制度的办法，美国有可能在日本实现一种“事实上的和平”。报告突出强调苏联通过日本共产党加紧渗透的威胁，建议美国托管或租用日本部分领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410]凯南建议的实质，是要美国利用没有和约的情况，通过对占领体制的修改而确立美国未来在日本的支配地位。而这时的远东局势的重大变化又使凯南的想法更加具体化。

1948 年，中国革命正在快速发展，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已经露出崩溃的迹象。中共的胜利将使苏联在远东获得一个新的重要的盟友，并由此改变雅尔塔协定构筑的远东政治格局。这种不妙的前景促使美国从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和作用。

1948 年 2 月，凯南赴日与麦克阿瑟磋商对日媾和问题。在这之前和访日期间，凯南提出了两份关于日本问题的报告。凯南认为，在欧洲继续执行马歇尔计划以遏制苏联扩张外，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应当使日本和中国相互易位，即把扶持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凯南预见到中国将会被共产党所掌握，由此他排列出远东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三种可能的阵式：（1）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2）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3）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坏。凯南认为，“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如果日本和菲律宾掌握在友好政权手里，而美国对这两个列岛保持有效的控制，在现代的东方就不会对我们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由此，凯南提出的美国

新的远东战略目标是：“（1）在中国停止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并谋求恢复美国对华的超然姿态与行动自由。（2）制订对日本的各项政策，以便保证其安全不受苏联的军事侵犯，同样也不受共产党的渗透，并使日本经济潜力再次成为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3）允许菲律宾独立，但是在方式上应保证该列岛继续成为太平洋地区美国安全的坚强壁垒。”[411]

凯南回国后于3月25日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新方针的报告。新方针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减少和约的惩罚性质；和约缔结后美军应继续留在日本；不排除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性；将日本的经济恢复置于首要目标；保留盟军总部和远东委员会等机构。[412]

1949年下半年，在欧洲，柏林危机以苏联的失败而结束；德国在美苏争夺中宣告分裂，东西德各自进入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冷战下的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进一步加剧。而在远东，形势则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在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最大城市上海后，继续向其余地区挺进。中国革命已经基本上取得胜利。远东的地缘政治地图由此将重新绘就，苏联将在这张地图上插上一面红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便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急剧上升。

1949年9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英国外交大臣会谈后表示，他们已经就对日和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苏联反对也要召开和会。随后，法国也附和了美英的立场。10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草拟了“美英对日和约”初稿。其主要内容是：除少数限制外，日本应恢复主权；远东委员会和盟军总部等解散；不设任何控制或监督机构；日本应付赔偿等。军方主要由于担心媾和后日本“中立化”和苏联的举动

不同意国务院的方案。可是麦克阿瑟支持国务院的立场。但他表示，应在和约之外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使美国能够继续驻军日本。这时，日本方面的主动态度消除了美国的难处。1950年4月，吉田内阁大藏相池田访问美国，表示希望尽早媾和，在缔结和约后，美军将继续留在日本。如果美国有难处，可由日本主动提出这一要求。[413]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其发表的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务线”是：从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琉球群岛。[414]这就明确地把日本划入了美国的防务线之内。这是与此前（1949年12月23日和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号和48/2号文件提出的亚洲防御政策相吻合的。48/1号文件认为，在中国革命后，如果日本也加入苏联集团，那么苏联的亚洲基地就能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48/2号文件说：“从军事观点看”，“美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和战争目标，显然现在都不在亚洲”，“目前的基本战略概念应该是在‘西方’搞战略进攻，在‘东方’搞战略防御”。因此，“重要的是以最低限度的军事人员和物资确保‘东方’战略防御的胜利，以便把主要力量投入‘西方’”。[415]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通过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正式结成盟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使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以便在缔约后使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在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的推动下，1950年9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了一个联合方案（即国家安全委员会60/1号文件），它成为美国对日和约的基础。[416]

1950年10月26日，杜勒斯在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会晤中向他递交了美国关于对日和约七项原则的备忘录。[417]美国开始时想同苏联进行秘密讨论，因此美国并未公

布七项原则的内容。只是11月24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苏联自己的备忘录作为对美国的答复时，美国的七项原则的内容才为人们所知晓。七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3.领土：日本（甲）将承认朝鲜独立；（乙）同意由联合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而以美国为管理当局；（丙）接受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联、中国及美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群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如果在条约生效后一年以内不能获得决定时，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之。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将予废除。

4.安全：条约应规定，在未来采取另外的、诸如由联合国担负有效责任等满意的安全措施之前，日本的设备与美国的或其他军队之间有继续合作以维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418]

在这之前，杜勒斯曾经于9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美国对达成对日和约的基本立场。他谈到，可能不需要召开和会，所有必要的预备工作可以通过同有关国家政府举行双边讨论的方式来完成。[419]

11月20日，苏联政府在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美、英、苏、中和其他一些国家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承担了不与敌国单独媾和的义务。苏联要求解释，对日和约打算是由美英苏中四国以及其他积极参加了对日战争的国家来签订呢？还是可能仅仅在由上述国家中某几个参加下单独签订和约呢？苏联还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问题已由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予以解决了。雅尔塔协议则已规定把萨哈林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归还苏联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对于美国提出的托管日本的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的根据，苏联提出了质疑。苏联强调，美国没有提出从日本撤军的日期，目的是为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继续保留美国在日本的

基地。[420]应当说，苏联的备忘录触及了美国的痛处。但是美国媾和的目标就是，不管怎样，日本都必须归入西方集团之列，特别是在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的情况下。

12 月 28 日，美国对苏联的备忘录给予了答复。美国认为：(1) “美国政府希望所有与日本作战的国家都能参加缔结和约。但是，美国并不认为：任何一国有永久不变的权力可以否决其他国家和日本缔结和约”。(2) 对于开罗宣言，美国认为“应该考虑各种有关因素的任何最后和约决定”，应该参照联合国宪章考虑开罗宣言等协定。(3) 美国认为它打算对日本一些领土实行托管制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77 条的规定，托管制不等于“领土扩张”。(4) 由于和平与安全没有建立等原因，日本可以与美国等一起参加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单独或集体防御措施。它可以包括美国等国军队驻扎在日本。(5) 关于和约后日本的安全问题已经答复过了。(6) 美国没有限制日本的和平经济发展。(7) 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对日媾和进行会谈，是因为美国与它没有外交关系。[421]

1951 年 3 月 30 日，苏联驻美国使馆收到了美国国务院 3 月 29 日的照会，内含一份秘密备忘录及有关对日和约草案的附件。照会说，美国的这份草案仅仅是作为建议提交苏联政府审议。草案共有 22 点内容。其要点是：

3. 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和澎湖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放弃委任统治地和在南极洲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

4. 美国可建议联合国把北纬 29 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包括罗萨里奥岛（西之岛）、火山岛（琉璜岛）、巴列斯维拉岛（冲之岛）、马尔库斯岛（南鸟岛）在内纳入自己的托管体系。日本同意接受这些建议。

5. 日本把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归还苏联，把千岛群

岛转交苏联。

7.盟国承认日本具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和参加集体安全的协定。

14.日本已无力支付战争赔偿，但盟国有对日本放弃的领土之内的和对由盟国管理的领土之内的日本财产和权益等的支配保留和处理权。

19.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权利法律基础或利益。[422]

从中可以看出，关于美国的托管权和日本的自卫权，实际上就是要确保在缔约后把日本纳入西方国家的轨道之中。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草案要点在于它对日本领土的托管。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没有提它的归属。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

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一条规定是附加了条件的，在美国国务院给盟军总部的电文中说，“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423]3 月 19 日，杜勒斯在同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议员们谈话时，对这一规定也作了解释。他说，如果苏联不参加条约，就将被剥夺从条约中得到的任何好处。杜勒斯还称这种挂钩是一种“诱饵”，虽然他也认为，这种挂钩价值不大，因为这些领土已被苏联占领。[424]

在有条件地同意苏联对日本北方领土的占有方面，日本政府的立场同美国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日本首相吉田对美国表示的态度是：“（1）把南萨哈林（库页岛）归还苏联和千岛群岛转交苏联的这一条款在苏联将成为和约参加国的条件下是可以接受的……（2）如果苏联明确退出媾和，希望有关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的规定将予取消。”[425]

台湾当局对于美国草案中领土问题的规定是不满意的。它要求，或者明确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或者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也作同样的不明确的规定，即，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不提其归属。[426]

1951 年 5 月 7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详细地阐述了苏联政府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并批评了美国的和约草案。

关于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意见书认为，根据波茨坦会议设立的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首先是为了“和约的准备工作”。如对意、罗、保、匈、芬的五国和约就是依据这一规定准备和签订的。“根据上述波茨坦协定，拟定对日和约的工作当然是已经委托给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苏联政府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不让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是不容许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在远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媾和。”“苏联政府曾经始终坚持尽速缔结对日和约，认为和约的起草必须根据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订的国际协定，和约草案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与英国四国的代表共同准备，并使远东委员会所有的会员国参加。”因此，苏联建议，“在 1951 年 6 月或 7 月，召开美、中、英、苏四国代表组织的外长会议，着手准备对日和约，并应顾及使所有曾以武力参加对日战争之各国代表参与制定对日和约的筹备工作，以便将和约草案提交和会审议之。”

关于和约的目的和内容。意见书提出，“草拟对日和约的工作应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进行，并以下列主要目的为指导方针：甲．日本应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乙．应保证日本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不得允许以剥夺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或军

事化的组织之存在，与对意大利和约中所规定者相同；丙．为保证日本军国主义之不复活，在条约内应确定对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之限制，使此等武装力量不超越自卫之要求。与在对意大利和约中所规定者相同；丁．对日本和平经济之发展，不应加以任何限制；戊，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上，应取消一切限制。”“日本不得参加任何反对任一曾以军队参加对军国主义日本作战的国家的联盟。”“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后一年之内，一切占领军应撤出日本领土，外国不得在日本保有军队或基地。”

关于领土问题。意见书指出，草案仅仅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而未提其归属，这是违反开罗宣言关于把它们归还中国的协议的。意见书认为，假借联合国托管，把日本的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交由美国管辖是“毫无理由的”。

关于军事问题。意见书认为，草案没有对日本军队作任何限制，等于是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草案没有规定占领军撤出的日期，目的“就是使美国占领军在缔结和约以后继续留驻日本并保有军事基地”。[427]

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照会认为美国的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打算在缔约后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将会破坏远东的和平事业。照会重申，“第一，对日和约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单独的，因此，不应该排斥任何一个参加过对日战争的国家，不让它参加和约准备工作和签字。第二，对日和约的拟订必须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与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第三，为了研究现有的各种对日和约草案，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以军队参加对日战争的一切国家的代表的和会。”[428]

但是，美国依然我行我素。在与苏联交涉的同时，美国还

与英国等其他有关国家进行了紧张的双边会谈。[429]在一切准备完毕后，7月6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附有美英关于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的备忘录。备忘录希望尽早得到苏联方面的意见，并通知说，将在7月20日或20日左右“根据美英政府的共同倡议”向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散发条约草案。[430]

苏联在接到美英备忘录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7月18日，副外长葛罗米柯把答复美英7月6日备忘录的复照草案送交斯大林审阅。葛罗米柯指出，“在7月3日的和约草案中既没有规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没有规定让蒋介石‘政府’签订和约。那时在3月30日的草案中规定远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参加和约的签字，而国民党集团在远东委员会里占有席位。此外，在3月30日的美国草案里规定，日本把萨哈林（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归还苏联，把千岛群岛转交苏联。7月3日的草案与此不同，它只是说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只字未提把这些领土交给苏联。”[431]

还未及斯大林批复下来，美国和英国大使又于7月20日向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照会包括一封请苏联政府出席1951年9月4日召开的旧金山和会的邀请信。同时还转交了对日和约草案、以日本名义发表的两份宣言草案以及一份有关契约、时效期、有价证券和保险合同的议定书。照会要求苏联政府提出意见，但同时通知说，不管这些意见如何，最终文本将于8月13日公布。[432]此外，美国大使科克还拿着笔记作了如下的口头声明：（美英）两国政府对条约的准备工作进行了10个月。所以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制订条约，仅仅是为了签署8月13日的美英草案（将于8月13日公布——引注）。[433]至此，苏联实际上已经被美英逼上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参加由美英一手筹划和包办的和会，那只能坐在充当美国陪衬的席位上；倘若拒绝与会，那么就无法从和会那里得到占有库页岛南

部和千岛群岛的批准书，这将使对日本领土的占领失去法律根据。

7月21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送上了对美英答复的新照会草案。草案仍表示要恪守苏联政府在5月7日意见书和6月10日照会中的立场和论据。草案谴责美英充当召开和会的邀请国。草案指出；二战期间或二战结束后所签订的协定没有哪一个授权这两个国家担负这种角色。美英政府擅自充任这一角色，竭力要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于对日和约准备工作之外，不让它们作为邀请国参与召开会议。草案说，苏联政府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准备对日和约和召开和会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的国际协议。草案表示：如果审议对日和约问题的会议在下述基础上召开，苏联政府就准备参加，即，会议能使所有有关国家能够讨论草案并最后能签订一项全面的对日和约。为此，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指出，根据它5月7日的意见书和6月10日照会中提出的理由，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么，上述会议就不可能在制订和签订对日和约方面是有全权性的。草案认为，会议的工作不应受某个方案的限制，会议应当讨论与会国可能提出的所有草案以及与会国无论是通过外交渠道还是在会上首次提出的所有建议和意见。[434]但是这个草案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8月1日，修改过的照会草案提出应当拒绝参加会议。理由是：美国政府召集和会是“为了把美国单独制订的和约强加给与会国……与会国实际上只能在会上遵从美国政府提出的和约从而给这一和约披上合法的外衣。不言而喻，苏联不能参加这种与在远东建立持久和平目标相悖的和会。”[435]8月8日，照会草案送交斯大林。

8月10日，联共（布）中央就对日和约问题通过了专门决定：苏联将参加和会。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内容如下：

1 认为苏联参加定于今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是合适的。

2.批准由葛罗米柯为团长的苏联参加和会的代表团的组成。

3.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发言时应当批评美英的对日和约草案，指出该草案明显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最重要的原则，特别是有关日本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恢复日本人民的主权和独立以及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草案中被粗暴地破坏了。

代表团应该指出，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提案不是一种和平条约，而是在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方案。

4.苏联代表团应当就草案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条款，首先是涉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条款进行修正，争取通过这些修正来取代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的有关条款。

5.如果会议的既定程序不允许对美英和约草案进行逐字逐句地审议从而排除了对个别条款进行修正的可能的话，那么代表团应当按照第3和第4条指示，声明将投票反对美英整个草案。

6.如果美英条约草案被会议多数所通过或者不经讨论就签订条约，苏联代表团应当按照本决定的第3和第4条规定的指示发表声明，鉴于代表团已陈述过的理由和非法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次会议以审议对日和约，苏联代表团认为不可能签署美英政府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

7 批准就美国今年7月20日照会给美国政府的复照草案和致罗申同志的让其把苏联政府参加旧金山和会的决定转达给周恩来的电文草案。[436]

8月12日，苏联在照会中通知美国，苏联将派团参加旧金山会议。[437]苏联的这一决定，多少有点出乎美国的意料之

外。[438]为了阻止苏联与会，美国驻苏大使在 8 月 16 日的照会中说，“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误会，美国提请注意，邀请信中已指出，美英政府‘将散发和约的最终文本’，并且已经这样做了。邀请信指的是‘以该文本为条件缔结和签订对日和约’。”他接着说，“旧金山会议不是为恢复关于和约条件谈判的会议。未来条约的条件已经由频繁的多边谈判而确定了。这些谈判实质上就是一次持续 11 个月的和会，它在 1950 年9 月中旬就开始了，其最终结果具体反映在 1951 年 8 月 13 日（散发）的文本里。”[439]

也是在 8 月 12 日，苏联外交部指令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中国总理周恩来：“苏联政府认为，苏联难以拒绝参加上述（旧金山）会议，因为这种拒绝可能会被舆论认为，苏联不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苏联代表将参加旧金山和会并力争通过苏联的建议。并力图通过苏联的建议。不言而喻，我国代表团将在会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问题，没有它的参加，对日和约是不能缔结的。我们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会议的情况。”[440]

8月 15 日，苏联收到了与 7 月 20 日草案基本相同的和约的最后文本及其附件。对此，维辛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美英今年 8 月 13 日的和 7 月 20 日的对日和约草案在下述重要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1）领土问题；（2）关于结束对日本的占领；（3）占领军的撤出；（4）外国军事基地；（5）日本同外国签订军事协定；（6）限制日本的武装力量；（7）关于对日和约的批准程序。”[441]

与此同时，苏联也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和约草案。苏联的草案由序言和十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包括领土的决定

第 2 条　除了本条约第 3、5、7、9 条规定的那些领土和

岛屿外，日本的主权将及于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以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罗萨里奥群岛（西之岛）、火山列岛巴列斯维拉岛（冲之岛）、马尔库斯岛（南鸟岛）、对马岛和1941年12月7日以前属于日本的其他岛屿。

第3条　日本放弃对朝鲜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济州岛、青山岛（哈密尔顿港）和郁陵岛的权利、权利根据及其要求。

第5条　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满洲、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宣德群岛、中沙群岛）和包括南威岛在内的南沙群岛的全部主权，放弃对此条款所列领土的权利、权利根据及其要求。

第7条　日本承认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和千岛群岛拥有完全的主权，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权利根据及其要求。

第二部分　政治决定

第10条　日本必须废除所有妨碍日本人民的民主趋势再生和加强的障碍，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有人权和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信念自由和集会自由。

第15条　日本不得加入针对那些以自己武装力量参加了对日战争的国家的联盟或军事同盟。

第四部分　有关陆海空军的规定

第21条日本的陆海空军武装和设施将严格限制在仅符合自卫目标的范围内。

第五部分　盟军的撤退

第28条

1.盟国和联合国家的所有武装力量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从日本撤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本条约生效之日起的90天。

2. 在盟国和联合国家的武装力量从日本撤出后，无论是哪个盟国和联合国家以及无论哪一个其他外国都不能在日本领土上拥有军队或军事基地。

第八部分　一般经济关系

第 34 条　不对以满足日本居民需求和发展符合日本和平经济需要的出口为目的的日本和平工业加诸任何限制。

第九部分　专门规定

第 37 条

1. 拉彼鲁兹海峡（宗谷海峡）、根室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应实施非军事化，并永远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

2. 上述本条第 1 款所指的海峡仅对日本海周围国家的军事船只放行。

第十部分　最后决定

第 40 条　所有在二战中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以及朝鲜、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均可加入本条约，加入后就本条约来说，将被称为盟国和联合国家之一。

第 41 条　本条约将交盟国和联合国家批准，条约的俄文、英文和中文文本同等准确。条约也应由日本批准。在苏联、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交存批准书后立即生效。[442]

从苏联的和约草案中可以看出，其要点是：实现对日本的领土要求，阻止日本成为西方国家集团的一员，限制日本的军备，不允许缔约后美国军队继续留驻日本，不允许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宗谷海峡、根室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实现非军事化。其目的就是要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冷战的同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利益。

8 月 8 日，苏联的和约草案呈交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又指示苏联外交部对草案进行修改。修改的方向是，“应能推翻美英的草案，揭露它作为和约草案是站不住脚的”。 8 月 15 日

苏联外交部进行修改后又将草案送交斯大林审议。修改的条款有：关于领土问题（第 2 和 3 条）；关于占领军从日本撤出和不允许在日本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第 6 条）；关于从日本遣送人员的问题（第 14 条）；关于条约的批准程序和生效程序（第 23 条）。另外，还新增了一些条款，如，关于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组织的复活；关于禁止生产原子武器等。[443]

8 月 20 日，在代表团临行前，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给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指示对了解苏联领导人在最后时刻的立场、想法和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兹援引如下：

“按照已批准的指示，代表团在会上应按下列方式行事：

1. 不要对会议主持问题表现出积极性。

2. 就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除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我们还要力争同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国家预先达成它们支持苏联对该问题建议的约定。

代表团还要搞清楚同上述代表团就它们支持苏联代表团提出有关结束外国军队占领日本和外国撤军以及不允许任何外国在日本领土上驻扎军队的建议达成约定的可能性。

搞清楚同上述国家以及菲律宾代表团就它们支持苏联有关向日本索赔的建议达成约定的可能性，但是不必泄漏我们在这方面的打算。

在上述情况下，还要注意到让上述某个代表团提出苏联将予以支持的有关建议的可能性。

3. 如果会上反对讨论我们的修正案或者予以否定，并且如果提议实际上不经讨论就签署条约，那么代表团就应发表声明，拒绝讨论我们的修正案和拒绝讨论任何其他国家就对日和约提出的修正或建议，就是破坏召开国际会议时普遍适用的基

本的民主原则。这种拒绝无非就是试图以强制的方式把美英的对日和约草案强加给具有平等权利的与会国。

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参加条约的签署。

4. 在讨论苏联提出的建议时，代表团应当主要注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和讨论对下列问题的修正：领土问题；和约签署和外国军队从日本领土上撤出后占领的结束；禁止外国军队在日本领土上驻扎和拥有军事基地；禁止日本参加联盟或军事同盟；实现日本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关于日本经济和对外联系的自由发展。

5. 如果其他亚洲和欧洲的代表团没有提出对美英对日和约草案进行逐条表决或总体表决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就不应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其他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我们就支持。

6. 授权代表团在退出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批评美英对日和约草案，解释苏联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立场，详细阐述我们对美英和约草案的主要的修正。”[444]

尽管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可谓是比较细致和周密，但是其基本立场仍没有脱离 5 月 7 日的意见书和 6 月 10 日照会的窠臼。以这样的立场赴会遭到惨败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因为美国人早就严阵以待，它只消利用其会议主持国的身份和会议的多数便能轻松地挫败苏联的意图。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1951 年 9 月 4 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开幕。[445]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支持苏联这一动议的只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葛罗米柯在发言中还提出了对美英草案的修正和苏联方面的新条款。美国代表艾奇逊以不符合会议议程为由，阻止了对苏联提议的讨论。 9 月 8 日，举行了对日和约的签字仪式。共有 49 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和约。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签。[446] 随后，葛罗米柯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怒地谴责和约是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之

间的一宗单独的交易。他认为，这项和约不可能成为远东真正和平进程的基础。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旧金山和会重新构筑了远东的政治格局。从此，在远东也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中苏同盟与美日联盟的对立和对抗。旧金山和会，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强化了美苏冷战的全球格局。

如果说，1948—1949 年的苏联封锁柏林是它在冷战开始后因判断错误而主动采取的一次贸然草率的行动的话，那么苏联在对日媾和过程中的举措和行为则显得消极和被动。对于美国要把日本纳入西方阵营并且在和约缔结后继续在日本驻军的试图，苏联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它的应对之策却是失误的。苏联先是自乐于对日本北方领土的军事占领。然后在 1947 年美国正式开始准备对日媾和后一直到 1951 年和会正式召开前夕的几年的时间里，苏联除了强调诸如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反对美国驻军日本长期化等抽象的原则外，从未积极主动地拿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来。在美国频繁地进行媾和外交的时候，在美国接二连三地抛出和约草案的时候，苏联要么是宣布自己与美国的媾和活动无关，要么就是不顾实际地一味说“不”，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当最后美国主宰媾和局面已经形成并且宣布它的对日和约草案不可变更的时候，苏联却过迟地拿出了自己的草案来。殊不知，回旋的余地没有了，一切都已无法改变。美国连讨论苏联方案的机会都给剥夺了。

对于苏联来说，惨败的局面并非预先注定。在这之前至少事情的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即除了美国全赢和苏联全输（如最后的结果）外，还存在着美国多赢苏联少赢（如，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性盟国并让美军继续驻扎日本；苏联按照和约合法地获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和会并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它[447]）、美国虽赢但苏联不

输或少输（美国把日本变成自己的盟国并驻军日本；苏联得到上述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斥于和会之外）。事实上，美国的方案刚出台时，不仅有关的亚洲国家（还有澳大利亚），甚至它的坚定盟国英国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苏联外交没有去进行积极有效的努力，实际上是消极无为地坐视美国最后与英国等国达成协议。

从当时美苏在欧洲的冷战情况来看，远东的政治格局按照下述趋势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与美国和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分别结盟并进行对抗。另外，由于美军占领着日本和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主持下进行了多年的西方式的改革以及美国在与对日媾和有关的国家中所拥有的影响和支持，这些都决定了对日媾和的主导权非美国莫属。如果苏联承认这些虽然令人难受但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它对美国的媾和方案就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的灵活性，首先是确保实现雅尔塔协议对苏联的领土承诺（美国原先的方案是规定日本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的，前提是苏联参加和约），而不是去提出肯定不会被对方所接受从而使自己处于败局的那些建议。苏联始终如一地主张必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和会，固然反映了它对自己的盟国负责的态度，但不顾实际情况地坚持这种立场而不采取某种变通的策略，表明苏联的对日媾和政策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苏联拒签和约也是它为巩固同中国的同盟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所以，苏联代表团的旧金山和会之行对于苏联来说虽然是一无所获的失败，但惟一令苏联可以感到宽慰的结果就是，因为会议排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最终没有签署和约，苏联同中国的同盟更加巩固了，而这在朝鲜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并非没有意义。

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美苏在欧洲冷战的进行和它们在朝

鲜战争中的较量，苏联除了坚决反对和抵制美国的对日和约方案外，还重新开始加强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1951年4—5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等来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日本国内的局势并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和帮助。[448]通过斯大林的“循循善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制定了把反对美国占领作为党的主要任务的日共纲领。斯大林指示说，“为了使这个纲领成为全日本共产党的纲领，要在东京的中央全会和各地党组织的会议上好好讨论它，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这个文件。”[449]

注 释

[1]《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见《斯大林文选》，第462—468页。

[2]《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斯大林文选》，第469—470页。

[3]《苏联武装部部长命令》，《斯大林文选》，第473—474页。

[4] 1944年7月起，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正式开始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任该部的实际领导人。该部有一个机构是由205研究所、100研究所和99专门研究所与联共（布）共产党外国局组成的，以前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外国共产党人就在这一机构内工作。（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案卷703。）通过该机构，联共（布）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原来经共产国际对其他各党的领导事实上仍然存在。战争结束后，以前在共产国际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由苏联返回各自的国家（季米特洛夫则于1945年11月返回保加利亚）。同年12月底，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1946年4月苏斯洛夫就任该部主任。仍有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继续在该部的一些机构特别是专门的研究所内工作。这些研究所的职能是收集和分析情报，培养干部，通过信使或秘密无线电系统与外国共产党保持联

系。（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11，参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36—137 页。）

[5] 迪吉耶尔：《铁托》，贝尔格莱德，1953 年，第 470 页，转引自同上，第 134 页。

[6]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会议没有留下记录。

[7]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 f. 8/14，转引自匈牙利乔包·贝克什：1946 年初期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载美国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月，第 136 页注 5。

[8] 这与斯大林与其他党的领导人谈话的方式是一样的。斯大林在谈到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总是先严厉地批评共产国际，并保证不会恢复这样的国际。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各党对成立类似于共产国际的新的国际组织的担忧。

[9]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 f. 2/34，转引自：1946年初期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第 135—136 页。需要指出的是，拉科西是联系各党努力去创造和实现本国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条件和任务来论述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必要性的，并认为目的是交流经验和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计划。这与斯大林所要建立的包含更广泛目的（如还有协调行动）的新的国际组织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斯大林在与某些党的领导人讨论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从来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10] 铁托是在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党关系紧张时提出上述建议的。铁托认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奉行的孤立政策“破坏了工人统一战线”。（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 0144，目录 30，卷宗 118，案卷 15，页码 64，《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35 页。）

[11]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党的中心档案馆，全宗 1，目录 5，案卷 3，页码 138，转引自同上，第 136 页。根据迪吉耶尔的说法，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情报局打算有时候交流经验，通过一些决议。但是与共产国

际不同，对于不同意这些决议的共产党，它们可以不必执行这些决议。在与铁托会谈时，斯大林提议由南共来做建立情报局的发起者。接着在同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斯大林问谁应当做倡议者？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回答是铁托。但铁托说，如果法国人能做倡议者，那就最好了。（迪吉耶尔前引书第 471—472 页，参见同上，第 134—135 页。）

[12] 记事手稿中未注明日期，但内容是写在南通社的 1946 年 6 月 12 日通报的反面页上的。铁托档案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I－3－c/11，1．1－2，参见同上，第 135 页注 17。

[13] 铁托档案馆同上，转引自同上，第 135—136 页。

[14] 匈牙利打算安排这一多党代表会议在匈共三大（拟于 1946 年 9 月 28 日开幕）期间召开。匈共领导人以为这一建议会受到联共（布）中央的赞扬和支持。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苏联并且希望联共（布）能派代表参加这一会议。（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916，页码 1，转引自同上，第 137 页。）

[1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916，页码 1；全宗 77，目录 3，案卷 109，页码 4—5，转引自同上，第 137—138页。

[16]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小节：《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分析和批判》。

[17]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第 92、94 页。

[18] 《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 1974 年，第 121页。

[19] 《斯大林文选》，第 491—494 页。

[20] 由于哥穆尔卡这次访问苏联是非官方性质的并且未加报道，所以尚没有资料证明访问的确切日期。波共活动家普塔希斯基在根据他同哥穆尔卡谈话为基础撰写的书中说，至少在 1947 年夏天之前，斯大林已经与前来莫斯科的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一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必要性。（《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4 期，第 138页。）据《哥穆尔卡》一书的作者韦尔布良说，波党著名

的活动家洛戈一索温斯基后来证实，这次谈话是在 1947 年春天哥穆尔卡访问莫斯科时进行的。（韦尔布良：《哥穆尔卡》，华沙， 1988 年，第 505 页，转引自同上。）

［21］同上。

［22］纳林斯基：《1944—1958 年法国的阶级斗争与政党斗争》，莫斯科，1983 年，第 101—105 页，转引自《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24—25 页。

［23］该信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于 6 月 3 日由法国驻苏联使馆转交给多列士的，要求多列士可以全文或部分抄录该信，但信的原件必须立即销毁。（《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 年)》,同上,第 25 页。)

［24］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2,页码 33—34，参见同上。

［25］吉比安斯基：冲突的起源：巴尔干症结，载《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 年，第 2 期，第 173—174 页，《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4 期，第 142 页。

［26］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 年)》,纽约，1973 年，第 53—54 页，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 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第 122—123 页。

［27］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的电文， 1947 年 6 月 24 日，引自塔赫年科：《对一项政治决定的解剖——文件选辑》，载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1992 年，第 5 期，第 121 页,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2—13 页。

［28］莫洛托夫致苏联大使列别杰夫的密电， 1947 年 7 月 8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58，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同上，第 18 页。

［29］据波党另一位领导人贝尔曼在回忆录中说，在他于 1947 年 8 月 22 日同斯大林等人的会谈中还谈到了让更多的共产党参加会议的问题，这些党包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共产党。但斯大林把它们从名单中划掉了。斯大林认为，这些党的活动家里有些人是可疑的，莫斯科对他们知之甚少。贝尔曼说，斯大林对他谈了建立情报局的想法，

然后他向哥穆尔卡作了通报。贝尔曼还说，在会谈中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曾经提议把苏联的克里米亚（雅尔塔）作为未来会议的地点，但被斯大林否定了。他主张选择波兰为会议的地点。（《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4 期，第 139—140 页。）

[30] 同上书，第 138—139 页。

[31] 同上书，第 142 页。

[3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0，页码 11，参见同上，第 139 页。

[33]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转引自同上。

[3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1，转引自同上，第 141 页 。

[35] 他们之间没有秘密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都只是单独同莫斯科保持联系。同法共和意共的联系则是分别通过波党和南共保持的。（参见同上，第 142—143 页。）

[36] 同上书，第 143 页。

[37] 同上。

[38]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3，页码 3，转引自同上，第 143 页。

[39] 同上。

[40] 同上。

[4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3，页码 6、7 ，参见同上，第 143—144、145 页 。

[42] 同上书，第 144 页。

[43]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3，页码 4—5 页，参见同上，第 144—145 页。

[44] 各党代表团下榻在该地的一个小温泉场的疗养所。会议就在此地召开。据意共代表团成员雷阿勒回忆说，每个代表团成员均住两人一间的双人房。代表们在一张马蹄形的餐桌上共进早、中、晚三餐。每餐都有 8—9 个菜，还不包括鱼子酱、冷盘、水果和酒。每天代表们都能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礼品”，如照相机、公文包和衣服等。（参见同上，

第 145 页。)

[45] 联共(布)代表团的随行人员约为 20 人，包括配备 2 座便携式电台的报务员和密码译员。会议期间，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以“谢尔盖耶夫”和“鲍里索夫”的化名，每晚与匿名为“菲利波夫”的斯大林进行联系。(参见同上，第 144 页。)

[46] 作为客人出席会议的有：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扎瓦斯基、拉特克维奇，捷共中央领导人格明杰尔和巴伦什，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卡德尔的助手。此外，各党代表团还有一些党务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3，页码 5，参见同上。)

[47] 这一天大会举行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从 11 点—15 点，另一次是从 16 点—22 点。会议的工作语言是俄语和法语，而会议记录使用的是俄语。(同上，第 145 页。)

[48]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1、35、46—47、50—51，参见同上，第 145—146 页。

[4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4、24、39 参见同上，第 146 页。

[5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6、49，参见同上。

[51]《1947 年 9 月底在波兰召开的若干共产党代表的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 年，第 155—156 页。

[5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51，《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46 页。

[53]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1，页码 2—4；案卷 94，页码 2—4、51—53，参见同上，第 146 页注 75。

[54]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4，页码 50—92；案卷 91，页码 13—14；案卷 94，页码 58；案卷 94，页码 1—49，参见同上，第 146—147 页。

[5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29 页。

[56] 显然是为了显示团结一致的缘故，对日丹诺夫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苏联方面采取了秘而不宣的方法。不仅没有将它编入会后正式发表的材料中，而且把它从会议的记录里删除了。但包括这部分内容的报告原件收藏于日丹诺夫的私人文件中。（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4，页码 40—43，《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4 期，第 147 页。）

[57] 日丹诺夫满意地指出，“所有代表的发言中有很大部分是以批评方式详细地分析了法共和意共的错误，而且批评是很尖锐的，从而反映了所有同志要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在最短时期内改正自己错误的愿望。”日丹诺夫强调，“所有发言者都完全赞同”他报告中的“全部观点”。（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90，转引自同上，第 148 页。）

[58] 后来在法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时候，杜克洛和法容形容情报局会议就像“法庭”一样，日丹诺夫“实际操纵了它”。杜克洛说，在情报局会议上他面临的是两者择其一的选择：屈服或者“绝交”。但是后一种选择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只有屈服了。法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通过中央某些领导人被南斯拉夫人所获悉。 1948 年 1—2月，南共领导人吉拉斯访问莫斯科时，日丹诺夫从他那里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8，页码 1—5，参见同上，第 149 页。）

[5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4，页码 44，参见同上。

[6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88，页码 17；案卷 90，页码 10，参见同上，第 148 页。

[6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4，页码 90—91，参见同上。这里指的是在战后处理的里雅斯特及意南边界问题上南斯拉夫所提出的领土要求。苏联支持南斯拉夫的这一要求。但是为了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并不完全顺从南的愿望。所以，南认为苏联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

[6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44，页码 90—91，参见同上。

［63］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52；案卷 96，页码 1—3，参见同上，第 149 页。卡德尔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与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报告是相悖的。他说，不仅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代表团，而且意大利和波兰代表团都反对建立情报局。(参见同上。)

［64］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6，页码 2，同上，第 150 页。

［65］同上书，第 149 页。

［66］同上书，第 149—150 页。

［67］同上书，第 150 页。

［68］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3，页码 83，同上，第 150 页。综合上面几种说法，这些话很有可能出自哥穆尔卡之口。

［69］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6，页码 2，参见同上，第 151 页。

［70］根据 1948 年 8 月的波党中央全会的材料，虽然政治局其他委员劝说，哥穆尔卡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表示否则他就辞职。但据哥穆尔卡本人说，“当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就迅速调整了方向。”（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62，页码 31、65，转引自同上，第 151 页。）

［71］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6，页码 2，参见同上。

［72］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2，页码 53、54，参见同上。吉拉斯在回忆录中说，9 月 26 日捷共代表返回波兰时带回了哥特瓦尔德同意布拉格成为情报局总部的肯定答复。但在这之前，日丹诺夫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关于选择贝尔格莱德作总部的决定。(参见同上，第 151—152 页。)

［73］同上，第 152 页。虽然，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哥穆尔卡转了弯子，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被清算的下场。在 1948 年 8 月的波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被指责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并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全会认为，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波党中央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因为担

心波兰国内和国际上对成立情报局可能的反应而表现出“机会主义的担忧情绪”。（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62，页码 54，转引自同上，第 150 页。）

[74] 在给各党文件的附函中，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轻描淡写地说明，“对文件的内容作了不多的文字上修改。”（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6，页码 30—37，转引自同上，第 152 页。）档案清楚地表明，这些修改均出自斯大林之手。（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1，目录 1，案卷 187，页码 26，参见同上。）

[7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6，页码 14，参见同上。

[76] 但是在马歇尔于 5 月 28 日召集的会议上对有关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是作了原则性规定的，那就是东欧国家可以参加欧洲复兴计划，只要它们不在经济上完全追随苏联（着重线系引者所加）从而有利于欧洲广泛的一体化。（迈克尔·霍根：《世界一分为二：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经济外交》，俄亥俄，1987 年，第 28 页，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1 页。）

[77] 前莫洛托夫秘书处成员叶罗费耶夫说，这就是苏联领导人的立场，“莫洛托夫正是持这种立场的。”（见纳林斯基 1992 年 10 月 15 日对叶罗费耶夫的采访，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3 页。）莫洛托夫本人回忆说，“起初，我同意，而且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当参加。”（转引自《莫洛托夫秘谈录》，第 79 页。）

[7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2。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2 页。

[79] 1947 年 6 月 23 日《真理报》，转引自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1945—1980 年，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40 页。

[8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9，卷宗 18，案卷 214，页码 19，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2 期，第 12 页。

[8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9，卷宗 18，案卷 213，页码 2—4，转引自同上。

[82] 塔赫年科：《对一项政治决定的解剖——文件选辑》，载俄罗斯《国际生活》，1992 年，第 5 期，第 121 页，转引自同上，第 12—13 页。

[8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9，卷宗 18，案卷 214，页码 4—6，转引自同上，第 13—14、15 页。

[84]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47 年，第 3 卷，第 260 页。

[85] 同上，第 286 页。

[86] 美国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美国与英法两国事先已经进行过磋商。所以，美英法三国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美国副国务卿克莱顿在此期间正在巴黎进行访问，他和驻法大使卡弗里等官员在会外密切注视着会议的进程。

[87] 《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307—308 页。

[8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54，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4 页。

[89]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59—60，转引自同上。

[9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 页码 64—65，转引自同上，第 15 页。

[91]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70—71，转引自同上，第 15、16 页。

[92] 《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第 2 册，第 123 页，转引自《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308 页。

[93]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 页码 93—94，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6 页。

[94]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96，转引自同上，第 16—17 页。

[95]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18，转

引自同上，第 17 页。

[96]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35，转引自同上。

[9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42，转引自同上。

[9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58，转引自同上，第 18 页。

[99]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201，转引自同上，第 17 页。

[10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3，案卷 270，页码 183—184，转引自同上，第 18 页。

[101]《消息报》，1992 年 1 月 9 日，转引自同上，第 18—19 页。

[102] 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就捷政府被迫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私下对自己的朋友不无调侃地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还是一名自由的部长，而回来时已成了斯大林的雇农。”（洛克哈特：《马萨里克回忆录》，纽约，1951 年，第 66 页。）

[103] 转引自《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311 页。

[10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29 页。

[105] 涅任斯基：《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20 世纪 40 年代下半期的苏联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以下简称《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莫斯科，1987 年，第 185 页。

[106] 同上书，第 186 页。

[107] 同上书，第 188 页。

[108] 同上书，第 189 页。

[109] 同上书，第 190—191 页。

[110] 同上书，第 182—183 页。

[111]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55 页。

[112] 普赖斯：《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纽约，1955 年，第 29 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3 册（194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40 页。

［113］《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第 192 页。

［114］在东欧各国中，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确立了对其他政党的绝对优势。

［115］《‘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95 页。

［11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7，目录 2，案卷 7，卷宗 120，页码 21—22，转引自同上。

［117］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315，页码 3，5，转引自同上，第 96 页。

［118］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315，页码 7，转引自同上。

［119］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315，页码 21，转引自同上。

［120］他的职务由另一名小农党人丁尼什接任。

［121］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25，目录 36，案卷 14，卷宗 145，页码 46—47，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96—97 页。

［122］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4，目录 37，案卷 17，卷宗 143，页码 5，转引自同上，第 97 页。

［123］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8，目录 29a，案卷 3，卷宗 171，页码 24、32、33，转引自同上。

［124］《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 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第 262 页。

［125］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38，目录 28a，案卷 9，卷宗 92，页码 39，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100 页。

［12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38，目录 28a，案卷 9，卷宗 92，页码 49、53、57，转引自同上。

［127］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7，目录 28，案卷 10，卷宗 125，页码 17—19、24—25，转引自同上，第 99 页。

［128］英国驻苏联临时代办罗伯茨在给本国外交部的信中认为，“我们如此积极和公开地干预佩特科夫案件，等于是勒紧了套在他脖子上的

绳索。"(伊苏索夫:《斯大林与保加利亚》,索菲亚,1991 年,第 192 页,转引自同上。)

[129] 《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8—19 页。

[130]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 年苏联与东欧国家》(以下简称《'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莫斯科,1995 年,第 104 页。

[131] 同上。

[132] 《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1944—1953 年),第 1 卷,1944—1948 年,莫斯科一新西伯利亚,1997 年,第 653 页,转引自穆拉什科:《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3—54 页。

[133] 此处的统计不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军事办公厅领导的国防部。但事实上国防部的情况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更大的关注。还在 1947 年 5 月,斯大林等领导人就曾经得到过一份"关于右派政党消除进步人士首先是共产党人在捷军队中影响的危险企图"的报告。(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83,页码 223、296,参见《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4 页。)

[134]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82,目录 2,案卷 1357,页码 229,参见同上。

[135] 穆拉什科认为,在情报局会议上同捷共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只是作为共产党人迫切任务的掌握军队和国家机构中领导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苏联领导人更为忧虑。(参见同上。)

[13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8,目录 29a,卷宗 171,案卷 3,页码 62 参见同上,第 54—55 页。

[13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8,目录 29,卷宗 146,案卷 4,页码 6 转引自同上,第 55—56 页。

[138]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8,目录 29a,卷宗 171,案卷 3,页码 64 转引自同上,第 55 页。

[139] 同上。

[140] 奥尔利克:《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

代史》杂志， 1998 年，第 2 期，第 7 页。

[141]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47 年，第 4 卷，第 234—235 页。

[142] 转引自《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第 6 页。

[143] 同上书，第 7 页。

[144] 同上书，第 6 页。

[145] 苏联实际上把谷物援助视为对捷拒绝马歇尔计划所受损失的补偿和修补苏捷关系的行动。 11 月 25 日，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因国内谷物严重歉收要求斯大林增加援助。斯大林答应把原定供应的 40 万吨谷物增加到 60 万吨。第一批 10 万吨预定在 1947 年年底运到，其余的将在 1948 年 4 月前运来。（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4—105 页。）但是，当时在捷国内恐怕没有人知道，斯大林运来的这些谷物是从苏联国内饥荒者嘴里硬抠出来的。因为其时在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严重饥荒。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34 页。）

[146] 与苏联一样，美国也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是否给予援助。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认为捷的经济灾难是“很有好处的”。他说，“我认为今后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要摊牌，那时真正的紧要关头就会到来，形势的发展将可以使我们提出一些条件。”“按照我的看法，现阶段在后面站着并对请求援助的呼吁置若罔闻是有利无害的。”(科尔科等:《权力的限度》,纽约，1972 年，第 388 页。）美国除了拒绝谷物援助外，还冻结了原先答应的第一笔 5000 万美元的贷款和进出口银行给予的 1.5 亿美元的贷款。（《“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5 页。）

[147]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5 页。

[148] 《权力的限度》,第 388 页。后来， 1947 年秋天当有传闻说捷共将在某一天发动政变时，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赶紧要求政府作出某种有利于捷非共政党的姿态。随后，美国国务院准备与捷签订关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两个协定。但为时已晚。（《“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5 页。）

[149]《1947 年 9 月底在波兰召开的若干共产党代表的情报会议》，第 201—202 页，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3 页。

[150] 同上。

[151] 同上。

[152] 韦肖雷：《捷克斯洛伐克 1948 年 2 月记事》，莫斯科，1960 年，第 54 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38 页。

[153]《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第 39—40 页。

[154] 诺赛克因病缺席会议。

[155]《捷克斯洛伐克 1948 年 2 月记事》，第 86 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第 43 页。

[15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0—131，《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7 页。

[157] 科尔贝：《共产党人颠覆捷克斯洛伐克（1938—1948 年）》，普林斯顿，1959 年，第 213 页。

[15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第 44 页。

[159]《“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5 页。

[160] 转引自同上。佐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告诉马萨里克，“我们（苏联方面）不赞同分裂政府的企图。”（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2，转引自《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8 页。）

[161]《“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5—106 页。

[16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3，《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58 页。

[16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3，转引自同上。

[164]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3—134，转引自同上，第 58—59 页。

［165］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4，转引自同上，第 59 页。

［166］同上。

［167］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57，卷宗 478，案卷 2，页码 134，转引自同上，第 59—60 页。

［168］而贝奈斯显然也是认真对待哥特瓦尔德发出的威胁的，他在离职后回忆了同哥特瓦尔德等人的谈话：“俄国人已经沿着边界做好了准备，如果共产党人要求的话，他们就打算立即开进共和国。”（转引自同上，第 59 页。）

［169］《苏捷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 5 卷（1945—1948 年），莫斯科，1988 年，第 438—439 页。

［170］《真理报》，1948 年 2 月 22 日。

［171］《‘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6 页。

［172］同上书，第 107 页。

［173］贝奈斯后来说，“当全副武装的工厂民警响应哥特瓦尔德的号召聚集在老城广场的时候，我原以为他们（指国家社会党人等的支持者——引注）会集合在瓦茨拉夫广场。我以前就知道，‘索科雷’（音译，系国家社会党控制的一个体育组织——引注）拥有足够的武器可以进行武装。但是我没有料到，它的良好的组织及其果敢性已经丧失了。我曾经认为，非武装的学生示威将是全民起义的信号，但是谁也没有动。”（转引自：《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60 页。）

［174］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22，目录 3，卷宗 214，案卷 5，页码 53，《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3 期，第 61 页。

［175］《‘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06—107 页。

［17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4 卷，东欧苏联，第 738 页。与这项懦弱的声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对西方声明的激烈反应。在该声明的俄文文本上，莫洛托夫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赞同维辛斯基的意见。必须在报刊上痛斥这种反对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并且指出，这是其计划遭到破产的外国反动集团的不满的反映。 2 月 26 日。”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部秘书处，目录 10，第 1076 号，卷宗 76，案卷 Че－720，页码 2，转引自《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第 8 页。）

[177] 同上。

[178] 外交部长马萨里克的尸体于 3 月 10 日在捷切尔宁宫外交部大楼他的办公室窗外被发现。按照通常的说法，他是自杀的，但也有人说他是被捷秘密警察或西方特务杀害的。

[179]《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第 8 页。

[180] 同上书，第 9 页。

[181] 《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 年）》，第 2 卷，纽约，1973 年，第 367 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第 57 页。

[18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4 卷，东欧苏联，第 751、753 页。

[183] 同上书，第 753 页。这表明，美国对捷二月事变的整个发展进程尤其是佐林在布拉格活动的情况并没有透彻的了解。

[18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4 卷，东欧苏联，第 758 页。

[185]《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第 11 页。

[186] 《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 年）》，第 2 卷，第 367 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第 58 页。

[187]《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第 11 页。

[188] 同上书，第 12 页。

[189] 同上。

[190]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第 58—59 页。

[19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65，页码 64—65，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102—

103 页。

[192]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1，页码 2—3，转引自同上，第 103 页。

[193]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3—4，转引自同上，第 104 页。

[19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5，转引自同上。

[195]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3，页码 9、14—15，转引自同上，第 103 页。

[196]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5，转引自同上。

[197]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3，页码 22，转引自同上，第 106 页。

[198] 这里指的是科希策纲领，实际上这一纲领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征得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同意的。（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082，页码 75，转引自同上，第 103 页。）

[199]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2，页码 61，转引自同上，第 103—104 页。

[200]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45—46，转引自同上，第 104 页。

[201]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2，页码 70，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2]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3，页码 19—20，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3]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1，页码 15—16、18，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9，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5]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12，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6]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162，页码 44，转引自同上，第 105 页。

[207] 《共产党情报局》（1947、1948 和 1949 年情报局三次会议的记

录），米兰，1994 年，第 358—360 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的行动》（以下简称《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 1 期，第 152 页。

［208］为此，决议解除了尤金的苏联《劳动报》编辑的职务。根据决议，同尤金一起被派往贝尔格莱德的还有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格里戈良和宣传鼓动部的舒米洛夫等人。（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3，案卷 1066，页码 59，《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 1期，第 152、153 页。）

［209］南斯拉夫档案馆，南共中央 9，119/v—34，页码 6，转引自同上，第 153 页。

［210］《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同上，第 153 页。

［211］尤金等人在南的活动是高度保密的。他们在南斯拉夫外交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身份是“教授”和“科研工作者”。其他随行人员也都使用别名。（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202，目录 4，卷宗 107，案卷 1，页码 212、215、219、230、234、237、242、248、251、258，参见同上。）

［212］会议的具体日期有几种说法。按照波党代表德卢斯基所说，会议是在 10 月 30 日晚上开幕的。捷共代表格明杰尔说是 10 月 31 日。在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里记载的会议日期是 10 月 31 日。（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187，页码 70，参见同上，第 154 页。）

［213］尤金在同波党代表德卢斯基的谈话中曾提议让波党派代表来担任副主编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同卡德尔谈话后还打算邀请意共代表参加编辑部。（参见同上，第 154 页。）

［214］会议确定刊物的每期发行量为 11 万份，其中俄文版 4 万份，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为 3.5 万份。刊物的费用承担是：联共（布）为 40%，波党、南共和捷共各为 10%，罗共、保共和匈共各为 7%，法共和意共各为 4.5%。（同上，第 154—155 页。）苏联还为编辑部提供了一架飞机及其费用。后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47 年 12 月 15 日会议的决定，联共（布）中央承担了刊物的头四期的所有费用。（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36，页码 19；案卷 1068，

页码 2，同上，第 155 页。）

[215] 联共（布）代表在会上提议，在与编辑部经常合作的撰稿人中间一般要至少包括一、二名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将由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担任撰稿人。所以联共（布）代表希望哥特瓦尔德、多列士、拉科西和其他各党领导人都参加办报。于是各党在会上和会后提出由本党领导人或者重要活动家作为撰稿人。如波党的哥穆尔卡，贝尔曼等，捷共的斯兰斯基等，保共的季米特洛夫等。（同上。）

[216] 同上书，第 156 页。

[217] 按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决定，这次会议原定于 1947 年 11 月底或 12 月 15 日之前召开。

[218]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3，案卷 1068，页码 2，《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157 页。

[219] 这四人是在会上直接选出的。

[220] 此三人是由其党中央在会后提出的人选。在两星期后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所宣布的编委会名单里，除了指明尤金为主编外，既没有说明其他成员的职务也没有披露他们代表哪些党。但这些情况均记载于联共（布）的“情况通报”、尤金的讲话稿和会议速记的摘录里。（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52，页码 1—7，25—36，《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157—158 页。）

[221] 除了联共（布）负担 50% 外，其他各党的费用有所削减。具体是：波党、南共和捷共各为 8%，罗共、保共和匈共各为 6%，法共和意共各为 4%。（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52，页码 2—3、7，同上，第 158 页。）

[22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36，页码 4，同上，第 162 页。

[223]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36，页码 1—3，参见同上。但是不久苏南发生冲突，该计划没有实现。

[224] 1949 年和 1950 年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加入了经互会。以后，东

欧以外的蒙古、古巴和越南也参加了经互会。

[225] 1955 年 5 月，苏、波、捷、罗、保、匈、阿、东德共八国领导人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会议，签订了多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而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就有关它们共同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当缔约一方受到武装进攻威胁时，缔约各方将给予一切必要形式的援助。根据条约规定，还设立了政治协商委员会和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这样，华约组织与 1949 年成立的北约组织一起，使欧洲出现了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局面。

[22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 5446，目录 53，案卷 352，页码 9，诺斯科娃：《1945—1953 年莫斯科在东欧国家的顾问》，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227]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6，案卷 138，页码 43，173；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卷宗 7，案卷 77，页码 1；全宗 067，目录 16，卷宗 11，案卷 4，均转引自同上，第 107 页。

[22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62，页码 88—98，参见同上，第 110 页。对于波兰出身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波国防部长（1949—1956 年），东欧国家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在布拉格，人们说，“对于波兰人只有羡慕的份……遗憾的是，在苏联元帅中没有捷克人”。罗马尼亚国防部部长博德奈拉斯说，“如果能在苏联挑选出 15 名会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达维亚籍军官，把他们派到罗马尼亚担任哪怕是兵团参谋长，那也是好的。”还在罗科索夫斯基就任波兰国防部长之前，保加利亚领导人曾经要求派一位苏联将军来担任保军总参谋长，但被斯大林所拒绝。斯大林认为，给保军总参谋长配备“一名有经验的苏联顾问”将更为有益。（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38，目录 30，卷宗 160，案卷 8，页码 136—137；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54，页码 57，转引自同上，第 110 页。）

[229] 同上书，第 110 页。

[230] 同上书，第 107 页。

[231] 同上书，第 106 页、108 页。

[232]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4，页码 6；案卷 362，页码 72，参见同上，第 106 页。

［233］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4，页码 6；案卷 362，页码 72，参见同上，第 110 页。

［234］同上书，第 111 页。

［235］同上书，第 110 页。

［236］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2，页码 33—34，转引自纳林斯基：《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25 页。

［237］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42 页。

［238］《苏联斯拉夫学》，1991 年，第 3 期，第 15页；伊苏索夫：《斯大林与保加利亚》，索菲亚，1991年，第 70—71 页，《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160—161 页。

［239］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19，页码 112—113；全宗 147，目录 2，案卷 62，页码 6—8，12—15，37—39，《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同上，第 161 页。

［240］关于这项计划以及苏联参与计划的讨论，可参见弗拉维阿诺斯：《1941—1949 年希腊（从抵抗到内战——希腊共产党的战略）》，伦敦，1992 年，第 238—244 页；乌鲁尼亚：《希腊共产党：思想、政策和国内历史的重要问题（1941—1956 年民族抵抗运动、内战和“冷战”中的希腊共产党）》，莫斯科，1994 年，第 189—201、204—205 页，《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同上，第 159 页。

［241］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19，页码 126；全宗 147，目录 2，案卷 62，页码 32；全宗 146，目录 2，案卷 19，页码 116—117、123—127；全宗 147，目录 2，案卷 62，页码 4，19—20，28—32，《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同上，第 159—160 页。

［242］丘瓦欣：《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1946—1952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243］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88 页。

［244］吉比安斯基：《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无情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模式与 1948 年苏南冲突》，载《“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79页。

［245］同上。

［246］《铁托文选和演讲集（1941年3月一1979年10月）》，莫斯科，1987年，第32—33页，《“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80页。

［247］同上书，第181页。

［248］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2,页码46—47、52—54 ;全宗575,目录1,案卷1,页码123—132、223—235;案卷41,页码7—13、15、19—20 案卷44 页码160—163 ,参见同上。

［249］《纽约时报》，1944年4月11日，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册（1948年）,第306页。

［250］同上，第308页。俄罗斯学者吉比安斯基在最新公布的《1946年5月27—28日铁托——斯大林谈话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记录》中所作的注解里，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同意南保两国开始讨论建立南保联邦问题的目的的：显然他是想通过建立联邦来加强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首先是借助南斯拉夫的帮助，其次是通过与南的联合来使保加利亚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和逃避美英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特权。(1946年5月27—28日铁托——斯大林谈话的苏联和南斯拉夫方面的记录，载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25页注14。)

［251］《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册（1948年）,第306—307页；吉比安斯基：《冲突的开始：巴尔干症结》，载苏联《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2期，第172—173页。

［252］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97，页码107—110，《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20页；俄罗斯《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23页。

［253］《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26页注15。

［254］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案卷294，页码28，《“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206页注29。

［255］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6，案卷1064，页码1，转引自同上。

［256］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 146，目录 4，案卷 639，页码 9，转引自同上。但尚未有材料证明铁托是否知道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答复。

［257］南斯拉夫《战斗报》，1947 年 8 月 3 日，转引自同上，第 186 页。

［258］铁托档案馆，I－2/17．L．70，转引自同上。

［259］季米特洛夫在致铁托的电文中说，必须“改正我们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同苏联朋友进行相应的协商后，时机成熟时”再签订南保条约。（南斯拉夫档案馆，AJ．F．SKJ 1－II－/79．L．1，转引自同上。）9 月中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致电铁托，告诉他，鉴于对保和约已经批准和生效，保南政府现在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铁托档案馆，I－2/17．L．69，转引自同上。）在南保条约于 1947 年 11 月正式签字前一个月，南将此事通知了苏联，并寄去了条约草案。同时还告知，南将于 12 月与罗马尼亚签订类似条约。此外，南接受苏联的批评，把南保条约由原来的无限期改为为期 20 年。（转引自同上，第 186—187 页。）

［260］吉拉斯关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苏—保—南秘密会谈的报告，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第 128—129 页。

［261］斯米尔诺娃：《丘瓦欣回忆录后记》，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34 页及注〔6〕。

［262］同上书，第 135 页。

［263］据苏联驻阿公使丘瓦欣说，苏联向阿的一些部、工业企业和农业部门派遣了几十名专家。此外，苏联的普通高校和军事学院接受了约 40 名阿学生和学员。（丘瓦欣：《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1946—1952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21 页。）

［264］《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同上，第 124 页。

［265］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7，目录 14，卷宗 104，案卷 6，页码 51，《丘瓦欣回忆录后记》，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266］霍查本人曾经多次受到过这样的暗示，但他的态度是：“如果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这么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就同意建立与南斯拉夫的联邦。”（转引自同上，第 136 页。）

[26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44，目录 30，卷宗 118，案卷 10，页码 1—3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编注：苏联集团与冷战的起始阶段：1946—1948 年斯大林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档案文件，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期，1998 年 3月，第 114 页。

[26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97，页码 107—110页，吉比安斯基编注：《铁托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见》，载俄罗斯《历史档案》，1993 年，第 2期，第 23 页；《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第 120 页。

[269] 斯大林同时表示，苏联将通过南斯拉夫向阿提供援助。（铁托档案馆，I-1/7，页码 6—11，《铁托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见》，载俄罗斯《历史档案》，1993 年，第 2 期，第 26 页。）

[270] 南斯拉夫档案馆，AJ. F. SKJ. CK SKJ IX 1/I-134，1/I-135，1/I-158，1/I-159，《“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87—188 页。

[271] 会谈中，斯大林还建议将阿共产党改名为劳动党。（《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272]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1947 年，第 2 卷，莫斯科，1951 年，第 34—35 页。贷款的数额为 600 万美元。霍查还同米高扬举行了业务会谈，明确了阿方提出的具体要求。苏联还决定向阿派遣新的专家小组以帮助和领导阿某些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 1 期，第 122 页。）

[273] 南斯拉夫档案馆，AJ. F. SKJ. CK SKJ IX 1-I/143，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88—189 页。

[274] 《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第 124页。

[27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9，页码 1—5、8，《‘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90 页。

[276] 铁托档案馆，I-3-b/651. L. 10—11，参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91 页。

[277] 南斯拉夫档案馆，AJ．F．SKJ．CK SKJ IX 1/I－154．L．1；铁托档案馆，I－3－b/651．L．24 ，转引自同上，第 192 页。第二天，霍查就表示同意。接着两国总参谋部开始就具体的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后来，霍查对苏联公使说，采取这一步骤是错误的，它对巴尔干半岛的和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5 年，第 1 期，第 125 页。）

[278] 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于 1 月 21 日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报告莫斯科说，南斯拉夫军队即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科尔察。这一决定是在没有苏联驻南军事顾问参与下作出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目录 20，卷宗 36，案卷 257，页码 89—90 ，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93 页。）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向苏联使馆作了通报。（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472，页码 78、84，转引自同上。）

[279] 《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 年，第 6 期，第 57 页。

[28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472，页码 59；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目录 20，卷宗 36，案卷 257，页码 117；铁托档案馆，I－3－b/655．L．1—3 ，参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93 页。

[281] 《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 年，第 6 期，第 59 页。

[282] 铁托档案馆，I－3－b/651．L．9 ，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93 页。

[283] 《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 年，第 6 期，第 59 页。

[284] 苏联《真理报》，1948 年 1 月 23 日。

[285] 吉拉斯关于 1948 年苏—南—保秘密会谈的报告，铁托档案馆，I－3－b651，ll．33—40，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第 128 页。

[286] 同上书，第 130 页。

[287] 同上书，第 130—131 页。

[288] 同上书，第 131 页。

[289] 铁托档案馆，I－3－d/13．L．1、5，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83 页。

[290] 铁托档案馆，I－3－d/13．L．2—3，转引自同上。

[291] 南斯拉夫《战斗报》，1945 年 5 月 28 日，转引自同上，第 184 页。

[292] 南斯拉夫档案馆，AJ．F．SKJ．CK SKJ IX．1－T/22．L．18，52，转引自同上。

[293] 铁托档案馆，I－3－b/634；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44，目录 30，卷宗 118，案卷 16，页码 28—30，转引自同上。

[294]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41，页码 22，转引自同上。

[29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94，页码 90—91，《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48 页。

[296]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187 页。

[297] 吉拉斯同吉比安斯基的谈话，1990 年 7月 13 日；南斯拉夫档案馆，AJ．F．SKJ．CK SKJ III/29．L．1、2；卡德尔卷，1947/I－14，转引自同上。

[298] 同上。

[299] 铁托档案馆，I－3－c/11，I，35—36；南斯拉夫档案馆，卡德尔卷，1947/I－15．1；15．6，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第 147 页。

[30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卷宗 53，案卷 872，页码 16—18；南斯拉夫档案馆，AJ．F．SKJ．CK SKJ IX 1－II/17．L．17；1－1/8．L．4—6；铁托档案馆，I－3－B/651．L．15，《社会主义联合体的产生》，第 187 页。

[301] 1948 年 2 月，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这一情况后，表示苏联坚决反对南斯拉夫的建议。（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100，页码 6、14，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64 页。）

[302]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65，页码 79，转引自同上。苏联于 3 月 23 日从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那

里知道这一计划后，立即声明南共和匈共可能提出的建议与联共（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对该计划持否定态度。（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3，案卷 198，页码 55—59，转引自同上。）

[303]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63，页码 15，《“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103 页。

[304]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63，页码 9—24，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62 页。

[305] 南斯拉夫档案馆，AJ. F. SKJ. CK SKJ III/31a，《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同上，第 160 页。

[306] 铁托档案馆，I－2/35，《“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200 页。

[307] 南斯拉夫档案馆，AJ. F. SKJ. CK SKJ IX 1/I－135，1/I－163，1/I－164；铁托档案馆，I－3－b/35；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472，页码 78—79，84—86，《“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200 页。

[308] 南斯拉夫档案馆，AJ. F. SKJ. CK SKJ III/32 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200 页；《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60 页。

[309] 《不应当发生的冲突——苏南关系史料》，载《苏联外交部公报》，199 年，第 6 期，第 60 页。

[310] 《1948 年苏南之间的秘密通信》（以下简称《苏南秘密通信》）中卡德尔同苏联大使 2 月 28 日的谈话，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 年，第 4—5 期（合刊），第 130 页注 3。

[311] 1948 年 1—2 月，苏南两国代表在莫斯科进行有关经济问题的谈判。谈判的内容之一就是缔结新的两国相互换货议定书（现行的供货议定书将于 1948 年 5 月 31 日期满）。1 月底，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在与南代表会谈时，同意南外贸代表团于 2 月 10 日左右前来莫斯科进行签订新的换货议定书的谈判。2 月 26 日，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在同南外贸部副部长和驻苏贸易代表会谈时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没有必要进行关于缔结新的换货议定书的谈判，理由是南斯拉夫方面向苏

联供货速度太慢，根据现行议定书的供货将会拖延到议定书期满（1948年5月 31 日）以后。因此，他建议在 1948 年底开始进行谈判以签订1949 年的议定书。（铁托档案馆， I－3－b/651，ll. 55，57—58；I－3－b/653，ll. 31—33， 《苏南秘密通信》，同上，第 130 页注 4。）

［312］《苏南秘密通信》,同上,第 130 页注 4。

［313］1945 年，南斯拉夫人民银行接受了苏联国家银行关于根据各自货币对美元的汇价来确定苏联卢布与南斯拉夫第纳尔比价的建议。（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4，目录 5，卷宗 5，案卷 1，页码 67；全宗 202，目录 2，卷宗 102，案 卷 2，页码 109，参见“苏南秘密通信”，第130 页注 6。）这个表面上平等的比价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南斯拉夫只能根据自己实际的外汇购买能力确定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而苏联可以随意提高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从而也就提高了卢布对第纳尔的比价。1945 年 8 月 28 日，南斯拉夫要求进行谈判，重新审议所规定的比价。 10月南又重复了这一要求。同年 12 月 4 日，苏方拒绝了南斯拉夫的建议。此后，南斯拉夫又提出过几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具体结算方式。（参见同上。）

［314］1948 年 1 月中下旬至 3 月初，苏南两国军事代表在莫斯科进行了有关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的谈判。其中谈到了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实行建立南海军的计划。按照南军事代表的说法，起初，斯大林和苏联军事领导人都表示准备满足南斯拉夫的要求。但是到 1 月底 2 月初，苏联却开始怀疑实现南斯拉夫提出的海军计划的可行性。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时而说苏联的资源有限，时而又说南斯拉夫的计划不够仔细和太激进。到 3 月上旬谈判停止了。苏联方面建议南斯拉夫提出一个新的更为实际的计划。南斯拉夫代表认为，苏联是在拖延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并且不想在近期内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铁托档案馆， I－3－b/651，ll. 11—12、16、20、26、41—42、59—67 ，参见同上，第 131 页注 7。）

［315］铁托档案馆， I－3－b/655，l. 12 ，参见《苏南秘密通信》，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2 年，第 4—5 期，第 124 页。

［316］铁托档案馆， I－3－b/655，ll. 13—14，《苏南秘密通信》,同上，第 124—125 页。

[317] 那一天，铁托 3月 18 日给莫洛托夫的回电尚未发出，苏联大使馆就又送来了莫洛托夫的电文。

[318] 铁托档案馆， I－3－b/655，l. 15；苏联外交部通报， 1990 年，第 6期，第 60 页。(《苏南秘密通信》,第 125 页。）莫洛托夫致铁托的电文是由苏联驻南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转交的。 3月 19 日，他向莫斯科报告说：当他把电文交给铁托时，“铁托激动不安地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误会，现在他难以回答什么”，必须“跟同志们商量一下”。（《苏南秘密通信》，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2 年，第 4—5 期，第 132 页注 17。）

[319] 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通信，贝尔格莱德，1948 年，第 17—18 页；《苏南秘密通信》，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 年，第 4—5 期，第 125—126 页。

[32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163，页码 9—24，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 202 页；《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62 页。

[321] 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通信，贝尔格莱德， 1948 年，第 17—18 页；《苏南秘密通信》，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2 年，第 4—5 期，第 125—126 页。

[322] 铁托档案馆，I－3－b/655，L. 29—31， 《苏南秘密通信》,同上，第 127—129 页；南斯拉夫档案馆，AJ. CK SKJ. IX. Reg. br. I－I/22，ll. 17—21， 《苏南秘密通信（续篇 2)》，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 年，第 10 期，第 141—152 页；南斯拉夫档案馆， AJ－CK SKJ，IX，Reg. br. I－I/22，1－I/47—47a，《苏南秘密通信（续篇 2)》，同上，第 154—155 页。

[323] 报告基本上是联共（布）致南共电文内容的翻版。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到了苏南冲突真正原因之一的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行为，而在信函中这些都被故意忽略了。〔《共产党情报局》（1947、1948 和 1949 年情报局三次会议的记录），米兰， 1994 年，第 532 页，参见同上。〕

[324]《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

第 40—49 页。

[325]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代表都争先恐后地建议让自己国家的首都成为情报局新总部。最后苏联选择了布加勒斯特。（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案卷 105,页码 15—16 ;案卷 108,页码 23; 《共产党情报局》，第 596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续篇），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2期，第 171 页。)

[326]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 ,案卷 106,页码 6; 《共产党情报局》,第 596—601 页，参见同上，第 171—172 页。

[327] 1948 年 7 月 1 日，南共中央驻联共（布）中央代表别洛维奇向联共（布）中央转交了南共中央的一份邀请信，请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参加定于 7 月 21 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联共（布）和其他情报局各党都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 7 月 3 日，联共（布）通知别洛维奇，他从即日起停止工作。（《苏南秘密通信 [续篇 2]》，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 年，第 10 期，第 160 页注 34。)

[328]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 68—73 页。

[329] 《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第 282 页。

[33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82，目录 34，卷宗 146，案卷 7,页码 1，转引自纳林斯基：《 1948—1949 年柏林危机》（俄罗斯档案的新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5 年，第 3期，第 18 页。

[331]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3，目录 74 ,案卷 39,页码 3，转引自同上。

[332] 福·波格：《马歇尔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第 297 页。

[333] 阿哈尔卡奇：《苏美关系中的 1948 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年，第 12期，第 41 页。

[334]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з），目录 11（ж）,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36,《1948—1949 年柏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期，第 20—21 页。

[33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з），目录 11（ж）,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37，转引自同上，第 21 页。

[336] 《苏联与柏林问题文件集》，第 1 册，莫斯科， 1948 年，第

22—24 页。

[33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з），目录 11（ж），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39，《1948—1949 年柏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 期，第 21 页。

[338] 《柏林危机（关于莫斯科谈判的报告）》，华盛顿，1948 年，第 1 页；《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第 140 页。

[339] 《苏美关系中的 1948 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 年，第 12 期，第 42 页。

[34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789，页码 24—25，28，《1948—1949 年柏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 期，第 22 页。

[341] 斯大林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和格罗提渥的谈话记录（1948 年 3 月 26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03，页码 34，转引自同上。

[34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з），目录 11（ж），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49，转引自同上。6 月 11 日，谢苗诺夫在另一份报告中说，按照已经确定的限制交通的计划，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希望，限制将使西方驻柏林的占领政权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з），目录 11（ж），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51，转引自同上。］

[343] 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5 月 18 日决定，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789，页码 33—35，转引自同上，第 23 页。

[344] 转引自同上；《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116 页。

[345] 《苏联与柏林问题文件集》，第 1 卷，第 30 页。

[34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48，目录 11，卷宗 70，案卷 17，页码 454，转引自：《1948—1949 年柏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 期，第 23 页。

[347] 同一天，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八国外长在华沙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单独决定的声明》。声明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分裂德国

和组建西方军事同盟并表示拒绝承认伦敦会议的法律效力。（《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45、51 页。）

[348] 《柏林危机（关于莫斯科谈判的报告）》，第 4、6 页。

[349] 同上书，第 7—8 页。

[350] 《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 55 页。

[35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7，目录 11（ж），卷宗 1，案卷 2，页码 22，《1948—1949 年柏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 期，第 25 页。

[352] 斯大林强调，他坚决反对成立西德国家政府，而把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占领区，这可能更好些。“停止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和废除 B 记马克。不存在任何困难。这甚至明天就可以做到。你们考虑吧。”（1948 年 8 月 2 日斯大林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英国代表罗伯逊和法国大使夏代格纽的会谈，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1（ж），卷宗 43，案卷 1，页码 7、11、17，《1948—1949 年柏林危机》，同上，第 25 页。）

[35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1（ж），卷宗 43，案卷 1，页码 21，转引自同上。

[3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第 65 号——1948 年 8 月 7 日决定），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案卷 789，页码 119—121，转引自同上，第 26—27 页。

[35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 目录 11（ж），卷宗 11，案卷 2，页码 11，转引自同上，第 27 页。

[356] 拉季阿尼日记摘录：1948 年 11 月 20 日同联合国新闻署副署长奥登的谈话，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82，目录 35，卷宗 165，案卷 32，页码 62，转引自同上，第 28 页。

[357]克莱：《在德国的决策》，康涅狄格，1970 年，第 389 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4 册（1948 年），第 358 页。

[358]《斯大林文选》，第 514 页。

[359]《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第 58 页。

[360]《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第 150 页。

[36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237 页。

［362］ 同上书，第 1243—1244 页。

［363］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48、351 页。

［364］ 《人民日报》，1947 年 12 月 7 日，转引自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年，第 555 页。

［365］ 《人民日报》 1947 年 12 月 10 日，转引自同上，第 555—556 页。

［366］ 《人民日报》 1948 年 1 月 24 日，转引自同上，第 556 页。

［367］ 吉拉斯关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苏联一南斯拉夫一保加利亚秘密会谈的报告，铁托档案馆，I－3－b－651，ll．33—40，《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第 131 页。

［368］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2 年 ,第 1—3 期（合刊），第 77 页。

［369］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80 年）》,中文版，三联书店，1982 年 ,第 26—28 页。

［370］ 郑亦同自德黑兰致南京外交部电，“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12．1/61．11，转引自默里：《斯大林、冷战和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 12 期，华盛顿，1995 年 6 月，第 7 页。

［371］ 转引自肯尼斯·雷和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60—168 页。

［372］ 后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在 1948 年 2 月拒绝了苏联的调停建议，才使得苏联同意中共进攻沈阳。（《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7 卷，第 85—86 页。）

［373］ 《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第 7 页。

［37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7 卷，第 281—282 页。美国政府在 8 月 12 日给驻华使馆的指示中说，“美国政府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美国政府无意再度担任中国的调解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第 322 页。）

［375］ 苏联想在中国进行谈判——国防部二厅给外交部的报告，1948 年 6 月 4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12．1/319．13，《斯

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第 8 页。

[376] 王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记录， 1948 年 8 月 25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12．3/314．57，转引自同上。

[377] 1948 年 10 月 29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决心”与“共产党周旋到底”。他称，如果中国“沦入”共产党之手，“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由此发生”。他呼吁“世界反共斗争必须保持整一之阵线”，并且希望美国将“拯救亚洲”“引为己任”。（《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904—906 页。）在对外关系方面，国民党政府仍然依赖和依靠美国。继 1947 年 12 月的《中美海军协定》和 1948 年 7 月的《中美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后， 1948 年 9 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商定成立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和联合参谋顾问处；11 月与美国交换业已批准的《中美商约》。

[378]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页码 95—96，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编注：《 1949 年 1 月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4 年，第 4—5 期（合刊），第 133—134 页。

[379] 同时还附上了南京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给苏联的照会，照会的附言说，“南京政府认为该建议不宜公布。”

[380]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页码 97—99，《1949 年 1 月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4—5 期，第 134—135 页。

[381] 当时毛泽东尚未收到斯大林的 1 月 11 日的补充电函，所以，毛泽东的这一复电只是对斯大林 1 月 10 日电文的回答。

[382]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页码 100—103，《1949 年 1 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函》，第 135—136 页。

[383]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页码 110—113，转引自同上，第 137—138 页。

[384]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页码 104—105，转引自同上，第 138—139 页。

[385]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 页码 118，转引自同上，第 139 页。

［386］列多夫斯基编注：1949年1—2月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期，第105—106页。

［387］列多夫斯基编注：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续集），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3期，第102页。

［388］同上书，第101页。

［389］同上书，第103页。

［390］同上书，第101页。

［391］同上。

［392］同上书，第97页。

［393］同上书，第98页。

［394］同上书，第105页。

［395］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第86页。

［396］刘少奇的访问的具体日期是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高岗、王稼祥等。访问是以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进行的。1949年7月31日苏联《真理报》报道说，“为进行贸易问题的谈判以高岗先生为首的满洲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转引自库利克：《建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第83页注18。）

［397］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页码11—50，转引自列多夫斯基编注：《1949年6至8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6年，第4期，第70—82页。

［398］斯大林同中共中央代表团会谈记要，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页码1—7页，《1949年6至8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上，第69页。

［399］《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第88页。

［400］《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同上。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里提到：“（7月）27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

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37 页。）

[401] 毛泽东致刘少奇转交斯大林的电文，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页码 137—140，转引自列多夫斯基：《1949 年 6 至 8 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6 年，第 5 期，第 88—90 页。

[402]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另参见刘少奇关于带苏联专家回国致斯大林的信，1949 年 8 月 2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4，页码 1—2，《1949 年 6 至 8 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续）》，同上，第 93 页。

[403]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 1949 年 6 月 27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1—7，参见《 1949 年 6 至 8 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1996 年，第 4 期，第 68—70 页；刘少奇关于带苏联专家回国致斯大林的信， 1949 年 8 月 2 日，《1949 年 6 至 8 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6 年，第 5 期，第 93 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8 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529 页。

[404] 苏联试图把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变成处理日本事务的国际机构，但是在这两个委员会里，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如关于战后日本宪法的制定、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和关于日本的土地改革等）大都被美国及其盟国所否定。有些问题即便在委员会里通过了，但是如何执行的处理权仍掌握在美国占领当局手里。

[405] 负责起草和约的班子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彭菲尔德为首。但是实际主持人是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日本问题专家博顿，故和约草案以其名命名。博顿方案基本上是按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的规定处理对日媾和问题的。譬如，关于缔约后对日本的管制和关于日本的非军事化问题，草案建议由盟国通过大使会议来管制日本，在 25 年内日本不准拥有军队。特别是草案没有提到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或给予美国军事特权的问题。（《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6 卷，远东和大洋洲，华盛顿， 1974 年，第 656—660 页。）博顿方案在美国政府内部传阅后，遭到了各方面的责难。其中最主要的

是军方批评该草案没有规定缔约后保留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博顿方案在修改的过程中，正值美苏关系愈益恶化并走向冷战，所以，该草案的修正稿在同年年底以“未定稿”不了了之。（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4页。）

［406］实际上当时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限制日本，抗衡苏联。换言之，在远东美国是倚重中国来保障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407］卡尔沃科雷西：《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第422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第335页。

［408］《美国对外关系文集集》，1947年，第6卷，远东，第469页。

［409］同上书，第472页。另外，中国和英国等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41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年，第6卷，远东，第537—543页。在凯南报告之后，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的讲话中提出要使日本独立并发挥日本在“阻止远东发生新极权主义的战争中”的作用。（《纽约时报》，1948年1月7日，《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第356页。）

［411］《凯南回忆录（1925—1950年）》，第1卷，波士顿，1967年，第374—375、381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第357—358页。

［4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6卷，远东和大洋洲，第691—696页。

［413］宫泽喜一：《东京一华盛顿会谈秘录》，中译本，1965年，第29—30页。

［41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415］这两个文件均见美国国防部：《1945—1967年的美国越南关系》，第8卷，上册，第226—272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第372—373页。

［416］其主要内容有：美军可以驻留日本；外国军队不得派驻日本列岛周围；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美国警备部队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

镇压日本国内的大规模骚乱；和约将在朝鲜战争获得有利解决之后生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 年，第 6 卷，东亚和太平洋，第 1293—1296 页。）

[417]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等国关于对日媾和问题的照会和声明集（1947 年 7 月—1951 年 7 月）（以下简称《照会和声明集》），莫斯科，1951 年，第 41—42 页，斯拉温斯基：《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的新文献）》，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第 80 页。美国的这一备忘录是在其向远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个月以后才交给苏联的。

[41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 年，第 6 卷，第 1296—1297 页；《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61—63 页。在七点计划的序言中美国表示，计划是试探性的，今后还可明确和研究。

[419]《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第 81 页。

[420] 苏联外交部编：《照会和声明集》，转引自同上，第 82 页。

[421]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64—66 页。

[422] 同上书，第 80—86 页。

[42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年，第 6 卷，亚洲和太平洋，第 908 页。

[424]《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第 84 页。

[42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年，第 6 卷，《亚洲和太平洋》，第 929 页。

[426] 同上书，第 1059—1060 页。

[427]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72—78 页。5 月 19 日，美国对此作了答复。美国一方面否定了苏联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由表示，两国立场的差距“并未大到妨碍达成意见一致的和约”。（苏联外交部编：《照会和声明集》，第 54 页，《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第 89 页。）

[428]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95、100、107 页。

[429] 美国特使杜勒斯在 1951 年 1—2 月访问日本时，就有关美国

驻军和军事基地等安保问题与日本基本取得一致意见。 2 月，杜勒斯又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就美国向它们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6月，杜勒斯在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举行会谈，就美英共同的对日和约草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7月 3 日，制定了美英联合草案。

[43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葛罗米柯，目录 4，卷数 83，卷宗 60，案卷 193 – 美国，页码 18—20 页，转引自《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1994 年，第 1 期，第 89 页。

[43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数 369，卷宗 32，案卷 193 – 美国，页码 22—23 ，转引自同上，第 90 页。

[43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数 371，卷宗 32，案卷 193 – 美国，第 1 卷，页码 106—109，转引自同上，第 90 页。7 月 20 日的对日和约草案与 7 月 3 日的相比，除了在托管领土方面增加了一个上次未提到的博罗季诺岛外，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地方作了些文字修改。

[433] 科克还宣布了已经拟定的会议议程。（对日和约草案，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数 371，卷宗 32，案卷 193 – 美国，第 1 卷，页码 112—137 ，转引自同上，第 91 页。）

[434]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69，页码 19—21 ，转引自同上，第 91 页。

[435]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69，页码 55—68，转引自同上，第 92 页。

[436]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70，第 3 部分，页码 2—4，转引自同上，第 92—93 页。

[437]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70，第 3 卷，页码 5，转引自同上，第 93 页。

[438] 艾奇逊写道：苏联接受邀请参加会议并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引起“杜勒斯发表了一篇近乎惊慌失措的声明”。（《艾奇逊回忆录》，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426 页。）

[439]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数 371，卷宗 32，案卷 193 – 美国，第 2 卷，页码 38—39 ，转引自《1951 年旧金

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第 93 页。

[440]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193 – 美国，第 3卷，页码 6，转引自同上，第 95 页。

[441]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1951 年），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96，第 3 卷，页码 6，转引自同上，第 94 页。

[442]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96，第 2部分，页码 91—116，转引自同上，第 95—96 页。

[443]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70，第 3部分，页码 29，转引自同上，第 97 页。

[444] 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 24，卷宗 32，案卷 370，第 3部分，页码 135—137，转引自同上，第 97—98 页。

[445] 共有 52个国家参加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都被排斥于和会之外。除苏联外，东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参加了会议。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拒绝与会。会议于 8 日闭幕。

[446] 当天，美国和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1952 年 2 月，两国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条约和协定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军队，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美日安保体制。通过条约获得独立的日本成为依附于美国的西方集团成员。

[447] 须知，开始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意见和观点并不全然相同或一致。英国对于日本的重新武装是有所顾虑的。而且由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曾经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当局参加和会，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448]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有：德田球一、野坂参三、西泽隆二和袴田里见。代表团于 1951 年 4 月底来到莫斯科，在苏联逗留了约半个月。在这期间，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了四次会谈。（阿德尔哈耶夫：《斯大林同日本共产党人的会谈》，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0 年，第 2 期，第 140—144 页。）

[449] 1951 年 10 月，也就是旧金山和约签署后一个月，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协议会在党内分裂的情况下通过了《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的纲领，参见同上。

第四章

冷战的新战略和新手段

第一节　同中国的战略结盟和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

一　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中苏同盟的建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第二天，苏联便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尽管在百废待兴的国家初创阶段，作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必须亲自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重要事务，但是为了加强对于巩固新生的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中苏关系并且在经济建设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便决定出访苏联。[1]从苏联方面来讲，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把毛泽东访苏提上了议事日程了。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过访问苏联的愿望。为此中苏两党在电文往来中也曾多次商议过毛泽东访苏的事宜。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又向斯大林转达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2]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尽早实现毛泽东来访并同斯大林亲自会谈，苏联同中国才能正式建立和确定两国的战略联盟关系。

毛泽东于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3]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与斯大林商谈

中苏条约的问题[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苏战略同盟。这对斯大林来说，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也正是所期望的。但是由此双方就必须首先处理棘手的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条约问题。而从苏联的角度讲，这个条约还不能简单地一脚踢开。这首先是因为它涉及到苏联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权益。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已经暴露出双方在这个事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因此，尽管从战略上来讲，斯大林非常渴望尽快确定两国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策略上，他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其次，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条约本身就是雅尔塔协议的产物。虽然美苏之间冷战正酣，并且双方都按自己的方式诠释雅尔塔体制的内容，但是谁都无意去触动它的基本框架。因此尽管在中国政权已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苏联废除与前政权的旧约并与新政府重订新约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行为。但是斯大林对废除雅尔塔协议副产品的中苏旧约是否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整个雅尔塔协议的有效性多少也是有点顾虑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时，斯大林马上表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 1945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任何一条条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

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5]

对于斯大林关于不必签订新条约的立场，毛泽东当然是不满意的。[6]但是，既然斯大林已经作此考虑，毛泽东也只好表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的方式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可是毛泽东显然也不甘心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就此搁浅。他紧接着又说，“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模棱两可地回答，“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7]

斯大林对毛泽东关于签订中苏条约的建议持冷漠态度，使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出现了罕见的冷淡场面。从 12 月 16 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到 24 日的第二次会谈之间，中间除了 21 日参加斯大林的 70 寿辰庆贺活动外，毛泽东一直呆在别墅里，情绪不佳，烦躁不安。[8]22 日，毛泽东把科瓦廖夫请去谈话。让他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希望大约在 12 月 23—24 日举行一轮会谈，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和航空协定等问题。打算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9]但是，在 12 月 24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时，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及。[10]毛泽东对此非常失望。

只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和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执著态度才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原先的立场。毛泽东在 1950 年 1

月 1 日与罗申大使的谈话中透露：“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11]毛泽东所传递的这一信息，对于斯大林立场的改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一，如果美国和英国立场一致的话，那么英国及其受其影响的印度和缅甸对中国的承认就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而这正是苏联所忧虑并且想要尽力防止的。而最有力的方法当然是尽快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第二，如果英国以及印度和缅甸承认中国，而美国并不承认中国，表明美国和英国的立场并不一致的话，那么苏联与中国签订联盟条约未必会引起美英的联合反对。[12]此外，毛泽东多次提议要解决中苏条约并大有不签订条约不罢休的样子。如果一味拒绝，恐怕不仅会失去中苏签订同盟条约的最佳时机，而且有可能使中苏关系受到很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到苏联后大部分时间闷居别墅足不出户，西方的媒体竟然报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虽然这是谣言，但也证明西方国家多少也看出了中苏之间不和谐的某些迹象。为了在西方国家面前显示中苏团结和防止它们对中苏关系的挑拨和破坏，签订同盟条约当然是最好的方法。

1 月 2 日，发表了经斯大林批准的、苏联和中国共同商定的《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访问记》。访问记公开谈到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表明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就中苏条约问题与他进行磋商。毛泽东发表了三条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

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第一种意见。这也是毛泽东所希望的，所以，他马上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是的。"毛泽东随后表示，他将让周恩来来苏联进行谈判并签订各项条约。[13] 苏联方面同意签订中苏新条约，消除了毛泽东访苏期间双方存在的最大芥蒂和隔阂，使毛泽东随后能以比较轻松的心情到列宁格勒去游览。

1月6日，毛泽东在同维辛斯基举行的会谈中再次强调了签订中苏新条约的重要性。他说，他一直不断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需要签订一个两国之间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认为，"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维辛斯基不无忧虑地说，"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做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毛泽东表示，"毫无疑问，当确定签约问题的方案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考虑。"[14]

尽管维辛斯基再次重申了苏联对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担心，但是苏联方面在1月初同意签订后，已经开始起草条约了。[15] 到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三次会谈前，苏联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包括新条约在内的12个有关文件。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当天他就前往毛泽东住

处就有关中苏会谈问题与毛泽东进行商讨。1 月 22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第三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会谈。双方就既存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以及准备签订的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关于中苏现有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斯大林说，“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斯大林请毛泽东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毛泽东回答：“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斯大林说：“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毛泽东表示，“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毛泽东提出，应当“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赞同。于是双方同意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起草条约的草案。

关于旅顺问题。毛泽东建议法律上保留旅顺口协定，实际上做些修改。修改时“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斯大林承认“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

是，“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另一个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他表示，苏联方面同意任何一种方案。毛泽东说，“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但是，他同时指出，如果保留大连为自由港，“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毛泽东对此表示领会。他说，“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说，“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莫洛托夫认为，“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 2—3 年轮流一次。”周恩来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斯大林的意见是，“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周恩来立即发问：“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 51%，以代替现行的

平均投资？”莫洛托夫表示反对：“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斯大林接着说，“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最后，毛泽东提出，“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16]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谈为两国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廓清了道路。第二天（23日）起，周恩来等与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具体内容进行会谈。至2月13日，双方就条约和各项协定达成了一致意见。2月14日，两国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一些协定。

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

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17]

公布的其他协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中长铁路的铁路局长和理事会主席等职改为轮换制；不迟于 1952 年末，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设备移交给中国；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大连问题，但大连的行政完全直属中国管辖。[18]

《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贷款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率 1% 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将于 1954 年 12 月 31 日至 1963 年 12 月 31 日的 10 年期限内分批还清。[19]

条约签字的当天，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与维辛斯基互换照会，声明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 1945 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

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20]

把1950年中苏协定同1945年旧的协定相比较，可以看出，苏联的在华权益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归还旅顺和长春铁路的期限由30年缩短到对日和约签订后（不迟于1952年年底以前）；长春铁路局局长、理事会主席和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中苏双方轮流担任。大连的行政权转归中国。

由于至迟到1952年底苏联就必须把旅顺交还给中国，届时苏联就将失去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得到的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但是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那种无可弥补的战略性损失。因为，第一，中国对苏联实行的是“一边倒”政策。第二，按照两国同盟条约的互助义务的规定，如果发生战争，中国向苏联提供包括使用军事基地在内的援助，自然是不在话下的。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的1945年苏联的远东战略是通过控制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保障苏联的远东安全的话，那么现在（1950年）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是通过与中国的结盟来更有力地确保自己的远东安全。这样，虽然苏联表面上失去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但是苏联远东战略——维护苏联的远东安全——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受到了削弱。

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苏联与中国的结盟使苏联受到的仅仅是局部性损失（在华权益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得到的却是战略性利益。因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使远东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地缘政治面貌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根本变化。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条约的形式结成战略同盟关系，不

仅使苏联的远东安全得到了切实有力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1948—1949 年期间苏联在欧洲所遭受的损失（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在柏林危机中的失败和北约组织建立所构成的威胁），由于在远东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盟友而得到了有力的补偿。这种补偿的意义就在于：因为有了中国这样的一个盟国，苏联极大地增强了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冷战的力量。因为有了中国这样一个盟国，苏联同美国进行冷战的手段增多了。接下来，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在冷战的另一种形式的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是怎样运用中苏同盟的力量同美国进行不露面的较量的。

当然，中苏同盟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中国同样也是一种战略性收获。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21]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与中国建立战略同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两国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方向上的一致，使两国需要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战略同盟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两国不同的历史特点和传统、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领导人之间彼此缺乏高度信任和了解等，又使两国在具体缔结这种同盟时不可避免地产生龃龉和矛盾。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在毛泽东访苏初期，由于斯大林出于维护雅尔塔体制的考虑，一度对订立中苏条约问题表现出被动观望的态度，使得毛泽东深居别墅无事可谈，由此颇感失望和恼火。事实上不惟如此，在毛泽东访苏的整个

期间，中苏双方在不少问题上都暴露出不小的分歧。试举如下：

台湾问题 在刘少奇于1949年6—8月访苏时就曾提出过在解放台湾时让苏联提供援助的请求。苏联方面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表示无能为力。毛泽东访苏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的回答很巧妙：“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22]这种不进不退的答复，似同意又像拒绝，实际上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事关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但是就苏联而言，则事不关己，无关宏旨。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难免各唱各的调，这是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使然。

对艾奇逊讲话的反应和处理问题 1950年1月12日，正是在毛泽东访问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演讲中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东北）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3]苏联认为这是对苏联的造谣中伤，决定予以反击。

1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把艾奇逊的这篇讲话交给了他，并提议两国“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莫洛

托夫要求先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然后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毛泽东问，“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认为，这样的声明不应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交苏方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再发往北京，由行使外交部长职责的副外长公布这一声明。[24]但是，1 月 21 日，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的声明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结果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

不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起专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此事进行了会谈。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泽东答：“是新闻署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泽东。他始终一言不发。[25]这件事情表明，所谓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别国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

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问题　　它规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26]这项协定产生的背景是中苏谈判期间（2 月 6 日）发生的国民党集团派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

中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条件是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周恩来当时就曾询问协定中所说的“第三国”指的是哪些国家？斯大林回答说：“主要是指美、英、日。”这样的规定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实际上就是要把上述地区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后来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中方作了让步，同意签订补充协定。但只是为了平衡的缘故，中方才要求把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列入到协定中去。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所谓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租让权都与中国没有任何实际的关联。斯大林对此当然是明白的。为了表示安抚，他决定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交由中方接收。后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一是在上海对中方提供空中保护，二是给一点敌伪财产。[27]毛泽东在同尤金的谈话时说，根据斯大林的倡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这些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28]

关于苏联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的问题　苏方在会谈中要求签订一个专门的议定书，保证苏军及其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在中苏境内作自由调动。周恩来反对给予苏军这种调动权，认为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是：允许中国军队利用苏联铁路由东北经苏联领土向新疆进行调动。周恩来认为这是遵守平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苏军可以通过中国领土，那么中国政府也应当有经苏联领土调动自己军队的类似权利。但是苏方却说中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它认为，首先，中国军队可以经自己的领土由东北调往新疆，因而经苏联领土调动没有实际必要。而苏军只有通过陆上通道经中国东北才能调往旅顺港海军基地。苏军从海路调往那里在许多情况下不太方便，如果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紧张的话，这种调动是不太

安全的。其次，中苏两国是盟国，作为盟国解决问题应从相互利益的角度出发。让苏军沿中长线经中国东北调往旅顺港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因为旅顺港海军基地就是为了保护两国免遭外来的侵略。[29] 当然，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仍然掩盖不了侵犯别国主权的实质。只是中方顾全大局，在提议加上“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的前提条件后，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最后的议定书是这样规定的：“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为了尽快调动苏联军队，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30]

贷款协定的秘密《议定书》它规定，“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予以确定，期限为 14 年，即从 1950 年至 1963 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31] 在会谈中，周恩来曾“请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 2 万吨，因此中国还必须进口铅”。。[32] 但是作为对苏联贷款的一种偿还和体现中国对苏联的帮助，最后中方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苏方的要求。

不管怎样，中苏建立同盟是两国对外战略的客观需要。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抗击共同敌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因此，在这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无碍于中苏同盟的建立和巩固。

二　朝鲜战争：与美国冷战的另一种形式

1950 年的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

地区性战争。虽然对于参战的各方来说，各有具体的设想、目标和理由（譬如，朝鲜南北双方都想按自己的方式实现半岛的统一；美国是为了阻止所谓的北方对南方的进攻；中国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就实质而言，朝鲜战争乃是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在朝鲜半岛的延伸和折射。而且由于美苏双方自始至终没有在战场上直接照面，所以，这场真刀实枪的热战尽管炽热无比，仍没有超出美苏冷战这个大范围，只能算是美苏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冷战。换言之，朝鲜战争是美苏两国解决它们在冷战中矛盾的一种特殊手段。

如果就具体的战争来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在自认为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次进攻行动，但从美苏冷战的总的态势来看，朝鲜战争则是斯大林为了改变苏联在美苏冷战中的劣势地位而进行的一次反击行动。只有联系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在欧洲的冷战和远东新的力量格局以及朝鲜半岛具体的形势变化，才能看清斯大林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动机和目的。笔者认为，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9 年 9 月之前，斯大林对朝政策的目标是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从 1949 年 9 月到 1950 年 2 月，斯大林对朝政策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探索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样斯大林对朝政策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维持现状，而是伺机而动，准备打破现状；从 1950 年 2 月到 6 月，斯大林对朝政策的目标已经重新定位，那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同意采取行动去打破现状。概括地讲，从 1945 年 8 月到 1950 年 6 月，斯大林对朝政策是循着如下轨迹发生变化的，即：维持现状——伺机打破现状——同意打破现状。而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受到了下面三个层次的因素影响：（1）美苏冷战的总的态势；（2）远东力量格局的新组合；（3）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第一个因素是：由于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失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和南

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美国在冷战中占据上风，而苏联则处于劣势。这个因素促使斯大林去考虑如何对美国进行反击从而改变苏联在冷战中的劣势地位。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使远东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重大变化。这个因素增强了斯大林反击美国的力量和信心。第三个因素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实现半岛统一的热切愿望。但是，仅靠朝鲜北方自己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去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因此，金日成渴望斯大林能够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在这过程中，金日成向斯大林描绘了南方的革命形势和北方必胜的前景。这个因素与第二个因素相结合，使斯大林找到了反击美国的力量和场所。正是在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下，斯大林最终把对朝政策中的目标由维持现状改变为打破现状。[33]下面我们根据俄罗斯档案馆新披露的材料，论述斯大林对朝政策是如何改变的。

在论述开始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两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第一，关于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计划。由于战后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南北两方，朝鲜半岛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而随后的美苏冷战又加剧了这种分裂。但是朝鲜南北双方显然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分裂状况，它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作为革命者的金日成由于受到周边国家革命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非常希望也能以这种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金日成以革命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半岛的另一方，南朝鲜领导人正在图谋借助美国的力量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半岛的统一。第二，关于进攻和被进攻的问题。在美苏进行全面冷战并且都试图保持和加强在朝鲜半岛影响的复杂环境下，在南北双方军队在分界线地区高度对抗并且时有

武装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南北双方领导人竞相实现各自的统一方式，其着眼点不仅是朝鲜民族的未来发展，更重要的乃是南北双方各自现实的生死存亡。因此，双方拔剑相向的武力对峙实际上已经模糊了谁是进攻一方的问题的真正意义，因为谁都兼具进攻者和被进攻者的潜在特性。更何况，对朝鲜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这样的全过程具有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南北双方本身，而是在冷战中进行全面对抗的美国和苏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从本质上来讲，朝鲜战争乃是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在朝鲜半岛的延伸和折射，是它们之间的一场特殊形式的冷战。

朝鲜问题在战争末期已经由美苏两国通过划分三八线实行南北分治的方法取得了暂时的妥协性解决。[34]北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分别依附于苏联和美国。

就苏联的远东战略而言，它安全的支撑点是在中国和日本。苏联对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占领、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以及通过该条约所获得的在华特权（如旅顺租借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保障苏联在大连的优先权力；中长铁路由双方共同经营；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等），有力地保障了苏联的远东安全。至于朝鲜，当时在苏联的远东战略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朝鲜半岛的北南分治和北方由共产党治理对于苏联的安全也是一种较好的保障。所以，尽管在三八线划定后，北南双方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但是苏联在朝鲜半岛并未采取什么重大行动。

美苏冷战开始后，苏联与美国进入了全面对抗的阶段。苏联开始相应地改变它的远东战略。这表现为，它增强了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更加严厉地反对美国单独占领和管理日本以及谋求单方面对日媾和的试图和努力。但对朝鲜半

岛，苏联并未马上改变维持现状的政策和做法。因为无论是在冷战之前还是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朝鲜半岛对苏联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划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三八线毕竟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性质。

随着美苏冷战的发展，朝鲜半岛的形势也日益紧张，敌对的两方都试图消灭对方。但是美苏双方都没有意图支持一方与另一方开战，因为双方都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948 年 12 月，苏联完成了从朝鲜北方的撤军。[35] 苏联在撤军后主要关注的是加强朝鲜北方的生存能力和与南朝鲜抗衡的力量。1949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在与来访的朝鲜首相金日成的谈话中许诺将向朝鲜提供 2 亿卢布（4000 万美元）的贷款并同意朝鲜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学习。[36] 同时，斯大林也反对金日成关于统一朝鲜的计划。斯大林从朝鲜北方现有力量、苏美关系和苏联的战后状况等角度分析了他的反对意见。斯大林说，他不能说北方对南方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不能向南方发起进攻。美军还驻扎在南朝鲜，苏美之间有着分界线的协议。我们的人民因战争而疲惫，它需要喘息时机，因而不会支持新战争的想法。[37] 从斯大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同意金日成的行动计划，主要是因为，第一，无法确定在力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北方能够获胜；第二，担心在美苏有分界线协议和美军驻扎在南朝鲜的情况下，这样的行动会使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至于说苏联人民已疲于战争，则一半是反映了战后苏联需要休养生息的真实情况，另一半则是斯大林委婉拒绝对方要求的惯用遁词。事实是，斯大林并非根本上反对以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相反，由于美苏冷战在欧洲已经开始并且苏联相对地处于劣势，如果在远东朝鲜半岛能够统一于共产主义旗帜下而又不至于引发美苏军事冲突，从而为社会主义阵营增添一份力量，那对斯大林来说，又何尝不是一

件值得拍手称快的大好事呢？所以，斯大林并未完全给金日成的行动计划泼冷水。他叮嘱金日成好好考虑和权衡，然后再来苏联。[38]斯大林主要从力量不足的角度否定金日成的行动计划以及他对金日成的叮嘱与其说是打消了不如说是激发了后者准备行动的意愿和决心，更何况金日成回去的时候已经带着一份苏联向朝鲜提供贷款用于购买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设备材料的两国经济合作协定。[39]

金日成访苏结束后，美苏在欧洲的冷战继续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1949 年 4—5 月，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失败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一年来南斯拉夫逐渐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使苏联在冷战中接连遭到失败和挫折。苏联当然不能容忍它在与美国的冷战中处于劣势地位。它要寻找反击美国的机会，而当时远东形势的发展变化正好给苏联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几乎就在苏联在欧洲冷战中失败的同时，远东的中国革命已经呈现出胜利的曙光：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并向全国胜利进军。斯大林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看到了一个即将出现的新中国将会成为苏联盟国的美好前景。如果中国与苏联联合起来，那么在远东就足以形成一支能与美国或者未来的美日联合抗衡的雄厚力量。这就是斯大林初露端倪的以中苏同盟对抗美国或者美日同盟的新的远东政策蓝图。在美苏在欧洲的冷战愈演愈烈和远东的形势呈现出新的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在朝鲜半岛维持原状的防守政策，在斯大林看来，似乎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而在即将出现的中苏联盟中再加上紧挨两国的朝鲜，那不啻是增添力量的多多益善的事情。

这样，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就开始随着它新的远东政策的出现而逐渐地进行调整。原来地位并不重要的朝鲜，在苏联的远东政策中开始显眼了。当然，这种显眼开始时与其说是因

为苏联主动地关注朝鲜问题莫不如说是朝鲜南北关系的愈益紧张特别是朝鲜领导人积极地向苏联提出各种要求使然。在苏联远东政策的调整中，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可以说是变化最晚最慢的，但结果却是最严重的。

1949 年 6 月，苏联同意向朝鲜提供一批武器装备，内有各种军用飞机 100 架、坦克 87 辆、装甲车 57 辆、各种火炮 230 门、步枪 1 万多支。[40]

1949 年 9 月 3 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内，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苏联代办请文日转告金日成，这个问题十分重大和严肃，必须加以认真周密的考虑，因此他坚定地建议金日成不要仓促行事，暂不要对此问题作出任何决定。[41]

9月 11 日，葛罗米柯回电顿金，要他速与金日成会晤并弄清下列问题：

（一）他们是如何估计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

（二）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以及他们指望从游击队那里得到何种实际的帮助。

（三）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

（四）朝鲜南方驻有美国军队吗？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

（五）北方是怎样估计自己的能力的，如军队状况、保障程度和战斗力。

（六）请告诉我们您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我们朋友的建议有何种程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42]

葛罗米柯的电文表明，虽然苏联没有同意朝鲜北方发动进攻，但是它已经开始考虑和估计这种进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苏联原来的政策是维持现状。从维持现状到伺机而动（考虑进攻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从这时（1949 年 9 月）起，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9 月 12 日和 13 日，苏联代办顿金与金日成和朴宪永会晤了两次。14 日，他在致葛罗米柯的电文中报告如下：

南朝鲜有陆海空军人员 8.5—9 万人，其中军官 4700 人。“军官训练较差。军队训练大纲没有系统执行。总的说来，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战斗力不强，并说北方军队根据自己在三八线上小规模的战斗经验深信这一点。”在南朝鲜有游击队 1500—2000 人。近来游击运动有所加强，但是，“金日成认为，不能指望从游击队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在如果北方发动内战舆论和人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上，金日成拿不定主意。 9 月 12 日谈话时，他明确说，如果北方首先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这将在人民中产生不良印象，而且由他们发动进攻在政治上不利。当时他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发动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金日成的想法是，等到中国主要战役结束后再说。”

在 9 月 13 日的会谈中，金日成先是说，人民将欢迎北方的武装发动，即使是他们首先开始军事行动，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输掉。后来，在谈话过程中，金日成又说，如果内战拖延下去，那时他们会陷于政治上不利的地位。而现在条件下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内战，而只是建议夺取瓮

津和该半岛以东到大约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

他们认为，如果发生内战时，南朝鲜人民将同情北方军队，并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将给予支援。他们希望在军事行动顺利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

根据官方材料，南朝鲜有 500 名美国军事顾问和教官。根据谍报（需进一步核查），南朝鲜有 900 名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 1500 名担任警卫的士兵和军官。北朝鲜军队有 97500 人。“金日成认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和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北方军队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如航空兵飞行人员数量不足和训练较差，军用舰艇缺乏，大口径火炮对于实战准备不充分和弹药不足”。

金日成的建议是：先突击瓮津半岛上的南朝鲜军队，消灭那里的两个团，占领半岛以及以东大约至开城地区，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南朝鲜军队遭此突击后，可能士气沮丧。这时可继续向南方挺进。如果南朝鲜军队在瓮津战役之后并没有士气沮丧，则巩固所占地区，从而可以缩短防线 1/3。

金日成认为，瓮津半岛有可能发展成为内战，但他希望这将不会发生，他认为，南朝鲜人不敢在三八线其他地段上发动进攻。

顿金的意见是：

金日成预计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内战。在北朝鲜和南朝鲜人领导圈子内，都有不少主张打内战的人。因此，在发动这个局部性战役时，必须考虑到，它必将是内战的开始。

现在发动内战，对北朝鲜自己是适宜的吗？

我们以为，这是不适宜的。

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甚至

把南朝鲜游击队和人民给予北方军队的援助考虑在内，也不能指望速胜。同时，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首先，拖延战争将使美国能够给予李承晚以相应的援助。美国在中国遭到失败后，大概会比在中国时更坚决地干涉朝鲜事务，自然会尽一切努力挽救李承晚。其次，当内战拖长时，战争带来的牺牲和苦难，会使人民对战争发动者产生不满情绪。

此外，朝鲜持久的内战，会被美国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和进一步掀起战争歇斯底里。

因此，现在发动内战，对北朝鲜是不适宜的。在现在的国内外形势下，如果北方能够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地迅速结束战争，那么，只有在这个时候，进攻南方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上面所说的局部性战役胜利了，而且也没有导致内战，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候，北朝鲜也只是军事上赢了，而政治上却在许多方面输了。这种战役将被利用来指控北朝鲜力图挑起骨肉相残的战争。它还将被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用来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事务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

我们认为，在上述条件下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43]

但是第二天，9 月 15 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却提出了与顿金相反的意见。大使首先分析了朝鲜南北双方的形势，基本结论是，形势朝着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大使指出，促使朝鲜北方提出进攻南方的原因是：

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当前形势下，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和南朝鲜反动派不同意和平统一。在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和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建立有左派、中间派和一部分南朝鲜右派政党参加的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

平方法统一国家。南朝鲜反动派拒绝了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的号召。因此，他们面前出现了如何统一国家的问题。

他们的出发点是，绝大部分人民赞成国家统一，赞成取消三八线。

在美国军队驻扎南朝鲜期间，人民被告知，美国军队妨碍统一。现在朝鲜已经没有美国军队了。因此，统一的这种障碍已经消除。人民自然地会问，是什么妨碍国家统一。在朝鲜南方，反动派进行反对民主政府和反对共产党人的宣传，指责他们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金日成和朴宪永看来考虑到了形势，不想承担拖延国家统一的责任。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无论朝鲜北方还是南方的人民都会支持他们的这个措施。他们显然认为，如果现在不用武装方法实行统一，那么统一问题就会拖后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认为能够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粉碎和消灭左派组织。同时南朝鲜反动派可利用这个时间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并进攻朝鲜北方，以便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

我不排除，金日成想进攻南方，是指望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他显然认为，既然朝鲜人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因此中国人也应当帮助他们。

我的结论和建议是：

就如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仍然认为，无论朝鲜南方还是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都对我们的朋友有利。

为国家统一和独立斗争的左派民主力量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他们采取的措施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广泛阶层的支持。

但是，需要考虑到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朝鲜人民军开始进攻来反对苏联这样一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我不排除，

美国人将干预这种冲突并给南朝鲜人提供积极的帮助。我还认为，人民军的人数和他们拥有的物质基础现在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进行仅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为此，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缩短陆地战线。[44]

斯大林否定了什特科夫大使的想法。问题主要不是要不要进攻，而是进攻的时机尚未成熟。9 月 23 日，在由布尔加宁和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指示稿中，让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军对朝鲜南方开始全面进攻是不恰当的和不合时宜的"。原因是，第一，发起这样的进攻，"可能被反动派用来向社会舆论指责朝鲜政府有侵略意图和把国家拖人内战的愿望"。第二，"在作出必须开始进行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斗争决定以前，应当权衡将要遇到的所有情况。为开始实行这种严肃的措施，需要有获得成功的充分把握。然而，在当前形势下，未必能够指望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在南方人民中没有充分准备好这种进攻的基础，并且不清楚南朝鲜人民能否广泛地起来支持人民军。还应当考虑到，游击运动开展得不够充分，因此难于指望南朝鲜游击队员的重大帮助。"第三，"人民军进攻南方可能给美国以借口，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侵略，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美军进驻南朝鲜可能导致长期占领国家的南部，从而拖延国家的统一。"指示还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实施占领瓮津半岛战役也是不适宜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南方人采取反措施"从而使军事行动的范

围扩大。指示要求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为推翻南朝鲜政权创造条件。[45]

9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责成什特科夫大使转告金日成和朴宪永：“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理由是，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所以，“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设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46]决议表明，首先，苏联不同意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发起进攻。其次，苏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合适的统一方法不是从外部向南方发动进攻，而是在其内部创造推翻反动政权的条件。

虽然朝鲜领导人接受了苏联的指示。但是三八线附近的军事冲突依旧未止。10 月 14 日，朝鲜北方军队对侵入三八线以北 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方军队发起反攻，占领了该高地。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先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这一军事行动，而且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为此，葛罗米柯指责什特科夫大使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许可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了警告。[47]

但是不管怎样，1949 年 9 月中旬葛罗米柯要求考虑和估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意味着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已经不再

是维持现状而是伺机打破现状了。由于进攻条件尚未成熟和害怕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伺机而动总体来说仍属维持现状，尽管其目的是要打破现状。这种伺机而动的目标到 1950 年初期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1950 年初期，国际舞台上发生了几件足以影响斯大林决策的重要事件。1950 年 1 月，正是毛泽东同斯大林在苏联进行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时候。 19 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发回如下内容的报告： 1 月 17 日，朝鲜外务省为新任驻华大使李周渊饯行。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驻朝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等人提出：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金日成颇动感情地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常常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还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回避了这些敏感问题。于是金日成就去找什特科夫，要求“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队强大得多”。金日成还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就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质问什特科夫：“为什么不许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指出，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

但是，“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48]什特科夫当然按照政治局 9 月 24 日的决议精神回答金日成。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次斯大林在听完汇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使斯大林态度发生转变的重大因素，首先是中苏关系的新发展。1 月 22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就缔结中苏同盟条约问题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中苏同盟的订立，对于苏联来说将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

（一）即将诞生的苏中同盟将使远东的政治格局发生有利于苏联的重大变化，平添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集团）的力量。有了中苏同盟，斯大林与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和手段就大为增强和增多了。而眼下最能发挥中苏同盟力量的地方就是远东的朝鲜——它同为两国的邻国。那里的革命形势非常高涨。多少年了，金日成受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一直希望和要求依靠苏联的支持来实现半岛的统一。但是，苏联始终没有同意。因为苏联无法直接帮助朝鲜北方，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是苏联恪守的原则。而单靠北方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征服南方的。当中苏建立同盟关系后，最大的实际可能性就是，把中苏同盟作为一种替代性力量运用于对朝鲜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援助。这样，苏联对朝鲜半岛的维持现状的政策（确切地说是伺机打破现状），在注入了中苏同盟的因素后，适时地完成了向进攻政策的转变。

（二）中苏同盟的缔结，对苏联的不利后果是，它至少必须在形式上交出它在中国大连和旅顺的特殊权益，从而将要丧失它通过雅尔塔协定得到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当然与得到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盟国相比，忍受这种损失是完全值得和必要的。况且需要时按照两国的条约，苏联照样可以使用上述港口。但是这毕竟不如放在口袋里的东西用起来那么容易和

方便。所以，不管怎样讲，失去了的旅顺和大连需要一种其他类似的东西予以弥补。这样朝鲜半岛的仁川和釜山作为值得谋取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应当能够映入斯大林的眼帘。而这样做的前提当然是朝鲜半岛统一于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所以，用朝鲜的仁川和釜山代替即将失去的中国的旅顺和大连的计划，在苏联对朝鲜政策由维持现状向进攻性转变过程中也应当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

导致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和干预的估计。对于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斯大林是非常重视的。尽管美苏冷战后，苏联与美国已进入了全面对抗的阶段，但是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是整个冷战时期斯大林遵循的基本原则。苏联之所以“伺机”几年而不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美国会作出强烈反应。1949年夏秋，当朝鲜半岛形势愈益紧张时，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使馆考虑和估计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当时朝鲜领导人认为，美国不会进行直接的武装干预，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指挥。[49]对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斯大林不说是完全不信，至少也是将信将疑。所以他并不接受这种估计，当然也就不同意朝鲜北方的行动计划。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务线”是：从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琉球群岛。[50]这一讲话只是明确地把日本划入了美国的防务线之内，而没有包括朝鲜半岛，它对斯大林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51]在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的问题上，斯大林的估计开始逐渐朝着“不会”的思路倾斜。

所以1950年1月中苏同盟条约的基本敲定和对美国态度的估计，对斯大林由伺机而动转为同意行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了中苏同盟，就可以让中国去承担支援朝鲜北方的责

任，可以让中国去与美国正面斗争，从而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有了艾奇逊的摒弃朝鲜半岛于美国太平洋防务圈之外的表态，那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美国插足干预的担忧。

1 月 30 日，斯大林在致什特科夫大使的电文中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情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52]

斯大林此口一开，以后的事情便朝着苏联全力帮助朝鲜北方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1 月 31 日，大使转告斯大林：“金日成十分满意地听取了我的转告。看来，您同意接见他并准备给他提供援助一事，给他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金日成为了再听得准确些，便问我，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了吧。我回答说，从这个通知看，斯大林同志准备接见您。随后，金日成说，他将做好晋见准备。”[53]

2 月 4 日，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提出：能否再组建 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人数增加到 10 个步兵师；能否要求苏联政府把将于 1951 年提供的贷款用于 1950 年以便为计划组建的 3 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54]

对于金日成的要求，苏联全部予以满足。2 月 9 日，维辛斯基致电大使让他转告金日成：可以着手组建 3 个补充师。可以请求在 1950 使用 1951 年的贷款。[55]

2 月下旬，苏联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军事顾问。[56]

3 月 9 日，金日成要求苏联政府提供 1.2 亿—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物资援助。3 月 18 日，斯大林在电文中表示，“苏

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请求。[57]

3月20日，金日成在与什特科夫大使的会谈中提出将于4月初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讨论如下问题：(1)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2)国家经济发展前景；(3)可能还有若干党的问题。[58]3月24日，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斯大林同意接见他和朴宪永。大使同时要求莫斯科为金日成访苏安排专机或船只。[59]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苏联并同斯大林最终商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行动的重大计划。金日成对斯大林说，采取军事行动解放南朝鲜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告诉斯大林，李承晚政权是腐朽的，只要朝鲜人民军发起进攻，那它就会在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中崩溃。他认为，美国曾不得不接受失去中国的现实，它也未必会卷入在朝鲜的战争，更何况在朝鲜发生的事情属于朝鲜人民的内部事务。斯大林显然接受金日成的观点，认为北方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60]

斯大林在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后，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处理该计划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很清楚，在苏联不能直接出兵的大前提下，事情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如果美国置身事外，那么就如金日成所估计的那样，战争很快会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如果美国进行干预，那么无论给予多少援助，北方军队是无法单独取得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发挥中苏同盟的作用，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的胜利。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这个与中国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和将对远东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立即通报给作为盟国的中国。这是因为：第一，斯大林既已同意金日成的计划，那他更多地就是相信第一种可能性。在这种无需中国出场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把决定马上通报中国。第二，中国对于朝鲜问题的态度，

斯大林实际上是了解的。1949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文中就曾说过，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方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61]新中国成立后内战的创伤尚未治愈，一切均百废待兴，又面临着解放台湾的任务，当然不希望再陷入一场新的战争中去。所以，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到要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当斯大林与金日成通过电文往来讨论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还在苏联，但是斯大林也只字未提他支持金日成的要求。总之，如何向毛泽东交代并能让他接受关于朝鲜问题的新决定，对于斯大林来说也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难题。结果，斯大林采取了一种间接迂回的办法，让金日成先去同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金日成于4月25日回国。5月12日他在与苏联大使什特科夫谈话时说，他打算于5月13日访问北京，向毛泽东通报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但金日成同时表示，“他不再向毛泽东求援了，因为在莫斯科已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给了他足够的援助’。[62]

5月13日晚，金日成飞抵北京后即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如下指示：“现在形势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63]显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指示感到费解。晚上11点30分，周恩来前往苏联大使馆，他说，“毛泽东同志想得到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引注）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64]5月14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转达斯大林的电文：“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表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

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作出。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作出。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65]这样，只是在中国方面的追问下，斯大林才第一次向毛泽东说明他已经改变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同时斯大林以非常巧妙的表面上“抬举”中国人的方式，使中国无法逃脱地被与苏联的朝鲜政策挂上钩。另一方面，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准备情况则尽量对中国进行隐瞒。[66]

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对此迅速作出强烈反应。[67]为了使美国来不及进行干涉，斯大林要求朝鲜“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他认为，“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同时他表示要在“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68]

但另一方面，美国强烈的反应使得斯大林在提供武器之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战争爆发时，在朝鲜军队中共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当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南进发时，斯大林下令召回在前线的军事顾问。[69]虽然由于形势紧迫，斯大林同意向朝鲜前线司令部（但不是战斗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但是最后军事顾问是作为“《真理报》记者”派往的。[70]

美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是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尽快进入朝鲜战场就是斯大林必须考虑的问题。

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报告斯大林，周恩来在与他的会谈中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同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能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71]斯大林马上致电罗申，让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

是正确的。”[72]但是斯大林显然是希望中国能更快地进入角色。7 月 8 日，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3]但是，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中国军队要进入朝鲜参战，其条件是美军越过三八线。而当时的情况是朝鲜人民军正在南朝鲜境内迅速推进。所以，出兵问题从中国角度来说，并不具有很大的迫切性。

随着朝鲜战场局势的恶化，中国方面的忧虑加深了。8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沉重地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74]

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成功地登陆，朝鲜战场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在危急的情况下，斯大林立即开始考虑让中国出兵的问题。[75]10 月 1 日，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复信中说，关于“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76]同一天，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介绍了朝鲜令人绝望的情况，然后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您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77]

10月 2 日，正当朝鲜战场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有关中国是否出兵的问题发生了扑朔迷离的周折。这一天，出现了毛

泽东致斯大林的两封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文。

在俄国档案中没有收藏的那份电文中，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同意出兵：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 12 个师于 10月 15 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78]

然而在斯大林收到的那份电文中，毛泽东却告诉斯大林，中国决定暂不出兵：

“您 1950 年 10 月 1 日的来电已经收悉。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

决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退却，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医治，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79]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内出现毛泽东的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文呢？沈志华先生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一书中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的两份电文都是真实的。他说，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毛泽东拒绝出兵的电文，“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这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做出的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发出的。所以中国档案中就没有保存这个文件。”至于俄罗斯档案中为什么没有毛泽东同一天的关于同意出兵的电文，沈志华说，“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查，中国档案中的电报（指 10 月 2 日毛泽东同意出兵的电文——引注）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

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的记录，而在 10 月 2 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标有发报时间（凌晨 2 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他认为，这份电文最后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他援引陈兼对此事的采访记录和其他材料作了如下描述：毛泽东在 10 月 1 日接到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文后，连夜召集由他、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斯大林的要求。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会议出现了分歧。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会议还决定第二天召开包括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内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议此事。10 月 1 日会议后，毛泽东急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在 10 月 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力主出兵，认为这已是万分火急的事情。会议决定由彭德怀领兵，并在 4 日再行讨论。在 2 日的会议上多数中央领导人主张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要谨慎从事。或许是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在与罗申谈话时只得先告诉苏联方面，中国暂时不能出兵。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中国领导人内部对出兵问题是有分歧的。[80]

但是，不管怎样，暂不出兵并不意味着中国改变了出兵的战略立场，尤其是因为毛泽东是最坚决的出兵论者。事实也证明，没“暂”几天，中共中央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统一的意见。[81]

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 10 月 2 日的暂不出兵的电文后，一方面着手安排苏联在朝人员从朝鲜战场脱身。[82]另一方面，他则再次要求毛泽东派兵入朝。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分析了出兵的时机和益处是多么的有利和明显：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

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师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 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 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 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 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它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做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明天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人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83]

在 10 月 8 日致金日成的电文中，斯大林把上述这封电报告诉了金日成。斯大林还说：毛泽东在 10 月 7 日给他的复电中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并准备派出 9 个师而不是原来的 6 个师。但是，派兵不是在现在而是要过一些时候。毛泽东准备派代表同斯大林商谈这些问题。[84]

10月 8 日上午，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然后他与正在苏联治病的林彪一起前往索契疗养地会见斯大林。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从 10 月 10 日晚上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85]周恩来是带着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86]周恩来在会谈中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极其严重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87]斯大林则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尤其是东北的安全所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但他表示，苏联不能卷入战争，因为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外，他还说，苏朝边界很短，并且苏联已经承诺从朝鲜全部撤军。他认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那是最好的了。他答应，苏联将向中国提供足够的装备和军事物资，而苏联空军也将保卫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但他表示，苏联无法（至少在初期无法）向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而周恩来坚持要苏联提供武器和空中掩护。[88]

10月 11 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

说，苏联将充分满足中国在大炮、坦克、 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方面的需要，但是，至少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苏联空军才能完成支援中国军队的准备。[89]要待几个月苏联才能出动空军！这等于使中国急切期望的空中掩护落空。这样的电文到了毛泽东手中，无异于让毛泽东进退两难。如果在得不到苏联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兵，中国军队入朝后的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90]而如果因此罢手，则中国要比苏联更难。因为在苏联的远东战略棋盘上，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最起码位于中国和日本之后，有了它固然可以增加苏联在远东的权益（特别是为苏联补充新的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但是即便没有它，也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正如斯大林所说，北朝鲜丢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更何况，从另一个角度讲，眼下丢了北朝鲜将大大地减少苏联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须知，斯大林之所以宁愿中国不出兵都不肯出动空军，就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再进一步说，当初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考虑是改变因 1949—1950 年在欧洲冷战中遭到的失败和挫折（柏林危机中的失败和面临北约组织的威胁等）而所处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斯大林是从美苏冷战总的态势出发，为了挽救苏联在欧洲的失败和削弱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而把朝鲜半岛作为苏联反击美国的一个合适的场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首先，由于中国实行的对苏“一边倒”政策已使中国处于与美国的对立之中。如果坐视朝鲜灭亡，那么，美韩联手则将对中国构成更大威胁。所以，就如周恩来在 10 月 6 日的军委会议上所说，“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91]其次,在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就出兵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出兵而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出兵。也就是说，出兵对中国来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后，中苏两国实际上是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行动的。苏联方面：赶紧去实施撤退的计划。13日，斯大林接到的一份报告说，满载士兵的美国军舰正在大规模集结，显然是准备在元山港登陆。斯大林立即意识到敌军可能准备在元山发动一次新的两栖攻势，这样朝鲜人民军就有可能再次被拦腰截断。当天斯大林就给金日成发去电报，告诉他中国人尚未准备参战，因此建议他把朝鲜军队撤往北方。[92] 中国方面：被迫作出出兵的决定。毛泽东在 10 月 12 日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后，先是立即发出电文，通知“10 月 9 日命令暂不实行”，“13 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93] 然后，毛泽东于 13 日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出兵与否的利害关系。会议最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作出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和高岗一起研究了入朝后的作战方案。[94]

也是在 10 月 13 日，毛泽东把中国出兵的决定通知斯大林。[95] 至此，在这场出兵问题的较量中，主动权最后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次日，斯大林电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96]

对于中国所要求的空军援助，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97]

10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

鲜战场。10 月 25 日，志愿军正式投入了战斗。这样，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4 个月，斯大林终于成功地把中国推上了反美斗争的第一线。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恪守不与美国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则，依靠中苏同盟的力量，通过中国与美国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战争。朝鲜战争是苏联借助于中苏同盟的力量对赢得柏林危机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所进行的一次重大反击，它使美苏冷战进入了全球化并伴以局部军事化的危险阶段。

第二节　建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努力及其失败

一　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设想和规划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整个国际关系急剧恶化和美苏关系骤然紧张。虽然作为美苏冷战的一种特殊形式，朝鲜战争只是一场有限的地区性战争，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真刀实枪的战争孕育着美苏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威胁。它同时也表明，美苏冷战进入了一个总体非武装对抗但局部有间接军事冲突的新阶段。

新的形势对共产党情报局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冷战产物和工具的共产党情报局，在其成立之时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以（阵营）集团的力量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的对抗。但是由于南共和南斯拉夫的“叛逆”，迫使斯大林不得不违背初衷和偏离方向，把情报局变成讨伐南斯拉夫的工具。情报局成立后共召开过三次大会，其中有两次（1948 年 6 月和 1949 年 11 月）是专门针对南斯拉夫的批判会。情报局作用的这种

奇怪的异化，对苏联来说，无疑削弱了与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斯大林开始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与美国进行冷战的战略和手段。其结果就是打算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由联共（布）对共产党情报局各党实行统一的领导。

1950 年 9月 21 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治委员会（其前身为对外政策部和对外关系部）主任格里戈良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议于 1950年 10月 10 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98]格里戈良在报告中谈到的会议的两项议程是：(1) 讨论有关保卫和平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筹备工作的问题；[99] (2) 讨论关于共产党报刊的现状和任务的问题，听取一些党的代表的报告。

格里戈良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和平运动的问题。他建议，“各党代表代表应当对共产党所做的争取禁止原子武器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制定措施以便加强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筹备工作。”[100]

他提出，“联共（布）中央驻情报局书记处的代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当：(1) 注意深化保卫和平运动纲领的必要性，除了禁止核武器要求外，还应当补充提出有关普遍裁军、谴责新战争宣传和采取旨在反对新战争准备和宣传活动的措施的建议。(2) 强调经常揭露新战争宣传的重要性和追究进行此类宣传活动的官员责任的任务的重要性。 (3) 指出必须吸引更广泛的人士参加保卫和平运动以便进一步扩大保卫和平运动的群众基础。(4) 建议采取更多的措施为第二次保卫和平大会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来推选与会代表并通过给代表的指示。(5) 强调希望扩大与会代表的成分，吸收妇女、青年、宗教、文化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代表以及某些拥护和平的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界进步人士、议会活动家

和其他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亦即要尽可能多地吸收非党人士参加保卫和平大会。(6) 注意必须将大会的筹备工作与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征集签名结合起来。”[101]

关于共产党报刊的现状和任务的问题，格里戈良认为，在讨论该问题时，要责成联共（布）代表：(1) 建议在各党的中央刊物上更广泛地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2) 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所有进步报刊揭露旨在煽动新战争宣传的重要性。(3) 注意改善共产党报刊发行工作的必要性。[102]

格里戈良还建议，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就将于 1950 年 11 月底和 12 月初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交换意见。情报局大会主要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贩子斗争的今后任务；关于与迫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派的恐怖活动进行斗争的措施。[103]

但是斯大林在阅读了格里戈良的报告后，否定了他的建议，决定把情报局会议的议事日程改为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的问题。

于是，格里戈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报告作了修改。10 月 26 日，他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这份 10 月份的新报告与 9 月份的原报告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新报告提出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应当讨论的问题是：(1) 讨论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2) 听取意共和捷共中央机关报编辑的报告；(3) 就共产党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日程交换意见。原来 9 月份报告中作为重点的保卫和平运动的问题完全抹去了。

对上面三个问题，报告详细论述如下：

“1. 各党驻情报局书记处的代表应讨论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提出供共产党情报局大会讨论的相应建议。（着重线系原作者所加 ——引注）

根据事先的约定，可由法国共产党代表提议将该问题提交书记处审议。

拟定于今年 11 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是合理的。

法共、罗马尼亚工人党和联共（布）驻情报局的代表可提出召开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建议。

在就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向情报局书记处提出的建议中应当：（1）指出扩大情报局职能的必要性源于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它要求在争取和平、反击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中各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合。（2）强调情报局的工作经验已充分证明建立情报局是正确的，现在提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各党需要相互协商和协调行动的问题范围扩大了，无论是在一般的政治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工作、宣传、党的组织建设和共产党报刊的活动等问题上，都出现了各党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必要性。（3）提出设立情报局常设书记处和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以保障对情报局活动的经常性领导的问题。

2. 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还可适当地以交流经验的方式，听取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的报告。

在该问题讨论完毕后，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上更好地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建设和加紧揭露新战争宣传等问题，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

3. 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应当就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日程问题交换意见。

在今年 12 月下旬召开情报局大会是可取的，会上将讨论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情报局会议还应当设

立情报局书记处（指常设性的—— 引注），选举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审议情报局组织结构问题，也就是情报局组织巩固和机构加强的问题。”[104]

在格里戈良报告提交两天后，10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批准了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治委员会工作人员起草的《情报局书记处关于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建议》草案。草案的第2和第3条说：

“2.根据已经被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各党之间相互协议和自愿协调行动的原则，情报局书记处将履行下列职能：（1）把国际形势中产生的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及其先进的共产党先锋队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以反对战争威胁、捍卫劳动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提交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2）听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告以交流经验和改善它们的工作并围绕着报告向这些党提出建议。（3）根据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请求，就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的问题向它们提出建议以便在情报局大会上进行讨论，而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将接受有关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4）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党的组织建设、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改善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和加强同反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工作给予帮助。（5）检查执行情报局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情况，提出问题以供情报局大会讨论。（6）做好对《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领导工作。

3.情报局大会认为，必须成立作为常设机关的情报局书记处，创设情报局总书记职务。”[105]

从格里戈良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对于如何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苏联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设想和规划。这就是：第一，扩大情报局职能

是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冷战的需要。第二，就各党来说，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它们的党内问题将要拿到情报局会议上去进行讨论，并接受情报局会议的建议和帮助。第三，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有关的党必须接受情报局的决定和指示。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苏联准备重新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也就是要回到共产国际的老路上去了。

按照苏联方面的计划和部署，1950 年 11 月 22—24 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按照事先的约定，由法共代表法容就扩大情报局职能的问题作了报告。

关于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必要性，法容从国际形势的特殊性方面作了论证，即：两个阵营斗争尖锐化；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由准备新战争转为直接侵略朝鲜，扩大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行动；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备竞赛在最近几个月里又有了新的发展；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武装力量，准备重建西德的侵略性军队；希特勒分子佛朗哥恢复了权力。结论是：“战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新阶段”。[106]

法容指出，国际反动派已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发起进攻，降低工人工资，恶化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消除民主自由的残余，加紧逮捕和在法律上迫害和平战士，更经常地采取首先是针对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领导人的恐怖和政治暗杀的手段。“在国际形势普遍紧张的条件下，应当再次提及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对其利益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的各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107]

法容认为，战争威胁的增长和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有力地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联系的问题。“我们感到，已经有必要在各兄弟党自愿合作、协调它们的活动和组织交流它们

之间经验方面采取新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在改革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以扩大情报局职能中应当有所反映。”[108]

法容在报告中对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三年来在组织交流经验和协调各党工作的活动及其作用作了肯定的总结。他说，各党之间的联系和就诸如保卫和平的斗争、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等党的活动问题所制定的共同一致的决定，“促进了兄弟党思想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团结，加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9] 情报局“及时地揭露并把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法西斯间谍和杀人犯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提高了共产党内的革命警惕性，有助于及时地把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变节分子从一些党中清除出去。”[110] “总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及其活动乃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反帝力量团结起来为了争取牢固的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为了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榜样和学说具有不可分割联系的事业而斗争的重要因素。”[111]

然后报告要求改建共产党情报局，因为它过去的形式已经不符合“日益增多的任务了”；“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常设国际行动机构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这样的机构就是情报局书记处。”在国际形势发生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需要这种庞大的常设机构。它将能极大地提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统一观点和行动的能力。此外，“兄弟党将经常能够在其感兴趣的问题方面得到劝告和建议”。[112]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如何扩大和执行职能的问题，报告说：

本着相互一致和自愿协调各党行动的原则，情报局书记处可以承担下列职能：它可以把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共同进行反对战争威胁、捍卫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一起努力和统一行动”的问题送交各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书记处可以根据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未加人情报局

的党）的请求，就各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实践活动问题制定建议以供情报局会议进行讨论。将把定期听取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告以便交流它们的工作经验和必要时就这些问题向各党提出建议作为情报局书记处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按照已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则，即必须检查已通过决议的执行情况，情报局书记处应当检查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及其涉及加入情报局各党的建议的执行情况。情报局书记处“应当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组织建设、马列主义宣传、改善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和加强同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等工作起到促进作用”。而《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则是行动的指南。[113]

报告认为，情报局扩大职能后获得的“优势”是：书记处将“提高兄弟党的战斗准备状态，加强党在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切身利益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将能促进各党思想政治的进一步提高，党的队伍的组织巩固和党的影响的增强”，“加强对争取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必要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反对投靠帝国主义者的右翼社会党首领对工人阶级的有害影响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114]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法容在报告中竟然没有提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问题。但是在法容报告后接着的讨论中，首先发言的保加利亚代表恰科夫却说，“我们代表团完全同意法容同志的报告，赞成他提出的扩大情报局职能和设立以总书记负责的常设书记处。”[115]联共（布）代表苏斯洛夫接着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苏联的建议：“我们还认为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职务是正确的和必要的。”[116]

各党代表在发言中对设立总书记一事虽然只字未提，但扩大情报局职能则一致表示赞同。保党代表认为，三年来，情报局成功地“弄清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政治性质这样的基本

问题”，“组织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特别是研究和运用联共（布）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很好地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争取和平与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消除了反映在所谓不同于苏维埃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理论’中的偏差和歪曲现象,,。[117]

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回顾情报局三年经历时说，各党之间的联系和制定共产党情报局有关各共产党活动问题的协调一致的决定，促进了“各兄弟党思想和政治组织的巩固，提高了它们的革命警惕性，加强了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及时揭露和清除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里的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法西斯间谍和杀人犯以及其他一些党内部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叛徒”。[118]

匈牙利代表霍瓦特说， 1947 年情报局第一次大会宣布世界分裂为“和平”阵营和“侵略”阵营的结论使匈党认识到，“内部的敌人不仅仅是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还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他们必须加快予以清除。认识到这一任务决定了我们对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这一情况也提出了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任务。”他还说，“1948 年 6 月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上对铁托匪徒的揭露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揭露和消灭拉伊克匪徒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促使党更坚决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工作和加强反对富农的斗争。但是，情报局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当时它把捍卫和平作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主要的决定性任务。”[119]

捷共代表巴雷什回忆说， 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大会后几个月，也就是 1948 年 2 月，捷共“以牢固的捷苏友谊和反帝民主阵营的团结声援为基础，领导人民消除了反动叛乱的试图，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在斯洛伐克成功地消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而在 1950 年揭露了钻

进捷共中央内部的“有害的代理人”。[120]

意共代表多诺弗立奥举了两个例子证明必须扩大情报局的职能。一是，刚刚成立的前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共产党曾就包括党纲问题等同意共商量。二是，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共产党经常就一些问题向意共寻求帮助和建议。“只是意共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我们对外政策的整个安排”。“情报局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可以给这些成员不多的党以帮助，向他们提出建议，并在必要时，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121]

必须指出的是，联共（布）代表对于法容所提出的扩大情报局职能的提法作了精心的修改。法容原来的建议是：根据情报局内外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请求，准备就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提出建议以供情报局讨论。苏斯洛夫将此改为：“而在不容迟延的情况下，将给情报局内的有关各党下达必须执行的指示。”[122]最后会议通过的决议又改为：“而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将接受情报局有关各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123]仔细分析一下，前一句话的重点在于，主体是下达指示者——情报局，而后一句经修改的话的重点在于，主体变成了决定和指示的执行者——情报局的有关各党。这样的修改当然不是简单的语言修辞问题，而是突出了对各党的约束，强调它们必须执行决定和指示。更有甚者，苏斯洛夫还要求，“我们也应当重视欧洲、美洲和亚洲那些没有加入情报局的共产党的利益，应当提出帮助这些向情报局寻求建议的党的任务。”这些党所属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古巴。[124]这清楚地证明，职能扩大后的共产党情报局活动所达的范围并不仅仅是情报局本身，而将是整个界。上面所引的意共代表的发言也证明了这一点。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扩大情报局的职能和设立常设书记处。

法容的报告成为会议通过的《关于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会议建议情报局书记处将这份决议草案提交情报局下次大会批准。会议还委托书记处对情报局章程作相应的修改，并将章程草案提交情报局大会审议。[125]此外，会议还就召开情报局大会以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由法共代表作为情报局大会的报告人。[126]

除了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外，1950 年 11 月的情报局书记处会议还听取了意共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和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主编所作的报告。

意共代表说，意共反对让报纸成为党内报纸的观点，认为有必要使报纸成为“能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并把群众团结在共产党人政策周围的报纸”。意共希望把报纸办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并宣传这一学说的工具”。。[127]意共代表详细阐述了该报为争取劳动人民自由和福利而斗争的情况。意共代表承认“意大利人民不太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这是《团结报》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所以，他称，应当更重视“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揭露敌对的思想意识形态”“总结党的工作经验”，等问题。[128]

捷共代表在发言中说，1948 年 2 月以后《红色权利报》夺得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的“领导地位”。这样，该报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帮助捷共实行它的政策。该报宣传了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和富有创见的国内政策以及“光荣的联共（布）的经验”。在谈到缺点时，捷共代表说，该报发表的材料没有说服力，许多文章内容是千篇一律的宣言，经常缺乏战斗精神，没有坚定地运用“布尔什维克的锐利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肤浅，考虑不周密。[129]

接着，会议听取了情报局刊物编辑、苏联哲学家米京的发言。米京上来就引用了三段“斯大林同志的经典原理”（如报刊是“我们党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然后就对意共《团结报》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尽管这段时期，该报登载的有关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成就的文章增加了，但这仍然不够。没有刊登关于表现出自己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充满说服力的文章，特别是没有关于处于“马歇尔计划”压制下的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的文章。报纸完全把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等问题置诸脑后。米京指责《团结报》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那里获取国际消息，“完全不用苏联通讯社的材料”。他要求《团结报》注意，必须“严格坚持党的战斗的思想路线，与任何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以党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教育群众”。[130]米京提出的其他的指责还有：《团结报》“对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分析问题的观点所作的冷静的客观主义的叙述”；称爱因斯坦为“伟大的学识渊博的唯物主义者”；低估斯大林卓越的语言学著作的意义；把列宁的画像与杀人犯的照片放在同一版面上。米京还认为，《团结报》在选择刊登连载小说时不够严谨。他说，读者更感兴趣的不是《基督山伯爵》或者《三剑客》，而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131]

米京对捷共《红色权利报》的批评是：该报对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不深刻甚至是错误的（如，关于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理论依据的文章，分析了列宁的著作，但是竟然未提斯大林的著作。）；很少刊登“可供人民民主国家实际运用”的布尔什维克党经验的文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重视。[132]

以米京报告为基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提出了共产党报刊的根本任务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报刊的具体任务。决议认为，党的报刊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论述

下列问题："扩大和平运动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农民和中间阶层之中"，揭露一些战争贩子；加强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阵营以及它所捍卫的和平事业；宣传苏联、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133]其他的头等重要任务有：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国内政策；揭示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宣传马列主义等。[134]

决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报刊面临着争取使自己国家取得摆脱"美帝国主义侵犯"的民族独立，反对镇压民主自由包括迫害共产党报刊的斗争任务。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报刊的任务是，学习和总结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苏联的经验的实际运用；系统宣传马列主义、联共（布）经验和其他共产党的经验；揭示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动员群众战胜阶级敌人的顽固反抗。决议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及其报刊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定期刊登劳动群众的来信，力争使党的报刊成为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党影响群众的传播工具，加强各兄弟党报刊之间的联系。

决议还建议，在共产党报刊上要广泛登载情报局刊物上的材料。情报局刊物将定期评述各共产党的报刊，揭示报纸的正面经验，批评其不足。[135]

综上所述证明，1950 年 11 月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讨论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并为各党报刊制定基本任务和行动规范，是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急剧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为建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所作的一次重要的努力。在美苏冷战进入整体对抗且局部间接军事冲突的新阶段，这也是为加强和巩固苏联东欧（阵营）集团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二　挫折与退却

尽管苏联为了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作了周密的规划和全面的准备，但是这一规划在付诸实践时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950 年 12 月 23 日，已被确定为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大会的开幕日。可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使原定的会议一再延宕而无法如期召开，直至最后流产。

问题主要是在物色拟议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人选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要害在于要让各党义务式地接受情报局所通过的决定和指示。而设想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届时情报局的指示肯定要通过总书记下达于各党。所以，物色一个合适的总书记人选对于实现斯大林的这一规划是至关重要的。按照斯大林的设想，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将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挫折。

1950 年 12 月 2 日，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科斯特列夫电告苏联外交部：意共总书记将无法如期参加定于 12 月 23 日开幕的情报局大会。他在电文中说，

“12 月 2 日晚上，皮耶特罗·谢嘉（意共副总书记——引注）委托我向莫斯科的上级机关（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引注）紧急传送下列报告（报告是陶里亚蒂在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市——引注］写的并在那里委托给谢嘉；我转交的是由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报告）：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完全同意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关于已经确定的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意共领导建议推迟一个月也就是在 1 月 20 日左右召开这次大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按照原定的日期（12 月 23 日）召开会议，陶里

亚蒂同志是不可能参加的。陶里亚蒂同志现在正处于康复阶段。他手术期间的伤口不久前才愈合；医生要求陶里亚蒂同志休息较长一段时期。陶里亚蒂同志可能在 12 月 10—15 日之间从意大利来莫斯科。”[136]

这天（12 月 2 日）晚上，谢嘉在与苏联大使科斯特列夫谈话时，向大使通报了 12 月 1 日他与陶里亚蒂在索伦托见面的情况。谢嘉说，“在莫斯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陶里亚蒂干事，因为他非常非常虚弱，很容易疲劳。根本就不能考虑让陶里亚蒂在 12 月 23 日去参加情报局大会，因为到那时陶里亚蒂肯定不能参加会议的工作，也不能作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往返）然后再到高加索那样的长途旅行。”谢嘉请求苏联大使让莫斯科通过秘密方法把苏联医生关于陶里亚蒂健康状况的报告完整地转达给他，并且不能少于每 10 天一次。[137]

苏联大使在上述电文中说，“我也认为，陶里亚蒂在到达莫斯科后至少一个月内是无法工作的。必须立即放弃让陶里亚蒂在 12 月 23 日前赶到并参加情报局大会的想法。马上让陶里亚蒂工作可能对他的身体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138]

由于陶里亚蒂的身体状况原因，苏联决定接受意共的建议，推迟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 12 月 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说，“根据意大利共产党的请求，把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从 12 月 23 日推迟到 1951 年 1 月 25 日是适宜的。”政治局批准了由苏斯洛夫致各党领导人杜克洛、哥特瓦尔德、贝鲁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和切尔文科夫的电文，告知会议已经推迟。同时政治局还批准了致苏联大使的电文。电文说，“请根据上级机关的委托转告陶里亚蒂同志：您关于把召开情报局大会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的建议已获同意。就此已经建议有关各党，将于 1951 年 1 月 25 日召开情报局大会。我们将会把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通知

您。”[139]

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让陶里亚蒂同志来苏联接受治疗的决定》以及与此有关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和奥地利大使的电文。决定说，“接受中央对外政治委员会的建议，派巴库列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和舍夫利亚金同志（对外政治委员会）前往维也纳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来莫斯科。”[140]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的电文说，“我们的医疗专家建议陶里亚蒂同志不要乘飞机来莫斯科。如果陶里亚蒂同志不反对，那我们就派专列到波苏边界接他和随行人员到莫斯科。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可以坐火车从华沙到达苏联边界，回华沙时也乘这列火车。关于这一安排已经同波兰方面的同志商量好了。合适的安排是：为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利亚金同志预定罗马—华沙列车的两个席位，他们将先到维也纳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由维也纳到莫斯科。谢嘉同志希望定期把有关陶里亚蒂同志的健康状况通报给罗马，我们已满足这一要求。请预先告知陶里亚蒂同志离开罗马的准确日期。”[141]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另一份给苏联驻奥地利大使的电文说，“按照同您的约定，我们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您想些办法在奥地利的英苏占领区的边界迎接陶里亚蒂同志，并陪同他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利亚金同志将来维也纳迎接和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到莫斯科。还要告知陶里亚蒂同志乘坐的罗马—维也纳—华沙列车的发车时间。”[142]

陶里亚蒂于12月20日抵达莫斯科。随后他和家人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圣诞节之前，斯大林与他通了电话。斯大林首次建议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后者既没有同意也没有绝对拒绝。随后陶里亚蒂给意共领导写了一封

信。他在信中转述了斯大林的建议并且对此表示了否定意见。[143]

1951 年 1 月 4 日，陶里亚蒂在给斯大林的信里正式拒绝了让他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信是以沉重的口吻写的：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曾多次考虑了关于任命我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要让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不会同意这一建议的。[144]现将我的意见简述如下：

1. 有关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总书记的问题主要已不是一个像地下斗争年代那样的简单的党内性质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对各阶层居民负有重大责任的问题。今天未必能向意大利社会舆论说明陶里亚蒂为何要放弃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重大的运动和创举，如同党不仅在工人而且在各阶层居民中享有的大部分威望，都是与陶里亚蒂同志的活动及其个人紧密相联的。

在议会中，如同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一样，这种情况反映在陶里亚蒂同志是整个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这样一个事实里。在意大利，如果今后没有陶里亚蒂同志，那么共产党未必能守住这个阵地。

2. 我们的敌人在他们发起的最具挑衅性的运动中，正在公开谈论陶里亚蒂同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最近，他们传播谣言或者制造假消息，说陶里亚蒂将不再担任意共领导。最近一次造谣发生在陶里亚蒂患病期间，它是由政府大张旗鼓地发起并予以支持的。反动报纸公开声称，如果陶里亚蒂不再担任意共领导，那么解散意共就是轻而易举的。

3. 最近以来，尽管反动势力有所加强，但是我们党基本

上守住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阵地。如果政府采取更残酷的针对我们的措施，党就将面临困难时期。但是我认为，党的成熟的领导还是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护党的合法存在，并且扩大党的影响。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不能使党和工人阶级没有陶里亚蒂同志及其他的活动。否则这就会使我们的阵线受到很大的削弱。大部分社会舆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把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看做是一种迹象，即，党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存在愈来愈不可能。党和工会的工作由此可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4. 今年 3 月将开始地方政府的选举运动（选举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使人担心的是，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在选举前到国外任职并居住在外国，那么我们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挑衅性的进攻。陶里亚蒂同志的离去将会极大地削弱我们选举前的宣传工作。

5. 让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在党内可能引起很大的不满和不理解，特别是在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和普通党员中间。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起初大会定于 1 月 21 日召开；后来推迟到 2 月底至 3 月初，这正是为了使他能够出席并主持这次大会。我认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是不可能担当大会第一项议程规定的报告人的（将作《为了和平和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当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其他同志担任总书记，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将会给代表大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不排除党内很快就会出现紧张局面。类似的情况过去也曾发生过，那时陶里亚蒂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随后他被派往西班牙。意

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逐渐地受到削弱，以至于 1940 年我们不得不解散中央委员会，并委派一些领导人去恢复党的工作。

现在的形势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更换党的领导人的准备尚未做好，它将使党措手不及并产生严重后果。

6. 至于情报局及其书记处的组成问题，在我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之前，我是无法发表意见的。那些迄今为止作为情报局书记处成员在布加勒斯特工作的意大利同志给我造成的印象是，他们的实际工作很少。另一方面，我曾指出，在最近（6—8 个月）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他们从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得到的帮助多于从情报局得到的帮助。确切地说，情报局制定了一般的政治路线，但是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善于就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给予具体的和方向性的指示。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方面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基于这一经验，我的印象是，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和发展像保卫和平这样的运动比通过半合法组织（对于我们一些党来说情报局就是这样的组织），更容易改善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145〕

7. 个人方面的考虑当然是次要的。但我诚恳地请求注意我的情况。18 年来（从 1926—1944 年），我一直侨居国外，远离我的祖国。这是非常艰难的。当我回到意大利时，要求我作出更大的努力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在国内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政治家，并从而促进了党内工作的新的迅速发展。当开展合法的群众性工作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候，我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我未必能同样有效地在这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最后我想建议，在情报局大会召开前夕，派一名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来莫斯科以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他弄清楚

我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从我方面来说，我想建议请皮耶特罗同志去莫斯科。他是负责组织工作的，而且他手头的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可以短期出国工作。”[146]

陶里亚蒂在信中把他不能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理由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信发出后，陶里亚蒂就盼望着斯大林对他意见的“裁决”。但是斯大林没有马上给予答复。1月12日，陶里亚蒂委托他的秘书阿马杰奇向联共（布）中央对外政治委员会主任格里戈良询问斯大林是否有了答复，因为陶里亚蒂今后活动的安排，特别是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的准备等问题都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阿马杰奇说，陶里亚蒂在焦急地等待斯大林的答复。当天，格里戈良就把谈话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汇报。[147]

1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以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名义致法共、保共、捷共、波党、匈党和罗党的电文。电文说，“鉴于现在提议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候选人遇到了严重困难和解决这个问题是与扩大情报局职能（这是即将召开的情报局大会的主要问题）相联系的，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提议把原定1月25日的情报局大会推迟二三个多月。在同各党协商后，书记处将会就情报局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出补充建议。”[148]这表明，联共（布）中央仍坚持扩大情报局职能的立场。

1月19日，陶里亚蒂与联共（布）领导人举行了会谈。[149]第二天，他又会见了来到莫斯科的意共其他领导人隆哥和谢嘉。2月1日，意共领导人举行了小型会议。2月12日，由陶里亚蒂、谢嘉和科隆比署名的会议情况报告递交给了格里戈良，后者当天就把它转交给斯大林。

报告说，“会上领导人以此前同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谈

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陶里亚蒂同志的安全及其保障的问题。”“党的领导人一致表示，苏联同志关于陶里亚蒂现在不能居住在意大利是合适的建议应当被接受。所以就有必要在国外为陶里亚蒂同志安排一个日常住所（尽可能靠近意大利），他在那里可以支配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也不排除因重大政治事件他回意大利的可能。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的政治事件。同时，党的领导同志认为，不应把领导国际组织的责任加诸陶里亚蒂同志身上。这既是因为，这样会使政府对他采取如阻挠他回意大利等的措施，也是因为，同志们认为，陶里亚蒂同志的全部力量应该投入于对意共的政治领导中。”[150] 至此，陶里亚蒂与意共其他领导人就拒绝让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给斯大林报告所附的信中，格里戈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转告，如果报告已把问题论述得很清楚并且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苏联同志进行会谈的话，那么谢嘉和科隆比同志可能要立即回罗马。陶里亚蒂同志说，如果苏联同志觉得有必要同他以及从意大利来的谢嘉和科隆比同志就报告中所谈问题举行会谈的话，那么，他请求告知这样的会谈将安排在什么时候举行。”[151]

没有文件证明进行过这样的会谈。后来，不仅早已规划好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终致流产，而且就连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亦再未召开。斯大林费心筹谋的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从而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领导中心的努力彻底失败。

使斯大林的努力归于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陶里亚蒂拒绝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莫不如说是陶里亚蒂对情报局前景的消极评价对斯大林重新审议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规划起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物色总书记人选对于拟议中的情报局大会的顺利召开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它并不能最终决定会议的召开与否。因为，即

便陶里亚蒂拒绝出任总书记，要另择一个人选也不是很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斯大林从陶里亚蒂对情报局作用的分析中和在追求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看到了情报局各党对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厌倦和抵制。这里有两点情况是值得提一下的。一是，在 1950 年 11 月的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书记处会议上，除了联共（布）代表和保共代表积极倡议设立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外，其他各党代表在发言中对此一字未提。[152]二是，当苏斯洛夫提出“而在不容迟延的情况下，将给情报局内的有关各党下达必须执行的指示”时，与会代表中只有匈牙利代表支持他的观点。[153]这表明，各党都不希望联共（布）假借总书记之手进一步操纵和控制各党。后来，陶里亚蒂在信中对情报局工作的批评性分析，实际上是反映和代表了大多数党的普遍看法。斯大林正是在明白了情报局内的人心向背后，才失去对情报局前途的信心，并最后放弃了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试图。

在 1951 年初期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努力失败的同时，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受到了严重挫折。 1951 年 1 月底，随着中国志愿军攻势的停止，在朝鲜战场，交战双方已经处于僵持状态。对于那场胜利前景暗淡的战争，斯大林在内心已经失去信心。

那一年斯大林已经过了 71 岁。卫国战争的胜利，本应使斯大林在精神和心理负担上稍感放松。但是，战后不久，苏联同其原来盟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和尖锐，直到最后陷入冷战。接着，冷战中又发生局部热战——依靠中苏同盟的力量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间接战争。从 1945—1950 年，斯大林为了追求他对外政策中苏联安全的目标，可以说殚精竭虑。虽然苏联在其周边建立了一些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但是从斯大林的安全观来说，这并不能使他感到获得了真正的

安全。相反，在冷战中不断遭受的挫折（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却和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南斯拉夫的“叛逆”、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各种困难以及打不赢的朝鲜战争，使斯大林身心疲惫。他逐渐地失去了作为一个斗士所曾经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他已经无力再去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实际上选择了退却。

继扩大情报局职能试图失败后，现在对于斯大林来说，正是到了该考虑朝鲜和谈问题的时候了。1951 年 5 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开始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表露苏联的和谈意愿。6 月 5 日，马立克在与凯南的第二次会谈中说，苏联政府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6 月中旬，斯大林与来访的高岗和金日成商议了有关和谈的问题。在 6 月 13 日致毛泽东的电文，斯大林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154]

6月 23 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说，苏联人民认为，朝鲜的冲突是能够解决的：“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他指出，只要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真诚愿望，就能采取这一步骤。[155]

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举行。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谈边打”的阶段。这种既让美国在亚洲脱不了身，又使中国离不开苏联的状况，对于苏联来说是较为合适的。

这样，1951 年年初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试图失败和同年年中同意进行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构成了斯大林晚年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如果说，在这之前，特别是冷战开始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攻性和挑战性的话，那么，

从1951年起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止，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更多地表现出防守态势，基本上是维持原状，消极无为，没有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冷战举动。

注 释

[1] 1949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中表示希望能于1949年12月同斯大林会面，“以便亲自向他祝贺寿辰”。11月8日，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这一意愿。11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电文中说，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11月10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时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毛泽东访问苏联。（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卷19，卷夹288，页码81—85，转引自库利克：《建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第7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2] 刘少奇在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说，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苏联。斯大林在报告上批注：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页码11—50，参见列多夫斯基：《1949年6至8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6年，第4期，第82页。）在1949年11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提出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后，苏联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了。直接参与安排毛泽东访苏事宜的科瓦廖夫回忆说，为毛泽东访苏进行筹备工作是在1949年晚秋开始的。（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1—3期，第88页。）

[3] 毛泽东是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启程的，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返回北京的时间是3月4日。根据俄罗斯档案材料，毛泽东离开北京时原打算在苏联逗留三个月的时间，后来在苏期间因国内工作的需要使他把访问的时间缩短至2个月。（俄联邦

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案卷 10，卷宗 302，页码 2，转引自《建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 年［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6 期，第 76 页。）科瓦廖夫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起初打算外出访问三个月，但不仅仅限于苏联，还有东欧国家。具体安排是：毛泽东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逗留一个月，签订苏中友好条约，同斯大林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为谈话作了特别精心的准备）。第二个月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打算在苏联的索契疗养地休养。（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2 年，第 1—3 期，第 89 页。）

［4］1949 年 11 月 10 日，周恩来在同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显然要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如果制订条约，那他将去莫斯科签字。（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2，案卷 19，卷宗 288，页码 81—85，转引自《建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 年［续］），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6 期，第 76 页。）科瓦廖夫在谈到毛泽东访苏安排时也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将“签订苏中友好条约”。（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2 年，第 1—3 期，第 89 页。）

［5］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9—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华盛顿，1995/1996 年，第 5 页。

［6］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到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时援引了他访苏期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中苏新约的事例。具体可参见《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尤金同毛泽东谈话笔记》（以下简称《尤金同毛泽东谈话笔记》），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5 期，第 105—106 页。

［7］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9—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第 5 页。

［8］其间，只有莫洛托夫等人曾对毛泽东作了礼节性拜访，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苏联《远东问题》杂

志，1992 年，第 1—3 期，第 89 页。）有一次，当科瓦廖夫来看毛泽东时，毛泽东向他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7 页。）周恩来后来曾愤愤不平地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样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9 页。）

[9]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 1—3 期，第 89 页。

[10] 现在尚未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二次会谈的档案文献。

[11] 罗申同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1 日）——摘自罗申日记，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10，案卷 302，页码 1—4，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8—9 期，华盛顿，1996/1997年，第 227 页。

[12] 毛泽东在与尤金的谈话中说，“斯大林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帮了我们的忙。”（转引自《尤金同毛泽东谈话笔记》，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12 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9—440 页。从 1 月 2 日晚至 5 日下午，毛泽东四次致电中共中央，告知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邮、民航等协定。希望周恩来于 1 月 9 日动身来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年），第 20—21 页。）

[14]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6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8，案卷 302，页码 4—6，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8—9 期，第 230—231 页。

[15] 1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已经完成了《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

[16] 以上援引内容见：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29—38，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第 7—9 页。在会谈中，对于

斯大林所说的“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毛泽东问道：“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回答：“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参见同上。）

[17]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页。

[18] 同上书，第11—13页。

[19] 同上书，第13—14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第26—27页。

[2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2页。

[22]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页码9—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6—7期，第6页。

[23] 《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第855页。

[24]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7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卷234，卷宗18，页码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8—9期，第232—234页。

[25]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5—457页。

[26]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第24—25页。

[28] 《尤金同毛泽东谈话笔记》，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第106页。

[29] 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会谈》（新的档案文件），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1期，第41—42页。

[30]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收藏于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31] 该协定收藏于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32］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33］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苏联在1949年掌握了原子弹对于斯大林作出这一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为，苏联拥有原子弹对斯大林作出这一决策只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由是，其一，斯大林对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估计：其二是，即便苏联有了原子弹，斯大林并没有改变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原则。

［34］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就日本投降后共同占领朝鲜达成了协议。1945年8月15日，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向斯大林送交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给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内称，以北纬38度线来划分美苏的受降区域，由苏军和美军分别接受三八线以北和以南的日军投降。8月16日，斯大林在答复中表示基本同意这种安排。由此，三八线就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分治线。（参见美国参议院：《关于朝鲜的背景报告》，华盛顿，1950年，第2页，转引自阿哈尔卡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与苏美关系》，载《“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93页；《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第262—264页。）

［35］美国则于次年6月从南朝鲜撤军完毕。

［36］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46，页码13—23。

［37］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217页。

［38］同上。

［39］协定草案参见：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775，页码18—21。

［40］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卷14，页码57。

［41］顿金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9月3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卷4，卷宗11，页码136—138。

［42］葛罗米柯致顿金电，1949年9月11日，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卷宗同上，页码45。

［43］顿金致葛罗米柯电，1949年9月14日，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卷宗同上，页码46—53。

[44] 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状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9月15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776，页码1—21。

[45] 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1949年9月23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776，页码33—38。

[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1949年9月24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776，页码30—32。10月4日，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汇报了金日成等人对联共（布）中央决议的反应："金日成听我讲完后说：'好'。朴宪永讲得比较明确，他说：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他们说，游击运动正在扩大。为了指导游击运动，他们向南方派了800人。"（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47] 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10月26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未标明）电，1949年10月31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11月20日，均见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48]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卷3，卷宗11，页码87—91。

[49] 葛罗米柯致顿金电，1949年9月11日；顿金致葛罗米柯电，1949年9月14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

[5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28页。

[51] 原苏共中央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的讲话很快就被传送到莫斯科，斯大林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特卡琴科的谈话，1992年3月30日，参见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第101页。）

[52]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30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卷3，卷宗11，页码92。

[53]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月31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卷3，卷宗11，页码93。

[54]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46，页码74—75。

[55]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46，页码76。

[56] 原来兼任这一职务的什特科夫作自动解除的处理。（什特科夫

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0 年 2 月 23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4，卷宗 11，页码 148。）

[5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3 月 9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3，卷宗 11，页码 149—150；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3 月 18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4，卷宗 11，页码 142。

[58]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3 月 21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3，卷宗 11，页码 94—95。

[59]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3 月 24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3，卷宗 11，页码 96—97。

[60] 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 218 页。另一位苏联外交官费德林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他在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开战前夕，“金日成为了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来到莫斯科，他呼吁在‘朝鲜半岛全部实行共产主义’，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回答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内藤泰郎：巨人外交的幕后——费德林回忆中苏等领导人的交往，日本《产经新闻》 1999 年 3 月 5 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 年 3 月 31 日。）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外，尚未见到有关金日成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俄国档案。但是，1966 年 8 月 9 日，苏联外交部的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 1950 年 3 月至 4 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目录 58，案卷 266，页码 122—131，转引自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档案文献），载《美国东亚关系》杂志，1993 年，第 2 卷，第 4 期，第 441 页。）

[61] 俄联邦总统档案馆，转引自沈志华 1996 年 7 月 31 日对列多夫斯基的采访记录。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1998 年，第 216 页。

[62]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5 月 12 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59a，目录 5a，案卷 3，卷宗 11，页码 100—103。

[63] 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致莫斯科电，1950 年 5 月 13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号不详。

[64] 同上。

[65]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0 年 5 月 14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1，页码 55；巴让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治分析（1949—1951 年），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第 87—88 页 。

[66] 一位前朝鲜负责军需事务的高级官员回忆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铁路经中国领土运往朝鲜的，其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知道朝鲜的战前准备情况。（参见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第 153 页。）

[67]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6 月 2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为支持南方而参战。 6 月 27 日，杜鲁门命令美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美国组织“联合国军”。7 月 1 日，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战争。

[68] 冯西（斯大林化名——引注）致什特科夫电， 1950 年 7 月 1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46，页码 104。

[69] 斯大林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这是金日成的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34 页。）

[70] 斯大林斥责主张向前线派遣军事顾问的什特科夫大使：“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斯大林还对什特科夫大使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当害怕吗？》载俄罗斯《星火》杂志， 1993 年，第 26 期，第 29 页，转引自：《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 227 页。）

[71] 周恩来同时抱怨朝鲜北方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他还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鉴于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应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巴让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治分析 [1949—1951 年]，《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第 88—89 页 。）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来通报战况。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 1993 年，第 5 期，第 85 页。）

[72] 菲利波夫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5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

宗 45，目录 1，案卷 331，页码 79。

［73］菲利波夫致罗申电，1950年 7 月 8 日，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82。斯大林总是以一种命令和协商兼而有之的口吻对中国领导人说话。事实上，到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根据朝鲜战场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7 月 7 日和 10 日，中央军委举行讨论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428 页注 2；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第 247 页。）

［7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 页。

［75］师哲回忆说，仁川登陆后一两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询问是否能够派兵到北朝鲜作战。（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纽约，1994 年，第 161 页。）实际上，这时中国已经在考虑出兵问题了。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 240—241 页。

［76］斯大林在信中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彼得洛夫：《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秘密文件的披露》，载《东北亚研究》杂志，1994 年第 13 卷第 3 期，第 60—61 页。）金日成在 9 月 28 日给斯大林的求援信中，要求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金日成和朴宪永致斯大林电，1950 年 9 月 30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47，页码 41—45。）

［77］菲利波夫致罗申电，1950 年 10 月 1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47，页码 97—98。

［7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39—540 页。

［79］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这份电文时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可能的原因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10月 3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页码 105—106。）

［80］《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 250—252 页。10 月 2 日这两份电文撰写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尚有待于中国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

［81］10 月 4 日和 5 日的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作出了出兵的决定。毛泽东指示高岗和彭德怀回沈阳后向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 10月 15 日进入朝鲜。10 月 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安排和部署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 256—257 页。）

［82］10 月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出朝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 78 次会议，1950 年 10月 5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827，页码 121—122。）

［83］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 年 10月 8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47，页码 65—67。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在 10月 8 日把出兵的决定告诉了金日成。当天，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43—545 页。）

［84］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 年 10 月 8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47，页码 67。

［85］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 221 页。对于周恩来访苏的具体日期存在着各种说法。据陪同前往的翻译师哲回忆说，周恩来是 10月 8 日离京的，9 日抵达莫斯科，10 日到达黑海（索契）。（《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95 页。）《周恩来年谱》中说，周恩来于 10月 8 日出发，10 日抵达莫斯科，11 日午后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与斯大林会谈，12 日飞返莫斯科。18 日返回北京。（《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85、87 页。）

［86］《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52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 3 期，第 103 页。

［87］《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96 页。贾丕才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领导人在出兵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毛泽东也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然后周恩来例举了中国不能出兵朝鲜的三条理由：华南刚刚解放，那里还没有进行土改；将近 100 万国民党军队仍盘

踞在大陆；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 221 页。）

[88] 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 221 页。师哲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这只限于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96—498 页。）

[89] 《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 221 页。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 10 月 11 日，斯大林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有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大炮、坦克等项装备的内容。（《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98 页注 1。）

[90] 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以不满的口吻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说，“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行，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 85 页；《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52 页。）

[91]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第 24 页；《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250 页。

[92] 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1950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5 日），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第 103—104 页。

[9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52—553 页。

[94] 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第 201—202 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第 405—406 页。

[95] 毛泽东在电文中表示，现在派中国军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希望苏联空军给予空中掩护，“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二是，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5，页码 1—2。）

[96] 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13日（原件如此，应为14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47，页码74—75。

[97]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87页。为此，毛泽东曾急电彭德怀和高岗，通知他们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67页；《彭德怀传》，第407页。）但是早就没有了中国可以退却和重新选择的余地。

[98] 按照共产党情报局章程，书记处会议是根据需要召开的，但必须每三四月不少于一次。从上次会议（1950年4月）后已经过去五个月，也就是超过了章程所规定的期限，但情报局还没有召开会议。这至少说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并不是正常的和有规律的。

[99] 全称世界和平战士大会，第一次大会于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世界和平委员会，参加者多为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1950年3月，在世界和平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书，在全世界收集签名。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并选举了世界和平理事会。

[100]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案卷129，页码10，转引自阿季别科夫：《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根据新的档案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合刊）,第52页。

[101]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10—11页，转引自同上，第53页。

[102]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11，转引自同上。

[103] 同上。

[10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42—43，转引自同上，第54—55页。

[10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案卷44，页码213—214，转引自阿季别科夫：《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年，第4期，第157—158页。

[106]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案卷123，页码50—51，转引自《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载俄

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第55—56页。

[107]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页码同上，转引自同上，第56页。

[108]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3，转引自同上。

[109]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5，转引自同上，第57页。

[110]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页码同上，转引自同上。

[111]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6，转引自同上。

[112]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7，转引自同上。

[113]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7—58，转引自同上，第57—58页。

[114]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8—59，转引自同上，第58页。

[115]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案卷122，页码26；案卷123，页码68，转引自同上。对于保共代表的发言，法容没有表示反对。需要指出的是，在联共（布）中央为苏斯洛夫准备的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材料中亦未提及设立总书记一事，但在10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却提到了。为何在差不多一个月后（11月22—24日）召开的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法容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忽略还是不协调呢？至今尚未有档案材料可以解开这个谜。但是正如阿季别科夫所说，这说明，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想法不是马上产生的，而是到10月下旬才成熟的。此外，很有可能的是，保共代表在发言之前与苏斯洛夫交换了意见，否则他怎么知道莫斯科有这种想法并作此发言呢？（参见同上，第58、59页。）

[116]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122，页码32；案卷123，页码79，转引自同上，第59页。

[117] 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123，页码60—63，转引自同上。

[118]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72—73，转引自同上，第60页。

[119]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91—92，转引自同上。

[120]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97—98，转引自同上。

[121] 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88—89，转引自同上，第

61 页。

［122］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79 转引自同上，第 59 页。

［123］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0，转引自同上。

［124］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76，转引自同上，第 60 页。

［125］档案全宗、目录同上，案卷 122 ，页码 100，转引自同上，第 61 页。

［126］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0，转引自同上，第 65 页。

［127］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51—52，转引自同上，第 62 页。

［128］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56，转引自同上。

［129］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67、74 ，转引自同上，第 62—63 页。

［130］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90—91，转引自同上，第 63 页。

［131］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91，转引自同上，第 63—64 页。

［132］档案全宗、目录、案卷、页码同上，转引自同上，第 64 页。

［133］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5 ，转引自同上。

［134］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6、107 转引自同上。

［135］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109，转引自同上，第 64—65 页。

［13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59a，页码 5，转引自：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第 158 页。原来的计划是：陶里亚蒂于 12 月 14 日早上 7 点 45 分坐直达列车从罗马到维也纳（然后再到苏联）。同陶里亚蒂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养女以及他的秘书阿马杰奇（他曾化名洛维尔，长期在苏联的无线电情报委员会意大利语广播编辑部工作。最后又在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情报局工作）。但是，由于陶里亚蒂身体不好，列车在罗马耽搁了三天。 12 月 17 日才发车。（档案全宗同

上，页码 9—10、15，《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 年，第 4 期，第 162 页注 7。）

［137］档案全宗同上，页码 5，转引自同上，第 158 页。

［138］档案全宗同上，页码 6—7，转引自同上，第 158—159 页。

［139］［140］［141］［142］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62，案卷 45，页码 8、69—72，转引自同上，第 159 页。

［143］同上书，第 159 页。

［144］斯大林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

［145］斯大林在“通过加强和发展这样的运动”的话下面画了线。

［146］《要让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艰难的——陶里亚蒂给斯大林的信》，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19，页码 28—32，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3 期，第 149—152 页。

［147］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同上，页码 32，转引自同上，第 152 页。

［148］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62，案卷 45，页码 138，《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年，第 4 期，第 160—161 页。

［149］至今尚未见到会谈记录。

［150］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19，页码 33、34，转引自《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 年，第 4 期，第 161 页。

［151］档案全宗、目录、案卷、页码同上，转引自同上。

［152］《1950 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4—5 期，第 59 页。

［153］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案卷 123，页码 95、79，转引自同上。

［154］《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06—508 页；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0 年 6 月 13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9，页码 31—32。

［155］《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下册，第 410—411 页。

余论

关于冷战起源和苏联冷战行为的思考与分析

一 关于冷战起源和爆发

根据上面总的论述，结合我们已知的美国方面的冷战行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冷战是一个互动的双向过程，它起源于参与冷战的两个行为主体，不仅美国而且苏联都是冷战起源的源头。对于冷战的产生，可作如下概括：

1．冷战酝酿于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 1945 年。其催化剂是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和相互敌视，并使双方开始调整各自的政策。

2．冷战萌芽于 1946 年。其信号是斯大林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凯南的电文和诺维科夫的报告。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演说、凯南电文和诺维科夫报告在观念和理论上完成了由战时盟友到相互否定和相互为敌的转变。

3．冷战爆发于 1947 年。其标志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 1947 年，整个国际形势已经日趋紧张，美苏关系业已愈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主义所作的那种全面遏制苏联的宣示，严重地毒化了美苏关系。而作为杜鲁门主义的正式实践的马歇尔计划，除了稳定和控制西欧的一面外，也包含着在恢复欧洲经济的过程中抑制和

排斥苏联以及引诱东欧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的目的。这样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必然促使苏联选择一种激烈对抗的形式进行反击，从而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急转直下。而苏联在杜鲁门主义之前已经在酝酿组建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表明苏联也正在积极准备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全面对抗和较量。以马歇尔计划为契机，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事实上使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已具雏形。它标志着苏联已经开始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一种积极进攻的集团对抗政策。所以， 1947 年出现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与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构成了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美苏由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合作转向了全面的完全的对抗。这种对抗是美苏或者以它们为首的西方集团和苏联东欧集团之间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一切对抗行为和对峙状态。这就是冷战！

总之，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合力造成了欧洲经济和政治朝着集团化方向的分裂，使欧洲开始出现两个相互隔绝的平行的经济市场和截然对立的政治集团，并为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总起来看，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居于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之先。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冷战是美国人单方面发动的，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问题在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是美国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以及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与苏联的较量和斗争后，根据对苏联的既有行为的观察和分析以及根据对苏联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判断后所作出的战略性抉择。换句话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产生除了美国对外政策本身的原因外，也有着促成它们产生的苏

联方面的因素。然而如果仅凭苏联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或者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的行为和表现，就认定冷战是由苏联挑起的，显然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苏联的表现和行为，既是基于它自己的独特的安全观也有美国方面促成苏联行为的推动性因素。如此层层深究，就会发现美苏两国之间走向冷战的行为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通俗地讲，冷战是双方你一拳来他一脚去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问题不在于寻找这些行为的谁先谁后或者谁多谁少，而在于产生这些行为的根源在哪里。我以为，根源就是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无论是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中，还是在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美苏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分歧和对抗，其基本原因都逃脱不了上述根源的范围。譬如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苏联认为只有在伊朗确立了它的势力和影响，只有在海峡建立了它的基地，它的南部边疆才算安全。又例如东欧问题，苏联不仅认为，只有在这些国家内建立起对苏友好政府，它的西部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努力要让东欧国家转变为与它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并且认为“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最民主的。而美国则恰恰相反，它认为，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只有把它局限在本国领土之内，美国在世界上才会是安全的。在美国看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是与苏联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专制国家，因而千方百计要使东欧国家变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德国问题上，在其他问题上，情况亦莫不如是。

所以，就事情的本质而言，冷战是美苏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从冷战的酝酿、起源和爆发的过程来看，冷战的产生既不是故意的却又是必然的。

说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谁也没有预先设计好要对对方进行冷战；说是必然的，是因为双方在诸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等方面的差别、对立和矛盾，在双方的对外政策中都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的情况下不仅是无法调和的而且势必导致双方的全面对抗和对峙，从而身不由己地走向冷战。当然这也并不是从宿命论意义上说，冷战是天生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但是当时确实不具备避免冷战爆发的前提和条件：美国能放弃它的社会制度和全球性进攻战略吗？苏联能改变斯大林体制的消极性因素和对外政策中建立势力范围的做法吗？换言之，只有哪一方改变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或者对外战略，才能避免或者结束美苏之间的冷战。

二　关于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

就苏联方面而言，走向与美国的冷战本质上乃是斯大林内外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在国内掀起连绵不断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思想文化方面，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并且总是以阶级斗争的目光注视和提防外来文化对它的影响和渗透。

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它非常能够适应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不在乎国际形势的

稳定与否，更何况持续紧张的国际形势可以成为它在国内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斯大林体制是苏联进行冷战的最深厚的国内基础。

苏联走向冷战的对外政策基础就是斯大林对外政策中的“一国安全”战略和“世界革命”的战略。“一国安全”的战略决定了苏联并不是从平等和均衡的角度来考虑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而是把本国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把本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别国的安全利益之上。由此它就不惜践踏和牺牲别国安全利益来谋求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环俄罗斯安全带。这种单方面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国安全利益的做法必然要引起苏联与邻国以及它们所依附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

“世界革命”战略则是与它的“一国安全”战略相辅相成的。由于战后初期斯大林实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再加上斯大林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做法更为突出，极易使人们误以为斯大林放弃甚至没有“世界革命”战略。实际上正是在二战结束后的斯大林晚年时期，“世界革命”战略才第一次取得真正的胜利。这一战略是在二战的特定形势下以苏军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建立势力范围的方式在东欧得到广泛实施的。形式上看，苏联把东欧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是一种追求国家利益的扩张行为。但问题的实质是苏联在那里干了什么？它在那里先是帮助建立以共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尔后又把它转变为苏联模式的政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地实现苏维埃化。这不就是“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和内容吗？又如在伊朗危机中苏联扶植和支持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推行革命，实际上也是“世界革命”战略的体现。正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战略（尽管它是隐蔽的）使苏联无法真正与西方国家实行和平共处。

简而言之，斯大林体制的封闭性造成了苏联与外部世界的本能的对立，斯大林对外政策中的“一国安全”战略和“世界革

命”战略则具有不同程度的扩张性、进攻性和挑战性，而且斯大林体制和对外政策的这种特征和特性都是与生俱有的，因而当德国法西斯这一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它必然要与另一个同样因为其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要在国外奉行全球性扩张和进攻战略的美国发生全面对抗和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进入冷战。

苏联的冷战政策或冷战方针就是，视美国为苏联国家利益的最大敌人，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阵营或集团的力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争夺和对抗。苏联的冷战政策的目标是：第一，要在冷战的过程中巩固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环苏联的安全带，确保和维护苏联的安全。第二，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最终压倒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确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或阵营的优势地位。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冷战目标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也就是说，暂时地表面地巩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但是并没有能在力量对比中压倒美国等西方国家。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冷战行为通常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明确地把不同美国发生正面武装冲突和战争作为与美国对抗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中、在对待希腊和中国内战的态度上、在柏林危机和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都不希望冒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公开冲突的风险。其原因在于：雅尔塔体制已经使苏联在建立势力范围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如果与西方爆发冲突或战争，那这些收益都将丧失殆尽。此外，就战后初期的综合实力看，苏联没有能力在二战刚结束后再打一场战争。所以，尽管在各种危机中和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中，苏联和美国时常发生尖锐的对抗和对峙，但是，苏联或者是以妥协或者是以退让的形式避免与美国走向公开的武装冲突。冷战之所以是冷战而没有转变为热战，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恪守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

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原则不能不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信奉强权政治和推行大国主义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对外政策与沙俄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其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公然干涉别国内政。例如，它把东欧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逼迫伊朗给予石油租让权并且不惜采取拖延撤军和支持伊朗阿塞拜疆民主党建立自治政府等手段。这些行为和手段都是与国际法准则和一般的道义原则背道而驰的。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比苏联逊色，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由此是否能构成苏联也有权这样做的理由呢？答案显然应当是否定的。

（三）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冒险性。苏联的冷战行为时常带有领导人浓厚的主观色彩，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周密的考虑。譬如，海峡危机。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的有关领土和在海峡建立苏联军事基地这样重大的要求，根本没有经过什么正式会议的讨论和决定，而是斯大林在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里（甚至是在餐桌上）随意谈论中作出的。斯大林和得到他宠信的贝利亚个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伊朗危机。最早提出要通过强硬谈判获得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的也是贝利亚。而且在整个伊朗危机的过程中，联共（布）“党的外交”和政府外交各行其是，根本没有协调。还如，柏林危机。采取这么重大的封锁行动，苏联所提出的理由竟然说是技术性的，如此随意和轻率，其失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四）缺乏良好的判断力、灵活性和应变性。国际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你死我活那样单一。但斯大林对外政策完全排除了事物发展的中间状态，以非赢即输的心态看待国际间的矛盾和斗争。斯大林的逻

辑就是：美国的成功就是苏联的失败，反之亦然，二者必居其一。譬如，马歇尔计划。苏联认定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要解救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组建一个反苏的西方集团。这种判断不能算错。马歇尔计划确实包含着满足美国本身的经济发展要求和遏制苏联的因素。但是问题在于：即便如此，马歇尔计划也不乏值得利用的经济价值。不管美国是否打算让苏联参加进来，既然这一援助计划是囊括整个欧洲的，苏联为什么不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去探讨参与并尽量争取利用该计划呢？在当时美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能与美国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还可以使之成为缓解两国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但外交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即使无法实现这种微弱的可能性，但如果苏联在这方面行事适当的话，足以置美国于尴尬的被动地位。如果苏联坚持要参加（这里根本不存在面子问题），并且静观美国如何动作，美国要寻找让旁人也信服的排斥苏联的理由并非容易。倒是苏联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这么迅速地予以拒绝自动地替美国人解除了忧虑。这一点，作为旁观者有些人是看到的。如，1947年9月，法国外长皮杜尔在与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谈话时，对莫洛托夫在6—7月的苏英法三国巴黎外长会议上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举动表示不解和困惑。他说，“我要说，我怎么也无法理解莫洛托夫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本来，或者他可以得到部分好处，或者整个计划宣告失败，因为谁都一无所获，他也是赢者。他要是呆在我们这里（指莫洛托夫不退出会议——引注），任何时候他都处于不输的地位，但他却偏偏选择了一种必输无疑的行事方式。”[1]

如果说，冷战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就是避免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就是热战，守住了苏联在二战中取得的经雅尔塔体制确立的胜利成果（主

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这对于苏联的安全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就实质而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冷战，只会逐渐地侵蚀苏联安全的基础。因为苏联的力量在整体上远逊于美国。随着冷战的进行特别是与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受到极大地损害和消耗。与此同时，对国内社会发展起着阻滞作用的斯大林体制的落后性愈发突出和明显。虽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这种体制进行过改革，并且也使苏联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出现过几个小高潮。但是，封闭性的斯大林体制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斯大林所确立的“一国安全”和“世界革命”的战略也没有在本质上发生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逝，1991 年 12 月，苏联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走到了它的尽头。苏联的崩溃当然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复杂原因。但是，与美国的冷战消耗了苏联的实力，加重了它的各种负担，并使它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历史的总结算来看，苏联在其周边建立势力范围和构筑安全带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维护苏联的安全。因为安全本质上是均衡的共同的，损害和剥夺了别国的安全，自己当然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全，即便你某段时期拥有势力范围而似乎很“安全”。所以，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强权政治和大国主义的行径是完全不足取的。至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盲目和冒险等行为更是应当引以为鉴的。

注 释

［1］国家档案馆（巴黎），皮杜尔私人文件，AP－80，735－4，第 6 页，转引自《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2 期，第 15—16 页。

参考文献书目举要

一　文献和文件

俄文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0 年 9 月 22 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发言速记，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2 年，第 1 期。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2 卷，莫斯科，1958 年。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4 卷（1935 年—1941 年 6 月），莫斯科，1946 年。

苏联外交部编：危机的一年（1938—1939 年）——文件和材料，第 2 卷，莫斯科，1990 年。

1939—1941 年的苏联与德国，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6 月的苏德关系文件和材料，第 2 卷，维尔纽斯，1989 年。

别济缅斯基编注：1940 年 11 月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指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4 期。

别济缅斯基和戈尔洛夫编注：前夕（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谈判［文件集］），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91 年 6 月号和 8 月号。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文件集），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5 期。

特档中的秘密文件，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3

年，第 1 期。

苏联在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会议上，第 2 卷：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的德黑兰会议，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8 年。

苏联在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会议上，第 4 卷：苏联、美国和英国三盟国领导人的克里米亚会议，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4 年。

列别杰夫和纳林斯基编：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第一卷（1942 年 6 月 22 日前),莫斯科，1994 年。

勒热舍夫斯基编注：1941 年 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文件集），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第 2 期。

着手准备未来和平，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 年，第 4 期。

勒热舍夫斯基编注：1942 年 5 月莫洛托夫的伦敦之行：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和与斯大林的通信，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 年，第 6 期；1998 年，第 1 期。

斯大林和蒋介石——1945 年 12 月—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密使莫斯科，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4 期。

苏捷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 5 卷（1945—1948 年），莫斯科，1988 年。

苏联与人民朝鲜的关系（1945—1980 年），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81 年。

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第 3 卷，莫斯科，1947 年。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材料集（1946 年），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52 年。

铁托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见，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3 年，第 2 期。

“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有关 1947 年 1—2 月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会谈的文件，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4 年，第 4 期。

1947 年 9 月底在波兰召开的若干共产党代表的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 年。

1948 年苏南之间的秘密通信，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2 年，第 4—5 期，第 6—7 期，第 10 期。

苏联与柏林问题文件集，第 1 册，莫斯科，1948 年。

齐赫文斯基编注：1949 年 1 月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函，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4—5 期（合刊）。

列多夫斯基编注：1949 年 1—2 月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 年，第 2 期，第 3 期。

列多夫斯基编注：1949 年 6—8 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档案文件），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6 年，第 4 期。

英文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 年，第 5 卷，华盛顿，1966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 年，第 6 卷，华盛顿，1967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 年，第 8 卷，华盛顿，1969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 年，第 7 卷，华盛顿，1969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 年，第 4 卷，第 6 卷，华盛顿，1972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 年，第 4 卷，第 6 卷，华盛顿，1974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 年,第 6 卷,华盛顿,1976 年。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年,第 6 卷,华盛顿,1977 年。

战后美国对外政策——1946 年 9 月 27 日诺维科夫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载美国《外交史》杂志，第 15 卷，第 4 期，1991 年秋季号。

乔包·贝克什，1946 年初期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f·8/14，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

吉比安斯基整理和编注：苏联集团与冷战的起始阶段：关于 1946 和 1948 年斯大林同南共和保共领导人会谈的档案文献，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

吉拉斯关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苏一保一南秘密会谈的报告，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

1946 年 5 月 27—28 日铁托——斯大林谈话的苏联和南斯拉夫方面的记录，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

吉拉斯关于 1948 年苏一南一保秘密会谈的报告，铁托档案馆，I－3－b651，ll. 33—40，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10 期，1998 年 3 月。

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 年)》,纽约，1973 年。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9—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1995/1996 年。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页码 29—38，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 6—7 期，1995/1996 年。

罗申同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摘自罗申日记，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卷10，卷宗302，页码1—4，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8—9期，1996/1997年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7日，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卷234，卷宗18，页码1—7，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8—9期，1996/1997年。

中文

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卷，第32卷，第33卷。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卷。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1985年，人民出版社，第7卷，第8卷，第9卷，第11卷，第12卷。

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194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1946—194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出版社， 1978 年。

国际条约集（1934—194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

国际条约集（1945—1947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

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年。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 年。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 年。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 年），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年。

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 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册（1945 年 5 月—1945 年 12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2 册（1946 年），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6年。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3册（194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册（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6册（1950—195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 论文、专著和回忆录

俄文

阿赫塔姆贾：1920—1933年苏联与德国的军事合作（根据新档案文件），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5期。

戈尔洛夫：20年代苏联同德国的军事合作，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第9期。

叶利谢耶娃编：1932年苏联军事代表团在德国观摩演习，载苏联《苏联档案》杂志，1991年，第1期。

斯米尔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6年，第3期。

菲尔索夫：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

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

阿季别科夫：形式上解散后的共产国际（1943—1944年），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7年，第8期。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通信，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5期。

纳林斯基：1939—1947年欧洲边界和势力范围问题，载俄

罗斯《自由思想》杂志， 1998 年，第 3期。

别济缅斯基：根据新文件看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5 年，第 6期。

克宁：1941—1943 年苏美英关系中的德国问题（文件简介），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5 年，第 4 期。

察廖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8 年，第 1 期。

霍尔茨马克：1944—1947 年苏联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7 年，第 1 期。

纳林斯基：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期。

布哈尔金：克里姆林宫与胡志明（1945—1969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8 年，第 3 期。

叶戈洛娃：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3 期。

诺斯科娃：1945—1953 年莫斯科在东欧国家的顾问，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8 年，第 1 期。

丘瓦欣：在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命（1946—1952 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1 期。

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 4 期。

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2 期。

塔赫年科：对一项政治决定的解剖—— 文件选辑，载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 1992 年，第 5 期。

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3 年，第 2 期。

奥尔利克：1948 年 2 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

现代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

穆拉什科：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8 年，第 3 期。

阿哈尔卡奇：苏美关系中的 1948 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 年，第 12 期。

纳林斯基：1948—1949 年柏林危机（俄罗斯档案的新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 年，第 3 期。

列多夫斯基：苏联和中国（1937—1949 年）——苏联外交官的回忆，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 1990 年，第 5 期。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 年，第 6 期，1992 年，第 1—3 期（合刊）。

库利克：建国时期（1949—195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材料），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5 期，第 6 期。

阿季别科夫： 1950 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4 年，第 4—5 期（合刊）。

阿季别科夫：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 年，第 4 期。

斯拉温斯基：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会与苏联外交（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的新文献），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1 期。

尤金：同毛泽东谈话笔记（1956 年 3 月 31 日),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 5 期。

列宁回忆录，第 4 卷，莫斯科，1969 年。

丘巴里扬：“冷战”新史，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 年，第 6 期。

当代世界的美苏关系，莫斯科， 1987 年。

斯米尔诺夫主编：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莫斯科， 1989 年。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问题，莫斯科，1995年。

扎格拉金：苏联外交成败史（政治学观点），莫斯科，1990年。

切尔尼科夫：为了和平与睦邻（1935—1970年的苏土关系），基辅，1977年。

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1938—1947年），莫斯科，1989年。

杜宾斯基：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莫斯科，1966年。

杜宾斯基：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年），莫斯科，1980年。

阿格延科：苏联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军事援助，莫斯科，1975年。

沿着中国之路（1937—1945年），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

贾丕才：在各个类似的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莫斯科，1996年。

涅任斯基：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莫斯科，1987年。

吉比安斯基主编："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莫斯科，1995年。

丘巴里扬等主编：战争中的盟国（1941—1945年），莫斯科，1995年。

黑勒和涅克里奇：执政中的乌托邦（1919年至今的苏联史），三卷集，莫斯科，1995年。

托尔库诺夫等：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莫斯科，1995年。

菲里托夫：“冷战”：西方史学界的争论，莫斯科，1991年。

科尔尼延科：冷战——参与者的见证，莫斯科，1995年。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1995年。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冷战——新观点和新材料，莫斯科，1995年。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斯大林与冷战》（论文集），莫斯科，1998年。

英文

和田村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年）——根据新的俄国档案文献，提交香港“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

默里：斯大林、冷战和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2期，华盛顿，1995年6月。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爆发（1945—1950年），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8期，华盛顿，1993年。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档案文献），载《美国东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

巴让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治分析（1949—1951年），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6—7期，1995/1996年。

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1950年9月16日—10月15日），载《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第6—7期，1995/1996年。

彼得洛夫：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秘密文件的披

露，载《东北亚研究》杂志，1994 年，第 13 卷，第 3 期。

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他们所追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 年。

唐娜·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 年），二卷本，花园城，1961 年。

托马斯·佩特森：苏美对抗：战后重建与冷战起源，巴尔的摩和伦敦，1973 年。

约翰·加迪斯：美国与冷战起源（1941—1947 年），纽约，1972 年；第二版，1976 年。

约翰·加迪斯：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反思，纽约，1997 年。

盖尔·伦德斯塔德：1943—1947 年美国对东欧的无用政策，特罗姆斯，纽约，1975 年；第二版，1978 年。

丹尼尔·叶尔金：支离破碎的和平：冷战的起源与国家安全状况，波斯顿，1977 年。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俄国走向冷战之路，纽约，1979 年。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纽约，1996 年。

弗雷泽·哈伯特：铁幕：丘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纽约，1986 年。

马歇尔·舒尔曼：斯大林对外政策的重新评价，剑桥，1963 年。

亚当·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1967 年苏联对外政策史，伦敦，1968 年；第二版，1974 年。

罗杰·摩根：不稳定的和平：欧洲冷战研究，伦敦，1974 年。

塞维茨和伍德贝：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布尔登，1985

年。

布鲁斯·库里霍姆：冷战在近东的起源：大国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冲突和外交，普林斯顿，1980 年。

卡罗琳·肯尼迪一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 年苏联的欧洲战略，曼彻斯特和纽约，1995 年。

弗雷德·哈利戴：第二次冷战的形成，第 2 版，伦敦，1986 年。

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1917—1991 年苏联对外政策回顾，弗兰克和卡斯，1994 年。

查尔斯·梅尔：欧洲的冷战（欧洲大陆分裂的时代），纽约，1991 年。

戴维·雷诺兹：冷战在欧洲的起源，纽黑文和伦敦，1994 年。

阿尔文·鲁宾斯坦：二战以来的苏联对外政策，科林斯，1992 年，第 4 版。

奥德·韦斯塔德等编：苏联与东欧（1945—1989 年），伦敦，1994 年。

吉利恩和迈尔斯：在满洲的最后机会（张嘉璈日记），哈佛，1989 年。

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纽约，1994 年。

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的竞争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 年。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 年。

查尔斯·加蒂：匈牙利和苏联集团，达勒姆，1986 年。

哈里曼和阿贝尔：特使（1941—1946 年），纽约，1975 年。

中文

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2 期。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 6 卷（1939—1945 年），第 7 卷（1945—1949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

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年。

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 年），上下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

托因比等：欧洲的重组（1939—1946 年），上下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

迈·鲍尔弗和约·梅尔：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79 年。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 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

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 3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 年。

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 4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 年。

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 5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 年。

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 2 卷，中译本，莫斯科，1987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

葛罗米柯等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上下卷，1917—1980 年，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1989 年。

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下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考德威尔：论苏美关系，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

霍罗威茨：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年。

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5 卷，第 3 分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第 2 分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2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 年。

艾奇逊回忆录（上下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

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 年），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

肯尼思·雷和约翰·布鲁尔：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 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宫泽喜一：东京一华盛顿会谈秘录，中译本，1965 年。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 年。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 年），中译本，三联书店，1982 年。

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扬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

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 版，1995 年。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1998 年。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

后　　记

有关冷战题材的书籍在国外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即便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因为原来的冷战当事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馆的文献资料源源不断地披露出来，使得研究冷战史的各种流派的学者突然间获得了印证、修订和重新审视自己观点的机会，这样，有关冷战的研究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降温，相反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自然，冷战方面的书籍也就依然层出不穷了。

但是，外面世界的热闹景象却更加反衬出我们这里冷战研究的冷寂现象。限于材料等多种因素，我们对冷战的研究多年来却一直停留在零敲碎打的层面上，鲜有完整的专著问世。至于研究苏联与冷战关系的著述则更属凤毛麟角。确实，学术研究无须去追求那种轰轰烈烈的恢宏场面，但是当着大量的新材料已经出现并且显然已经动摇了我们原有的观点体系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奋起直追从而加快我们研究冷战史的步伐吗？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迹象已逐渐地开始出现，虽然它似乎还嫌缓慢。

写一部中国人关于冷战特别是关于苏联与冷战关系的专著，乃是我多年的夙愿。1985—1988 年，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方向是二战前的苏联对外关系史。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二三十年代的反苏‘防疫线’”。论述的内容就是十月革命后至 30 年代初中期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后来，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后以“西方的反苏‘防疫线’

与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为题发表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见该刊 1992 年第 2 期）。对苏联二三十年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实际上成为我后来研究冷战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毕业后留校任教，我的科研方向延伸到了二战后的苏联对外关系史，从此也就与冷战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正值苏联东欧剧变时期。我借助于掌握俄英两门外语的便利，看到了许多有关冷战的鲜为人知而又振聋发聩的新材料。新的材料告诉我，冷战不是美国对苏联单方面发动的，而是美苏双方相互对抗和相互遏制的产物。冷战作为一种互动的双向性斗争过程，它起源于参与冷战的两个行为主体，不仅美国而且苏联都是冷战起源的源头。新的材料启示我，必须以苏联为基点研究苏联与冷战特别是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把握冷战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

1993 年，我申报了《斯大林体制与冷战》的课题。接着便开始大量地收集有关冷战的各种原始资料。在这前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冷战题材的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对外政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在 1994 年编辑出版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录》里关于我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这样介绍的“苏联 70 余年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其一是推动苏联导向的‘世界革命’，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性苏维埃共和国，其二是保障苏联‘一国和平’，而非普遍的全球和平。苏联对外关系史几乎是一部斯大林模式扩张史，缺乏理性和道义。”虽然这一表述有缺精当并且在后来又有了修改和发展，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恪守这种观点的基本精神。

1995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的最后一篇论文后，我考入了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仍是苏联对外关系史。于是在原校没有搞完的课题便顺理成章地转为我博士论文的基础。在读完了学校规定的一

年课程后，从第二年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于既是论文也是书稿的撰写。1998 年 6 月,当我的博士论文‘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冷战的起源(1945—1947 年)’通过学位答辩时,含有这部分内容的书稿《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 年)》也已竣笔了。然后在寻找出版机会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又不断地补充材料和修补缺陷。

如此算来，从课题立项、搜集材料、展纸伏案到最后掩卷封笔，这部书稿竟也断断续续地写了 5—6 个年头了。虽然自感效率不高因而不敢大肆张扬，但能最终完稿却也有如释重负之感。谢天谢地之后，照例应当谢人。我衷心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先生和邢书纲先生为本书惠写了出版推荐书。我尤其要感谢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几年来，他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此外，书中有一些未注明出处的俄文原档文件，系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苏关系历史档案课题组》，特此说明并表谢意。

对于此书的最终出版，我要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李正乐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半牧等同志所给予的巨大帮助。

这里，我还特别要感谢我侨居美国的姐姐张桂凤女士。如果没有我姐姐那种令人没齿不忘的帮助和关怀，且不说此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就连我自己的生活也是无法想像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只是在撰写的过程中，我才感到冷战那种在国外已经被做滥的题目是那样地难以驾驭，写起来又是那么地艰难。拙著的出版，权作我不自量力地在中国研究冷战的领域里不知深浅的跛行。如蒙高手扶正，自当深以为谢！

张盛发

1999 年 3 月于北京